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任	朱作霖				
副主任	刘 恕	刘济民	李东海	吴 福	宋 埜
	金开诚	金冲及	龚育之	张文惠 (常务)	
委员	王庆成	王晓秋	王楚光	刘景录	李汉秋
	陈 威	陈 砾	陈漱渝	周秉德	弥松颐
	傅璇琮	舒 乙	党德信	马 威	胡太春
	俞兴茂	霍明光			

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

本辑执行编辑 孙晓鸥

# 目 录

## 军政史料

- 忆国民军训 ..... 李骧骐 ( 1 )  
国民党军需署亲历记 ..... 黄念勤 ( 17 )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纪实 ..... 秦 箜 ( 24 )  
湖北襄枣师管区军服舞弊案始末 ..... 李春初 ( 34 )  
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 ..... 章 培 ( 43 )  
陆军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回忆 ..... 卢凤阁 ( 61 )  
国民党各派系在西南公路上的权利争夺 ... 苏从周 ( 78 )

## 人物述林

- “山东王”韩复榘琐记 ..... 王华岑 ( 84 )  
我所了解的刘茂恩 ..... 刘亚仙 ( 98 )  
我所知道的刘郁芬 ..... 范学增 ( 112 )  
刘震东生平 ..... 刘 林 刘淑华 ( 130 )

## 宗教史料

-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忆略 ..... 王佐良 ( 138 )  
解放前天主教在阆中概况 ..... 阆中县政协 ( 142 )  
建国前河套区天主教史略 ..... 段德荣 ( 147 )  
北京道士火烧白云观安世霖、白全一亲

历记 .....	许英华 (155)
我所知道的虚云和尚 .....	觉  澄 (167)
能海法师集传 .....	仁  祥 (183)
我对太虚大师生平的回忆 .....	雪  嵩 (191)
杨仁山居士的生平及其事业 .....	游于默  李  安 (194)
忆格达活佛 .....	邓珠拉姆等 (205)

### 文化史料

艺涯南北七十年 .....	徐志良 (212)
---------------	-----------

# 忆国民军训

李 驥 骥\*

我在 1935 年到 1937 年间曾经主办过上海市的国民军训（包括公民训练），又在 1939 年到 1943 年主办过全国性的国民军训。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写出来，提供编写文史资料的同志参考。但仅凭记忆，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对这方面情形熟悉的同志加以指正补充。

## 国民军训的实质及其演变

国民军训最初是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对全国青壮年普遍实行军事控制和政治麻醉的一种形式。早在复兴社未成立前即 1929 年，蒋介石就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套办法，开始试办青年夏令营，在暑期内实行短期的军事训练。后来，凡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普遍实施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并颁布有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法，成为中等以上学校教育中一种制度。1932 年复兴社成立后，国民军训就完全成了进行法西斯组织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主持这种组织训练的总机构是在训练总监部内设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名义上为公开的机关，实际上是受复兴社的指

---

\* 作者曾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副处长、上海市军训会主任委员、上海公民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



挥。关于这一部门的用人行政，即当时的总监唐生智也不能过问。处长人选最初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后由复兴社举荐。先派贺衷寒为处长，贺因事触怒蒋，派赴日本留学，改由潘佑强继任。潘亦因不得蒋欢，又改派鄧悌继任。蒋介石为进一步毒化青年，以考察名义派鄧悌赴法、意留学，又改派杜心如继任处长。贺、潘、鄧3人担任处长都为时很短，独杜1人从1936年起到1938年训练总监部撤销止，担任处长两年多。贺衷寒、潘佑强、杜心如、鄧悌都为复兴社组织领导层中的湖南人，除鄧悌性情乖僻自负而外，其他几人都是连成一气。还有邓文仪、萧赞育、刘咏尧、张镇、袁守谦等，也都是湖南人，再加上留俄和留日的关系，就形成了以贺衷寒为首的湖南派的小集团。我在1928年到1930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和贺衷寒、萧赞育、潘佑强、杜心如等又恢复了黄埔同学的关系，直到1931年和贺衷寒一同结伴回国，私人情感很好。回国后，因贺衷寒的关系，又和刘咏尧、邓文仪等经常接触，无形中我也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中的一个。我记得有次在南京铜铜巷贺衷寒家里闲谈，贺很郑重地说过：我们的行动须要注意，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和攻击，说我们搞小团体。国民军事教育处始终掌握在几个湖南人的手里，就是这个小团体发生的作用。

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于1938年1月17日改组，军事委员会，包括训练总监部在内的有6个部撤销，另成立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至同年初夏组建完成，以第二厅接管国训业务，厅长由原国民军事教育处长杜心如担任，我任副厅长。当时蒋介石虽然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口号下不敢公开反对共产党，但对全国青壮年的思想行动仍然加以严格的控制。陈诚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继续加强对青壮年进行思想麻醉和政治欺骗，首先是加强对原有军训教官的思想教育，其次是培养新的军训干部。蒋介石由武汉撤退到重庆时，在浮图关成立中央训练团，对所有党政军人员进行短期的精神训练。中训团

下设军训人员训练班，调训全国各大、中学的军事教官。又在重庆附近的杜市成立军训教官训练班，培植新的军训教官。对杜心如和我，在业务上也进行了分工，以杜心如兼军训教官训练班主任，长期驻班主持教育，我主持厅务。在中训团调训的军训教官，更分期分批举行，每期训练时间为6个星期。训练内容，除中训团原有的政治课程外，着重业务研讨和思想考察。在杜市的军训教官训练班是长期设置的，训练时间为1年。训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配合进行，但着重在政治思想的灌输。由于军训教官散布在全国各大、中学校控制着广大青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资本，陈诚的这项措施，是企图在国民军训部门中造成一个新的系统。

1939年秋，国民政府鉴于兵源补充困难，修改了兵役法，以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实行全国皆兵的口号来号召全国青壮年应征兵役，实际上寓将于学不过是为有钱人的子弟不服兵役开一条出路。由于新兵役法的规定，国民军训的名称已不复存在，原国民军训的社会军事训练定名为壮丁训练；原国民军训的学校军事训练，在中等学校定名为预备军士训练，在专科和大学定名为预备役候补军官佐训练，仍总称为学生军训。由于兵役制度的建立，国民军训已不能为政治部陈诚所独占，首先引起争执的为何应钦主持的军政部，理由是壮丁训练和学生军训都属于兵役范围，军政部主管兵役，这两种训练都应由军政部统一办理。其次是白崇禧主持的军训部也相继起而争执，理由是国民军训一贯为前训练总监部主管，军训部接前训练总监部全部业务，不应该把国民军训这一部门单独地分割出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专门召集有关各部进行多次协商，都不得要领。1940年春，陈诚去职，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长，他把国民军训全部推让出来，这一场争夺战才初步得到解决。解决办法是划分两部掌管，在军政部成立国民兵司，掌管壮丁训练的组织征调一切事宜；在军训部成立国民兵教育处，掌管预备役军士或候补军官佐组织训练一切事宜（仍简称为学生

军训)。关于壮丁训练的人事经费属于军政部，关于学生军训的人事经费属于军训部。这两种训练的教育计划由军训部统一制订。以政治部第二厅长杜心如调充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长，我由副厅长调充副处长。军训部接管学生军训后，同样的首先是调训全国各大、中学生的军训教官，并在中训团第 19 期一次调训完毕。训练内容全照中训团规定。主持教育部的陈立夫一贯对学生军训不满意，过去在复兴社控制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所谓党方（代表 CC 系）、军方（代表复兴社）就互相摩擦，互相争夺。陈诚接管后，上下摩擦并没有停止。到白崇禧接管后，陈立夫即正式提出学生军训应归教育部掌管，理由是学生教育应以科学文化为主，军事教育为辅，为了配合适当，不影响学生的学业，应该由教育部掌管，统一事权。这次的争执比在政治部陈诚主管时闹得更凶，时间闹得更长。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教育部和军训部都开过多次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均无结果。最后，陈立夫控诉于蒋介石，蒋介石令白崇禧与陈立夫两人当面协商。白崇禧不得已约请陈立夫在重庆李子坝住宅直接谈判，还有我和教育部郝更生座。我和白崇禧、陈立夫两人的关系本无所谓厚薄，但因过去我在上海搞国民军训时，和 CC 系的潘公展、吴开先、吴醒亚等的摩擦旧痕尤深，因此并不愿意把学生军训让给教育部。在谈判中，白崇禧和陈立夫都是倾听我和郝更生二人的意见。我是坚持对学生的一般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能混为一谈。教育部主管的是一般教育，军训主管的是军事教育，以学生的军事训练划归军训部掌管是理所当然。当前的任务是要以军事力量把日本侵略军打出中国去，而不是凭空喊。如果国家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学生？彼此谈判至深夜，最后白崇禧支持我的意见，使陈立夫、郝更生不欢而去。通过这次谈判，军训、教育两部摩擦日深。我于 1943 年秋调充军训部第七督训处长，派驻广东第七战区，以后学生军训的争执情况就不清楚了。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军事制度完全美式化，原军事委员会撤销，国防部成立，学生军训划归预备

干部局，这个工具又为蒋经国所掌握了。

## 国民军训的组织训练

国民军训的组织系统主要分中央、省市及市县三级。中央于1938年前为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主管。1938年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主管。从1940年到抗日战争结束，又改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民兵司）和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分管。省市于1939年前由中央派员会同省市政府及教育、社会有关厅局组织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持其事。1939年后，随中央主管部门的变更和兵役机构的建立，改由省市军管区司令部（军训处）主管。市县于1939年前在市县政府下设自卫团（总队），县长兼团（总队）长，由中央分配社训教官任副团（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团（总队）以下分设壮丁训练队、常备队、自卫队、模范壮丁队等，按实际情况而定。1939年后，改为市县国民兵团，内容无大变更。在各特别市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即由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直接主办，按市属行政区域划分分别组织若干大（中）队，由各区警察分局长兼任大（中）队长，另派社训教官任副大（中）队长，负实际责任。学生军训，无论学校设置在省市或市县，一律由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军训处）直接指挥，都不通过学校所在地的行政机构，对教育部门仅给以必要的通知。在中等以上学校设军事训练中队或大队，以校长兼任队长，军训主任教官任副队长，负实际责任。其余军训教官或助教分任队干部。

军训教官的来源，主要是从康泽主持的星子特别训练班和梁干乔主持的南京政治训练班调派的。这些班的学员原来都是黄埔各期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复兴社，法西斯作风尤为强烈。在全国范围内，凡中等以上学校多半都派有军训教官和助教二三人到四五人，以各校学生人数多寡而定。各校均设有军训教官办

公室，设主任军事教官 1 人，为中、少校级；军训教官若干人，为少校级；助教若干人，为上尉级。军训教官的升迁调补与奖惩，完全由军训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统一掌握。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可以提出意见，申请办理。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经常费和事业费，由省市政府开支；所有军训教官的薪金则由国民军事教育处统一发给。其中有少数助教由学校聘任，其应得待遇由学校负责。复兴社在各学校都成立了支社或小组，以军训教官为核心，指导学生进行政治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1. 研究执行复兴社的指示；2. 考察学生的思想行动；3. 同学校中的 CC 系争夺青年；4. 收集情报，向复兴社反映情况。军训教官是受双重指挥，在工作上要接受当地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调配，在组织上要接受复兴社的指挥。

关于国民军训的实施方案、办法、规则等等规定得很多，其主要内容分为学校军事训练（简称学生军训）和社会军事训练（即壮丁训练）两个部门。在 1935 年前，学生军训逐渐推广到全国各中等学校以及专科、大学。从 1935 年开始由南京市举办壮丁训练，逐渐推行到全国各省县。上海市由于环境特殊，改用公民训练，实质上是一致的。壮丁训练，一般都规定在早晚实施，每天训练时间共为两小时，有军事操练，也有政治讲话。每期训练时间为 3 个月，训练完毕发给受训期满证书，并按地区编组，随时召集复习。在农村的壮丁训练，有的按一般规定分散训练，有的按季节分期集中在县训练。

学生军训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在校训练，即平时训练；一是在营训练，即集中训练。凡中等以上专科、大学一年级新生，必须经过这两种训练，发给受训期满证书，始准升学。在校训练时间，每周六到八小时，完成新兵教育。在校训练时，各学校都组织军事训练队，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在营训练，是在每年暑期举行。由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同当地政府机关组织暑期学生集中训练总队，以省市市长或当地驻军的师长兼任总队长，以国

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为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集中各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升学的学生统一实施。军训教官都调充中队以下队职干部。中队以上队职干部，则由部队中的营、团长临时调任。在校训练的军事课程，由单人教练到班排教练。政治课程，无论在校在营训练，都始终贯彻着法西斯教育，如“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等，都是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观点出发，用以麻醉青年思想，使之拥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每届集中训练完毕，必大量吸收中毒较深的青年加入复兴社组织，在军事教官的控制下，拉拢落后学生，打击进步学生，搜集情报，阻碍和破坏革命运动。

### 上海市国民军训的实施概况

上海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简称上海市军训会），由中央派主任委员1人，专任委员3人，上海市教育局、社会局、公安局、保安总团、保卫委员会各派兼任委员1人，共9人组成之。直隶于南京训练总监部，受上海市长的监督指导，并在军事上接受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指挥。会以下设三组，分管学生军训、社会军训及总务文书等工作。主任委员及专任委员的薪金由中央发给，兼任委员只支交通费，由上海市政府开支。首任主任委员为贺崇梯，黄埔一期学生，因受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排挤，到差未久即去职。继任者为焦绩华<sup>①</sup>，留德学生，因与CC系有关系，复兴社不信任，又改派我继任，同时并另派专任委员陶一珊、罗克白、赵柱中3人，彻底改组军训会。上海市复兴社组织的主要骨干为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保安总团长吉章简，大学教授刘炳蓁和我，由蔡劲军任书记，吉章简、刘炳蓁和我任监察，并另由南京复兴社总社派郑全山为助理书记，负实际责任。

<sup>①</sup> 查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军政职官人物志》，记为张绩华。

主要目的为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对文教界、工商界、社会团体都进行组织宣传、情报等活动。军训会的工作，是配合复兴社进行公开的活动。最初只主办学生军训，比较单纯，和 CC 分子的摩擦只限于学校以内。在 1936 年，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市政府下成立上海市公民训练处，组织训练全市市民，以社会局长吴醒亚兼任处长，同上海市军训会形成了对立。吴醒亚是 CC 系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在组织活动上和上海复兴社结成了一对冤家。因此，上海复兴社以公民训练即壮丁训练为国民军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为理由，向市长吴铁城提出异议，反对吴醒亚担任处长。吴铁城对 CC 系和复兴社是两面应付，都不得罪，由于没有理由支持吴醒亚，不得不改任我以军训会主任委员兼任公民训练处长。从此军训会的工作逐渐接触到工商界、文教界、社会团体以及工厂工人和一般市民，不但工作本身错综复杂，并且同 CC 系分子的摩擦更加激烈。针对这种情况，会内三个专任委员也进行了分工，以陶一珊主管公民训练，罗克乌主管学生军训，赵柱中主管国民军事教育，各兼任委员除公安局和保安总团所派者外，只在每月例会出席会议，实际上不过利用他们保持对各机关的联系而已。军训会和复兴社的秘密关系他们是无法知闻的。

上海市设立学校之多，占当时全国之冠，学生人数以数十万计。每年应参加军训的一年级新生约近万人。派驻各中等学校、专科和大学的军训教官、助教约 150 多人。在校训练时，各军训教官每周除担任六至八小时的军事学科或术科的讲授外并对学生生活进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在生活管理中，配合复兴社布置的工作，对学生进行组织宣传和情报等活动。政治教育一课主要由我担任，每星期抽出一两天时间，以视察为名，轮番到各校对受军训的学生作“精神讲话”。利用参加各学校的开学校庆、结业和其他纪念的机会对全体学生宣传“军国民教育”。在校训练，须完成新兵的教育；在营训练，须完成预备役军官佐（上）教育。1935 年的集中训练地点，在苏州“老五团”旧营房，定名为

“上海市第一届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兼任，副总队长为上海市军训会主任委员焦绩华，公安局长蔡劲军，教育局长潘公展，保安总团长吉章简等。以焦绩华为常务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各级干部来源，除原有军训教官外，由上海市保安总团调充，这一届参加受训的学生有 2000 多人。1936 年的集中训练地址仍在苏州原地，定名为上海市第二届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驻无锡八十三师师长宋希濂兼任，副总队长为钟彬（八十三师副师长）<sup>①</sup>、蔡劲军、吉章简、潘公展和我。我为常务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各大、中队干部，除以原有军训教官、助教充任外，由八十三师调充。这一届参加受训学生 3000 多人。

训练内容一二两期都大致相同。在军事学科上是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术科上是单兵教练到班、排、连教练，由操场练习到野外演习。在政治教育上，照例是“领袖言行”、“发扬革命精神”、“复兴民族”之类课程。除南京复兴社总社组织的一批“名流学者”以及总队所邀请的上海市军政长官来队作报告和讲演外，主要是由宋希濂和我在每日早起升旗时，经常作“精神讲话”，最重要是依靠派驻各大、中队的指导员利用早晚集合时作简短的讲话，并随时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

训练将届完毕，蒋介石下令召集南京、江苏、上海三地集训学生到南京聆训，并指令京沪铁路专车输送。对学生每人加发新草绿色军服 1 套，水壶、干粮袋、腰皮带各 1 件，并用黄缎印制胸章 1 枚。宋希濂和我为了取得蒋介石的欢心，还集资铸造金头短剑 1 把，在聆训时，当面献给蒋介石。同时到达南京的集训学生连同原在南京的共有 8000 多人。蒋介石在对三省市集训学生训话前进行检阅，在检阅中，频频向学生们点首，在训话中主要

---

<sup>①</sup> 据刘国铨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宋希濂时任二十六师师长，钟彬时任二十六师副师长。



是讲解“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勉励学生要谨守“四维”、“八德”、“尊师重道”、“忠党爱国”。经这次聆训，我和宋希濂拥护蒋介石更积极。由南京回到苏州后，即发动集训学生向他们的家长募捐，集资10万元，购买飞机1架，命名为“集训号”，献给蒋介石为祝寿寿礼。

集训完毕后，我回到上海，即积极筹划下一届的学生集训工作，考虑了有3个问题必先解决。一是下届应集训的学生将近1万人，苏州老营房已容纳不了。二是学生使用的武器、弹药、服装、装备、器材、交通工具、铁床、蚊帐、脸盆、桌凳以及其他一切用具等等，一次设备就消耗几十万元，因无固定营房，保管不易，每年补充一次，又为数不少，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三是从上海到苏州的交通运输虽有铁路可资利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也是一种浪费，并增加工作上不少的困难。因此，我建议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上海市郊新建营房作为一劳永逸之计。在暑假期间用以集训学生，其他三季，用以集训市民，两得其利。吴铁城接受了我的建议，首先拨款100万元，责令上海市公用局长徐佩璜负责计划建造。在上海郊区华漕镇征用民田350亩作为建筑基地，采用适应军事需要的既分散又集中的军事堡垒形式，建造一个可容纳1万人的完整营房。每个中队配属两幢营房，一为中队部及学生宿舍，一为讲堂及饭厅，并附加有厨房及卫生设备。每个大队为一个区域，当中建造一个大队部。以上均为平房，独总队部为楼房，建立在全营最前面的中央，站在指挥台上面，可以观察到全营的活动。营内设有共同浴室（包括盆堂和池堂），有阅览室、俱乐部，有内操场、外操场。从1936年9月开工，至1937年5月建造完成，共花了近200万元，并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为“中正营”。1937年的集中训练即在新建营房举行，定名为上海市第三届学生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驻在上海附近的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兼任，副总队长仍为蔡劲军、吉章简、潘公展及我。以蔡劲军兼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以我为常务副总队长，负实际

责任。各大、中队干部除以原有军训教官调任外，由八十七师营团长调充。这一届参加受训的学生有 9000 多人，内有女生 100 多人，另成女生队，进行军事看护训练。在集训之前，陈立夫早有准备，计划在这一次对学生要进行大规模的组织活动，经向蒋介石请准在总队部加设政治教官办公室，并指令潘公展以副总队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潘在上海集中大批 CC 系分子，介绍给总队部聘任为政治教官。在潘的指挥下，白天对学生讲授政治课程，晚上分赴各队找学生谈话，暗中进行组织活动。在星期日放假时，还组织学生在外集合或聚餐。复兴社为了阻挠和破坏 CC 系的计划，并进一步争取学生和组织学生，除责成各军训教官利用职权对学生生活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外，并在上海调集大批骨干分子，以训育委员会名义分派为各中队驻队指导员，考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动向。总队部又在星期日用专车运送学生回家时，按照他们的住址分地区编组，每车指派军训教官一人负责押运，名为照顾，实际阻止 CC 系分子和学生接触，使他们约会学生的计划无法实现。这次集训，复兴社的收获很大，大量吸收了学生，仅由我经手介绍加入复兴社的就有 500 多人。从此，上海复兴社的声势更壮，气焰更高，和 CC 系分子在上海的争夺战，也占压倒优势。集训完毕后，CC 系分子垂头丧气，大叫失败。这一届训练内容基本上和第一二两届相同，比较突出的是复兴社总社书记刘健群和汪精卫、戴季陶等都来作过讲演。他们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主要是：刘健群讲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的“国策”，汪精卫讲当前形势的剖解及如何救亡图存，戴季陶讲三民主义的真谛。他们都很会讲话，特别是汪精卫的讲话，煽动力很大，讲了四五小时，学生站着听，自始至终队伍不乱。他们讲话后，都表扬学生集训是一个成功的训练。

集训到最后一个半月，即“八一三”的前夕，上海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不断向上海增兵，并在上海到处挑衅制造事端，特别是在 8 月 9 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大有暴雨即到之势。总队

部鉴于局势危急，提前结束集训。上海复兴社同 CC 系的争夺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曾经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企图作为永久训练基地而建成的新式营房“中正营”，也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军的炮弹所摧毁，全部化为乌有。

上海市的壮丁训练改称为公民训练很适合当时上海人的口味，最先响应的有所谓上海闻人王晓籁、刘鸿声，先施公司经理郭顺，报关同业工会理事长陈泮君，新生纱厂厂长赵国良等 100 多人。他们听说工厂店员等都要受军事训练，害怕自己落后，影响他们对工人、店员的管理控制，于是首先自己报名参加。公民训练处为他们成立特别训练队，我兼队长，以专任委员陶一珊为副队长，并组织有杜月笙等参加的队务委员会，共同研讨有关教育、生活上的一切问题。训练内容注重在军事常识的灌输和军事基本动作的演练。他们不上政治课程，仅在每周纪念孙中山总理的周会上，由我传达蒋介石在新近发表的言论，作为“精神教育”。每日早晨，他们同汽车司机都穿着草绿色军服，驾驶着自备汽车，来到沪西区谨记路队址集合。训练时，他们分一处，汽车司机分一处。从上午 5 时起至 7 时止，每日训练 2 小时，3 个月结业，同样发给受训期满证书。由于他们的影响，的确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特别是工商界都要求参加。公民训练处在组织训练时，对汽车司机和旅馆、饭店、理发、浴室工人，码头脚夫，黄包车夫，清道夫等，每期抽调一小部分参加训练。为了便于指挥，在处之下，设置公民训练总队，我兼总队长，以专任委员陶一珊为副总队长，专司其事。总队之下，按行政区域成立 10 个大队，以当地公安分局长兼任大队长，另派军训教官一人副之，负专责。大队之下，设 4 个中队，有的以工厂、企业为单位编成一个中队，有的按街道编成一个中队。每日从上午 5 时至 7 时为训练时间，在特殊情况下，则在下午 6 时至 8 时利用电灯光进行。住在租界的，每日早晨用卡车输送到指定地点集合训练。训练时，一般都以中队为单位，所需武器、弹药由公民训练

处发交各大、中队保管，随用随取随收回。队员需用的服装、装备、交通工具以及其他费用，均由各工厂、企业等单位开支。单独生活的则由各同业公会开支。中队干部最初由公安分所长或保安总团的排长兼任分队长，警士或保安总团的班长兼任班长，都酌给津贴。由于事权不统一，指挥上发生困难，经向市长吴铁城请准在公民训练处之下，设立公民训练干部教练所，招收失业学生，培养新的干部。第一期训练 150 人，第二期训练 200 人，每期训练 6 个月。结业后，分派各中队为专职分队长，逐渐代替公安局和保安总团调任的干部。第二期将届结业，正值上海抗日战争发生，第一期分发的学员都调充中队长或副中队长，第二期学员，分派为分队长，接替第一期学员的职务。

训练内容，按壮丁训练的一般规定，在 3 个月内完成新兵教育。政治教育由上海复兴社派员担任，有的每个中队设政治教官 1 人，有的以一至三个中队共设 1 人。我在每日早晨，必须视察一至三个中队的训练情况，有时集中一个大队会操。在视察中，必须对受训公民作“精神讲话”和政治测验。从 1936 年至 1937 年，共训练公民四期，合计 25000 多人，其中有公司经理、董事长、各同业公会理事长、各工厂厂长、工程师、店主、小开、店员，还有汽车司机，旅馆、餐厅、浴室工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清道夫等。每期训练完毕，由上海市长吴铁城会同中央派员在上海龙华飞机场举行结业典礼，并邀请上海各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共同检阅训练成绩，发给受训期满证书。经过各期训练后的公民，都按其所在单位和地区分编为队（组），作为永久组织，并指定其中复兴社分子 1 至 3 人为通讯员，担任指挥联络。

1937 年 7 月，张治中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准备在上海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派刘孟纯等为代表来到上海，调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军事部署，了解上海市民的思想情况，并与我联系组织别动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我被任为上海别动队第二纵队司令，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上海市保安总团第一二两团组

成，以钟某为支队长，第二支队从受训公民中挑选 5000 人组成之。纵队任务最初是担任闸北、沪西的警戒，交通路线的安全，以及维护华界及租界交界处的秩序。在“八一三”战争开始后，全部警察都调赴前线，市内空虚，第一支队不听指挥，自由行动，全部责任都落到了第二支队肩上。战争到第三个月，前线紧张，调第二支队集中苏州河南岸，构筑第二防线防御阵地。最后，第二支队分为两部，以一部随国军退至浙江，一部配合国军某旅扼守南市，掩护国军的撤退，同日本侵略军激战一星期，按照预定计划，退入法租界，南市失守。

### 国民军训的作用及影响

国民军训是实行国民教育的基本训练，对发展复兴社组织，宣传和执行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复兴社在各省市都设有分社，各省市军训会有支社，各学校和县壮丁队都有支社或小组，无小组的有直属通讯员。各级军训教官，绝大多数为黄埔学生，又大都是复兴社分子，在复兴社各级组织中起骨干作用。各支社、小组，在各学校和市县壮丁队中，又起核心组织作用。从分社、支社、小组到社员，惟一的任务是“限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在学生和壮丁中，如遇有条件符合的，可以联名介绍加入复兴社组织。如发现特殊情况，则随时向小组报告。对受军事训练的学生和壮丁，首先必讲授陆军惩罚令和陆军刑法条例，使学生和壮丁严守军风纪，绝对服从军训教官的命令。军训教官利用法令规定和权力，对学生和壮丁的思想行动进行监督和管制。所以军训教官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受训学生和壮丁都得惟命是从。上海的情况，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36 年西安事变，我在上海发动军训教官在各学校和公民训练队进行营救蒋介石的签名运动，除受训学生、公民都参加签名外，其他学生和公民也有不少被迫签

了名。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时，我又发动军训教官组织学生和壮丁5万人，在上海江湾、闸北、沪西、南市等区举行火炬游行，庆贺蒋介石的“胜利”归来。在蒋介石60岁生日的那天，我又发动军训教官召集受训学生、公民，分区集合会操，为蒋介石助兴。当晚，我又集合全市军训教官，并邀请上海市长吴铁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以及各党政军负责人，共200余人，在沪西冠山园农场举行宴会。我在会上致词，歌颂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所谓“精诚感召的伟大”。吴铁城的讲话，也颂扬了蒋介石“丰功伟绩”。在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我又发动军训教官，一方面组织受训学生编为战地服务团，共三个团约1000余人，分配在前线各部队，担任担架救护及运输工作。据事后了解，这批学生大都补充了部队初级干部，伤亡也不少。另一方面是组织受训公民编入上海别动队第二纵队。最初在张治中的指挥下，担任上海市区的警戒和维持秩序。战争中期，被调在苏州河南岸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战争到了末期，戴笠来到上海，组织“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立意要从我手里夺取这个部队的指挥权。他在南京替我代领了蒋介石发的3万元扣住不交，使部队生活无法维持。我指派陶一珊全权负责，连同所有人员武器拱手交给了戴笠。随后戴笠请我担任“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委员，我亦没有接受。最后，这个部队以一部份配合国军某旅扼守南市，掩护国军撤退后退入法租界；另一部分随同戴退到浙江地区。在抗日战争中，阻击新四军抗日行动的所谓“忠义救国军”，就是以这个部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市的受训公民同全体市民一样，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对蒋介石所谓“复兴民族，发扬革命精神”，都抱有一种幻想。1946年夏，以王晓籁等为首的200多人，代表全市受训公民欢迎我回到上海，并组织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通过了组织上海市公训同学会，并为在抗日战争中死亡的上海公训同学建立纪念碑，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对曾经受过军事训练

的公民，重新调查登记，编为“义勇公民队”。曾在上海市跑马厅举行一次检阅，作为典型示范。参加检阅的有受训公民 2000 多人。我在检阅后，提议公推吴铁城为公训同学会名誉理事长，得到了一致通过。1947 年春，军事形势正向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蒋介石军队士气沮丧，经济困难。我以公训同学会名义，发动了上海市受训公民到苏北南通向第一绥靖区部队劳军。组织了以王晓籁等为代表的 100 多人，携带各种物资和食品，用专轮输送到达第一绥靖区各部队举行劳军活动。劳军归来后，在公训同学会集会捏造解放区情况，对受训公民作欺骗宣传。陶一珊成为戴笠特务系统中的骨干分子，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利用过去旧关系，又打入了公训同学会，运用稽查处的职权，暗中拉拢一些受训公民，组织义勇稽查处，作了特务的外围。为了此事我和陶一珊发生了摩擦，在组织上海市学生军训同学会的活动中，我把陶一珊排除在外，不让他插足进去。这两个同学会从 1946 年先后建立，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和巩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也引起了对外人对这两个组织的注意和覬覦。特别是对公训同学会都想染指。在竞选国大代表前，萧作霖同宣铁吾（淞沪警备司令）组织什么建国会，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推我担任他们什么会的监察。傅正模（上海师管区司令）也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表示要和我合作。李默庵（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在蒋介石面前请准调我任第一绥靖区政治部主任，对我表示好感。还有其他搞竞选活动的，也都想和我打交道。他们这样拉拢我，都无非是企图把这一力量拉过去，作为他们政治活动的资本。但我坚持不为他们所动。由于我经常不在上海，让原上海市军训会及公民训练处教育主任曾庆辑和军训部国民兵教育处科长张心宇两人分别负责主持其事，因此，被陶一珊又拉过去一部分力量。

（1963 年 5 月）

# 国民党军需署亲历记

黄念勤\*

我自1932年5月被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司长白云深电召赴南京在该司供职起，至1939年12月调任军政部桂林第六军需局第三科科长任职一年后交卸时止，共达8年之久。现将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分述于后。

## 蒋介石口袋里的军需署

军政部军需署成立于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党政府时，辖三司一处，即会计司、储备司、营造司和总务处。会计司掌管各部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经费的给与，储备司掌管粮秣、被服的给与，营造司掌管军用土地、建筑物的营缮、利用和保管。至于总务处则掌管人事、购置、警卫等项事宜，与普通机关无异。各司处分散办公，各自为政，颁发有印信。第一任署长为俞飞鹏，军需学校第一期学员班毕业。以后继任者为朱孔阳、周骏彦、陈良，均非军需学校出身。此四人都是蒋介石的同乡，并和蒋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军需署虽隶属军政部，但其用人行政，部长不能过问，而是由蒋介石亲自裁决。举凡各部队经费的给与或军需品的补给，都

---

\* 作者曾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被服科筹办组组长、桂林第六军需局第三科科长。



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蒋的嫡系部队待遇最优，整编部队次之，新编部队又次之，杂牌部队则概不予以经常补给，仅到必须利用时酌予少量接济，以资维系。最不合理的是蒋的一些秘密开支。例如他所信任的少将以上高级军官，每到年终各给以慰劳费，至少数千元，多则数万元。又蒋在军阀内战中，一遇到紧要关头，便施展其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手段，运动对方将领倒戈。如送给石友三 100 百万元，使其倒冯（玉祥）投己；送给李明瑞 40 万元，使其倒桂投己。有他的心腹大胆力谏其不可如此，他反骄傲地说：“只要他们想升官发财，我这种办法总是行之有效的。”此话其实不然，因为类似石友三这种人，不独想升官发财，而且想惟我独尊。当其得到运动费时，又可招兵买马，一旦毛羽丰满，对蒋不免又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

蒋介石的这些秘密开支，虽然不要他掏出私囊，而是在他掌握的公费中任意动用。但开支庞大，何来如许巨大的财源供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呢？当他资金周转不灵时，便滥印纸币。所谓法币，不到 10 年发行额便达 690 万亿元之巨。结果通货膨胀，币值日渐低落，金融紊乱，工厂倒闭，商业萧条，民生凋敝。

## 储 备 司 概 况

储备司职司军用粮秣和被服之筹办、贮存和补给。内设三科，即粮秣科、被服科和材料科。粮秣科因那时军用粮秣皆采用金钱给与，故事务不多。被服科划为筹办、补给两组，筹办组负被服成品筹划制办之责，制办之法分设厂自制和招标投标承制两种，有关被服厂之管理和承制商资格之审查、登记以及投标、开标诸事务，均归该组负责；补给组负审查各部队、机关、学校编制人数，核定配给被服品种、数量和填发给与通知单之责。材料科分为厂务、库务、出纳和检验四组，厂务组负制造材料的各军需工厂（制呢厂、制革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管理之责；库务

组负被服品运输和管理各仓库之责；出纳组负被服新品发出和废旧品回收以及年终被服物品出纳汇总报销之责；检验组设有检验器械和储藏标本室，负被服成品材料的规格检验并制作说明书之责。全司职员共计 100 人，另有由各仓库调用的数人。我被派在被服科筹办组主持工作。司长白云深命我着手陆军制服条例之拟订。其间经过用部文咨请外交部转请驻英、美、德、法、日中国大使馆，搜集各国现行陆军服装寄回以资参考，拟制适合我国陆军之大礼服、军常服和军便服的制式，制作样品陈列军政部，听取军职人员参观提供意见，再择善修改样品陈列于军事委员会。待参观者无意见方作最后决定，拟具陆军制服条例条文并附图说明，用部文呈请军事委员会转请国民政府公布。阅时年余，始完成这一任务。

那时的军需工厂计有南京被服厂、北平被服厂、武昌被服厂、北平制呢厂、武昌制革厂和南通军工厂等 6 个厂，另有一皮件工场附设于武昌制革厂内。后来又接收了日本汉口泰安纱厂（接收后改名汉口纺织厂）。内中除北平和武昌两被服厂因原有设备简单扩建不易，南通军工厂不具备扩建条件，及汉口纺织厂机器完整无需扩建外，其他三厂后来的扩建和变革情况从略。

以军需署当时在朱、周两位昏庸署长的领导下，本无发展可言，然白云深终能惨淡经营，将储备司办得生气勃勃。当时，该司职员中亦有少数人腐化堕落，如有一位少校科员于分配他的工作中，只肯承办被服厂事项，其他工作拒不接受，且多次向被服厂厂长借用公款。当时我很奇怪，后来考察他公余之暇好作“秦淮之游”。又有检验组的一位技正报告，北平制呢厂历年制造成品预算所用羊毛原料，多报消耗 120 万斤，请予追究。后经核实，该厂并未多报消耗。原来该技正因向制呢厂勒索未遂，怀恨报复。再如每次派出监制、验收私商承办之被服的人员到达沪、汉后，经不起奸商引诱，每夜秦楼楚馆，纸醉金迷，不独过了数月腐化生活，而且满囊而归。

## 署长亲自采购劣等军用品

记得有一天军需署突接蒋介石由南昌来电，大意说，据某军检验所领雨笠、草鞋，品质极劣，不能使用，命将负责人员押解南昌。当时署长是朱孔阳，即飭令储备司火速照办。全司人员莫不为领导全司的司长、配发物品的材料科长和采购者担忧，以为在蒋的盛怒之下，3人去南昌必定凶多吉少。是时我代理材料科长，经查明这种劣质雨笠、草鞋系署长朱孔阳亲自前往上海采购的，未经验收手续，径行运交仓库。我曾到仓库检查，见朱采购的雨笠、草鞋确属质劣不堪；另有储备司派员采购者则质地优良（雨笠系湖南地道货，经久耐用；草鞋系用布条编成，和朱所购纯用禾草编成者有天渊之别）。于是将库存湖南雨笠定为甲种雨笠、布质草鞋定为甲种草鞋，并严告库长以后只准发出甲种，不准以劣充优，随将劣者封存，以杜流弊。我遂向司长白云深面陈，认为司长和我没有硬着头皮去南昌碰钉子的理由。白即向朱详陈经过情形，朱至此无话可说。白见朱有忸怩之色，不便再谈而退。后因朱孔阳是蒋介石任用的私人，此案便不了了之。

## 孔祥熙“放鹰捕鱼”

孔祥熙察知军需署储备司每年开支被服费数亿元之巨，认为大有油水可捞，便向署长周骏彦推荐王钟到储备司接替白云深司长之职，“放鹰捕鱼”，为他敛财。

王钟缺乏军需专门学识和经验，仅在孔的实业部长任内当过科长。以一文职人员滥充少将司长，其不称职不言可知。曾任被服科长的邵方铭告诉我：“王钟屡次替储备司丢人，在署务会议中，署长问及有关储备司的问题，他不知道怎样答复，涨红着脸，都是我代为答复，解除他的困窘。”王没有家眷在南京，却

租赁一大栋房屋。司中有一同事以为他必和前任司长一样，欢迎职员到家中畅谈，便去拜谒。哪知一进门便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同事只好扫兴而归，于是再没有同事敢去了。后来，好奇的同事终于发现其私寓每天晚间和星期日，商人来往川流不息，门庭若市。由此可知王之租赁大栋房屋自有他的用途，而不让属员去其私寓者，盖恐发现其为孔“捕鱼”的秘密工作。当王初到储备司时，全司同事都知道他是来发财的，必定要大批换用私人，所以都抱“五日京兆”的态度。不意王深知司中工作繁难，非借重熟手不可，仅更换司长办公室副官、书记二人。至于各科，除将材料科科长空缺补用私人外，余都未动。并为笼络旧人安心工作计，按照级别各加给津贴，各级职员皆大欢喜。这种办法系经孔祥熙同意，而这笔津贴亦系每月造册向孔领取，可以断定必从孔以“放鹰捕鱼”手段所揩得的油水内开支。

自王钟到储备司充当了孔祥熙捞取私财的工具之后，上行下效，一时贪污之风甚炽。

### 蒋介石任用蒙师

军需署的第三任署长为蒋介石读私塾时的蒙师周骏彦。以冬烘先生一跃而为中将署长，花样百出。周自到署后，事无巨细，一惟蒋介石的命令是从，虽至轻微的责任也不敢负，自谈不上有什么作为。兹举下列二事，以概其余。其一，储备司因受日军侵略威胁，西迁武昌，职员要求在蛇山麓筑一防空洞以避敌机轰炸。初拟用石块砌筑，约需 2000 元，请周骏彦核示，未蒙许可；继拟改用砖砌约需 1000 元，再请又不准；复拟改用木料，约需 500 元，三请仍不准。于是全司职员要求在此最低范围内自动办理，款由职员分摊，结果用了 400 余元。周对开支构筑防空工事的区区小款，都不敢负责审批，视 100 余职员生命如蝼蚁。其二，储备司后来由武昌迁衡阳，再迁桂林，三迁重庆，科长以上

都单独行动，或车或船很舒服地先抵重庆，置全司职员、眷属和公私行李于不顾，只派我交涉车辆并负押运全责。其中由桂林至重庆一段，程途遥远，山路崎岖，交通工具缺乏。幸我探听得承制被服的华商厂由重庆派人到越南自购卡车8辆，我即电重庆请该商厂转电越南将此购妥卡车于驶往重庆时，绕道桂林，协助本司运输，所需汽油由公家负担。安全到达重庆后，我会同各司处负责押运的同事数人照章请领旅费，合共不到300元。上报后，周竟一文不发，只嘱各司处长转告，在国难期间，大家要体谅财政困难。周之不负责任、不近情理，竟至于斯。

周骏彦年近古稀，宽脸大口，身短背驼，一旦登上署长宝座，着陆军制服，戴中将领章，行八字步，操浙江奉化土语，那种沐猴而冠的形态，见者莫不捧腹。每星期一全署职员集合举行总理纪念周，本应由他主持。但他只会口诵子曰诗云那一套，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登台演讲，所以每次纪念周都是请副署长或司长一人代理主持。他在南京接任署长至西迁重庆，前后也有四五年之久，但是他那种冬烘先生的顽固性丝毫未改，真是冥顽不化的旧官僚典型。

## 陈良结党营私

陈良原在中央军校当经理处长，时与兼任校长蒋介石接近。蒋以蒙师周骏彦接任军需署长后，恐周无力应付，便调陈良任副署长，为周之臂助。陈系复兴社骨干，结党营私是其专长。初任副署长时，便将他的寝室定在军需学校为兼校长蒋介石虚设的校长室对面房间，俨然一代理校长。那时该校的教育长及其他高级教职员均为该校第四期毕业并留学日本经理学校的双重毕业生，陈良不时和他们谈话，感情逐渐融洽。他并与学员暗中结纳，造成一个系统，为他将来利用。盖陈良此时图谋署长宝座之野心已昭然若揭。周死后，他果然升任署长。于是独揽军需署的大权，

将他在军需学校结纳的第五九两期学员作为嫡系，不次升迁，占据要津。

军需署西迁重庆之后的 1939 年 12 月，我被桂林第六军需局局长陈达勋电请调充该局第三科科长。由于勤勉奉公，节约公帑，因而我在 1940 年的年终考绩是全署第一，奉到陈良传令嘉奖。但朝奉传令嘉奖，夕又奉陈免除我科长职务的电令，遗缺以军需学校第五期毕业生赵某充任。

(1962 年 1 月)

#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纪实

秦 箏\*

1946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了一个内战决策会议，我当时任广州行营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参加了这个会议。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就记忆所及记述于后。

## 会议起因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起到1946年6月，是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准备时期。他一方面同共产党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装出一副和平面孔。另一方面又把双十协定、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当作幌子，以争取时间布置兵力，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一面公开下停战令，一面秘密的下作战令。我就是执行蒋介石向鄂豫湘赣四省驻军高级长官传达密令的人。与此同时，美国派遣马歇尔为特使，调处中国内战，并派员参加各地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假调停之名，行援蒋之实。在这一时期内供给了蒋介石大量的武器和金钱，并于1945年10月直接出兵登陆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向八路军挑衅，为蒋介石抢地盘、准备打内战当先锋。

1946年6月，美蒋以为内战兵力业已布置就绪，一切都准

---

\* 作者曾任国民党广州行营政治部少将副主任。

备停当。蒋介石就扯下他的和平面纱，向共产党提出荒谬的五项条件。在遭到拒绝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于7月下旬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配合军事作战，命令召开庐山高级政工会议。

## 会议概况

会议的时间是1946年7月19日到25日。会场在庐山牯岭河西路的一个教堂内。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陆海空军总部、行营、绥署、绥区一级的政治部主任和国防部新闻局处长以上人员。我记得有滕杰、陈汝珍、朱静涛、黄砥中、萧赞育、赵可夫、张元良、刘子清、李煦宗、王超凡、苏寿余、范奇峻、郑会焯、幸华铁、陈远湘、丘国珍、邓文仪、李树衢、卿汝楫、侯鼎钊、易大德、张泰祥、张佛千、袁觐贤、吴英荃及国防部民事局局长刘楨（列席）等共30余人。

蒋介石在会议期间讲了两次话，主要内容是“完成后期革命的任务”。大意是：“中国经过对日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总理（孙中山先生）所毕生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已经达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继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于最短期内消灭国内反动势力（指共产党），统一中国，实现民生主义，完成后期革命的任务。古语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前期革命那样的艰苦困难，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一定不能‘功亏一篑’。希望我们这次到会的同志们，从政治上针对敌情，研究出具体对策来，配合军事进攻，于最短时期内消灭敌人，完成国民革命最后一篑之功，以告慰总理和诸先烈在天之灵。”

陈诚除每日主持会议外，在会上正式讲了一次话。他的讲话，除重复蒋介石所谓“完成后期革命的任务”外，就是反苏反共。他说：“目前从安徽来安到江苏南通的战线上，我军处处胜利；以湖北宣化店为中心的共军中原军区七八万部队，已为我军



击溃。按照当前敌我兵力装备，后勤补给，战略要点，和我有强大的美国作后援等等有利态势来判断，我军占绝对优势，有把握在三至六个月内将共军彻底歼灭……但是我们千万大意不得，要知道战争除物质条件外，还有精神条件。我军除以泰山压顶的军事威力作军事的进攻外，还要特别讲求民心、士气、政治、组织、宣传等，从精神上压倒敌人。这是一次‘戡乱’和政治上的决策性会议，关系非常重大。关系到战争胜败，关系到党国安危，关系到每个人自身前途，也关系到子孙后代。今天到会的都是高级政工人员，都是总理信徒，总裁（指蒋介石）信徒，都是领袖多年心血一手培植出来的高干。我们应替领袖分忧分劳，把这个万斤重担担当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殚精竭虑，认真负责，针对敌情，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研究出具体对策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情研究，就是知彼的工作。决策贵在贯彻执行，会议完毕后，你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要同部队长密切配合，领导所属全力贯彻这些对策。我们一定要遵照领袖的训示，用最大最苦之努力，用政治进攻配合军事进攻，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完成中国真正统一。”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针对“敌情”，从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来研究具体对策，如决议举行拥军爱民月，成立阵前喊话队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决议案有：1. 发行土地债券，实施赎买制的限田政策案。2. 战士授田案。3. 成立“和平爱国团”案。4. 制发“来归证”案。

### **第一，发行土地债券，实施赎买制的限田政策案**

1946年夏，蒋介石、陈诚等侦知中共发出“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变为有区别地将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分得土地后，在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保田保家的口号下，参军支前非常踊跃。他们为了同共产党争夺广大农民群众，也来一套政治欺骗手法，以此糊弄迷惑农民，同时认为用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地价税法来

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缓不济急，需要翻新花样。为此，想出了一个不触及地主利益的赎买制的限田政策，要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在庐山高级政工会议上提出。

此案经大会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成立，交由大会组织的专题研究小组研究，由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卿汝辑为召集人，组员有陈汝珍、简朴、黄砥中、吴英荃和我等七八人。我们在牯岭河西路仙岩旅馆经过几度研究后，推定卿汝辑、吴英荃和我为发行土地债券办法的起草人。我们3人拟就了办法草案，经小组会通过，提交大会讨论。当草案原则通过后，决定呈经蒋介石核定，由国防部长白崇禧提交国府行政院会通过，送立法院完成立法手续后施行。

我记得对地主实施所谓限田制办法是：一个8口之家的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额不得超过100市亩（地广人稀的东北、西北及边远地区除外），百亩以外的超额土地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行土地券照价赎买之。土地债券的票面额规定为30元、50元、100元不等。并规定每2元土地债券折合美金1元计算，持券人满3年后，即可将债券视为现金，可作缴纳国税或工业投资之用，也可转卖抵押。国家用债券收回的期限，至迟不得超过20年。

此案的执行机构，在中央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地政署；各省、市、县政府专设机构办理此案；区（乡）政府为基层执行机构，负责调查统计登记，按照田亩约定时价，赎买地主超额土地。赎买所得土地以一部分交给当地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则按所领土地原有价格，于5年后将价款分期偿还国家。缴清全部价款，最迟不得超过50年。候地价偿清，土地即归耕者所有。

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划苏北淮阴等4县为实施土地债券收买地主超额土地，并将一部分发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的实验县。10月，我任国防部宣慰组长（由国防部监察局、新闻局、联勤总部派员组成），持蒋介石的慰问信和先期由联勤总部

特勤署运到的慰问品（棉卫生衣裤、毛巾、牙粉牙刷等），到京沪路的苏州、无锡、镇江和江北的扬州、淮阴等地慰问伤病兵，并促其伤愈病愈后归队，加强前线反共力量。我曾在淮阴县逗留过几天，同淮阴县长陈天秋谈在淮阴、涟水等4县实施土地债券赎买地主超额土地的事。得知涟水县因遭到大地主顾祝同（顾当时任郑州绥靖署主任）的反对，暂缓实施。淮阴县在实施中，对真正有权有势的大地主超额土地，暂不动手，以免引起他们的反感和阻挠。对无权无势的没落地主的土地，即用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行的土地债券，赎买了一些。将赎买所得的土地，拿一小部分分给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他说，他的这种办法已写成实验报告书，并分呈行政院地政署和国防部新闻局，要我回到南京后，向新闻局长邓文仪吹嘘。我回到南京后，即向邓文仪说：“陈天秋在淮阴的实验成绩很好，在办理用土地债券赎买地主超额土地的过程中未遇到地主的阻力和反感，分得土地的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对政府非常感激。”邓文仪说：“陈天秋很行，他的实验报告书已批交第五处审核。你同吴英荃（吴当时任五处处长，我任副处长）好好看一看，签呈领袖核阅。”我后来同吴英荃、第五处少将专员伍超、余绍彰和三科科长张超等会签了一个意见。大意是说：“淮阴实验成绩优异，在用土地债券赎买地主超额土地的过程中，没有遇到阻力和反感，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对中央非常感激。淮阴县能行得通，其他各地也应行得通。这种赎买政策的王道办法，较之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法大纲的霸道办法，容易行得通，更适合中国国情。既可逐步达到‘耕者有其田’，又不触犯地主根本利益。地主可将土地债券做工业投资之用，由地主变为工业资本家。此实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最具体可行的办法。这次限田制的王道政策较之中共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霸道政策，要高出万万倍。拟请将淮阴县实验报告书大量印发，作为其他各地推行土地债券赎买地主超额土地的示范。”邓文仪看到我们对淮阴实验报

告的签呈，即以此作为向蒋介石报功的本钱，签请蒋介石大量印发，作为自欺欺人夸大宣传之用。

## 第二，战士授田案

蒋介石集团的士兵，除极少数为流氓地痞兵油子之外，绝大部分的士兵是由绳索捆绑而来的壮丁，都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这些贫雇农在未当兵以前，终年胼手胝足，不得温饱，日夜盼望的就是如何挣得几亩田，自种自收，不再受地主的冤气。当蒋介石要大举进攻解放区时，为鼓舞士气，宣称：只要官兵肯卖力气打仗，到了把中共的武力消灭后，士兵就可以轮流复员了。每个复员士兵回到原籍，都可以凭退役证，向区（乡）政府领得一定数量的田地，从此自耕自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长为太平之民。这就是战士授田案所要作出的承诺。

这个提案由萧赞育为召集人，参加研究的有赵可夫、张元良、朱静涛、易大德、张泰祥等七八人。由易大德、张泰祥起草，提交大会讨论后原则通过，并决定呈经蒋介石核定后，由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提交行政院通过，候第一案（发行土地债券实施赎买制限田政策案）经过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后实施。

内容大致是由行政院发行土地债券，赎买地主超额土地，将赎买所得土地除以一部分发交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外，另一部分即留作复员士兵授田之用。授田的亩数多寡，因各地人口密度不同，土地肥瘠不同，未作硬性规定，但规定不得少于当地自耕农的亩数，最少不得少于2市亩，最高不得超过15市亩（地广人稀的东北、西北地区和边远地区除外），由各地区（乡）政府据实际情况约定之。

## 第三，成立“和平爱国团”案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国以换取美援，作为他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资本。他自称为“爱国民族领袖”，诬中共为苏联第五纵队，是卖国贼。宣称国共两军一旦接触，一定会有大批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弃“暗”投“明”，而不“投诚”的命运

只有两条，不是被俘，就是被打死。对“投诚”被俘的解放军指战员要使其由“破坏和平”进而“爱好和平”，由“卖国”进而“爱国”，就需要有一个管训机构，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同时还要利用被收买的“指战员”回到解放军去做瓦解工作，以期达到早日消灭解放军完成“戡乱剿匪”大业。

此案由滕杰任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组员李煦宗、王超凡、张佛千、袁颢贤等七八人进行研究，拟具办法，提交大会讨论后原则通过，并决定呈经蒋介石核定后由国防部实施。

内容大致为：该管训机构定名为“和平爱国团”。团下设若干大队，大队下设若干中队，中队下设若干分队（一般采取三三制，即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三大队为一团），采取严格的军事管理。待遇分为两种，对“投诚”的解放军指战员按照其原有阶级比照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发给八成薪饷；对被俘的指战员只发给零用钱。在管训期间进行“思想教育”做“思想消毒”工作，务使其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改信三民主义。受训期满，“思想纯正”者分别派作策反、侦探等工作，不愿工作的资遣回籍。“和平爱国团”的番号顺序、设团的多寡及设立地点视实际需要而定。

就我所知武汉设有“和平爱国团”第三团，团长为邓少麟，管训对象为河南柳林战役被俘解放军指战员 2000 余人，实际上是集中营，待遇极端恶劣。主管者对伙食费尽量克扣，对被强迫管训的指战员凌辱折磨。他们用尽一切威胁利诱欺骗麻醉的手段，企图达到诱叛的目的。但绝大多数解放军指战员拒不接受诱叛。

#### 第四，制发“来归证”案

蒋介石集团认为人民解放军生活待遇非常艰苦，武器装备又非常低劣，在天空有飞机、地面有大炮坦克的军事威慑力量之下，一经正式接触，定会有很多人经受不住这种严酷的考验，心理会发生动摇，这时用飞机散发“来归证”（证上注明优待办

法)，就可瓦解解放军。

此案由大会组织的专题研究小组研究，拟具办法。召集人为刘子清，组员有苏寿余、范奇峻、郑会焯、幸华铁、丘国珍、侯甯钊等七八人。该案拟具的办法，提交大会讨论后原则通过，并决定呈蒋介石核定后，由国防部执行。

“来归证”内容很简单，除制发机关、制发年月日外，注明“持证来归者”接受短期训练，在受训期间按原阶级比照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发给八成薪饷；受训期满，愿留用者破格录用，不愿留用者发放回原籍，并保障安全。证上钤盖国防部印信。此案经蒋介石核定后，由国防部新闻局大量印发，在1946年到1947年前方战线，几乎每日用专机运载大量“来归证”向解放军阵地散发。

## 会议圈外

会议期间，蒋介石为了对到会者笼络打气，搞了一次宴请。当时被约请的有邓文仪、萧赞育、滕杰、刘子清、赵可夫、简朴、秦箜等7人。

午餐是在爱庐的一个长方型小饭厅内举行的。蒋介石坐在南面的主席座位上，北面是陈布雷，右首的第一个座位空着，左首坐4个人，我坐左手的第二个席位上。饭吃到中途，宋美龄来了，我们7个人起立。宋美龄一面招呼大家吃饭，一面口里嚷着马歇尔夫人留着谈话，把吃饭的时间都耽误了。她连遮阳的草帽都不摘掉，只往后脑勺一掀，就坐在蒋介石右首的空位上吃起饭来。一面吃饭，一面同蒋介石谈个不休。我当时坐在宋美龄的斜对面，看到宋的态度很不端庄，心想宋是主席夫人，为什么不矜持一点呢？

饭后蒋介石进后面卧室午休，宋美龄等蒋介石离席后，嘱咐邓文仪说：“老先生近来身体不大好，等一会儿找你们谈话，你们少谈一点。”说完和陈布雷一同走了，我们7个人在原地闲谈

等候了一个小时光景。蒋介石午休毕，个别召见，由秘书萧自诚一个人一个人叫。我过去被蒋介石召见过两次，一次是在1941年5月我任十七军政治部主任，调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以受训成绩优异，留团任十五期党政训练班训育干事，同上官、林祥光在团长室被召见过一次；另一次是1944年4月，蒋介石在重庆国民政府召见军委会各单位1943年年终考绩成绩最优人员，我是军委会政治部年终考绩成绩最优人员之一，被召见。这两次召见，都和其他人员在一起，蒋介石同我谈的话很少，只有这一次是个别召见个别谈话。见到蒋介石后，他叫我坐下来谈，我谦让了一下，他再叫我坐，我就坐下来。他照例先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我逐一答复后，他又问我过去到过广州没有，我答没有。他再问我，到广州去工作有无把握。我回答做政工的时间较长，对政工的业务比较熟悉，到广州后可以帮助主任黄珍吾处理一部分业务。他又接着问我对完成后期革命（指消灭解放军）有无信心，有无把握。我当时迎合他的心理、投其所好，连答有信心，有把握。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想到宋美龄嘱咐不要多讲，当即起立，向蒋介石告辞，退了出来。

在庐山高级政工会议开会的同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庐山夏令营在牯岭集训，也正是马歇尔9上庐山的第8次。夏令营集训的对象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的学生代表和湘鄂赣三省的一部分干部。夏令营的营主任为李明灏，副主任为刘健群。当时夏令营的干部都是由九江乘汽车到庐山山脚下的莲花洞，改乘滑竿（用竹子绑扎抬人的轿子）上牯岭的。马歇尔在牯岭有避暑的公馆。马到牯岭后，常同其夫人到牯岭小天池一带散步。小天池有1个小亭子，位置在由莲花洞到牯岭必经之路的旁边，马歇尔目击一批批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坐滑竿上山，抬滑竿的都是些衣服褴褛骨瘦如柴的老年人和未成年的幼童（间有中年人，但占少数）。与此同时，蒋介石每日晚上早上，也常常带宋

美龄到小天池一带散步，同样看到这些青年干部坐着滑竿上山。有一次马歇尔问蒋介石：“你们上牯岭夏令营集训的青年干部是怎样上山来的？”蒋介石明白马歇尔问话的意思，佯称不知。马说：“你们这批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都是坐滑竿上来的，太腐化了，太不人道了。青年人把老年人作为踏脚的踏板，人骑在人的头上，太不成样了。用这批干部怎么干得过共产党呢？”蒋介石听了恼羞成怒，一回到官邸，就马上把夏令营主任李明灏叫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

邓文仪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侍从秘书很久，那些侍从秘书、武官同邓关系较好，邓文仪因事到蒋介石的官邸，从侍从秘书、武官那里得知蒋介石骂李明灏的事由。他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劈头就问：“你们出席会议的人员是怎样上来的？”邓答：“是走上山来的。”蒋介石便说：“这很好，你们以后上下山都不准坐滑竿。”邓答：“是是。”蒋在盛怒之下，除痛骂了李明灏一顿外，又下了一道手令，规定50岁以下的人上下牯岭不准坐滑竿。

蒋介石不准坐滑竿的手令下达，已是会议闭幕的前一天，邓文仪对出席人员传达蒋介石的手令后，说：“诸位此次上山，是公家备的滑竿，明天闭会后，公家不再备滑竿，希望诸位步行下山好了。”

7月25日会议闭幕的下午，我得到通知，7月26日下午3时在九江机场集合，乘机飞南京。散会后住严仁记旅馆的赵可夫和仙岩旅馆的滕杰、刘子清、张元良、萧赞育、王超凡等人都离开了牯岭，事后得知他们都是要旅馆内的茶房代雇滑竿到小天池以下的一个山坳里，预先等着（从小天池眺望不到的山坳），候他们步行到那里后，再乘滑竿下山。我同徐云台按照预定计划于7月26日晨离开严仁记旅馆，策杖下山，不到两个钟头，就到庐山脚下的莲花洞，再乘汽车到九江新闻局约定的旅馆集合，见萧赞育、滕杰等已在旅馆。

（1963年5月）



# 湖北襄枣师管区军服舞弊案始末

李春初\*

我原任国民党江陵团管区司令，1941年兵役改制时，调任襄枣师管区副司令，驻均县。我按照新的规定，先行到职，组成师管区司令部。但除自卫队员2人、军需1人外，全部人员均由原师管区选用编足，未留空额。当时惯例，军需主任必须是主官亲信，我本想把这个缺留待新来的师管区司令派人，后因原襄郢师管区司令冯岐吾推荐他的军需何士雄，我就用何士雄为军需主任。这就种下了人事摩擦和军服贪污案的种子。

## 案外军服的由来

原襄郢师管区司令冯岐吾，移交案外军服3万套，这些无案军服怎么来的呢，这要从国民党部队在被服方面的通弊谈起。被服是有使用年限的，一年为新，二年为旧，三年四年过了使用限期可以报废，这一批被服在上级就销了账。报废被服或发士兵作布片打草鞋，或另做处理。存心舞弊的，干脆将新被服扣下不发，等到账面使用期限届满销案，再制作新被服时，就可名做实不做，从上级领到款子，把仓库里的新被服搬出来就行了。冯岐吾案外移交的3万套军服，也是这样来的。据当事人之一的何士雄讲，在这批军服移交之前，旧襄郢师管区有关人员分为两派，

---

\* 作者时任国民党襄枣师管区副司令。

即以主任部员陈述斌为主的主卖派和以军需主任蔡某为主的主交派。主卖的一派，认为这批军服已经报废销案，只差卖一个环节，钞票就可到手。主交的一派认为军服数以万计，不比小东西可以藏起来，监守仓库，输送搬运，辗转托人交卖，要经过许多人的手，随时都有暴露可能，现在舍不得交，以后想交都交不掉。冯岐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蔡某劝他说，钱是要的，命也不能不要，二者不能兼得，还是舍钱保命吧。于是冯岐吾决定移交案外军服。

正在此时军政部令襄枣师管区做一批棉军服，虽然原襄郟师管区案外交的是单军服，单棉不能互相替代，但做军服就要与被服厂打交道，对存心染指的人来说，自然是个机会。主卖的一派，在襄枣师管区多数蝉联原职，他们怂恿我说，襄枣师管区大权在手，有各种方便，趁这一回做军服的时机，将案外3万套军服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同冯司令一样，白辛苦一场。我考虑了三个办法：（1）接受他们的意见，乘机处理，但人多嘴杂，特别是当分赃不均时，可能暴露；（2）如数呈报军政部，报多少，变无案为有案；（3）既不卖，也不报，留待尚未到职的新司令作决定。经过反复权衡，我决定采取第三个办法，既可不负责任，又不得罪任何人，将来如果处理分赃还是有我一份。于是我对怂恿的人说，等司令来了再说。

按照军政部规定，师管区成立被服制作委员会，以主任部员陈述斌为主委，军需主任何士雄、师管区其他有关人员及驻地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商会、财委会等机关团体的代表为委员，开过几次会，推何士雄到老河口招商家承制。我没有经验，心想被服制作委员会委员既然多数是地方团体的代表，就派军需林岑同去。我告诉他，应该多找几家被服厂，用招标方式比较一下，务求质好、价廉、交件快，其余照被服委员会的决议办理。数日后，何士雄与林岑由老河口归来说，已经与厂商签订做棉军服的合约，并说有3000元的回扣。钱来得这样容易，我当然有些心

动手痒。但司令快来了，若为了 3000 元的回扣，影响正副司令的关系划不来，因此决定看看再说。

我私下问林岑，回扣是怎样来的？林说回扣是军服定盘后，被服厂经理问何士雄，现在办公费不够，你们是不是需要想办法？何说当然需要。经理说你拿 2000 元去花吧。何嫌少了，又加 1000 元，合计 3000 元。何与厂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很熟，三言两语就谈好了生意，没有找第二家。我感觉这件事有些蹊跷。后来还是何士雄泄露，我才晓得被人利用了。原来这家被服厂的经理和职工都是黄破人，与冯岐吾是小同乡，过去襄郟师管区的被服，都是这家工厂包办，别家插不上手，结算下来，被服厂历年积欠冯岐吾数万元。这笔账，究竟是历次做被服的回扣？还是卖案外被服的价款？或者是冯放的债？不得而知。商人是势利眼，冯在台上时，互相利用，勾得很紧，冯下台后虽派专人坐索，但厂商分文不给。冯有些着慌，适襄枣师管区做棉军服，冯于是授意何士雄必须到这家去做棉军服，不管厂商同意不同意，直接由何在棉服付款内，代冯全部扣还。对冯来说，干净利落，钱到手；对厂商来说，这笔生意虽然有些利润，但还了冯的欠款后，账而上赚了钱，实际上赔了现金。厂商便在棉军服的质量上偷工减料，后来又因现金周转不灵，进原料、发工资都成问题，以致交货时间一拖再拖。主任部员陈述斌与厂商也是熟人，后来厂商来取款时，夜晚陈把他叫到家里，拍桌打椅大骂一通：你吃的谁的饭？好不懂事的东西，我是被服委员会的主委，你以后还做不做生意？厂商连说：多谢你的关照，我们晓得好歹的，这里有 700 元，请收着零花。以后又送陈棉被、棉裤、大衣全套。

1 个月后，三十九军副军长兼襄枣师管区司令刘尚志到职。他当过多年的旅长、师长，当然有些亲信干部，早已预备了一批人，其中内定的军需主任为王须如。不想襄枣师管区军需主任已发表何士雄，王须如只得降格屈居军需。王自恃为司令亲信，对何毫不买账，自作主张，何、王二人经常摩擦，互找岔子。

刘尚志屡次同我谈到案外军服问题，不表示明确意见，所在意的是制作棉军服应该有回扣，不给就要，不然当傻子。又说冯岐吾利用我们做棉服扣还欠款，他坑厂商一下，会影响我们的回扣。于是，他一再逼何士雄不要放松，我看刘志在必得，就叫何士雄把做棉军服的3000元回扣给他。

过了些时候湖北军管区派了一个科长来视察，暗中调查襄枣师管区棉军服回扣案。这个科长向好朋友王某透露了这件事。王某为襄枣师管区部属，写信告诉我。我将原信交刘尚志，刘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随便谁来查，也只有白跑。出钱的人与得钱的同样犯法，他敢说吗？这种事最后是不了了之。”果然此事没有查下去。

### 钞票有毒，笑面虎变成哭面虎

1942年春，襄枣师管区司令部由均县移驻谷城，军政部令做一批单军服。主卖派又活动起来，但刘尚志不为所动。事后我才明白，他已决意独吞，不让别人参与了。

被服制作委员会虽然是形式，终究有些绊手绊脚。刘索性不设，大权独揽，派军需主任何士雄、军需王须如，仍然找做棉服那家厂，把该厂的经理叫到谷城与刘面谈。生意很快定盘，签约完毕。到底内幕如何？刘只字未露，我也知趣，全未过问。

何士雄由于刘尚志与王须如上下夹攻，意欲离开，但刘叫他把单军服做了再说。刘有一套如意打算。第一，何与厂商熟，由他挣钱，可以开门见山说暗盘；第二，何刘无关系，由何经手做军服，可以表白刘大公无私，以后出岔子，还可以往何身上推。但刘并不要他参与内幕，安排外一套、里一套，刘亲自掌握，王须如具体执行。

刘何不通气，被服厂是不晓得的。何当然不甘心做工具，装着参与机密的样子，对被服厂的会计说，总共给了我们多少好

处，开个条子来看，心中有个底。会计就开了一份表交给何。这张表是用毛笔写的，主要内容是：（1）照账面数少做3万余套，相应贷款名收实不收；（2）代销徐鹏飞团长800余套单军服；（3）实做单军服数的回扣；（4）总计数。何士雄拿着这张表，又喜又恨，喜的是凭据在手，恨的是利用他又瞒着他。何士雄原已牢骚满腹，现更火上加油，遂决心告状，密约军政部驻襄枣师管区兵役视察王某，商定办法步骤是：（1）由何士雄出面检举刘尚志贪污，正本寄军政部，副本寄恩施湖北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陈诚亲启；（2）双管齐下，王某也以驻区兵役视察的名义，同时向军政部检举；（3）检举一定要经过调查，此时王某已接到调任陵都师管区视察的命令，遗缺由郑均师管区兵役视察阎扶生接充，调查人很可能是阎扶生，由王先与阎取得联系，介绍情况；（4）刘尚志每月补贴军政部兵役署文书科长罗某一份薪水，刘的驻渝办事处还为罗腾出房间，免费供给宿舍，因此罗成为刘派进军政部的坐探。检举时将此一并揭露，剪除刘的内线；（5）检举之后何即离开，以免事发，在刘势力范围内吃眼前亏。

何士雄想争取我的支持，又恐我与刘串通一气，反复试探后，确认我与刘并不在一条船上，乃尽吐实情。我开始对何也有戒心，所以说话吞吞吐吐。后来虽消除了怀疑，但仍不敢表示态度，对何的打算，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实质上内心是同意的。

刘尚志毕竟作贼心虚，曾在“总理纪念周”上，为其贪污行为辩解：有些钱必须花，但没有预算，只得先挪垫，等待机会，开源弥补，用不着大惊小怪。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1942年，军政部在重庆召开全国第四届兵役会议，刘尚志不愿长途跋涉，借口三十八军补充兵训练处裁撤，三个补充兵团并入襄枣师管区，业务待理，不能离开，派我到重庆出席兵役会议。会议采取先训后会的办法。

我到重庆后，对受训开会都不大感兴趣，关心的是襄枣师管区军服舞弊案的发展，其中最担心的是贪污案揭发后，我是否会

受到牵连。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湖北当省主席时，我当阳新县县长，他是我老上司，我们又都是湖北同乡，关系不错。军法总监部是最高军法机关，问题搞严重了，官司也可能打到军法总监部，所以我是先找何备案。我汇报了情况，并说刘在纪念周上公开提倡贪污，法纪何在？何说：他们过去在部队搞委任经理，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你制行不要紧，不过要少管闲事。我怕何说话不作数，辞出后，又把情况向军法总监部主任高级军法官余良材摆一摆。余说：你好小的胆子，这有什么可怕？制行是桌面上的公文，贪污是桌子下的事，尽管放心，与你无涉。余是军法案件最高复核实际负责人，他这几句话，使我心里掉了一个砣子。不久，刘的舅弟朱镜匀（三十九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对我说：“何士雄这家伙，坏透了，他告了士先（刘尚志的别号）一状。你看吧，害人先害己。”这是军政部兵役署文书科罗科长向朱通风报信的。罗一见到何士雄检举刘尚志贪污的文件，立即告诉朱镜匀，朱马上电告刘尚志。

刘尚志平时逢人笑脸相迎，绰号笑面虎。听说事发后，刘一连数日绕室徘徊，彻夜不眠，不断与其亲信密商，一天比一天消瘦，眼睛也凹下去了，整天哭丧着脸，动辄发脾气。同事们心里乐滋滋，背后人传人：钞票有毒，笑面虎变成了哭面虎。

刘为防备，动员师管区全部军需还不够，特聘三十九军造假账的专家，每晚灯火辉煌，彻夜造账，把有漏洞的账簿全部换过。

### 贼喊捉贼，官官相护，不了了之

刘及其谋士挖空心思办法，最后得一妙计——贼喊捉贼，贪污主犯检举贪污。一面向军政部检举军需主任何士雄经办军服，贪污有据；一面派武装士兵搜查何宅，并将何士雄扣押，演了一出双包案。

军政部所派调查人员就是阎扶生。阎原任襄郟师管区科长，

到重庆中训团兵役班受训后，先派充郧均师管区视察，此时改调襄枣师管区视察，情况熟悉，且事前已得前任王某通气。阎又急于事功，力求表现，不管刘尚志怎样掩饰搪塞，全不理睬，很快提出了查案报告，肯定刘尚志是贪污主犯，指出刘检举何士雄只是在消息泄露之后反咬一口，企图嫁祸于人。

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与刘尚志合伙经营木材生意，不是一般交情，无须刘尚志请托，程泽润自然会大力庇护。开始程认为问题并不严重，只要通过查案人员就可颠倒黑白，肯定反检举案。及见阎扶生的报告恰恰相反，慌了手脚，不避嫌疑，亲下手条，把由郧均师管区调来襄枣师管区未满1个月的阎扶生又调回郧均师管区，襄枣师管区兵役视察缺，另调恩宜师管区兵役视察云瑞充任。这就为刘尚志搬走一个对头。

此时，一件意外事把我卷入矛盾中。襄枣师管区补充团长黄希文，受到排挤，他是何成浚的旧部，托我为他另找工作。何的秘书以何成浚的名义发给黄希文一封密电，电文应为“谷城襄枣师管区转黄希文。缓图，忍耐勿急”，却把转黄希文几个字漏掉了，成了何成浚给刘尚志的电报。刘与何向无来往，在贪污案发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时，接着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发电人又是军法总监何成浚，疑心是我从中捣鬼，速电朱镜匀查明究竟。军法总监部湖北人多，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感到不管采取什么态度，刘都会怀疑我，与其等他整倒何士雄，再来收拾我，不如先走一步。我仍然先去找何成浚，因为以前已与何谈过，我就开门见山，要求他主持正义，严惩贪污。他笑而不言，劝我少管闲事，说双方都未牵扯你，与你不相干，不相干的事就是闲事，天下不平的事多得很，抱不平打不完，而且也不一定打得赢，还是少管的好。同何谈话毫无结果。我又去找余良材，我与余系老同事，说话更随便，我将全部情况和自己的打算都摊开，要求帮忙。余说照何老总（指何成浚）的话办，不错，人家的胳膊比你的大腿粗，你斗不过他，何苦自找麻烦呢？

我见军法总监部的路走不通，又找军政部。先找兵役署长程泽润，程根本不提此事，最后我耐不住主动提出，程马上关门说：“案情我很清楚，与你无关，不必过问。”在程泽润那儿希望不大，我遍访兵役署长官，他们一见我就热切询问此事，但都不说自己的看法。只有经理处左处长说，你是案件发生以来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说公道话的人。我接着话尾说：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说公道话的人。左笑说：恐无能为力。

与左一席话，还是起到一些作用。阎扶生的查案报告对刘不利，程泽润要推翻阎的报告，就必须派人复查。主管司处研究此案时，左提出以下的建议：阎是代表军政部查案，推翻他的意见，理应让他心服，因此建议派阎扶生、云瑞、五战区王会计长3人会查。大家一致同意，程也被迫点头，这就无形中主持了公道，帮了何士雄的大忙。

受训、开会均已完毕，我应该回谷城，但我不敢回去，就请求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准我留团服务，王派我为中队附，这就找到了一个暂留重庆的借口。

当我在中训团服务期满，准备暂留渝观望的时候，3人小组的查案报告出来了，且比前次阎扶生的报告更详细、更有力，认为何士雄的检举属实。这期间何士雄被刘尚志关押在特务连，在他老婆帮助下，从墙脚挖洞逃往南漳，刘派兵追捕未果。

3人小组的查案报告送到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半年之后，何应钦才批“交五战区”。这四个字，不但保了刘的命，而且保了刘的官。据五战区军法执监部承办人、主任军法官黄某亲口对我讲，这件案子李宗仁、林赐熙（五战区军法执监）都感到棘手，最后还是李宗仁“高明”，指示一条金蝉脱壳妙计——在判决书上先做一段文章，大意是刘尚志一贯清廉自守，洁己奉公；身为高级主官，只能综揽大要，具体事务，委之承办人员；军服贪污，责任在于经手，刘尚志免于审判。判决主文：襄枣师管区军需王须如贪污有据，自认不讳，判处有期徒刑6年。1945年，



刘尚志以王坐满刑期三分之一将其保外服刑。

轰动一时的襄枣师管区军服贪污案，就这样草草结束。

(1963年8月)

# 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

章 培\*

陆军大学是旧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从 1906 年在直隶省（1928 年改为河北省）保定府创办起，迄 1948 年底离开南京止，共计 43 年。中间因时局动荡，迁移有 6 次之多。我在陆大前后工作过 16 年，谨将十几年来身经目睹耳闻的事实做一回忆。

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可分为 4 个阶段：日本顾问主持阶段、德国顾问主持阶段、混乱阶段、自主阶段，分别介绍如下。

## 日本顾问主持阶段（1906—1931 年）

清朝末年，清政府痛于屡屡战败，才决心废绿营而练新军。但新军的将领仍然是从绿营里选拔出来的，其昏庸无能，可想而知。段祺瑞主持教育时，自然一切都听日本人支配。日本军阀是我们的敌人，日本人在陆军大学所主持的教育计划，名义上是照抄日本陆军大学的，在课程上所谓高等战术、参谋业务，以及动员、国防等课，虽然样样都有，但空洞不着实际。国内主持军事教育的人，一般都是外行，一切资料照抄照译。既不辨真伪，更谈不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了。辛亥革命以后，在黎元洪主持之下，校址从保定迁到北京。1914 年以后，教育计划虽收回自拟，

---

\* 作者曾先后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员、战术教官兼研究员、将官班乙级第四期班主任。

但重要课目仍由日本教官主持。所谓自拟的教育计划，也不过是日文的译件，改由中国人签名而已。据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的同学告诉我：日本教官教课，在重点方面多是欺骗性的，在现地战术指导时，把敌我观念隐蔽起来以迷惑学员的思想。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多数教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土桥一次、田中久、多田骏等，都担任师团长等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官在陆军大学教学的性质，已经很明显了，哪里还谈得上改进教育呢？直到1929年起，蒋介石自兼校长，再用些德国顾问和日本顾问比赛一个时期，德国顾问都是德国国防军中比较优秀的高级参谋，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而日本顾问只有日俄战争的经验，同时，日本的陆军从明治维新开始建军起，一切都向德国学习，哪能赛得过德国顾问呢？因此，蒋介石就辞退了日本顾问，改用德国顾问。陆军大学的教育权就渐渐地落在德国顾问手中，校中一切规章制度都效仿德国陆军参谋大学的成规。

### 德国顾问主持阶段(1932—1937年)

这一阶段是陆军大学迁到南京之后开始的。当时杨杰任校长。杨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作战时，他担任蒋的参谋长，有大军作战的经验。他主持陆军大学，除依靠德国顾问外，还能罗致一些经济学人才，以资应用，那时马寅初就担任经济学的教授。同时，因南北统一之后，国民党政府经费充足，选拔全国军中优秀军官入校受训，更是方便。因此，这段时期陆军大学的教育日渐发展。陆军大学对日本军队的侵略非常关心。在当时日本军队发动侵华战争的危急形势压迫之下，学员们奋发努力，钻研高级军事，以增强抗日本领。蒋介石也知道学员们的心理，在开学那一天对大家说：“日顾问是德顾问教出来的，所以我辞退了日顾问而改聘他们的老师德顾问来教你们，总可培养出来一些将材，和日本人在战场上比较一下。”

杨杰主持陆军大学几年之后，总觉得自己有些不够。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德顾问人才辈出，如战术教官斯达开、史培曼和空军教官史太秋三位将军，都是德国国防军里有名的人物；以后，德国国防部长塞克特元帅也亲来陆大担任总顾问。杨杰在使用上感觉困难，就自请到欧洲各国考察军事，增长见识。1年后回国，他又以参谋次长身份兼任陆军大学的教育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兼校长之名。

我那时正考入特别班第二期学习，身受三年的教育，感到收获颇多。那时的陆军大学，无论正则班、特别班，课程内容都是一致的。每日上午四节课，专研军事，主要是战术；下午两节课，是补习外国语和高等数理化。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习各兵科战术和师战术。各兵科战术由德顾问讲授，专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战术；师战术由本国教官讲授，专研师在一般地形的攻击、防御、遭遇战、追击、退却的战场指挥。图上研究完毕后，还要学习一周以上的现地战术，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又利用暑假到各部队作兵科见学，使学员们对本兵科以外的其他兵科也有一定的认识。第一学年第二学期专研师战术（包含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以一般地形为主，旁及特殊地形。每周中国教官教两个上午，德顾问也教两个上午。教授方法是教官和顾问根据条令，利用地图提出问题，简单的当场解决，复杂的学员带回宿舍做答案；教官、顾问看完学员的答案之后，再在课堂上分类向学员讲评，学员也可根据原则自由辩论。杨杰提出一个口号：“讲堂和演习地，都想定是战场，学员和教官、顾问对垒以决胜败。”同时他又一再吩咐学员：“对顾问必须做有组织有计划地问难，才能学到真东西；对本国教官必须留一手，免得打倒太多，无处聘请。”现地战术的学习时间也加多了，本国教官和德顾问讲授时间都是10天。在演习时，学员们骑着马，对演习地各处都要经过侦察。杨先生每天轮流参加一个战术班，在学员和教官辩论结束之后，他总要根据想定，就现地提出一个问题，考试学员、

教官，最后由他做总结。我们都认为他是“画龙点睛”，比大家有高一着的见解，所以人人对他尊敬。但对德顾问的教课，他向来没有参加过。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仍然学习师战术，着重特种地形和特殊状况的钻研，再加上参谋业务、后方勤务、空地联络和防空，并随时在教室里演习兵棋。现地战术照常着重。总使每一学员对于师战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心应手”地解决问题。第二学年的暑假，全体学员都要到各兵科学学校和空军学校去见学。第四学期开始学习军战术，也是中国教官（主要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和德顾问每周各担任两个上午。在教育上着重战场统帅，参谋业务、后方勤务也同时研究。在图上研究后，仍到现地去演习战术。同时还加上军内各师的辎重、行李演习。第三学年的第五学期专研军战术，使用国防要地的地图做想定。可恨那时东北各省已被日军所侵占，长城附近的要地也被日军所控制，我们只能在图上研究，不能到现地去演习。学习内容是战场统帅、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并重，同时也着重空地协同和防空。图上研究完毕后，只能到山东、河南一带做一次参谋旅行。两军在战场形势决定后，就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侧重兵站的设置和交通通信、情报等业务的演习，以后再随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各种业务的作业，总使学员们对于军战术的一切业务都做到十分纯熟。德顾问在这一次的指导，是用两军对阵的形式表演的，生动有如实战，更使我们信服。第三学年的暑假到海、空军学校和基地见学，使学员们认识海、空军的战术和现状，为最后一学期的大军战术——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的研究打下基础。第六学期是最后一个学期，着重研究大军战术和整个国防问题。照常是本国教官、德顾问每周各担任两个上午。本国教官的授课由杨先生亲自主持，研究院主任张亮清等高级教官为辅。在图上研究后，再由杨先生亲自率领到陇海铁路沿线做一次参谋旅行。接下去还做一次战史旅行。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路决战时，杨先生是蒋的参谋长，所以对这次旅行指导得

十分精彩。各地驻防高级将领都前来见学。同时，杨先生还亲自在本期选拔 12 名研究员，我也是被选的 1 个。德顾问在这一次参谋旅行中更是卖力。回校后还在校内做了一次高等司令部的演习。然后，再到军事各部门和交通、铁道等部门见学一段时期，俾能了解政府中军政各部门的组织。此外，三年以来，每星期一的纪念周，总由杨先生亲自作报告，或邀请名人演讲，其内容主要是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是与国防有关的。

对杨杰主持的陆大教育，我认为也有许多缺点：1. 不能罗致继承的人才，仅恃圆滑的张亮清和无能的宗明，以致他自己离开后，就酿成鄂系祸校之痛；2. 不知加强学术组织，分系负责，整编教材，专恃研究院和教务处分别总揽一切，尤其是不能将德顾问的资料结合本国国防实际情况，缩写成统帅纲领、作战纲要一类的条令，传给后辈；3. 专研战场指挥，忽视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以致作战时后方跟不上前方，参谋业务也欠灵活。

### 混乱阶段(1938—1943 年)

我们特别班第二期毕业前夕，正逢卢沟桥事变。我虽奉令留校，但大敌当前，不能不到战场和敌人较量一下。于是，我来到部队任第七十五军的参谋长，继任太湖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参加淞沪抗战，直到宁沪溃败为止。1938 年元旦，我冒雪率妻子儿女到达长沙，向陆军大学报到。那时杨杰先生出使苏联，教育长职务由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调任，张亮清以研究院主任掌握实权。他们见到我回校，都十分欢迎，当日就任我为少将战术教官兼研究员。由于教官奇缺，限我准备 1 个月就要上课，理由是我有半年参战经验，足以抵补在研究院研究半年的时间。还有一位同期毕业的同学刘占复，也是留校而参与淞沪会战下来的。校当局要他和我同时上课教战术。那时张治中先生兼任中央军官学校长沙分校的校长，也要我们去兼战术的课。结果两校的现地战

术指导都得到完满的结果。当时陆军大学有些暗潮，由于周亚卫太老实，张亮清不服气，渐渐地发生了许多问题。我那时课完无事，也到校园里走走，探悉鄂系人员纷纷要求带领学员到现地去演习，企图以报销手段瓜分学校里8万元的存款。我听到这种不义的行为十分气愤，就去见周先生。周先生对我说，他已专电校长辞职。我说，据我推测，辞职是不会准的，但必须严禁各班期以演习为名离开长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很同意我的建议。可惜，正则班第十五期已提前去芷江演习了。过两天，军令部长徐永昌奉蒋介石命到长沙集合全校教、职、学员讲话，主要是申斥捣乱的教、职、学员，挽留周亚卫，不准他辞职。散场后，我正要离校回家，在大门口碰到局先生送徐永昌回来，一定要我到他房里谈谈。一进房门，他就对我说：得到你的帮助，仗总算打胜了，但徐部长指示，武汉会战即将开始，学校要计划西迁，问我向哪里迁好些。我当即建议迁遵义，因遵义是贵州北部富庶之地，气候温和，生活花费很低，离战时首都重庆不远，而且是云贵高原的一个小盆地，不为敌人飞机所注意，最适于教学。我的建议，又得到郭惠苍教官的赞同，说那里的新营房正可作为陆军大学的校址。那时主张迁湘西的鄂系人员已将全校的图书预先运走，路过桃源就遭敌机轰炸，被烧毁一空。这更坚定了周先生西迁遵义的决心，遂派郭惠苍先到遵义去打前站。郭惠苍是遵义人，自然马到成功。此时我的三弟秋阳正从武汉到长沙，约我到武汉和几位共产党要人见面。我就嘱家人先去遵义，而自偕秋阳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三位先生长谈4小时。那时我的老师蒋方震刚从欧洲考察回国，也住在汉口德明饭店。我就去见他，建议他到陆军大学当校长，领导周亚卫和张亮清，办好陆军大学，对抗日战争做些贡献。他认为鄂系不易应付，我告以陆军大学重学术而不重地方派系，他也同意我的见解。

果然不久，蒋方震奉命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以蒋先生过去在

军学界的声誉，全校人心都非常振奋。他所写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见解》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见解略同，他总结了中外历史，得出“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主张实施军事总动员以抵御日军的侵略。可惜蒋先生几年来受尽折磨，心脏病已严重，在迁校期间病死宜山。陆军大学的教育从此一蹶不振。幸而遵义地方气候温和，四季如春，生活费极低，鸡蛋每元可买100个，大有世外桃源之感。因此，教官安心教课，学员更安心学习。但不久周亚卫他调，万耀煌得到陈诚的支持，来任陆军大学的教育长。万耀煌不学无术人人皆知，到校之后学员们就送他一副对联，上联是“耀武扬威，前官后兵三匹马”<sup>①</sup>，下联是“煌言诡论，东拉西扯一团糟”，横批是“万恶滔天”。由此可见陆军大学上下对于万耀煌的鄙视。但他也有一套做官的本领，首先以同乡的关系拉拢鄂系人员；再则利用他的小老婆不时做菜请教官，尤其在讲授现地战术时，他总要派厨子到现地做菜请教官。那时德国顾问调回去了，专靠本国教官维持上课。教官们顾到国难当前，又见他那样卑躬相敬，也就委曲求全。我和刘古复、郭惠苍三人精诚合作，专在教课上用功夫，得到学员们一致的欢迎。1939年4月，将官班乙级第一期在遵义召集入学，我们三人又奉调到将官班教战术课，从师战术、军战术、大军战术到现地战术和参谋旅行，都得到学员们的欢迎。尤其最后一次参谋旅行，学员们有许多是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长，对于现代作战的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多不熟练，要求我们发原案，这在陆军大学是没有先例的。我们三人为抗战的需要而答应下来。三人闭门努力，足足准备两个月才完成。现地战术和参谋旅行都是在贵州和四川南部举行的，大军在山地作战，有关兵力转用、兵站设置，行李、辎重的移动，往往

---

<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所收陈子衡《我了解的陆军大学十七期》的记载是“前官后兵三匹马”。



只能想定道路网以便实施，未免纸上谈兵，违背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这是最大的缺点。那时同在校里的除将官班外，还有正则班第十五、十六两期，特别班第四期，万耀煌感到直接应付几个班期的学员有些头痛，就在各班期都设一位主任，授以管理和教育大权。将官班主任潘英杰，东北人，是教战术的老教官，能尊重该班的教官，对学员也十分和气，总算没有出乱子；正则班第十五期是老学员，没有人敢去当主任，就没有设置；正则班第十六期主任梅铸也是老战术教官，又是湖北人，倚老卖老，不久就被学员们轰下来了，改由也是老战术教官的陈冰担任；特别班第四期主任张少杰，是在正则班第十一期毕业后再到法国陆军大学留学的，后利用法顾问和万耀煌闹独立而离开了，万即改任林薰南为此期主任，林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又是湖北人，教战术也有成绩，所以能够当下去。班主任的设置巩固了万耀煌的地位，同时来了一批法国顾问，万耀煌更觉得有恃无恐。

这批法国顾问共 10 人，由法国国防大学校长白锐将军率领来华，蒋介石要他们先审查一下过去陆军大学的教材和教育方法。他们花了 1 个月的工夫才完成。在教课的前一天，由白锐将军对全校作报告，先谈中日战争当前的形势，接下去就讲陆军大学过去 30 年的得失。他认为第一阶段的教材和教育方法都是空洞骗人的东西，日本人是你们的敌人，决不会将他们的高级军事秘密教给你们；第二阶段德顾问所主持的教育虽没有日顾问那样久，但他们已将德国陆军参谋大学的教材全数介绍给你们了。但德国的高级军事教育法过于呆板，不及法国的机动。白锐报告完后，就介绍全体顾问和大家见面。当天万耀煌宴请法国顾问和全体教官，席上吃的西餐洋酒以及顾问们的日用品等许多东西都是派飞机到越南去买来的。他们认为酒菜不错，可惜没有女人作陪。万耀煌听了这句话，就设法找了些女人陪他们。第二天起，法顾问对学员讲课，我总是跟学员们一起听课。首先是教一般战术课，这位顾问总是迟到早退，教的课并不出色。但他批评日本

顾问所教的师战术，在进攻之前，总是先来一个开进配置，将全师一万多人集结在一个狭小地区内，不讲究空地隐蔽，供敌人空军和远射程炮歼灭性的轰炸，等到展开向敌攻击时，已经溃不成军了。我认为这一评论很对。抗战初期，蒋介石用几十万大军在淞沪三角地带会战时，用的就是日本的师战术，结果被日本空军和陆、海军的远射程炮歼灭了。其他各兵科的顾问所讲的课平淡得很，只有一位空军兼陆军机械化战术的顾问确有真才实学，他那时已经51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过法国空军轰炸队长。我连续听了他们3个月的课，讲的都是理论，还没有讲应用，适逢法国受到德国进攻，他们都奉调回国去了。

之后，又来一批苏联顾问，是由崔可夫将军领导的。当时万耀煌在重庆，将校务托教务处处长郗恩绥兼代。这批顾问夜半到达遵义，因为没有人理睬，就原车返回重庆，郗恩绥因此被撤职查办。校里从此只有3个白俄顾问，一个叫司太维斯基，是世界四大筑城专家之一。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逃到法国，曾参与马其诺防线设计。杨杰先生到欧洲考察时，特将他请来教我们永久筑城的，确有真才实学。在抗战期间，对于我国的防御工事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但不久就死了；第二个叫多马，专教现代化的战术，也还可以，不久也死了；第三个叫布尔林，专教战役法，教得最糟，但万耀煌很赏识他。抗战胜利后，他还在南京开了一间饭店，由他妻子经营。

另外，叶剑英曾到过遵义，在陆军大学讲演了两天<sup>①</sup>，第一天讲当前中日战争形势，我因没有得到通知，无缘去听；第二天讲游击战，我是去听了的；第三天查明他的住所，我去看他，他已经走了。听说蒋介石不愿周恩来来讲，而只准叶剑英来讲，而

---

<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所收万耀煌《我主持陆军大学的回忆》中说：“叶在我家住了6天，饮食亦由我家供应。……叶剑英在本校讲了6次课，讲完即赴重庆。”

且万耀煌鬼鬼祟祟做了严密布置，除演讲外，不准教、职、学员们和他接近。

1940年，陆军大学逐渐向重庆山洞迁移。我教完了将官班的战术课，过了暑假，也向重庆迁移，转教特别班第五期的课。到年终教完兵科战术，适逢徐庭瑶在昆仑关会战后，深感其所领导的陆军机械化学学校和第五军机械化方面的人才不足，难以应付现代战争，特亲自到陆军大学调侯腾任第五军参谋长，调我任陆军机械化学学校的研究处处长。当时，大家都认为今后陆军一定要走机械化的道路，因此陆军大学研究院派两位研究员到陆军机械化学学校研究处任研究员。所以我虽已离开陆军大学，对于陆军大学的情况仍然十分了解。万耀煌在重庆虽得到陈诚极力支持，但丑态毕露，大有朝不保夕之势。陈诚又派其亲信王东原以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身份兼任陆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想用法西斯政治来控制陆军大学，结果受到陆军大学全体教官、学员的激烈反对。王东原无计可施，只得带走以杜建时为首的东北系的几个人，在中央训练团内另设国防研究院。万耀煌不久也只得离开陆军大学。陈诚想控制陆军大学的阴谋，到此总算彻底失败了。蒋介石改派军训部次长阮肇昌继任教育长。阮肇昌是云南人，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三期毕业，在日本顾问主持阶段曾任过短时期的教育长，也是忠厚人，无法安定混乱局面。

1943年5月，我以陆军机械化学学校研究处长兼教育处长名义率领1个5人考察团，到印度的英国皇家陆军机械化部队、学校、工厂作两个月的考察后回到重庆，阮肇昌就留我在陆军大学筹备机甲战术系<sup>①</sup>。我那时也愿将几年来在陆军机械化学学校的实践和最近的考察收获介绍给母校，认为是一件好事，但鉴于当时工业落后、军队机械化杂乱，只答应教课，而不敢筹备机甲战术系。不久阮肇昌调走了，特任陈仪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徐培根为教育

---

<sup>①</sup> 一作“装甲战术系”。

长。陈仪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还兼任中央训练团的教育长。徐培根是本国陆军大学和德国参谋大学毕业的，刚从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参谋长回来。他们两人同时来校，先声夺人，陆军大学在衰败之下为之一振。他们来校不久，既要我积极筹备机甲战术系，又要我兼任正则班第十九期的主任。我当时只允筹备机甲战术系，而拒绝兼任正则班第十九期的主任，还提出一个建议：欲想搞好陆军大学，首先要提高学术，必须将全校教官按其性质的不同，分为若干个系，以战术系为经，其余各系为纬，经、纬交织，与研究院切取联系，在教育长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学术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则事半功倍，正合乎孙子所说的“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的原则。过了两天，陈仪又叫我去，对我说：20年前我在浙江当师长时，看到你在夏超部当营长、团长，都当得很好。为什么现在请你兼第十九期主任，领导不到一百个学员，你就怕了呢？我回答：第十九期和机甲战术系的筹备，都是本校当前最难干的工作（第十九期学员入学不过1年，在校里闹得最凶，一次出去兵科见学，回重庆时沿途专打戴笠的检查站），我一身绝难兼任两个要职。他听了之后，坚决要我首先兼任第十九期的主任，整顿好这一期之后，再逐步地筹备机甲战术系。无奈，我只得答应试办3个月，请他随时物色接替的人才。当日，校令就发表我担任正则班第十九期的主任，我立即走马上任。第一天向班部人员调查情况，第二天召集学员代表10人，征询意见，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答应努力去办。同时，我也要求他们必须遵守纪律，努力学习，以达到服务抗日救国的目的。他们也一致同意。我当即将班里的行政人员作严格的分工，并将过去专门侍候官员和太太们的勤务兵、伙夫等3人调出做改善学员们生活的工作，如到磁器口买菜、在驻地附近种菜养猪等。不久，学员们又要出去现地战术演习，得到徐培根的许可，约定较优秀的教官杭鸿志、郑长海、杨振声等人担任指导，我也亲自参加指导，并严令行政人员对于教官、学员在现地战术演习期间的食、

住、行要特别注意。因此，教官、学员人人满意。从此之后，全班学员不但努力学习，还推选几名长于英文的人，替我翻译从驻印英军那儿所得到的有关军队机械化的资料。下了3个月之后，不但校当局不准我走，学员们也不让我走了。

当时，特别班第七期主任王麟生是意大利陆军大学毕业的，又是徐培根的好朋友；正则班第二十期主任金仲和，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的，又是中央训练团的模范大队长，是陈仪先生特别选调的。他们两个人都干不到半年就被学员们轰下来了，只得选拔优秀的战术教官郑长海继任特别班第七期主任，杨振声继任正则班第二十期主任。教务处长龚浩老朽不得人心，也选拔优秀的战术教官杭鸿志代理。经过这些处置之后，陆军大学的混乱局面，才得稳定下来。从此，凡有关陆军大学的重大事件，他们两人总要和我研究一下，但我的志趣仍然是要深入地研究陆军机械化的问题。1944年初，蒋介石决心送走苏联顾问，陈、徐两人都很不同意，但不敢抗命，只得在顾问临走之前大宴他们一次，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副武官兼秘书长安德烈也夫也应邀参加。陈仪还送他们每人1件福建的漆器，以作纪念。我也奉命作陪。这些顾问并不对学员直接教课，只对研究员进行指导。我每次都要抽暇参加的，并为了筹备机甲战术系的问题，常常向他们请教。我很欣赏他们在卫国战争期间装甲战的经验，在席间就请陈仪与罗申研究一下，今后我怎样和他们联系。罗申当场就介绍我和安德烈也夫商量。安德烈也夫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且也是研究装甲战的，就答应按月给我有关的资料。我得到了他的保证，对于筹备机甲战术系才有了信心。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曾运用坦克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因此战后20多年来，西方列强都为军队机械化而努力。无论在战术、技术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那时希特勒运用以坦克为中心的陆军协同空军的“闪电战”占了上风，但苏联怎样挫败“闪电战”转败为胜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从此，我得陈仪先生的保证，每月总要到

苏联大使馆两次交接这些资料，一直到1946年春安德烈也夫奉召回国为止。三年以来，我努力研究了这些资料，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国家工业化是谈不上军队机械化的。

### 自主阶段(1944—1948年)

陆军大学在这一阶段内部十分稳定，但外国顾问都走了。陈仪先生主张由国防研究院发起，在全国各军种兵科中选拔10个专家，到欧洲战场去实地考察，以收集一些现代战争的资料来充实教材，并为战后国防建设、军队革新打下基础。我和张德庆(新中国成立后任长春汽车研究所所长)担任陆军机械化的考察，由国防研究院副主任杜建时率领，一切准备都已完成，临行为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所阻而作罢。徐培根又以在德国参谋大学和魏德迈同学的关系，想聘些美国顾问来校帮助教育，也不得要领。就只得在自力更生上下功夫了。我再提出我过去在陆军机械化学校兼任教育处处长所用的分工、分组、包教的办法，将全校教官分为若干系，分工负责，编好教材，包教各班期。同时，和军令部第二厅、各国大使馆武官处取得联系，收集当前国内外战场实际资料，修改教材。陈、徐都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1945年初全校编制除校本部的教务、总务、编译、训导处外，全部教官分别到战术、军制、战史、后勤、空军、机甲战术系，受训人员仍旧是兵学研究所、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甲级、将官班乙级。

战术系：是陆军大学各系之经，教官、助教人数最多。根据军令部所颁布的统帅纲领，军训部和海、空军各部会所颁布的典令，军制系所拟的编制表，使用全国各要地的地图，随时集合担任各班期战术课的教官、助教，策定各兵科战术、师战术、军战术、大军战术(陆、海、空军协同)的想定，以供图上战术、现地战术、参谋旅行、高等司令部演习之用。现地战术和参谋旅行

在策定想定后，还要到现地详细侦察后再行修正定案。在必要时，也要研究员参加，帮助编写情况或调制要图。

军制系：过去由于国民党军编制没有合理的规定，都由战术教官自拟编制。经过抗战的经验，深深地认识到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是绝对不行的，就和军政部联系拟定编制。战术教官做想定，必须根据这些编制使用兵力计算火力。无论是图上战术、现地战术，都要按此进行。另外参谋业务和兵要地理也归该系担任授课。

战史系：要配合各级战术进行研究。但过去侧重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对于本国的战史则很少研究。尤其龚浩教拿破仑战史，占的时间太多，讲课好像茶馆里说大书一样，学员对他很不满意。徐培根因此解除龚的教务处长职务，要战史系着重研究当前国内外的战史，并要求密切结合战术；过去一些战史，则责令该系扼要重编，用很少的时间教完，并加入中国历代战史中有名的战例。

后勤系：也要密切配合战术去研究。主要是研究战斗行李、日用行李、輜重和兵站设置。陆上运输、水上运输的授课也归该系担任。以后驻昆明远征军的后勤司令司可庄调任该系主任，就将美国对中国远征军所用的一套后勤全部照搬过来了。

空军系：着重研究步、炮兵的空地联络，更着重远距离的侦察，也研究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空运、着陆战和防空也归该系研究。

机甲战术系：这一个系对中国来说困难最多。将落后的军队战术改变为现代化的机甲战术，好比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有相类似的困难。我从1933年跟德顾问研究战术时起，就着重战术的研究，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基础。1941年到1943年在陆军机械化学学校担任研究处长兼教育处长时又和英、苏两国顾问专门研究了两年半，且经常下工厂、车间跟技术员、工人们学习驾驶、修理的技术。以后又率领一个5人的

考察团，到英国驻印度的机械化部队、学校、工厂实地考察过两个月。手头收集有德国、英国和苏联的资料，还不敢轻易开张。因为军训部无能力编写教令，教官既要有理论的基础又要懂得技术。过去到陆军机械化学校研究过的教官，现在都调出去担任汽车兵团的团长了。以后校当局准我选拔一些青年优秀教官、助教到驻印度的坦克训练班去学技术。但没有典令作依据，只能东凑西拼一些教材作为策定想定的根据，以应付教学。同时，又顾到当时军队装备的落后，理论很难结合实际，只能以坦克营配合师、以坦克团配合军、以坦克师配合大军来编写想定教材，以资应付。直到1946年，侯腾从美国带回美国陆军部颁布的一切条令，翻译成中文作教材；后又有美国参谋大学毕业的邓醒感、杨宝贤、徐应麒3人回系后，才打下建系的基础。但用美国的教材和美国培养的人才来教育工业落后、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的军官，实在有削足适履之感。

各系的设立，并实行分工负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当时，纵的联系做得很好，横的联系问题仍多。尤其是炮兵、工兵、通信兵、海军和情报业务都没有设系研究，许多课还要请军政机关派人兼授，实感美中不足。

兵学研究院：是陆军大学培养师资之所。正则班和特别班各期学员毕业时，都要选拔十分之一的人充当研究员半年后，再任兵学助教。研究员在研究期内，过去主要由外国顾问指导，准备教材、策定想定，以供教学之用；设系之后，改由各系主任担任指导。

正则班：召集在国内外军官学校或兵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服务4年以上的中尉以上、中校以下的陆、海、空军军官，经过师、省、中央三级的严格考试，选拔入学，训练三年毕业。除选拔十分之一留校充任研究员外，其余一律分发各部队升级任用。

特别班：召集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或兵科专门学校毕业的中



校以上、中将以下的优秀军官，经过师、省、中央三级的严格考试，选拔入校，学习三年毕业。除选拔十分之一的人留校充研究员外，其余一律升级分发任用。

这两种班期的考选制度是迁到南京后规定的，但是蒋介石总要亲笔批准十几个无法应考的亲贵人物到每班期来旁听。尤其是特别班第二期的召集，由于中央级考试委员会的公正严格，录取的学员60%以上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其次是各省讲武堂或国外军事学校毕业的。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应考的，由于程度太差，多数落选，就闹得天翻地覆。结果由何应钦、陈诚包围蒋介石，由蒋批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李昊等20多个考试不合格的入学。特别班第三期考试完毕，正逢蒋介石经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有100多个没有考取的黄埔学生，以庆贺蒋介石生还为名，强求批准为第四期入学。这些都是蒋介石违背陆军大学组织法的行为。当时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得到蒋介石的许可，率领鹿钟麟、石敬亭等人，天天到特别班第三期去旁听。后来特别班第三期在长沙举行毕业典礼，冯玉祥代表蒋介石到长沙发毕业证书时，冯先生也要发给他一张毕业证书。由于以上的情况和抗战的需要，陆军大学决定于1944年10月增设将官班甲级，由蒋介石指召高级将领入学，3个月毕业。主要是使他们了解一下陆军大学各班期学员所学的是什么内容，让他们回本军以后能够好好地任用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的人员。派研究院主任徐祖诒兼任这个班的主任，办了三期就结束了。

将官班乙级：由于抗战胜利后复员整军，在各军的正副军、师长和军参谋长以及高级司令部少将以上的主官中，由军令部会同铨叙厅严格甄审召集，继遵义的将官班之后，定名为将官班乙级第二期，学习期限1年两个月。从师战术开始，将正则班、特别班的课程压缩教授。由于他们作战经验丰富，虽学习时间较短，但毕业成绩很好，所以也选拔少数人充任研究员。

教务处：主要联系各系策定教育计划及各班期的教育实施，

并代教育长应付一切有关教育事务，作出建议，请教育长核定。处里还附有1个印刷所，1个地图收发室。

编译处：在各国顾问主持阶段十分活跃，顾问走后，专任各国资料的编译，有能力的编译官还可兼任外国语的教授。

训导处：在陆军大学里向来起不了什么作用，尤其在王东原兼任处长之后，教官、学员们对于该处还产生一种仇视的心理。陈、徐两人来校后，蒋介石又派曾扩情担任处长，也难以挽回。以后就改派一个不知名的沈亮来看守该处，专门承命约请政治学、经济学教授到校教课而已。

1945年春正则班第十九期毕业后，我又奉令带领四位年青优秀教官，到美国在印度办的坦克训练班学习技术后，搭乘坦克兵第四营的车经由史迪威公路到畹町回国，途中得知日本投降。回校后，知道陈仪奉命接收台湾，校务由徐培根暂代。当时，陆军大学正要准备招收将官班乙级第二期，徐培根认为这些人不易领导，一定要我去兼主任。我也因机甲战术系的工作业已开展，总算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就答应去兼任，并介绍同班同学刘宗宽（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担任班附，帮助我处理内部事务。1946年2月初，该期学员入学，其中有些特殊人物，如蒋介石的副侍卫长柳元麟、陈诚的亲信张振国等，领导起来比正则班第十九期确是困难些，但在加紧教育上用功夫，总算很顺利地到1947年4月底毕业了。在这两年里，其他各班期也能顺利毕业，足以证明大家分工努力，不依靠外国顾问，自力更生，也能办好高级军事教育。

此时，陆军大学只留特别班第八期在重庆继续上课，其他各部先后还都，我也于7月初携眷经过上海，回到故乡白马湖。不到1个月，父亲在遂昌病逝，我赶去安葬父亲之后回到白马湖家中，徐培根派人到白马湖要我回京办将官班乙级第四期。回京路过上海，正逢二弟章乃器为了反对内战而遭到蒋介石特务监视。兄弟相议脱离蒋管区，但因陆军大学政治教官谢宜渠（原是共产

党员)得到党的指示,要他进将官班学习,进行地下工作,急需我替他掩护。因此,乃器先去香港,我仍到南京兼这一期的主任。这一期的基本学员是从哭陵将官一千余人中选出来的100名。还有24名特殊人物,如蒋介石的死党方先觉、特务头子赵世瑞,龙云的二儿子龙绳祖、三儿子龙绳曾等人。我保举将官班乙级第二期毕业的陈世光担任班附,并令陈世光督同班部其他人员,协同从学员中选出的代表,组织生活委员会,管理有关行政事务,给学员们以自治之权,行之十分有效。学员们不但功课进步很快,在生活行动上也可以作其他各班期的模范。而同在南京学习的将官班乙级第三期一年之中换了3个主任;正则班第二十一期于1948年5月去台湾参谋旅行时,闹得不亦乐乎:徐培根的妻子徐芳冒顶中校编译官的名义,跟学员前往游历,到凤山被学员们发觉后,强迫徐培根送她回大陆。校长徐永昌看到事情不好办,也不声不响地离开教官、学员到他儿子家中去住了。我那时也担任这期学员的参谋旅行指导,和该期主任傅绍杰及其他教官同住一处,劝他们顾全大局,认真地领导学员完成参谋旅行的任务。同时,由孙立人的参谋长干毅(是陆军大学编译处长调任的)交涉派军用飞机送徐芳先行回南京了事。演习完毕回南京途中,在轮船里我和徐培根同住一个房间。我劝徐培根从速离开蒋管区,他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寿命不会长久(因其妻子徐芳系CC分子,先将财产和孩子带往台湾,徐培根没能弃暗投明)。回南京后不久,学校虽照常上课,但社会上受内战的影响,人心不安,在金圆券发行以后,物价波动更烈,校里的教职学员,也受到影响。我在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毕业的第二天,就离开南京,投入人民的怀抱。

(1962年9月)

# 陆军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回忆

卢凤阁\*

## 陆大从南京迁到长沙之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南京人心大震。陆大过去惯例是每年7月20日放暑假两周，学员多离开南京探亲访友，或到名胜地区游览。期满归校有两周集体到航校等兵科学学校参观学习，至8月底才能正式上课。是年为了应变，学校宣布休假不放假，学员都呆在南京消磨时光。

8月14日，南京发生了第一次日机空袭，人人感觉南京防空设施不佳，每家自做简单防空设备，最可笑者多为方桌上加被褥，紧急警报一响，躲在桌下求安全。我是一个学工兵科的军官，但在南京当时情况下，每逢敌机来到头上，只有叫家中妇幼张开口，以防炸弹响声震破耳膜。除此也无善法。

8月24日，陆大各班期接到校部通知，大意是：各班期学习暂停，开课期异日通知。除直接通知的学员暂缓离京听候派遣任务外，其余学员即时安排好眷属离京回到原送部队，听候安排作战任务云云。军人的职责本是保国卫民，特别我是东北人，有机会能与侵占东北故乡的日军作战了，怎不感觉格外高兴呢。于是到了本军（六十七军）驻京办事处，探询军队现在位置和眷属留守地点。据告知：六十七军现在沧州，留守处在安徽阜阳。我

---

\* 作者曾是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四期学员，后任该校战史系主任。

把一切生活用具交给房东保管，当晚即过江乘津浦铁路客车到蚌埠下车。次日乘船上驶两日夜就到了阜阳。留守人员均嘱咐安心杀敌，眷属生活有他们负责，决不使第一线将校有后顾之忧。抗战初期这种“与子同仇”的景象，迄今犹觉历历在目。

我把眷属安顿好，正准备乘车赴沧州找军队报到，又接到军部驻京办事处一封快信，要求即时赶赴长沙，谓陆大已经决定迁长沙复课，望勿迟延。我只得把眷属交给留守处，只身先回南京，一面到校探询详细情况，一面处理寄存的家庭用具。那个时候，南京城内外到处有木床桌椅廉价出售。这些东西送人都送不掉，出售更无人买。于是我把两年来添置的用品，交给房东暂为保管，相约一年不回来即由他自由处理。谁知道这一去就是8年呢。

在南京，打听到当初陆大决定停课，是基于一般常规，认为战争发生必须全力以赴，争取战争胜利，尔后再谈建设。陆大是在职军官培训机关，当然应该解散，让学员回原部队参加第一线作战了。但是陆大教育长杨杰先生认为这次中日战争不同于甲午战争，打起来就是持久性的，时间越长越对中国有利，而陆大教育应该继续进行，为持久作战培植高级将领和参谋人才。不过，杨杰以自己是陆大教育长，坚持办下去，怕被人讥为“恋栈不去”，未敢提出自己的建议。所以，停办通知一出，陆大学员顿时走光。恰好不久，杨杰先生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赴苏联乞援，便在面辞政府要人时，把陆大应该继续办下去意见，当面陈述，即获批准。于是陆大才得以办下去。

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对陆军大学迁往长沙非常重视和支持，把原藩台衙门作为陆大校址，令原住机关一律迁出。因此，陆大先遣人员到后就有办公处，复课学员住公寓、找房子均很便利，并不时受到何键宴请。陆大每期湖南学员都不少，我所在的第十四期，共100人，湖南籍有27人。其他各班期湖南人也是人才济济。

1937年年底在长沙陆大复课的计有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期和特别班第三期，都在一个旧衙门上课，确实有些拥挤，教学不便。正赶上前方部队急需参谋人员，向陆大要人。学校当局决定第十三期、第十四期提前4个月先后于1937年12月、1938年7月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按过去惯例，每逢陆大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是不放过这个向学员表示亲善好机会的。在长沙潜伏的汉奸把陆大第十四期毕业典礼的时间、地点向日本人报告了，可能意在轰炸蒋介石，但却使长沙人遭受了一场灾难。

7月22日那一天，天气炎热，陆大十四期毕业典礼仪式如期在旧藩署大堂举行。但主持者不是蒋介石，而是何应钦代表校长。他说话简单，勉励几句就发毕业证，结束了典礼。我是被留校任兵学教官兼任研究员，没有什么事情需当日办，所以很快地回到小吴门寓所。上楼刚喝了一杯水，就听到空袭警报声。以往多在20分钟后才再发紧急警报，这次10分钟后就发了紧急警报，紧接着就听见敌机轰轰临空。那时长沙无防空洞，仅有一些防空壕，上面盖一层木板和泥土，这样简陋的条件，遇到敌机空袭，也只有听天由命而已。

我坐在椅子上，只听咚咚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杯碗在桌上跳响。当时并没想到敌机是听汉奸的密报来炸蒋介石和陆大毕业的学员。警报解除不久，就有人跑来说，藩台衙门和周围店铺、住房都被炸平了，躲在防空壕的人都被埋在壕中闷死了。说得绘声绘色，惨不忍闻。我便一路急步到校去看个究竟。

到衙门附近，东、北两面大街一片瓦砾，消防人员在灭余火。遥见衙门围墙还巍巍在望。我急速绕道从正门进入衙门，只见大堂安全无恙，许多大难未遭身的同学在谈论他们这次亲眼看两耳听到的敌机轰炸情形。本期成绩第一名的盛超同学，因礼成后到教务处领奖品，迟走了一步，迨走到大堂前，适逢敌机投弹，他急速卧在堂前，结果炸弹都在墙外爆炸，破片被砖墙挡住，他安全无损，仅身上落了一层灰尘。

3天后再看，轰炸面积恰好和衙门面积相等，只偏东了15公尺，平民死伤近千人，在防空壕中被活埋的有三百多人，这是长沙大火之前最严重的死伤事件。

## 从桃源、芷江到遵义

1938年夏季以来，武汉方面的军情一再吃紧，长沙人心惶惶。陆大这个军事教育机构，必须迁往安全地点以利教育不间断地进行。因此，国民政府派蒋百里先生为陆大代校长，周亚卫实任教育长，负起行政责任来。

这时候陆大还有三个班期：特别班第三期还有3个月将毕业；正则班第十五期还有8个月将毕业；第十六期将入学，正在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装甲兵学校逐次见学实习，3个月后才归陆大正式上课。其余就是陆大家底，例如图书、军用地图、印刷器具等，为陆大教学必不可缺的物资，非完全搬走不可。

蒋百里先生不仅是中国早期著名的军事学者，也是办军校的能手。他来陆大就任代校长后，对陆大迁校址事作了妥善的安排。他宣称，已经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协商，议定浙大、陆大两校开展文武交流，同迁贵州省遵义地区。特别班第三期暂迁桃源城外女中，9月初毕业，就地遣返原送部队；正则班第十五期提前3个月毕业，暂迁湘西芷江；第十六期兵科见学实习期满径赴遵义上课；校部及教学用具即时随先遣人员运往遵义。

上述处置，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条件下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湘黔公路湖南段止于桃源，桃源与长沙运输又有大批的轮船和帆船，陆大的人员和物资，先运到桃源，尔后租汽车运往贵州遵义，避免了在长沙军情不稳的风险。蒋百里先生亲随特三期，把这期未完成的大兵团沙盘、兵棋、参谋业务等各种课目完成，在1个月内使特三期按计划顺利结业。9月初蒋百里先生在桃源主持了特三期的毕业典礼后，百里先生乘车赴遵义。他先

到桂林，尔后乘火车到广西金城江下车，因病即时到河池医院就医，抢救无效逝世。但经他布置的迁移并未停止，依然按预定的计划进行。

我在陆大留校任教官兼任研究员，被指定和第十届研究员在一起，给第十五期作辅导，参加现地战术、室内作业评卷等工作。因为芷江是湘西一个重要经济区，敌机不时来侦察，所以警报频传，昼夜不停，对学习也感不利。且战乱期间，此地治安也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五期学员一致要求即时迁到遵义完成最后学业。周亚卫接受了学员的要求，用汽车队把迁芷江的这批教职员工及眷属陆续运到遵义，以致影响第十六期学员储存在桃源的物品未及时运走，遭受损失。我是最后一批离开芷江的，经历十几天的停停走走，终于12月9日平安无事地到了遵义。

当时的遵义是一个公开吃鸦片烟的城市。烟客从夜间几乎吃到天明，饮食店通宵供应。天明后多数人都在梦乡，反而店铺不开，街上无人。抗战已经进行了1年多，大后方的贵州省仍在公开吃鸦片烟，这真是一种讽刺。遵义县长卜某是一个怕事者，对禁烟令执行不严，故无政绩。后来换了一位孔福民县长，他是山东人，带来一批助手，都是干练人才。他以军事法官的身份来惩治盗窃、烟赌，不移交法院，依颁布的法令裁定，大多数是死刑，由专署转呈省府很快就批回“如拟就地执行”。

这样雷厉风行了几个月，枪毙了一二十人，以贩毒、吸毒者为最多。整个遵义改变了面貌，市容整洁，商业兴旺起来。

1939年3月29日，陆大举行第十五期学员毕业典礼，国民政府派参谋总长何应钦亲临主持。陆大按以往惯例，又办了川菜九大碗，举行会餐，呈现喜气洋洋的景象。

第十五期原拟提前在芷江毕业，因蒋百里先生逝世，未按计划进行，于1938年11月迁到遵义。至毕业止，满期未减，是被称为“幸运”的一期。适逢参谋总长来主持毕业典礼，即面请将



该期毕业生送往重庆参观见习，并“聆听”蒋介石训示后再遣返原保送部队，何应钦当即批准。陆大即在贵州汽车运输公司遵义站租了5辆汽车运学员，本校汽车运行李，很顺利地完成了准备。

4月1日，第十五期毕业学员在校友欢送之下，乘车奔向重庆“朝圣”<sup>①</sup>。车到四川公路段的吊丝崖，这是事故多发地段，前三部车平安过去了，第四部车转向稍迟滑倒崖下。乘员25人中18人被摔出车箱，仅受轻伤；7人被扣在车箱内，当时死2人，另5人受重伤，司机当场死亡。领队下部立即将重伤人员搭便车送返遵义，轻伤人员分乘各车继续开往重庆。重伤者中后有2人死去。此次车祸死亡者中学员3人为邱养吾、龙德、毛鸿，埋在遵义陆大墓地。

第十五期毕业后，陆大负责人也有变动，教育长一职，蒋介石接受陈诚的推荐，派在西安事变中共过患难的万耀煌（陆大第五期旁听生）来接充。教务处长宗明也辞职，由林薰南继任。

按以往惯例，必须是国内外陆大毕业加入校友会的人才能主持校务，万耀煌以陆大第五期旁听生的身份来陆大掌教育，军令部人事局提出异议。消息传入万耀煌的耳中，他顿时慌张起来，找人疏通，才把这件事情摆平。但在遵义是否会再发生类似问题，很难保证，遂借第十五期毕业学员赴重庆参观聆训途中翻车死人一事为例，证明陆大远离陪都不便，应迁至重庆，向当局一再请求，得到批准。其真正目的是希望接近陈诚等人，有所庇护，免得再受打击。

当时的重庆，地狭人多，物价昂贵，再加上空袭警报昼夜频传，人心不安，并不适于读书求知。因此校部传出上级批准迁校到重庆的消息后，全校教职员工一致起来反对，认为万耀煌是为

---

<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所收万耀煌《我主持陆军大学的回忆》中的记载为：“第十五期学员4月3日赴渝听训。”

个人谋而不为全校计。有人建议写意见报告，向上级陈述迁校与不迁校的利害，请求暂缓迁校。幸而重庆没有陆大可用的校舍，也就把迁校之事搁置起来，仍在遵义上课。浙大感觉在遵义无法发展，则把各院系迁到距遵义很近的湄潭县去了，那里是产米区，生活比遵义还便宜。竺校长与张其昀均住在老城，万耀煌常去拜访，但并未实现他们与蒋百里达成在此“文武交流”的协议。

陆大迁到遵义后，约在4月中旬，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身份到南岳衡山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带随员一人路过遵义，万耀煌敦请其留住两天，为陆大教职员讲武汉失守后的新形势和新的作战方式。

讲课那天，3个班期的学员和教官都参加了，大教室里坐无虚席。叶剑英把武汉失守后对敌作战的新方式称为“扯狗后腿的作战方式”。他说，日军举全力占领武汉，形式上是他胜利了，但在今后的作战上他就陷于很难再前进的地步。他若继续前进，必须克服前进路上一切障碍，例如湖沼地、无公路等地区。倘若硬着头皮非前进不可，那么我们就在他后方广大地区发动游击战。好像癞狗子贪食想吃前面一块肉，我们就抓住它的两条后腿不放松；它想回头来咬人，我们就暂时松手躲开它。这样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解除后腿的被抓。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整训部队，筹集物资，一有机会就趁隙出击，完全处于主动，而不是以前时时防范它的包围袭击，处于被动形势了。发挥这种作战的威力，必须把游击战术放在第一位，这次到南岳去就是研究研究游击战的基本法则。

叶剑英的讲话大约有两个小时，言语清楚，举例恰当，有时用手势表演，更使人印象深刻。两小时中无人离席外出。当初有很多人预约广东同学当临时翻译，以备随时帮助理解。及至上课之后，他没有一句不是官话，都是北方人常用的习惯语。叶的讲话艺术，为陆大听过讲演的人称颂一时。

## 迁到重庆后的 10 年

万耀煌建议迁陆大于重庆一事，虽然停顿了一段时间，但他动机未打消，依然在找机会。1939 年秋应该在第十四期毕业时入学的第十七期，因搬迁问题停了 1 年，又重新召集。这一期是在重庆举行入学考试，拟入学后送到遵义上课。送这批新生入学的车费开支是很大的，途中还有风险，因为吊丝崖新线还未通车。

万耀煌见机会已到，以上述理由向陈诚、何应钦二人提议，把第十七期学员改在重庆上课，作为陆大迁校之始，以免往返的车费开支。何应钦是有名的好管家婆，只要能节约开支，一切均同意照准。但重庆城里并没有陆大建校的地点。万耀煌自建议迁校以来，就到处物色建校地址。他看准距重庆 25 公里山洞街以西，距公路很近的山凹处，那里有军令部建筑的宿舍，以备向郊外疏散之用。虽然房舍不多，但给一个班期作教室、宿舍还是绰绰有余。于是，他就提出借用山洞军令部迁建的宿舍安置第十七期入学开课，军令部居然也照准了。

留在遵义的班期，因情绪不安，房舍不够等等原因，暂且不动，等其毕业后，就地遣返原保送部队、机关，教官则两地上课。这样一来，学员安心，教官乐得“狡兔有三窟”，两头跑跑也很愉快，就未再发生反对迁校而闹事问题。万耀煌就原建筑工程队扫尾之际，临时呈请增建了几幢宿舍，等第十六期快毕业时，也用汽车接到山洞，在蒋介石亲临之下举行毕业典礼。

自 1939 年秋陆大部分班期在重庆开课，至 1940 年秋完全搬到重庆，才正式称为重庆陆军大学，定居下来。1941 年 9 月蒋介石突然下了一个手令：派万耀煌带必要随员，到贵州、广西视察步、炮等专科学校、军官分校现时教育情况，以及有关兴革问题，回来作具体的书面汇报，即时成行。

万氏得到这个手令，真是比得升一级的任命状还高兴。因为这是给他比陆大教育长更高地位的一种预备阶段，于是，他欣然受命，及时部署，挑选4名随员曹耀祖、关中一、刘古复和我。我们4人分别是步、炮、工兵科教官，教战术战史，可以给他拟讲演稿，也可以每个人作专题报告。另选精干事务员一名，办沿途食宿行等事。万是大将出门八面威风，在重庆上轮渡就和舵工吵了一阵，因为舵工进舵仓碰他一下，认为污辱了他。及至到了一品场，拦路杆放下挡住汽车检查，万耀煌大声告诉检查员：“我是陆大教育长万耀煌，奉主席命到贵州、广西视察军校去！快开开，我们要赶路！”这个检查员更倔强，比万氏声调还高：“我们奉命检查，凡是乘小轿车出一品场的坐车人，都须持有军委会办公厅奉公出差的证明，否则不许通过！”无奈万氏取出手令，这才通过关口。据说自从汪精卫逃出重庆之后，坐小轿车出一品场就比坐大卡车麻烦得多了。

从9月5日到10月15日，我们陪万氏视察了步校、炮校、军官分校、参谋补训班4个单位。返程途中，我们4人商量起草了一个报告，万耀煌很满意。当了这次“钦差大臣”之后，万氏的官运一天一天地逐渐好了起来。1943年夏，他突然被调到成都军校当教育长去了。表面上看，最高军事学府调中等军校是降级，实际上他又向蒋介石靠拢了一步，因为成都军校是初级军官养成机构，蒋介石抓得最紧，非他信得过的人不可担此要职。所以，万耀煌欣然受命，不辞而行。离开陆大，他真是如释重负。

来接任的是陆大前几期毕业的老教育长阮肇昌，他是云南人。因为以前在陆大主持过教育，他对怎样办好陆大是心中有数；又有杜建时教务处长妥善安排各班期的课程和胜任的教官。所以，他很受全校人员敬重。不过经费困难，一如前任。阮氏把自己一部旧卡车卖掉，作为添置教具的补助。从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将就一年，已经无力支持，一再请辞，获上级批准。陈仪被任命为陆大上将代校长，徐培根任陆大中将教育长。

陈仪是浙江人，日本陆大毕业，归国后曾在孙传芳部下当过师长，以后投入北伐行列当过军长，后任福建省主席。

徐培根也是浙江人，陆大第六期毕业，曾任航空署长，为毁灭亏款劣迹纵火烧飞机库，被判刑坐牢。后又宣布无罪释放，跟随杨杰为首的军事代表考察团，赴苏、美两国考察，饶有心得，著书上陈，获得奖勉。此次实任陆大教育长，陈仪给他以全权处理校内外一切事务的信任。他在上饶集中营时曾和中共地下党有默契，在陆大看《新华日报》和《群众》月刊他是不禁止的。当叫我编中外古今战史时，他特意将他珍藏的翦伯赞编著的《中国史纲要》、吴晗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拿出，作主要参考资料。

陈仪、徐培根二人因都是浙江人，在陆大人事上就占了主导地位，再加上有苏联顾问在上面随时帮忙，徐培根便得心应手地大干起来，陆大形势从此起了很大变化，具体情形叙述如下：

### （一）人事上更新

徐培根深知陆大学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有战场、社会各方面的丰富经验，如无深湛的学识满足他们的需求，校风一定得不到健康地发展。所以，他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更张：第一，抓兵学研究院，以原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徐祖诒为主任。徐是江苏人，日本陆大毕业，曾在第五战区给李宗仁当过参谋长。叫他培训各班期毕业留下的成绩优秀的学员（研究员）。第二，成立战史、战术、空军、战车、兵要地理、后勤6个系，以曾在各系课目中有过著作、教学有过贡献者为系主任，一面筹划系内业务——编审教材，一面上课，并兼任研究员导师。第三，在各班期增设一名主任，负责管理好学员课外一切有益的活动；聘请李雅轩教太极拳、刘昌合教体育。以上这些人事一公布，过去滥竽充数的教官纷纷地离开了陆大，因为有了他们的市场。

### （二）校园的建设

陆大从遵义迁到重庆山洞，经万、阮两任，办了十几个班期入学、毕业的隆重典礼，大都是由蒋介石亲临现场，点名、训话、

发毕业证书、给优等生授奖等。因为没有礼堂，一贯在校部门前广场举行。来宾既无站处又不能不来参加军政头头亲临的典礼，委实尴尬。但经费无着，不可能盖个礼堂，万、阮两任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徐培根到任后，就一改过去无能为力的窘状。他的人事更新，很快地得到上级的批准；他又找校中学非所用教外国语的建筑工程师，设计一个可容千人聚会的礼堂、6个系合厅办公的办公厅，既要美观又要省钱；修建一条从公路直接通到礼堂正门的汽车路；新辟网球场；在十八梯开挖游泳池。几项建设需款数十万元。计划一上报，照准批下来，很快兴建起土木工程。

此外，又增修了几幢教室，在各班期宿舍附近增加房舍，使带着属的学员也有了住宅。徐培根为了和外界交往便利，在校部门外修了一幢教育长办公室，避免了过去挤在一起办公的混杂局面。每星期三在校长室开校务会议，校长这一天十有九次不来，由徐氏主持会议，各处——教务处长杭鸿志、总务处长王麟生、编译处长杨某、军需主任王泽永、研究院及各系主任，共12人出席。会议时间过久，一般会后聚餐，不饮酒、不吸烟，平均1人1菜，由公费报销。

### （三）生活方面的改善

学员成绩优劣，关键在教官施教质量上。抗战期间，为聘优秀教官却不能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忿而辞职的教务处处长就有宗明、林薰南、龚浩、杜建时4人。徐培根到任后，将教官工资提高到比校外同级多一倍的水平，但币值一日数贬，还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1945年校中又定出钟点加薪办法，即上课每小时加薪10元，等于当时1斤猪肉价；后又改为实物钟点补贴，即上课1小时补贴猪肉1斤，每周4小时，每月4周，上足课，可得猪肉16斤。每月每人有平价米45斤，再加上16斤肉，这个生活在当时也算不错了。这样一来，杭鸿志的教务处长也好当了。

### （四）鼓励教官到校外兼课

陆大教官的生活，与当时重庆文科学学校教职员生活比较，是

差强人意的。但是，还不能抵挡住各部队首长延揽教官去当参谋长的吸引力。陆大从第十期至第十四期，每期留 10 名研究员，至 1945 年十之七八已离开陆大，都是被部队长指名调走的。凡是离开陆大的都有了较好的工作，谁愿在陆大坐困愁城呢。徐培根看出这一点，也希望教官在经济上多收入一些，不限制教官在外面兼课，只要不影响校内的教学就行。不过这些都是暗中进行。

有一个单位聘请陆大教官前去兼课，班主任亲到山洞餐馆设宴请教官，徐培根不但不阻止，反而告诫被请者：“请吃必须去，排课必须去上，千万不要惹起误会，致生意外麻烦！”辞严意恳，倒像是恳请教官到校外兼课。这个单位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机关呢？原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各军分校毕业生前 30 名优等生中，选拔家庭富有者留下深造，共有一百多人，成立一个“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班主任由戴笠自兼，设在重庆大兴场。班部设一教务长，另有一教育事务员，但没有一名教官，完全在陆军大学聘请兼任。每周二次，每次 4 小时，每小时付酬 30 元。上课时从山洞至朝天门用小汽车接送，从朝天门至大兴场乘轮船，发一枚乘船卡片，上船后把卡片一亮，船上人立即请上船。下课后招待午餐一顿，四菜一汤，教务长陈某作陪。回重庆时，只要江中有小轮船上驶，这边红旗一招，都要过来靠岸搭客，无人敢违抗。上岸时小汽车早已等待好久了，径送至山洞原上车处。给小费坚决不收，司机说：“主任有指示，索小费的严惩。”每个月终，教育事务员唐某把上课钟点费亲送到陆大教务处代转，并附下月授课日程表，以免和陆大本校排课日程抵触。相处久了，问唐某为什么不设专职教官，节约接送车船费。回答是：“班期不定是一个原因；完全由陆大教官授课，可使学员领会留用深造涵义，免得影响学习情绪是主要原因。”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怕学员知道是在搞特务专业，不安心学习下去，拿陆大做招牌。

我们去上课的教官，多半是东北讲武堂毕业投考陆大的。由于张学良在息烽被囚禁着，深感自己也在被特工监视着，因此唐某最初来山洞邀请教官时，我和张在善、傅绍杰表示不愿去。唐某向戴笠一讲，戴说：“我去山洞设宴当面邀请，并请徐教育长帮助动员一下。”所以徐培根立即召集不愿去兼课的人到校部，当面劝告请客要去吃，排课要去上，以免戴找麻烦。

### （五）开设甲级将官班

1944年秋，美国为支援中国军队反攻，派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来重庆任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陈纳德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也来中国参战，因而中美军官交往广泛。当时美军对陆大毕业的中国将领尚能尊重，而漠视无陆大学历者。徐培根曾随杨杰赴美考察，对此颇了解，于是向何应钦、陈诚建议，为了中国将领不受美军冷遇，立即在陆大办短期的高级将领学习班，3个月为限，发毕业证和校徽，并加入陆大校友会，成为陆大正式校友。建议被批准后，立即筹备召集开课。最初拟称元帅学习班，最后定为甲级将官班。进修学员以中、上将级的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军事机关厅长为限。当时陆大已有乙级将官班，学制1年，进修学员以少将以上军事机关正副主官和部队旅、师长为限；另有特别班学制2年，以团级为限。

最初定的人学资格很严，人哪一个门坎都有框框，错了都被军令部人事局教育处挡回。但到大陆解放前夕，入学标准开始松动，甲级将官班有少将入学的，乙级将官班有上校入学的，特别班有中校营长入学的。

1944年11月中旬，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在重庆山洞正式开课了。这一期共36人，一如校章规定都是中将以上现职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属厅长、局长等。每位学员都换上陆大学员带竹节的领章，按年龄选出赵寿山为学员长。校中有食堂、宿舍，如不住校，按课目表规定准时到校也可，迟到、早退、拒不交书面答案，按学员遵守规则处理，其中有扣分、警



告、记过、降期、勒令退学等。

这36位将军学员也真的放下架子当学生。每天准时到校，坐在课堂听号音，教官到时起立，听教官喊坐下才坐。每人都记笔记，有疑问时，先请允许后提问题，俨然像小学生一样循规蹈矩，并不因教官年轻阶级低而不礼貌。

12月中旬，蒋介石来将官班视察，并听课很久。其间曾问学员对那些课程感兴趣？一致说喜听战史，并希望到西南中缅国境战地参观战迹。蒋同意，并把此事向魏德迈说明。魏很赞成，并派驻昆明美军后勤部组织招待事宜。于是甲级将官班和我们几位教官共30人，在1945年1月乘飞机赴云南芒市，然后乘车进入缅甸，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会师典礼，并视察了滇西反攻日军据点的战迹，2月1日返回。此行收获很多，大家颇满意。

1945年2月中旬，甲级将官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在林园礼堂举行，重庆各部首长自何应钦以下均到场。蒋介石讲话，对政治方面只字未提，仅一再说“外国人称中国兵是乞丐，大家必须把兵带好练好，把乞丐帽子摘掉”云云。赵寿山学员长代表毕业学员致答词。礼成，学员在大教室设宴招待授课教官并聚餐。

甲级将官班连续办了三期。第三期入学适逢8月10日晚上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而乞降，更激发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争取入陆大将官班学习的情绪。

## 抗战胜利后陆大还都

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一响，陆大教职员工都幻想着未来无失业的危险，安心工作，上上下下一团和气，所有一切教学业务都在顺利进行。当代校长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即赴台受降并主持省政时，无一人要求追随，也可见陆大教官安于其位的心态。

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来陆大任校长，徐培根仍以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对于还都一事，大家都不热心，因为得知南京陆大校舍被日军搞得一塌糊涂，房舍倒塌，大礼堂竟被日军做了养马的马厩，南京已无家可归。1946年各班期毕业、新生入学典礼照常重庆举行。

1947年1月间，陆大接到国防部一个电令：“着陆大在南京汤山温泉地址，筹办乙级将官班，准备3月间开课。”徐培根这才飞赴南京筹备。为了便于办公，临时买了一座民房作校部，其窘状如何，不言而喻。我于2月中旬飞回南京，因城里无住处，即住在汤山别墅，一天两次温泉浴，很感难得。不久，乙级将官班开课，我又恢复了教官生活。这期的班主任赵子立很得学员的尊重和信任。5月中旬我结束了这期的课程，又飞回重庆给各班期授课。

由于南京已经有了乙级将官班在开课，为了教官上课便利、教育行政集中，就把陆大迁回南京一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徐培根对建校是有抱负的，他走遍南京城内外，发现中山陵对面有一块广场，足够未来陆大发展为陆、海、空、后勤综合大学之用。在此建筑一个现代的教学大楼，附近辟为生活区，供教职员工居住，避免上下课时交通的麻烦。所需经费虽大，也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很快地进入施工阶段。至1948年7月中旬，陆大新校址已部分交付使用。正则班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已在新校址上课。重庆仅留下一个特别班第八期，预计1949年底毕业，即可以在重庆遣返原保送机关。

### 留渝陆大部分教职员光荣起义

特别班第八期于1947年11月入学，是各部队团级以上军官经考试成绩及格入学的，学制二年。原规定毕业学员不任研究员，不在陆大任教职，以后取消原规定，和正则班同等待遇。陆

大校本部迁南京时，因南京校舍不足，有一部分教官与特别班第八期留渝继续上课。

我在1948年被热河省主席刘多荃推荐，经省参议会选举为“行宪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若就此新职，必须辞掉陆大战史系主任职，因“宪法”规定立监委不得兼职。我因家在陆大宿舍，决定不走，陆大遂采取两全办法：准辞系主任职，另聘为陆大教官，兼职不兼薪，上课时实物补贴照样拿。最后在监察院成立大会上，我又被推选为川康渝区“监委行署”委员，任期1年，恰好和特八期相始终。因而陆大课程我要上，陆大向国库提款由我向渝行办交涉，在杭鸿志教务处长未回之前，一切困难问题找我解决。1949年10月末特八期学员马惇濂因他父亲马鸿宾起义，被特务抓走关在重庆罗汉寺，学员们也找我去向徐远举（保密局西南区区长）要人。

1949年10月间<sup>①</sup>，陆大教务处长杭鸿志不愿赴台跟着国民党走，偕眷从广州回渝主持特八期的未完课程。全班学员要求他制订一个“应变”计划，以作“万一”的准备。其中有许多学员参加进步人士行列，不过多数携家带眷，苦于无法安插。他们应届毕业期是11月中旬，虽然李宗仁“代总统”已来重庆，但陆大并未与他联系。

及至11月中旬蒋介石又来重庆，李宗仁见大势已去，借赴昆明视察之名，径飞香港以后赴美医病。蒋又不声不响地恢复了辞掉的职权，同时派人来陆大了解情况，知道特别班第八期本月就届毕业期，遂决定11月19日在山洞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蒋氏亲来参加。特八期急速做了毕业准备，一如既往布置礼堂，准备聚餐，还有小型文娱节目，好像一个太平盛世的样子，以免引起蒋的猜忌。

到毕业这一天，天气晴朗，上午9时许，蒋介石仅带俞济时

---

<sup>①</sup> 据杭鸿志回忆，他是1949年5月1日由广州回重庆陆大。

及其秘书、警卫人员，乘车来到陆大，不像以往邀集各部会负责人前呼后拥，云集礼堂。在行礼如仪后，蒋照例下讲台，手执名册，一一点名观察学员面容，并在被点名者应声时，常提醒说：“声音大一点。”

此时一度被扣押的马惇濂也参加毕业行列，我生怕点到他时出问题，讷知一带面过，未生麻烦。及至点到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时，蒋怒容满面，看了又看，站了很长时间，才又往下点。点完名后，又登台讲话。他今天所讲的依然是带好兵学好现代作战方法，关于时局只字未提。讲完话就走，校部也未进。毕业学员，照例举行聚餐。我发现冯洪国也站在一张桌子前，听候他们学员长宣布饭后行动。我走到冯洪国面前说，今天点名对你不利，赶快躲一躲吧！他听了我的话，转身就走了，家也未回。第二天他的爱人向我们说：从中午到晚上，有人几次到他家找冯洪国，假如他不走，可能要遭到毒手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陆大残留的教职员工在杭鸿志处长领导之下举行了起义，走上了光明大道<sup>①</sup>。

(1982年4月)

---

<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所收的杭鸿志《重庆陆军大学起义纪实》称：1949年12月1日上午杭鸿志等在陆军大学召开全校人员大会，宣布起义。

## 国民党各派系 在西南公路上的权利争夺

苏从周\*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川滇公路工作时间较久，这是新建的一条沟通川黔滇三省进出口的运输要道。1939年，西南运输处设泸州支处，负责该路川黔境内军事运输。1941年底，改组为川滇公路局，经营全路运输，局址设在毕节。我因此经常往来于重庆、昆明、贵阳之间，与各方人士时有接触，对于国民党各派系间的权利斗争见闻较多。现将个人记忆所及，略述片断。

抗战初期，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政治中心移转武汉，这时通往海外的运输路线，只有依靠粤汉铁路。我当时负责西南运输处汉口分处的接转工作。不久武汉又告失陷，国民党政府撤到重庆，进出口物资运输也随之转到海防再向国内调运。其后日军侵入越南，一时物资运输又转向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进。在抗日战争期间，绝大部分进出口物资都是依靠公路运输来完成的，汽车是运输的主要工具，那时掌握车辆多的单位是：后方勤务部5个汽车兵团、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航空委员会运输处、资源委员会运输处、交通部中国运输公司、贸易委员会复兴公司等，这些单位都有政治背景和派系势力为他们撑腰。此外，较大的商办汽车运输公司，也都有官僚资本在内，或者有军政大员作他们的后台。谁掌握的车辆多，运输能力大，发财的门路就广。所以负

---

\* 作者当时在川滇公路局工作。

责运输部门的当权者，无不想方设法，施展权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运输管理统制机关，车辆、燃料、器材的分配单位，也就是最有权势的了。

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全名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它抓得最早，手伸得最远，权势也最大。它在国内外设有分支处，声势浩大，足以垄断全部进出口物资，久为热衷财货者所垂涎。运输处开始筹备时，是 CC 系大将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主任，不久让位给宋子良。宋是宋美龄的胞弟，他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合作，和特务头子戴笠关系也很密切。总处原设立在广州，在组织系统中设有警卫稽查组，属军统戴笠系统；国民党西南运输处特别党部属军委系统。各分支处的党组织和特务人员都是一体的，并指挥警卫部队。运输量大时，另调有警卫队宪兵营、内警总队的稽查人员全副武装押运，在各公路上人人侧目，真是声势浩大。西南运输处私设有公司，还办一个中国国货银行，同美军和美国资本家勾结，声息相通，处处占上风，得到美军支持，显赫一时，更非其他竞争者所能比拟。

国民党的派系是很复杂的，它们在公路方面的权利斗争常常伴随着军事的变化、政治势力的消长而起伏。当时，可同宋子良抗衡的只有俞飞鹏，他是何应钦的亲信。1940 年，军事委员会设立了运输统制局，由何应钦兼主任，交通部长张嘉璈兼副主任，这时俞飞鹏正做后方勤务部长，也兼了个副主任。俞飞鹏依仗着和蒋介石的亲戚关系，挟持着汽车兵团的实力，掌握着运输统制局的特权，政治上又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接近，来头不亚于宋子良。于是两派的权利争夺就日益剧烈起来。平时互相窥伺，一旦有机可乘，就会引起搏斗。

1940 年 4 月，遮放仓库爆炸事件发生，大批珍贵军事器材被毁，损失惨重。这个仓库正属于西南运输处管辖范围，追究责任，宋子良是不能辞其咎的。原来海防进口堵塞后，西南运输处为了加强滇缅公路的运输，在缅甸仰光和国内畹町设立了分处，

遮放就是畹町分处的一个点，由一位副处长负责指挥。凡是进口物资除一部分直运昆明外，绝大部分都是运到遮放，然后再转运的。于是就在公路旁边圈一块空地，用毛竹稻草盖些简陋的库房，设立了临时接转库。遮放临时接转库分两处：一处储存汽油，依山露天堆放；一处储存枪械弹药，在公路旁堆放。那时每天到达的车辆很多，而西南运输处的接运能力不足，运出的少，储存的多，物资逐日积压，临时接转库就变成了长期储存库了。结果这个只能容纳二千吨左右的临时仓库，竟然堆积了五千多吨物资。枪械、炮弹之外，还有黄色炸药、出口桐油以及以“特种物资”为名的银元等。仓库满了，就任凭雨淋日晒，无人过问。

1940年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忽然发生了两声巨响，山坡上接着连续爆炸燃烧起来，一直烧到第二天天亮火才熄。物资几乎全部被毁，住在仓库的三百多名搬运工人，死亡达四十余人。宋子良在重庆闻讯前往察看，为了掩盖罪责，假拟了一个结论：由于敌人飞机的轰炸，因而引起了火灾。理由是仓库中有两个大坑，在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天空有两盏白灯在晃动等等。回重庆报告，蒋介石不信，责令宋子良再查。正当宋子良走投无路的时候，兵工署长俞大维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枪弹、炸药是危险品，我们兵工署仓库有很好的库房，条件优越，还会出事，何况遮放设备简陋，露天堆放，由于气候变化，自然容易发生爆炸。宋子良听了立即请求兵工署派技术专家协同再去调查，推翻前次结论，认为黄色炸药在露天堆放，白天天气炎热，夜间气温骤然下降，紧缩变成压力，以致自动发生爆炸，造成事故；库长失察，应予撤职；工人牺牲，应予抚恤；另由兵工署派人员接任库长，以善其后。宋子良回重庆复命，蒋介石认为所报属实，有关人员负有责任，分处处长应予行政处分，副处长判有期徒刑5年，库长判有期徒刑7年，其他有关人员亦分别处以徒刑或行政处分。结案后蒋介石为了保全宋家的面子，于7月初发了一个电报，将此次议处各员予以宽免。于是轰动一时的遮放爆炸案件就

此结束。

案件虽然结束，舆论犹未平息，尤其是一直与宋子良明争暗斗的俞飞鹏，哪能放过这种机会，于是对西南运输处大肆攻击，并依靠何应钦的力量，利用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职权，压制西南运输处。宋子良虽然还想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但终于敌不过军方的压力，不久就借口有病出国疗养去了。俞飞鹏乘机而入，奉了蒋介石之命，负责整顿西南运输处，另行成立了中缅运输总局，自任局长，并拉拢宋子良手下的龚学遂为运输统制局的运输处长，掌握实权。这是国民党派系在西南公路上权利争夺的第一个回合，俞飞鹏得胜。

同俞飞鹏继续争夺权利的是交通部长曾养甫。曾是 CC 派的大将，铁路交通的权威，各公路工务局都属他的势力范围。交通部政务次长徐恩曾是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特务头子，他同曾养甫密切配合，深得蒋介石的宠信，政治势力极为雄厚。同时，他和宋氏兄弟关系较深，和西南运输处也有历史关系。宋子良的下台，曾养甫颇为不平。因此，在他同俞飞鹏进行争夺时，暗中就得宋氏兄弟的有力支持。公路运输业务原来属于交通部的职掌范围，在前部长张嘉璈任期内，这项业务被军方夺走。曾养甫上台后，一直想把它重新收归自己权限以内，只是无机可乘，只好暂缓。

1941 年 12 月，中缅运输总局刚成立 1 个多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运存缅甸的物资急待运进，援缅甸部队急待运出。当时，中缅总局改组伊始，脚跟尚未站稳，应付突来之非常局面手忙脚乱，缺少办法。日军来势很凶，1942 年春，占领仰光，旋即长驱北上，指向中国境内。这时国民党驻缅甸的参谋团驻在腊戍，还有几个师的军队驻在中缅边境。俞飞鹏以为一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于 4 月下旬亲自率领部分人员前往滇缅边境布置运输任务。不料日军先头部队绕过中国部队的主力，轻装前进，直趋腊戍，进入云南。俞飞鹏等人正在途中，得到腊戍



沦陷消息，立即掉头往回跑。可是这时沿途车辆堵塞严重，由畹町到遮放不到四十公里，汽车行驶了十几个钟头，还不能到达。俞飞鹏亲自下车指挥，甚至搬部队的招牌也不济事，一路上翻车、撞车、斗殴、抢劫的事，比比皆是。日军的先头部队顺着滇缅公路长驱直入，遇到中国车辆即行焚毁，或推入山下。物资被掠夺，人员遭惨害。尤其在日军到达惠通桥西山顶的腊猛以后，以炮火封锁了惠通桥东山顶至坭田的一段公路，全部车辆不能开动。那时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已被炸毁，桥西的车辆全部被日军俘获，很多人被害或被俘。桥东的人只好抢车逃命，有的被日军炮火打死或打伤，物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由于这次撤退损失惨重，涉及到国民党军政大员和地方当局的直接利益，于是俞飞鹏成了众矢之的。人们认为造成这次损失的原因，是由于中缅运输总局的无能。在撤退时指挥无方，秩序混乱，是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因素。

俞飞鹏在狼狈逃回昆明以后，正被各方面猛烈攻击的时候，又倡议征购民间汽油，更惹起群众的愤怒。曾养甫抓住这个时机，攻击俞飞鹏能力太差，在紧要关头不能完成任务，贻误战机，丧失大量军用物资。蒋介石大怒，立即撤销了中缅运输总局。1943年1月，又裁撤了军事委员会的运输统制局，公路总局仍改由交通部管理，派曾养甫兼局长，龚学遂任副局长管运输，赵祖康任副局长管工务。这是国民党派系在西南公路上权利争夺的第二个回合，曾养甫得胜。

俞飞鹏对自己的失败并不甘心，随时准备着东山再起。而曾养甫以交通部长自兼公路总局长以后，即已失去仰光路线，只有依靠中印空运了。曾养甫乃利用时机，在云南罗益、四川成都等地调动大量军、公、商车，抢修飞机场以应急。由于他从中大肆搜刮，群众称之为“铁公鸡”，这是对曾借修飞机场以发国难财的极大讽刺。当时，曾养甫的权势、声威空前高涨，他绝没料到自己的亲信黔桂铁路局长侯家源闯了大祸，给俞飞鹏创造了夺权

的有利条件。

当黔桂铁路修到清泰时，火车即通到都匀。这条路设备简陋，运输能力薄弱，而侯家源却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肆鼓吹铁路运输能力强大，在铁路运输范围内停止汽车运输，以致引起了军、公、商车的不满。恰于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失利，拟作垂死挣扎，于1944年五六月间，向我大举进攻，粤汉、湘桂两路相继失陷，日军进逼黔桂。在军事紧张的关头，出现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的局面，在金城江至都匀间，军公物资以及商货堆积如山，不能运出。曾养甫情急，商请副局长龚学遂调动大批车辆赶来疏运，然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自吹运输能力强大的侯家源在这战事吃紧之时，竟然抽身逃走，以致全路陷于瘫痪，沿途物资无形抛弃，损失之大超过了遮放仓库爆炸案和中缅公路撤退案。蒋介石闻讯，立刻命令曾养甫捉拿侯家源归案法办，曾养甫苦苦哀求蒋，念其过去的功劳，予以开除路籍的处分，始得了事。此时俞飞鹏又和龚学遂勾到一起，共同对付曾养甫，他们利用时机，大造舆论，又复得何应钦的支持，结果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于1945年1月，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由俞飞鹏兼任局长，龚学遂为副局长，接管了交通部的公路总局，并将各公路的运输局和工务局合并，成立了公路管理局。这是国民党派系在公路上权利争夺的第三个回合，俞飞鹏取得了最后胜利。

(1980年8月)

# “山东王”韩复榘琐记

王 华 岑

### 韩复榘的飞黄腾达

清朝末年，韩复榘在清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八十标第三营充当下级军官。辛亥革命前夕，他积极参加了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所领导的革命活动<sup>①</sup>，为营长冯玉祥所赏识。滦州（今河北滦县）起义失败，王、施被袁世凯杀害，冯被押解回籍，韩被驱逐出境。

民国初年，袁世凯编练备补新军时，陆建章<sup>②</sup>荐冯出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冯在陆的扶植下，为时不到3年（1912—1914年），竟从营长而升至混成旅长，冯所率领的军队，也从数百人发展成为有万余众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劲旅。冯利用这一独立团体，收容滦州起义时代的旧部，韩亦于此时投入冯的麾下。

冯玉祥以会练兵能打仗驰名于北洋军队中，成为当时直皖各系军阀争取的重要实力派。冯夤缘时会，扶摇而起，10年之间（1914—1924年）又从混成旅长成为占据数省、拥兵十余万众、独霸一方的军事集团。其间，韩以剽悍勇猛，为冯所器重，亦从

---

<sup>①</sup> 王金铭是辛亥滦州起义时，北洋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是起义军总司令，冯玉祥是总参谋长。

<sup>②</sup> 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心腹，曾任袁之执法营务处处长、陕西督军，因与徐树铮不睦，被徐杀害于北京。

初级军官，青云直上，不断擢升，而成为统兵万余众的高级将领。

1926年4月，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张宗昌、褚玉璞<sup>①</sup>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组成所谓讨赤联军，冯采取两面作战方针，东路军固守南口，西路军夺取晋北。韩当时任第六军军长，奉命围攻大同、孤山和镇川堡，在攻占孤山和镇川堡、围困大同、向雁门关挺进的时候，韩意志消沉，暗中与阎锡山勾结。及东路防线察北多伦、沽源被奉军骑兵万福麟部攻陷，南口阵地侧背受到威胁，按既定计划，向绥远、包头撤退时（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韩见冯大势已去，随背冯投降阎锡山。

在奉直晋联合攻击国民军之前，冯为了缓和矛盾，争取时间，调动军队，曾宣言下野。大战爆发前夕，他为减少目标，于3月20日前往苏联访问。及闻战败消息，即兼程归国，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进驻包头，整顿残军。这时候，韩复榘正在归绥（呼和浩特市）医院养病，冯以电话询问他的意向，韩表示：愿意听从指挥，并派代表谒冯，自认过去做错，冯当令其将所属炮兵开往包头待命。当韩部炮兵在归绥登车时，被晋军阻拦。韩闻报愤而出院，亲率手枪兵数10名，赶赴车站，将阻拦的晋军拘捕，威言曰：“若不让我们开走，我们只有开枪打。”当时的绥远都统商震<sup>②</sup>，恐怕事态扩大，随任韩之炮兵登车。临走时，韩又扬言说：“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的，你们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冯认为韩这次行动是对己的无限忠诚，益加器重。

韩归来后，随冯平定陕（西）甘（肃），东出潼关，参加北伐，率领所部，转战于豫南豫东，屡挫强敌。豫北大战时，奉鲁

---

<sup>①</sup> 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等均为奉系军阀，吴佩孚是直系军阀，阎锡山是山西军阀。

<sup>②</sup> 商震是山西军阀阎锡山部将领之一。

军用数倍的优势兵力，并配有优良的武器，将冯军阻困在彰德附近。敌人陆上用坦克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空前激烈。韩部因长期转战，过于疲惫，武器又远不如敌方，每次冲锋上去，都遇到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而退下来。在此紧急关头，韩复榘很是着急，他躺在地上，打滚撞头，痛哭流涕地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定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就死在此处。”经韩复榘这一闹，将士们极为感动，重新鼓起勇气，冲杀上去，鏖战了三四天，终于把强敌击溃，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从此，韩部节节胜利，首先攻入北平。以后，更为冯所宠爱。北伐胜利后，升韩为河南省主席。这时候，冯部高级将领流言纷纷，谓韩曾经叛变冯，居然高居主席地位。但冯并未为流言所动，对韩信任如昔。

1929年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发生战争，蒋向冯求援，冯表示：“为公为私，都不能让蒋独任其艰。”决定派兵10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屯驻豫南，名为助蒋，暗中却令韩按兵不动，观望风色，以坐收渔人之利。战争发展不到两个月，蒋胜李败而告结束。经此事件，蒋冯之间的关系更加分裂。蒋深感冯系的存在对他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因此下定决心对冯军进行瓦解；后用500万元重金收买韩复榘。并在宴席上对韩备加称赞，誉之为北方赵子龙、常胜将军，宋美龄亦亲为把盏庆功。韩为金钱声色所迷惑，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深感冯对己刻薄严峻。原来冯治军极严，军官必须与士兵同生活、同操练，高级将领也在每天朝会时排班点名，稍有不当，即加训斥。统兵数万，职居总指挥的韩复榘亦屡被痛责，韩当时虽怒于心，却不敢形于外，但对冯离心离德的情绪却因此产生。冯常以此事向人夸耀说：“张作霖、吴佩孚对于高级将领，是用赌博妓女来联络；我对高级将领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像普通士兵一样，严肃敬事，一丝不苟。用这一点来比较，可知谁胜谁败了。”冯每每以此自鸣得意，殊不知敌方却乘此隙而入。

冯之参谋长石敬亭，素日与韩不睦，屡次向冯进言：“韩心怀异志，非可靠之人。”遂引起冯对韩的疑虑，撤除了韩的军职。韩复榘作了光杆主席，对冯怨恨益深；加之，石对韩部军官，又极力排挤，韩更为愤愤，伺机而动。

1929年秋，冯与蒋介石破裂，率部从河南西退入陕时，韩在洛阳叛冯，率其旧属第二十师，并联合第十三师石友三<sup>①</sup>等东返投蒋，回任河南主席。韩、石叛离，给冯以沉重打击，不但精神上受了极大刺激，在军事上，亦给予更大威胁，失去了对蒋作战的必胜信心。

韩投蒋的当年，河南境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反蒋战争，西北军“双十节”出师讨蒋，同年冬唐生智发动了护党救国军，声讨蒋介石。韩率领所部，配合蒋军作战，终将讨蒋军击败。

1930年春，阎、冯联合讨蒋战线告成，西北军东出潼关，晋绥军从山西、河北向山东推进，企图会师徐州。韩不敢与冯军接触，请求蒋介石将他调往津浦线对晋军作战。此次混战，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战火延续了半年之久，军民伤亡10万余众。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并利诱张学良入关，武力调停，终将阎、冯击败。阎锡山化装逃往大连，冯玉祥通电下野，蒋介石论功行赏，任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

## 如此“韩青天”

山东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暴，清末义和团的灭洋运动，其坚强勇毅和无畏精神，早使中外反动统治阶级有所畏惧。韩复榘占据山东后，想用武力镇压，使人民俯首听命，把他的五师一旅军队，分布各地，并组织地方武力和地主武装，成立民国军和联

---

<sup>①</sup> 石友三是冯部嫡系将领之一，与韩同时叛冯，这次叛冯投蒋的还有马鸿逵、刘镇华等冯部非嫡系将领。

庄会。为执行其血腥统治，还组织了两种特务机构——第三路军高级侦探队和山东省政府高级侦探队。以被招抚的匪首刘耀庭为第三路军高级侦探队队长，刘为了向韩邀功，在出卖他的绿林朋友的同时，株连的无辜良民亦不在少数，每次杀戮都是百数十人。省政府高级侦探队的组成，其队员为各县市警察局局长，任务是侦探民众动态，这些人，在升官发财的欲心驱使之下，虚构情报，请功领赏，甚至老百姓捡到1元钱，拾得1件衣，都被诬为盗匪，横遭杀害。因而路途中发现遗物，就好像飞来祸难，谁敢拾取！韩却夸耀说：“山东境内，政治清明，路不拾遗。”

韩本跋扈军人，兼理省政，在武力万能的时代里，自以为一省之主，不但要管山东省内的军事政治，就是国民党所标榜的司法独立，他也要插手加以干预，直弄得山东全省的司法部门乌烟瘴气，笑话百出。韩常以主席身份巡视各地，每到一县，总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部提出审讯。他以为该杀的，立即处决，没罪的，当时释放。这样一来，就有些罪大恶极的凭借一张巧嘴，逃脱了法网；也有些罪过不大，笨口结舌，不善言词的，反被诛戮。韩复榘却自以为判狱如神，自命为“韩青天”，可与宋朝的包拯相媲美。

有一次，省府参议沙月波派人到省府送信。正当韩复榘审问土匪，那人就站在一旁观看，韩审案完毕，略加思索，吩咐执法队把站在这边的全部枪毙。那人也被捆绑起来，他高声喊道：“我是送信的。”韩愤愤的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终于把那人与土匪一同枪毙了。事后，沙月波向韩理论，才知道韩当时误认为那人是土匪中送信的呢。原来韩复榘审案，非常简单，他高坐案首，听取犯人诉说，诉说后韩便用手一挥，执法队依韩手势，让犯人站在左边或右边。每次审讯，都是数十人或数百人，案完之后，韩一声令下，站在这边的全部杀，那边的全部放，那位送信人恰好站在要杀的一边，就被韩复榘糊里糊涂地杀掉了。

韩对维护封建礼教是不遗余力的。诸如：山东各地娱乐场所，分为男左女右，不得混坐，以表示男女授受不亲。禁止妇女烫头发。规定妇女衣袖必须过肘。所有这些，在韩的淫威之下，属下小民，谁敢违背。但不明了禁律的外地客旅，偶尔来到韩的治下，也会遭受无妄之灾。有一天，韩复榘驱车济南街头，看到1个烫发女郎，不禁大怒，当即停车，令人将她叫到面前，询问她为什么烫发？该女郎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竟答称：“为了美观。”韩当即命人叫来理发师，当众把这个女郎的一头青丝剃得净光，直羞得她恨地无缝，不能自容。而韩却得意地说：“你爱漂亮，我偏要你出丑。”这就是传遍全国的“韩复榘巧剃女人头”事件。

上行下效，韩复榘的胡闹做法，他的部属也争相效尤。

平原县县长曹某，早年与韩同棚当兵，自恃根基硬，胡作非为，平素与人交往，话不投机，就脱掉他足上的一只布鞋殴打对方，如此久之，有人向他建议：脱鞋未免麻烦，且不雅观，不如从鞋店买来一只鞋底，携带、使用均较方便。曹从其说，从此，出入一切场合，都带着一只鞋底，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曹二鞋底。

1932年夏天，上海某报记者来平原采访，被邀入会客室，等候接见。不料这位县长一进客室，勃然大怒，一言未发，掏出鞋底，一阵乱打，把这记者直打得鼻脸青肿。什么事使这位县长这样怒呢？只听得曹愤愤地说：“你来看我，就这样打扮吗？”原来，这位记者久居上海，又值夏令季节，按南方习惯，足登凉鞋，身穿短袖汗衫，下着短裤，臀和腿部半露在外。这样的装束，若在其他地方，是不足为奇的，而这位县长却以为是对他的大不尊敬，故而饱以鞋底。这位“无冕皇帝”遭此奇辱，岂肯罢休，于是联合全国新闻界，向韩复榘提出抗议。在当时，干涉新闻自由尚为法律所不许；辱殴记者更为难容。韩经不住全国各报一致谴责，只得把曹二鞋底撤职，一场风波虽告平息，确也成了



笑谈资料。

韩复榘的禁烟运动，不知道枉杀了多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山东半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主要城镇都设有日本洋行，浪人到处横行，他们以贩卖毒品谋取暴利。韩对有武力作保护的日商和浪人不敢触动毫毛。对本国同胞却是执法如山。有一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医治母亲的痼疾，买了几钱鸦片，被韩部便衣队查获，竟被处死。鲁北民团指挥赵仁泉，在禁烟中，杀人竟以脸色为准据，凡面黄肌瘦的，即以吸毒论罪。直弄得全区人民人人自危，深怨自己的祖先，生就黄色皮肤。

韩为了粉饰他治理下的山东太平富裕，竟然想出了一个掩耳盗铃的办法。大捕乞丐，把全省各地的讨饭穷人，装上火车，送往省外，让他们流浪外地，归不得家乡。

1932年冬，韩借口统一省政，向盘据在胶东的刘珍年部进攻。这次地方小军阀混战，双方动员兵力10余万，战祸延续了3个月，战火燃烧数县之大，给战地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所谓“韩青天”，不过如此。

### 冯、韩关系点滴

“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时期，有一个对张作霖临时的团结。及至攻下北京，这个团结，立即解散”<sup>①</sup>。他们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编遣会议上互相争吵。到1929年秋天，蒋冯的利害冲突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军事解决，已不能避免。冯为了争取主动，决定缩短防线，放弃山东、河南，退入陕西。以免重蹈南口大战覆辙（军之侧背受山西阎军威胁），便与阎谈妥合作，两路出兵，会师徐州，可操胜券在手。各将领均遵照冯的命令，移动军队。然韩复榘于西退途中，在洛阳叛冯投蒋，将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1页。

冯预定计划全部破坏。冯经此刺激，精神一度失常，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冯军各级将领及全体官兵，莫不恨韩入骨。冯玉祥为了挽回不利形势，应阎锡山的邀请，亲赴山西商谈合作讨蒋。孰意阎居心叵测，将冯软禁于晋祠。蒋以陆海空军副司令委阎，嘱其将冯解赴南京，阎闻冯部大军近驻陕西，如对冯不利，恐其部下向山西进攻，不敢妄动。及唐生智发动讨蒋军事，阎乘机向蒋献媚，亲赴开封督师讨唐，驻于陇海花园。韩复榘知阎到达开封，对人说：“冯先生在山西，受尽了阎老西的气，如今他到了开封，我一定把他扣起来，给冯先生报报仇，他不放冯先生，我就不放他。”但以事机泄漏，阎闻讯逃逸。及韩派人逮阎，已无踪迹。韩大呼“可惜”不已。韩之所以出此，乃是为了报答冯玉祥以往待己之厚。韩深深知道，自己从一个无名的初级军官，位至封疆大吏，实冯一手提拔；叛冯之举，固然是因为受了蒋介石的500万元重金，但冯家长式的统治，只让部属服从自己，而不许他们陈述意见。在一次军事会议席上，韩曾询冯：“敌人未曾压迫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冯不但没有说明撤退的原因，反怒冲冲地说：“小孩子懂得什么，要你退你就退。”是故将韩激怒，愤而反戈。

是年冬，鹿钟麟<sup>①</sup>从南京逃归后，派李忻前往开封与韩复榘联络，韩表示愿率部人晋，驱逐阎锡山。适蒋方代表蒋伯诚亦在韩处。李言：蒋冯关系恶化，是因为阎从中挑拨。编遣会议时，阎许冯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提案，又复告蒋冯野心极大，愿助蒋讨冯，以致造成蒋、冯破裂。今韩率部驱阎，西北军愿全力相助，事成之后，韩为山西主席，蒋军接防河南，西北军驻防河北。议定，鹿电韩云：“我弟入晋，兄愿听指挥。”以坚定韩的决心，因电讯失密，被阎侦知。阎锡山得知韩复榘将攻晋，焦急万

---

<sup>①</sup> 鹿钟麟是冯部高级将领之一，冯蒋破裂时，鹿在南京代理军政部部长，1929年冬，从南京潜往陕西冯军根据地。

状，徘徊终夜，不知所措。赵戴文向阎献谋，说：“想解除这一危机，非冯玉祥不可。西北军的行动，从来是以冯的意志为转移。冯所希望的是阎、冯联合，共同讨蒋，如今答应冯的要求，可将鹿、韩攻晋战争目标立即转移，山西的危机可解。”阎从其谋，遂于2月间放冯回陕。冯回到潼关，与各将领会议，坚决主张联阎讨蒋，将鹿钟麟苦心推动的驱阎计谋全部推翻。

韩复榘知冯返陕，即派代表前往谒见，表示仍愿听从指挥，但要求讨蒋胜利后，能得任山东省主席。冯答称：“只要把蒋介石打倒，莫说山东，就是浙江、江苏富饶的地方，也须要你们去治理。”冯、韩在归绥的往事，重演于今日，大有可能。而阎锡山却任万选才为河南主席，万为攫取河南地盘，向韩部猛攻，韩怒问鹿钟麟：“为什么派土匪打我？”鹿亦无法答对。及西北军出潼关，韩虽不敢与冯军交战，但亦未为冯军效力。

讨蒋军事失败后，冯隐居山西省汾阳县峪道河村。及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旬日之间丧失辽宁全省，全国鼎沸，痛斥蒋政府误国。蒋为了躲避舆论责难，宣布下野。冯在赴南京参加国难会议时，途经济南，韩率第三路军各将领及省府高级官员，迎冯于车站，执礼甚恭，坚请冯留住济南盘旋数日。冯宿省府东大楼，韩侍奉唯谨，亲自为冯铺设被褥，执便壶，宛如孝子侍奉父母。冯与韩畅叙离衷，但绝口不谈往事，只以抗日相勉，冯告韩：“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只有收复失地，为国雪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对得住先烈。”韩唯唯答称：“我要紧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

冯到南京，坚主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而蒋介石却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军妥协退让。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而蒋介石不但不派兵援助，反而命令他的海军与日军“维持友谊”。冯见主张不能实现，在由南京赴洛阳的途中，从徐州秘密地到泰山隐居，著作“反国联

调查团报告书”，驳斥这个国际强盗组织对中国人民的诬蔑。

1933年春，日军攻占长城各口，侵略魔掌，伸向华北。4月末，陷热河，进窥察哈尔。5月初，侵占察东。冯玉祥在中共帮助与推动之下，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冯通电就任同盟军总司令，宣布对日作战，7月间收复察东四县。8月间蒋介石加冯以破坏国策的罪名派大军10万配合日伪军，南北夹击，使同盟军陷人绝境<sup>①</sup>。韩复榘派钢甲车将冯迎归，重返泰山。冯聘请教授，闭户读书，课余之暇，种菜植树，日以耕读为事。韩月送五千元，作为冯的生活用费，且每过泰安的时候，必停车上山，亲赴冯寓，问候起居。距冯之住所数百步，弃轿步行。冯闻韩来，辍读立门前等候，韩至冯前，先行鞠躬礼，口称：“先生近来身体好？”冯答：“谢谢。”然后导韩入室，纵谈读书心得，世界形势。有时偕韩漫步山麓，参观冯所建之科学馆、瞻仰烈士祠。如值吃饭的时候，冯亦备大饼、蒸馍，佐以泰山特产的白菜、豆腐等，与韩共餐，冯笑谓韩：“泰山三美：白菜、豆腐、水，我常以吃此三美为乐，有人说我做作，岂不知尚有千千万万的同胞过着挨饿受饥的生活。”宾主之间，谈笑风生，局外人，不知今日的座上客，竟是数年前叛冯之韩复榘。

冯每过济南，韩必盛列手枪队于车站迎接。及冯入京，遇有大计，亦必与韩相商，并互有馈赠，彼此之间，颇为亲密。

## 韩复榘的叛国阴谋及其被杀经过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炮轰卢沟桥，包围宛平城，以武力

---

<sup>①</sup> 1933年5月，日军攻陷热河省，向察哈尔省进犯。5月26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与协助之下，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与日军作战，收复了察东四县，8月间，蒋介石以冯破坏国家为名，出兵10万，与日、伪军南北夹击，同盟军失败。冯被迫离军，方振武、吉鸿昌两将军，坚持抗日，率同盟军一部向滦东进军，亦遭蒋军阻击，失败。

大举向中国进攻，守城守桥的二十九军士兵们奋起还击，全国人心沸腾。而蒋介石却幻想和平解决，继续向日本妥协投降。宋哲元也准备局部和谈。但是反动统治者的屈辱政策，是满足不了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和欲望的。8月13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争，进逼南京，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他才被迫实行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爆发了。

这时候，韩复榘竟然暗中和日本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保持他在山东的统治地位，日本以不轰炸济南诱韩，韩则以保境安民作借口，不和日本采取敌对行动。

9月上旬，津浦北段战况不利，二十九军从马厂溃败，退到沧州以南。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为逃脱战败责任，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sup>①</sup>来津浦线，作他的替罪羊。冯于9月16日，设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于桑园，调整防线，坚守砖河南岸。这时候，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潜入济南，与韩密谋：一、山东宣布中立；二、韩拒绝中国军队在山东境内与日军作战；三、日军保证不向山东进攻。这一叛国阴谋议定后，韩即拟通电全国。韩复榘虽甘心作刘豫，愿为儿皇帝，置身于日本卵翼之下，但其左右，并非全属丧心病狂之徒，其秘书刘熙众谏韩云：“这种叛国的事件，万万做不得，如果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要遗臭万年，溥仪的处境，沐猴而冠，任人拨弄。石敬瑭的下场，身败名裂，这都是前车之鉴，自古至今在外敌人侵的时候，叛国投敌，结果都是很悲惨的。”刘语时，声泪俱下，韩为所动，犹豫未决。刘急将电稿抄送冯处；冯极为震惊，如变生肘腋，则北方战局，势必陷于混乱；抗战事业，亦必遭受严重破坏，民族将趋

---

<sup>①</sup>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将全国划分为3个战区，蒋自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平汉、津浦两线战争。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同浦、正太两线战争。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京沪、沪杭两线战争。一月后又任何应钦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广东战争。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南段及陇海东段战争。

于危亡，人民将遭受无穷灾难。急电南京告变，蒋介石得讯后，即派蒋伯诚驰往济南，进行安抚。白崇禧亦派高级参谋刘任赶赴桑园，与冯密商防变对策，当即决定：调广西军队五师集中徐州，准备应变，如韩有异动，这支兵力，就直趋济南，将其解决。

蒋伯诚与韩复榘交往甚密，及至济南，询韩意图，韩借口：“冯驻此间，我常存恐惧心情，唯恐冯报以往背离宿怨，借机杀己。”蒋伯诚劝韩安心勿惧，彼当请蒋介石调冯他往。南京政府迅即升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仍兼山东省主席，以安韩心，这一叛国阴谋，暂为平息。

9月下旬，津浦前线，阴雨连绵，敌我双方，隔砖河相持，战况沉寂。冯玉祥决定出奇兵制胜敌人。9月26日，派副长官鹿钟麟率领五十九军经惠民、乐陵向敌后迂回，攻占冯家口、泊头镇、南霞口、北霞口各据点，缴获敌重炮2门，钢甲车1列，弹药数10船。砖河北岸的敌军，迅速北返援救，冯得报，用电话向韩复榘说：“鹿等迂回已经成功，当面的敌人，正在向北撤退，请弟台急调生力军一师，从正面出击，并发扬你在豫北大战的精神，激励贵部，与我迂回部队配合，前后夹击，以期全歼津浦线上的日本鬼子。”韩答称：“胶东防务紧急，军队不能抽调。”拒绝了冯的命令，失此歼敌致胜的良好时机，坐令北返的日军于击退我迂回部队后，掉转头来，又复南犯，致使津浦线的战况，陷于不利形势。

10月1日，砖河防线被敌突破，长官部移驻洛口。六战区所属部队，3日夜，在德州附近与敌激战后，四十军经吴桥向南背进，四十九军向铁路迄南撤退，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沿卫河向西南转移。韩复榘部担任了正面，与日军激战于平原以北地区，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将日军阻止于鲁北。

冯依照蒋介石的命令，10月5日，率长官部人员向平汉线移动，是日晚8时抵济南，铁路封锁，车不能行。战区副官长彭

国政报称：“据车站站长说，韩主席赴前线督战，临行前曾命令车站，任何车辆，都不得通过，违则枪决。”冯怒曰：“韩复榘能枪决站长，我也能杀你，如不开车，即将你枪决。”当此危急关头，韩乘专车归来，即登冯车晤谈。冯告韩：“同心同德，抗战才能获得胜利，望与二十九军团结一致，协力反攻。”韩骄气十足，扬言阔视，侃侃而谈；冯危坐倾听，状极谦逊。战区参议韩多峰见此情景，极为愤怒，密写“将韩扣留，开车带走”字样小条一纸遽冯，冯阅毕，置衣袋中，与韩谈笑如初。及韩辞出，韩多峰询冯何以不将韩扣留，冯说：“大敌当前，如果这样做，就会动摇韩部军心，对抗战有百害而无一利。”韩多峰则不以冯的见解为是，他说：“津浦南段韩部驻军，多为西北旧属，沿途向彼等宣布韩的罪状，晓之以大义，彼等得知韩之叛国罪行，决不会维护韩而加害于冯。”

10月中旬，山东战况沉寂，冯玉祥恐韩被日军所诱，派吴青旺携亲笔函去济南，勉励韩复榘及第三集团军各将领，要作民族英雄的岳飞，流芳万古。并在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你要作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

12月初，山东形势紧张，进犯的日军蠢蠢欲动，并以利诱和威胁手段使守将局部妥协，青岛市长沈鸿烈态度暧昧，暗中与日军勾结准备投降。韩复榘为了发展实力，不但不积极作抗战动员，反而将乡村建设派组织的民团8000人令孙廉泉率领开到河南漯河，韩复榘这一行动，李宗仁大为不满，战区截留未成，向蒋介石告韩，也未能阻止。李电韩不要把后方置于五战区范围之外，韩复电说：“现在全而抗战，何分彼此。”韩的傲慢，使李大为恼火。12月中旬，日军发动攻势，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电报令韩不得放弃济南，而韩却于22日到泰安。李宗仁来电命韩护守泰安，韩复电说：“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亦急电令韩死守泰安，而韩已到济宁了。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战而逃，节节后退，到次年1月，竟然退至峄县，使山东省15.3万平方

公里土地沦于敌手，4888 余万同胞任凭敌人蹂躏。

1938 年 1 月，蒋介石用召集军事会为名，将韩诱至开封，加以扣留，解赴武汉。由何应钦、何成浚、鹿钟麟组成军法会审，韩供称：将率领所部，退往汉中或由襄樊入川，与刘湘联盟，刘据四川，称蜀王，韩占汉中，称汉中王，反对抗战。军法会审判韩死刑。

当韩复榘被解到武汉的时候，虽然作了阶下囚，却受到何应钦的特别优待，食以山珍，衣以轻裘。韩亦以为以往对何有过重贿，有恃无惧，况且不抵抗主义是蒋介石一贯主张，现在虽失去自由，该无妨碍。

韩部将领谷良民迭电冯玉祥，请为韩讲情，将其释放，戴罪立功。冯为所动，有一天，冯正拟访蒋，适鹿钟麟来见，向冯报告审韩的经过，告冯已判韩死刑，冯沉吟良久，说：“国人皆曰可杀，杀之。”

1938 年 1 月 24 日，这个烜赫一时的“山东王”被枪决于武汉行营之内。



# 我所了解的刘茂恩

刘亚仙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尤其在河南的近代史上，刘镇华、刘茂恩两弟兄，以一门双主席、弟兄两总戎的显赫地位，在军政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其一生功过，治史者自有定评。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及全国政协各级领导的倡议抢救文史资料为当务之急的号召，我写了这篇资料。

我于1933年参加刘镇华、刘茂恩所领导的十一路军和十五军，经过八年抗战，我当上了十五军军需处上校军粮科长，跟随刘茂恩一直到1948年十五军编为地方团队，前后十有六年。对刘氏兄弟虽不能全面了解，其间亲见亲闻亲历的事情，尚能有所记忆，关于刘茂恩的情况，叙述于后，借供参考。

1933年，蒋介石委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十五军是他的基本部队，随刘镇华驻在潢川。那时军队有两个番号，十一路军和十五军，刘镇华是十一路军总指挥，刘茂恩是十五军军长。十五军有两个师，六十四师和六十五师，刘镇华兼六十四师师长，刘茂恩兼六十五师师长。

刘镇华的参谋长是于耀东，秘书长是王印川，副官长是李柑青。军需处长梁文渊是刘镇华督陕时的财政厅长，四大金刚之一。

刘茂恩的参谋长是赵和璧，军需处长王赓彤，清末贡生。

六十四师师部各处代办十一路军业务，六十五师师部各处代办十五军业务，当时的编制如下：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下辖十五军及直属部队、机关如独立旅（旅长徐先锋）、炮兵团（团长邢延绪）、辎重团、谍报队、运输队、汽车队、骑兵连、特务连、临时兵站等。

十五军军长刘茂恩，辖六十四师（师长刘镇华兼）、六十五师（师长刘茂恩兼）。每师各设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连。六十四师辖一九〇旅（旅长武庭麟）、一九一旅（旅长邢清忠）、一九二旅（旅长杨天民）；六十五师辖一九三旅（旅长刘惠心）、一九四旅（旅长姚北辰）、一九五旅（旅长马其臻），每旅分辖两个团。

十五军的薪饷制度是每36天为一个月，一年发十个月薪饷。上尉月薪25元，中尉每月21.5元，少尉18.5元，临时兵站官佐低一级支薪。

刘镇华当了“剿匪”总司令，大别山大军云集，为了运送给养，由信阳修一条轻便铁路直通潢川，专运粮秣。潢川十一路军临时兵站及前方各分站，粮秣堆积如山容纳不下。

刘茂恩率领十五军，在豫鄂皖红区和红军对抗。双山门战役中，两军争夺阵地，战况十分激烈，一日之间，阵地数易其手，前敌总指挥上官云相坐飞机在空中指挥。

1934年刘镇华当了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人说欢迎刘主席，不欢迎刘主席的军队。然而十五军就慢慢地开进了安徽，先驻叶家集继而开进了六安。

刘茂恩虽然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但当上了十五军军长的要职，却不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也不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而是由刘镇华的关系，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和各个旅长的资深望重、劳苦功高相比较，资历显得不够老，所以威信不算高。对内对外遇有棘手的问题还得刘镇华出面决断。

1933年刘茂恩驻在六安，他的随从副官刘尊三、刘友三两

弟兄贩卖鸦片，被蚌埠警察局查获，报到十五军军部。因为刘尊三、刘友三在刘茂恩公馆甚得宠幸，刘茂恩的老太太也为他说情，刘茂恩不能作主，请刘镇华到六安处理。刘尊三之父，托人说情，十五军的上层人物，都向刘镇华恳求。刘镇华碍于情面，不好下决心，乘飞机回安庆，即电刘茂恩说：限电到立将刘尊三弟兄二人枪毙。刘茂恩不敢违抗，即将刘尊三、刘友三两人枪毙了。

刘茂恩有吸烟嗜好，平时吸的是大炮台香烟，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提倡用国货，于是就将国产的白金龙香烟代替大炮台。刘要吸烟，侍从将白金龙奉上。他眼睛不看，只吸一口，就把烟扔掉；停一会儿又要烟，吸一口，又扔掉。如再一次侍从奉上大炮台，他仍是不看就吸，只是再不把烟扔掉了。

刘镇华当安徽省主席，不惟安徽人不欢迎，就连监察院长于右任，也以去留相争。当时的豫鄂皖“剿匪”军总司令卫立煌，对刘氏弟兄不欣赏。卫到六安，刘茂恩去接他，卫不热情，刘去看他，迟迟不接见。刘茂恩感到气愤，向其兄刘镇华诉苦说：人家看不起不如不干。刘镇华安慰弟弟说他能把你的饭碗夺了，不让你吃饭吗？

刘茂恩到安庆去看哥哥，住在省府后楼西间。东间是刘镇华的卧室，刘茂恩因穿便衣上街观光，回来时上楼，楼梯是木质的，皮鞋踏上咚咚响，刘茂恩怕惊动哥哥，把皮鞋脱掉手提着，小心翼翼地赤脚上楼，走进卧室。

1935年秋季安徽六安县旱灾严重，五谷不登，灾民沦成乞丐，成群结队，进城沿街讨饭，惨状堪怜。刘茂恩准备放赈救人，派十五军粮秣处长李×庵，副官处长庄则敬到街上放款。我那时在粮秣处当会计，奉命带上几百元角票一同上街，事前用绿颜色和绿水半碗，一个灾民发五角钱用绿笔在他手背上划一道子，作为领过钱的记号。一时轰动全城，不管是否灾民都一拥而上，把我们围在中间，秩序紊乱，放款进行困难。当天发款四百

余元，第二天就不敢上街放款了。这样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就是放赈救灾，也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茂恩奉命由六安出发北上抗日。在参加晋北忻口战役中刘茂恩表现得沉着机智，胆大心细指挥有方，是以屡立战功。在军中信誉日高，恩威兼著，全军上下团结一心，军容风纪均有可观。刘茂恩独当一面，威望卓著，官兵用命，全军肃然。

忻口战后，大军转进，物资后撤，刘茂恩担任掩护任务，在掩护卫立煌撤退时，他不顾自己安危，保护卫立煌撤退到安全地带。卫立煌很受感动，大加称赞。以后卫立煌当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对十五军特别优遇，长官部发薪、发服装、发物品均给十五军以优先权，以往卫对刘茂恩的不满情绪一扫而空。

1941年刘茂恩升为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在中条山横河镇。5月间，日军集结七八个师团兵力，配备飞机大炮，三面包围中条山。用切豆腐的方式进行所谓扫荡。首先封锁黄河渡口，切断我军补给线。我军奋勇抵抗，战况激烈。敌人用强大兵力压迫我军后退，包围圈逐渐缩小。长官部电令刘茂恩冲出敌人封锁线，到敌后打游击。即派六十四师一九〇团团团长路青山为前哨，带两门山炮，乘夜向敌人包围线冲击，结果没有打开缺口，把两门山炮也丢了，路青山不敢回来，乘夜弃官潜逃，不知去向。

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河北省献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中条山战役中不幸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我军几个军官，我同村的刘延寿也被俘，共有三十多人。日军派一个军曹押着，在一个山沟里，日军曹用日语审问张参谋长。别人不懂日语，不知问些什么，只能在他们的表情上测度些情况。只见日军曹大发雷霆，张参谋长摇头不答。日军曹发怒，命令用机枪对准张参谋长及我军官，一面集合刘延寿等中国士兵，押着上路。张参谋长及十余名中国军官，都壮烈牺牲在日军机枪之下。我国军

人威武不屈，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精神不死，军人楷模。

十五军六十四师师长姚北辰，河南孟津常袋乡姚凹村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驻山西绛县西桑池。姚师长宽厚待人，军民融洽。日军攻打中条山，西桑池受到日军隔山炮击。六十四师奉命东撤，西桑池民众平时对姚师长甚为敬重，依为干城。日军来犯，民无依靠，全村老少弃家随军后撤。在战况紧急之中，军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掩护群众，恨敌人凶残，怜同胞惨苦，姚北辰心情复杂，十分感慨，抽空到群众前慰问有加，安排食粮照顾医药。西桑池群众十分感激，泪随声下。军民情深，在国民党军队中实不多见。

苦战日久，补给断绝，粮尽弹缺，困难日增，山大民少，就食无门。姚北辰虽然沉着，亦以不遇漂母为憾。军中馱骡战马，均杀以充饥，野菜树叶，均成佳肴。

6月下旬，姚师长与部队失掉联系，他仅带特务连及师部二三十人，活动在大山中，日军追来，他自料抵抗不过，就在山中找到一个破窑洞，就把全部人员撤到洞内，机关枪架在洞口，带枪者均实弹握枪，准备抵抗到底。结果敌人虽在洞外山路上往来频频，没有发现洞内有人，幸免一场大难。

十五军六十五师师长邢清忠，驻中条山一家农民家中。房东老者对邢师长十分恭敬，照顾周到。山外距侯马不远的南范镇系中日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各无驻兵。日军为了经济侵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南范设市场，商业繁盛五方杂处，中日双方谍报人员均在这里活动。邢师长的房东老头常到南范赶集，买些罐头及各种食品给邢师长。中条山战争爆发前夕，邢师长染病在床，前方医药不便，在邢师长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刘茂恩命令把他送回河南嵩县田湖镇原籍治疗，医药不效衔恨去世。邢师长出身行伍，性情暴躁，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全军景仰。抗战未胜，勇将身殒，噩耗传来，袍泽同悲。有人说邢师长是慢性中毒

以致身亡的。

6月下旬，刘茂恩、武庭麟、姚北辰均来到天坛山南麓，六十四师驻郑坪村。姚北辰奉到命令，疏散非战斗人员，剩下战斗部队打游击。命令一下，我们这些文职军人就被赶出部队。当此之时，敌军压境，地方秩序紊乱，散兵游勇及地方坏人乘机骚动。我们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进退维谷无所适从。摸索到一个名叫寺沟的小村，暂且停下，探知夜间有中国军队向南开，我估计军队是向黄河沿开去的，于是我下山乘夜跟军队南行，行进中才知道前边走的是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警卫部是一九二团团团长张肃。刘茂恩把他花100两黄金买的蒙古劣马抛到后边，他同武庭麟跟在张肃团长队伍后边，步行前进。两边的大山低了，渐渐变为丘陵地带，部队越走越快，继而跑步前进。前边一个劲向后边传话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掉队。据说前边要闯公路了，有敌人坦克巡逻。忽然面前出现一道沟，不知深浅，只见前边的人往下溜，后边的人也跟着往下溜，溜下去站起来就跑，否则后边的人就会砸到身上。一九二团的兵卧到地上，作好了准备放的姿势，官长站在后边，小声而严肃地催着我们快走。气氛非常紧张，人们的心好像要跳出胸腔以外了。

不知何时闯过了公路，前边又是山。我们跟着队伍向山上爬，这时听到隆隆机声，敌人的坦克沿着公路开过来了。用探照灯向山上照，灯光的角度只能照到我们行进线以下，没有目标，敌人也没有射击。

天明以后来到一个小村暂作休息，后边枪声炮声清晰可闻。刘茂恩和武庭麟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6月5日中午时分，队伍行进在一条南北胡同内，敌人两架飞机到上空，盘旋轰炸，机枪扫射。刘茂恩、武庭麟和我们一起隐蔽在胡同内，两边墙高，机枪扫射不着，伤亡不大。

敌机去后我们来到黄河北岸的槐树庄村。总部中校参谋南国威在群众家找到一只破木船，仅能容下八九个人，木船多年废置

不用，下到河里满船露水，当此之时如获至宝。第一船刘茂恩、武庭麟先渡过黄河，到达孟津县的河清村。我和总司令部管理处刘伯礼乘第四船渡到河南岸，第五船因上人太多，船被压沉，无法再渡，河岸待渡者很多，不得不退回山中。有些官兵自找一根木柴抱柴泅过黄河。

六十四师上尉参谋姚焕甫抱柴泅水到南岸边，漂到友军阵地前，守军不准登岸，姚焕甫报明部队番号，说明自己身份，苦苦哀求，友军就是不让上岸，并开枪射击，姚焕甫中弹，尸体顺流漂去，没有下落。姚焕甫参加抗战有年，没有死在敌人屠刀之下，却被自己人枪弹打死，是谁之咎？

六十五师参谋长李××，保定军官学校出身，胆小如鼠，畏敌如虎，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战况紧急时，为了减小目标，部队分散行动，李带一个连，探知日军追来，他命士兵枪上绑上白手巾准备投降。敌人却走向另一条路上去了，他派人去追日军，送上门去投敌，过河后他又回来。刘茂恩十分震怒，在孟津李家窑村把李枪毙。

1941年刘茂恩驻在孟津县横水乡文公村，当时农村晚秋禾苗。正届中耕，文公村民王学易那时十三四岁，由其母领着去地锄秋。刘茂恩在门外散步，见王学易幼年荷锄下地走，到王学易跟前，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道：你会锄地吗？王的母亲代答曰：家中无人，只好让他学着锄吧。

刘茂恩回到总部命令特务营吴营长向文公村民多借锄头备用。次日吃罢早饭，令特务营官兵荷锄下地，凡该锄的庄稼不管是谁家的，挨块中耕。群众见官兵们在大毒日头底下挥汗干活，过意不去，赶紧烧菜做饭，往地里送。吴营长早就料到这种情况，派人在各路口等候，遇有送茶饭者，即上前婉言劝阻，请其回去，并说：如果总司令知道接受群众菜饭，我们是要受责罚的。就这样把文公村的秋庄稼完全锄了一遍，文公村人至今犹念念不忘。

## 二

1943年，刘茂恩的十四集团军总部驻在洛阳，他的胞兄刘镇华由巩县原籍赴陕西，道出洛阳。刘茂恩手足情故，道敦厚，对刘镇华执礼甚谨，恭迎乃兄下榻总部，朝夕侍奉未尝少懈。

十四集团军的高级幕僚及十五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多出刘镇华门下，得悉老长官驾临，相率谒见，执部下礼。

刘镇华虽已解甲归田，并有严重的精神病，却仍保有当年叱咤风云的气概，并且异想天开，钻研科学，研究周天，自谓有得。他指示刘茂恩，召集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五军校级以上官佐，在总部礼堂，集合听他演讲周天率。

刘茂恩不敢违抗，遵命而行。各官佐整队进入礼堂。大厅内座无虚席。总部参谋处长对一位参谋说：你准备纸笔，把主席（对刘镇华的称呼）讲的话记下来，那个参谋讷讷地说，我没那个本事。

刘镇华身着藏青呢中山装，头戴礼帽，足穿皮鞋步入礼堂，指挥官发口令全体起立，刘登上讲台，举手示意，让大家坐下。

刘镇华用长官对部下的口吻讲他的研究心得。他说：科学家阐明，周天360度经我长时间的探讨，表明周天为720度，他站在讲台上两臂平伸，在原地旋转，每闭一下双臂、身体按顺时针方向转动一段位置，表示周天720度的刻划。他讲理论时引经据典，背诵原文，语言晦涩，拮屈聱牙，满座的人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听着，四座无声，气氛低沉。讲了一个多钟头，好不容易结束了，刘镇华态度从容下台而去，人们也松了一口气。

十四集团军有个俱乐部，专演京剧，今天特意准备给刘镇华演出，他听说以后，很不以为然。他的理论是唱戏的人是下九流，死后不能入祖坟。不惟唱戏的人不能入祖坟，看戏的人也不能入祖坟，他用命令的口吻对刘茂恩的侍卫说，叫总司令来，我



问他为啥要演戏。侍卫报告刘茂恩，他皱着眉说：我头疼，要休息，他没有去见刘镇华。

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河南，敌骑纵横，中原板荡，遍地烽火，人民涂炭。敌人集结群酋众寇侵犯我古都洛阳。

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奉命守洛阳。日军于5月8日进至洛阳南郊，在关林一带与我军展开激战。日军陆空联合，攻势凌厉，我军奋勇抵抗，寸土必争。双方拼杀，日趋紧张。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敌人进攻洛阳之初，即率长官部人员向西撤退，洛阳各机关学校亦皆相率逃亡，洛卢公路车马拥挤，争先恐后，途为之塞。

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原驻洛阳城外，战争开始，他的老部下武庭麟守洛阳，战况愈演愈烈，他的司令部受到威胁，他也向西撤退。到宜阳境时，遇到宜阳煤矿经理徐吉生，徐系宜阳洛宁一带民团领袖。现在虽无职衔，在群众中威望仍高。

十五军由洛阳撤到洛宁的后方人员，也因战局紧张，将所带大车及物品，也向西退，行进中与刘茂恩相遇。十五军是他的老基本，他十分关心，于是随他一同西行。

行至古县一带，夜幕降临，忽有当地大批群众拥来，强抢军队物品。刘茂恩见是群众，以为向他们解释，即可无事，谁料群众意在抢枪抢物，并不听刘茂恩那一套。以徐吉生平时的威望也无法制止，群众不惟抢物，击而硬夺刘茂恩特务兵手中的枪，刘茂恩下令不准开枪。群众愈闹愈凶，特务连长夏恩熙也不听刘茂恩的，命令用冲锋枪向空射击，群众这才后退。十五军后撤大车十余辆，车上东西及各人随身所带行李被抢夺一空。

次早到达卢氏县东郊。据报洛河南岸有日军部队活动。刘茂恩乘马到河岸查看，被日军发现用机枪扫射。刘茂恩拨马回走，乘马尾部受伤。这时十五军后撤人员数百人，整队在公路上行进，日军见状以为有准备，他们人少，未敢过河，旋即退去。

刘茂恩命令卢氏仓库，给十五军发给养。他考虑这一批人无

处可存身，便给胡宗南写了一封请胡关照的信，交给十五军副官处长唐建武，唐建武带状信及后撤人员向西安去了。

刘茂恩对十五军孤军守洛阳特别关心，他人虽不在洛阳而心怀系念，每日茶饭无心，夜不成寐。待到洛阳战斗进行到最后阶段，武庭麟用明码电报，给刘茂恩报战况，刘茂恩想非到万不得已，岂能用晨码发电，他十分萦计，坐卧不安。洛阳战后，对十五军官兵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及此事，声音尤有些嘶哑。

河南省会开封，早已陷敌，而今洛阳失守，河南军政局面，均临危殆。国民党中央任命刘茂恩为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艰危受命，在内乡丹水组织省府，以栾川常自箴，通许邵垣宗为省府委员，孟津县的王公度原任教育厅第一科长，现升为教育厅长，孟津县的杨宝华为田粮处长。河南第十区（洛阳）行政督察专员，以十五军副军长杨天民充任，住嵩县山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刘茂恩把河南省府迁回开封。

刘茂恩当河南主席的消息发表后，住在陕西城固县的刘镇华，得到消息他欣喜之后说道：老五（刘茂恩）他应付不了这重大责任，须得我去主持，于是他坐上汽车到了汉中。

省田粮处长杨培华，字秋实，孟津县老城仁义街人，北京大学毕业。精明干练，胆识超群，长于交际，善于辞令，有能说、会说、敢说之誉，虽身为田粮处长，实为刘茂恩的机要秘书。刘茂恩每次重要会客，必有杨秋实在座，遇有疑难问题，刘茂恩答不上来时，杨秋实接住话茬说下去，所言一定能符合刘茂恩的思想。刘茂恩就会说，秋实所说正是我的意思。

刘茂恩每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请人代拟的，十五军一九〇团团团长李文圭就常给刘茂恩拟稿。拟好后刘茂恩躺在床上，李文圭拿着稿子念一句刘茂恩重复一句，读上两遍，第二天登台演讲，他能讲的一字不差。

教育厅长王公度，字海涵，孟津南达宿村人，北大毕业，原教育厅科长，道德高尚、热心教育、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在河

南教育界颇有威望。

省府委员常自箴，栾川县城内人，是栾川地区出类拔萃的显赫人物。其母故后，埋于栾川西门外，坟前建拜殿三间，两边山墙上镶嵌着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石刻题词，自蒋介石以下多有题赠。建成以后据堪舆家说拜殿不能高出坟头，于是又向坟头积土。

1946年周恩来为黄河归故道问题亲到黄泛区视察，到开封时曾和刘茂恩有所接触。

十五师师长武庭麟、副师长姚北辰、杨天民被俘后，十五师残部驻在开封整补。中央任命刘镇华之子，奥国留学生刘献捷为十五师师长。

刘献捷当上了十五师师长，给他父亲刘镇华捎去法币200元，刘镇华接到后，没有说话，叫他的侍从点一支蜡烛放在桌上，刘镇华拿起票子，一张接一张的在蜡烛上点燃，一直把票子烧完。

刘茂恩虽然脱离十五师，仍和当年的刘镇华一样，对十五师的重大事情，不能撒手不管。

此次十五师的整编，重要人员均由刘茂恩裁定。1947年秋中央派员到开封给十五师师长刘献捷授职，并给师及各团授旗。

中央派一位中将参议，来到开封，刘茂恩接待。次日十五师全体官兵，集合大操场，恭敬严肃的接受中央委员颁令和授旗。

中央委员登上讲台，态度随便，背着双手，并没有拿出中央文件，他在台上来回踱着步，口中背诵道：国民政府军令部命令，兹任命刘献捷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令。

他诵罢命令，刘献捷致答词，说道：献捷蒙中央委以重任，不胜感戴，今后将尽忠职守，在沙漠上创造绿洲，以报中央栽培之恩。

中央委员把十五师旗帜授给刘献捷，刘献捷接旗转给掌旗官。

另把一九〇团团旗授给团长吕维中，一九一团团旗授给团长李阎卿，一九二团团旗授给团长武良梓。

刘茂恩照搬当年刘镇华那一套国法家教，对刘献捷要求严格，每次见面，刘献捷规规矩矩，执礼甚恭，刘茂恩态度庄严，未尝假以辞色，刘茂恩不命坐，刘献捷两脚跟并拢站在那里不敢少动。

刘献捷学问渊博，常识丰富，善于辞令，亦庄亦谐。身体虽健却为高度近视和严重耳聋所累，对面讲话，须用高音，说电话须用助听器，所以治军打仗均有不足。他请准中央给假赴美治病，军需处给他购买美金数千元，他带着太太去美国就医。

1948年中央命令，十五师番号取消，编为河南保安团，十五师官佐除少数编为河南地方团队外，大多数均编为军官队员。

从民国元年刘镇华将张钫部队编余的四五千人，及收集的一部分绿林英雄（武庭麟语）编为镇嵩军开始，到1948年经刘茂恩、刘献捷之手把十五师编为河南省保安团。其间经过36年的反复折腾，最后寿终正寝，宣告灭亡。

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演进到兵戎相见。解放军进军中原，席卷河洛，鹿死谁手已见端倪。

林伯渠率领的解放军挺进豫东，向河南省会所在地开封进攻。开封车站、南关邮电大楼、大南门、小南门一带，战况十分激烈。

河南保安团第二团团团长陆承宣守最大电楼。大楼高出周围建筑物三四米，目标显著，陆承宣将大楼四周房屋一律拆除，十米内外形成空地。

解放军将大楼包围，猛烈攻击，陆承宣拼命抵抗，大楼被解放军炮弹击中，顿时起火，烈焰腾空，火光熊熊，楼上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一楼门窗均已堵死，二层距地面一丈有余，周围无隐蔽之物，前有强敌后有烈火，走投无路，慌不择路，只好从高楼往下跳，枪林弹雨中，死伤枕藉，大楼失守。

解放军用计攻入小南门，进入城内，展开巷战。开封鼓楼大厅两层上有匾一块，上有“声振天中”四个楷书大字，铁画银钩，气势雄壮，匾额无上下款，据传为宋奸相秦桧所书。大厅中弹起火，匾额和大厅一同成了灰烬。

刘茂恩守在省府大楼内，解放军猛攻大楼，情势危殆，刘茂恩只身出走，隐藏在他的随从程振东家中。城内国民党军队，全被击溃，解放军控制了全城，这使刘茂恩走投无路。程振东夫妇用计，刘茂恩假装受伤群众，用鸡血涂抹头部及全身各部分，绑上纱布，躺在架子车上。程振东的女人假装刘茂恩的女儿哭哭啼啼跟在车后。程振东拉着车子，骗过城内卫后，出到城外，向东行进，沿途经过解放军多次讯问，终于逃出解放军的势力范围，到兰封遇上新五军，刘茂恩随邱清泉返回开封。

解放军攻进城后，在龙亭一带作战，在附近各街道搜索。住在刷荣街的军官队员耿竹岭夫妇，因战烈出外躲避。解放军进院在耿竹岭屋内，发现银元 11 枚，解放军写一个条子说：我们的目的是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的 11 个银元，分文未动，请你检查。

刘镇华当时住在开封，解放军查询。他说：我是刘镇华，我要去见毛主席。解放军没有奈何他。

教育厅长王公度在省府被俘。

解放军撤出开封，刘茂恩随新五军进城。在街头出现时大家都很奇怪，这几天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样快就回到开封呢？经过讯问，才知道他的经过。

十五师的官佐，除少数编入地方团队外，大部分都编为军官队员，名册运绥署备案。开封战前，绥署按月拨款，在开封领取薪饷。开封战后一切组织均不存在，我们的薪饷均无着落，生活发生困难。刘茂恩甚为关怀，我们请他代向兵站关照设法解决粮饷问题。

军需处在开封还有许多人，我把他们找来商议办理请领粮饷

手续，先造册统计人数，再请刘茂恩帮助解决。

十五师在未改编以前，由其他各军拨来的军官队员人数也不少，过去均在军需处领薪饷，现在组织不存在，薪饷无处领，生活困难怨尤其深。他们集结四五十人，带着怒气，找军需处要饷。我正在临时借用的商号楼上，与各同事办手续，这一群军官队员闯上楼来，把三间楼房挤得满满的。一个年轻军官怒气冲冲地问道：哪个是刘科长？我们的人问他，你找刘科长干什么，他狠狠的说向他要饷呀。我看这些人气势汹汹的样子，知道军官队是不讲理的，今天来者不善，有打人的可能，看情况躲是躲不了，于是我挺身而出，站起来向他们说道：我就是刘科长，你们来要饷这很好，我先把现在办粮饷的情况向你们说一说。大家知道咱们的师长，早就上美国去了，开封战后参谋长军需处长都不见了，原来军需处的组织已不复存在，现在我同大家一样都是军官队员，都领不到粮饷。

开封二次解放前夕，我乘坐河南省府的专列火车离开了开封，来到了苏州。

以前被解放军俘虏的十五师副师长杨天民、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河南省政府教育厅长王公度都先后被释放，住苏州。

河南省主席由张轸继任，刘茂恩带着家眷去台湾，以95岁的高龄，病死在台北。

# 我所知道的刘郁芬

范学增

刘郁芬，河北省清苑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出身。冯玉祥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刘郁芬任参谋长。由于冯玉祥的部队逐步发展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时（当时冯部号称 26 万人），在水涨船高的形势下，刘郁芬也历任旅长、师长，甘肃督办，陕、甘、青、宁四省后方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刘又与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宋哲元等有冯玉祥的“五虎将”之称。刘郁芬在冯玉祥的部队中，有相当的威信、地位。再由于冯玉祥曾任西北边防督办，他的部队都在西北边区的察哈尔、绥远、甘肃等省驻防，更因在南口与直奉联军作战，虽然战败，但西北军由此出名，大家就将冯玉祥的部队简称为“西北军”。本文只叙述刘郁芬在陕甘青宁等省驻防时的一些战役的片断。

—

1925 年六七月间，我在北京考取西北陆军干部学校（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所开办）。以后直奉联军进攻西北军，发生南口战役。到 1926 年 8 月间，西北军在南口战败，全军向西转进。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随军退到包头，由张之江主持举行毕业仪式（当时因冯玉祥去苏联，西北边防督办由察哈尔都统张之江代理）。随后全校学生奉令开往五原。适冯玉祥由苏联回国，来到

五原。冯玉祥收容由南口西溃残部，并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改为军事政治学校，即在五原开学，两个月毕业，以张允荣为校长，以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共产党员刘伯坚为教官。训练内容：国际形势、中国历年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割地赔款经过情形、国内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的接济、年年火拼等等。冯玉祥时常到校讲话：西北军成立经过，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等等。冯玉祥在一次讲话中说：此次南口之败，由于张之江过于迷信基督教，通电、讲话都离不开上帝，甚至以为只要祷告祷告，天上就掉下馒头来，打仗就会打胜仗，以他这样的脑筋。指挥作战，还有不失败的么？我冯玉祥信基督教，是以基督教来维系军心的（冯玉祥是基督教徒，令全军官兵集体作礼拜，听讲圣经，作祷告；虽号召大家受洗信教，但不强迫信教）。张之江信基督教，成为基督教迷，真是可笑。经冯玉祥此次讲话后，西北军全军再不作礼拜、听讲圣经、作祷告。军事政治学校，两个月受训期满，仍驻五原，候令分发。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为响应国民革命北伐，准备出关，会师中原，即于是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sup>①</sup>，由政治部长刘伯坚授旗，冯玉祥受旗后，即成立总司令部。当时参加五原誓师的部队，除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学生，还有一部分队伍，约千余人。官兵虽然衣敝履破，但精神振作。冯玉祥讲话，说明北伐意义和会师中原决心。誓师毕，冯玉祥检阅参加誓师部队，与官兵学生握手问好，并大声地对官兵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不辛苦，为人民服务。”会后，军事政治学校随同冯玉祥开赴宁夏。冯玉祥又召集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学生讲话：“你们都是沙里淘金出来的，你们是全军的骨干，今后好好地努力，为人民服务。”讲话后，立即把全校学生分发各部队服

---

<sup>①</sup> 《民国大事日志》1927年4月6日记载：汉口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务。我分发在宋哲元师田春芳旅，充当中尉连附代理连长，全连无一兵，只有连排长及班长 10 余人，轮流站岗，自己警戒。在宁夏住 1 个多星期，即开往兰州，招募新兵。兰州是甘肃省会，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甘总司令刘郁芬驻在地（刘郁芬是冯玉祥于 1925 年派到兰州代理甘肃督办，现改称驻甘总司令）。1926 年年底，宋师田旅开到兰州，我奉令调充刘郁芬的驻甘总司令部上尉参谋。几个月后，刘郁芬升我为少校参谋。到 1927 年 5 月间，刘郁芬派我到戴靖宇师李松昆旅担任中校参谋长，全旅驻甘肃狄道县，不久旅长李松昆调升戴靖宇师副师长，以李仲斌为旅长。1927 年冬，回军马仲英部包围河州（马仲英系西宁镇守使马麒的侄子）。攻城甚急，河州镇守使赵席聘电报刘郁芬告急，请求亟援。甘肃马、冯战役的序幕，从此开始。

## 二

甘肃兰州原有前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的李长青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的张兆甲任陇东镇守使驻平凉，孔繁锦任陇南镇守使驻天水。甘肃是回汉杂居，有回族首领宁夏镇守使马鸿逵驻宁夏，西宁镇守使马麒驻西宁，凉州镇守使马廷勳驻凉州，甘州镇守使马玉清驻甘州。他们是甘肃回族的封建势力，地方上称为土皇帝，部队人事，是世袭制，部队士兵均是回民。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冯玉祥于 1925 年派第二师师长刘郁芬部入甘，代理甘肃督办，以甘肃为西北军后方根据地。刘郁芬奉令由五原率部进入宁夏时，得悉前任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已被师长李长青逼迫离兰。刘郁芬对师长李长青之飞扬跋扈已存戒心，暗中派人到兰州布置，以防不虞。刘郁芬于 10 月下旬率部进驻兰州，对李长青极力表示亲密，暗地监视行动，及李故态复萌叛迹已明时，即将李长青扣留，李师改编，肘腋之患已除，甘局暂定。刘郁芬对平凉张兆甲、天水孔繁锦、西宁马麒、凉州马廷勳等均

委曲求全，事事忍让，维持现状。刘郁芬本身则专事招募兵员，补充实力，整顿部队，以振声势，全省境内，暂告稳定。在1926年三四月间，刘郁芬得悉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员到平凉令张兆甲联合天水孔繁锦，并速经陆洪涛旧部黄得贵、韩有禄以及马麒、马廷勳等合力进攻兰州，解决刘郁芬部，并以甘肃督军许张兆甲（马麒、马廷勳等，不能参加，表示中立）。刘郁芬为防患未然，避免战祸，与张兆甲几度信使往返，答应任何条件均可商量。只因张兆甲督甘心切，竟联合孔繁锦等于是年夏季分路进攻兰州。刘郁芬部署兵力分头迎击，并于7月间攻克天水，8月间攻克平凉，陇东陇南遂告平靖。刘郁芬即以陈毓辉为平凉镇守使，以佟麟阁师留驻天水。冯玉祥率部出关，会师中原，即令宁夏镇守使马鸿逵开赴前方，以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以后马鸿宾出关时，以门致中为宁夏镇守使。刘郁芬调河州镇守使，裴建准为××镇守使，以师长赵席聘为河州镇守使。赵席聘是冯玉祥的老部下，事事倚老卖老，有己无人，老气横秋，刘郁芬对赵席聘以老大哥相称呼。赵席聘接任何州镇守使后，对回民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吃猪等都看不惯。再听地方汉人说回民的种种不好，以及回民30年一小反，60年一大反等。赵席聘就有歧视回民之心，不时叫士兵赶着一群猪，在南门口的八方大街回民区域内来回走，对回民的清真寺教门馆等不加重视。这种开玩笑、侮辱回民的举动，回民最为禁忌，甚为仇恨。马麒、马廷勳等虽心存不快，但敢怒不敢言，同时马麒、马廷勳等看到李长青、张兆甲、孔繁锦等几个军阀部队先后被刘郁芬消灭，回军地盘逐渐缩小，封建小皇朝一个个消灭，自己有欲坠之势，人人有自危之感，对西北军仇恨日深。西北军在甘一日，他们的前途将不堪设想。但自顾实力，又不敢步张兆甲、孔繁锦等的后尘，公然挑起战端。为了巩固他们的地盘，暗地策划在前后的马鸿逵、马鸿宾两部，以“逃兵”方式，整营整连地暗中潜逃回甘，以厚甘肃回军实力，作为进攻西北军的地步。马麒、马廷勳等在回民中宣传，西

北军要杀回民，汉人要杀回民等谣言，预为发动回民的张本。刘郁芬每日接到各县报告，回甘马部窜扰县境情形，派队堵截无济于事，对于马部宣传，并没有过问。刘郁芬对这类情况早有所闻，为避免战祸，时常派财政厅长郑道儒、高等法院院长韩骏杰等到西宁、凉州等地，与马麒、马廷勳等联络，并加慰问，借以察看动向。并时常在兰州举行阅兵、战斗演习、爆破试验，请回军首领，地方士绅，前往参观，含“舞杆苗格”的意义。河州是兰州的外围重镇，是马家的根据地。因此河州成为马、冯双方必争之地。终于在1927年冬，在马麒、马廷勳暗中指挥下由马仲英出面发起围攻河州的战争（马仲英人称少司令）。此即马、冯战争的开端（亦称甘肃回汉战役）。

### 三

刘郁芬接得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告急电报后，判断马仲英兵力虽号称十万，不过虚张声势，以西宁马麒、凉州马廷勳等部凑集起来，尽其所有最多过不了一万人，枪支不全，没有训练，战斗力不强；其余都是裹胁来的回民，人数虽多，乌合之众，不能作战。河州城内，宁城部队仅有一个学兵团，不到千人，均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回民称为娃娃兵），以及手枪营二百余人。马部屡次猛攻爬城时，都被学兵团、手枪营沉着地打退了。刘郁芬根据双方兵力情况，计划救援兵力。兰州仅驻有戴靖宇的二十五师七十五、七十六两旅（该师七十四旅驻狄道）和总部手枪团。始以戴靖宇师驰援河州，则兰州、狄道两地势必空防。若调平凉、天水、宁夏等地部队前去救援，则有远水难救近火之虞，且各该处防务恐成问题。在这紧急情况下，多方考虑，决定以釜底抽薪之法，遂决心以戴靖宇师驰援河州，兰州城防以总部手枪团担任。即令戴靖宇师集中狄道，星夜驰赴河州解围。戴靖宇到狄道，即分路向马部进攻，激战3日，马部溃退，河州解围。是役师长戴

靖宇受伤。河州解围5天，马仲英卷土重来，又将河州包围，攻城甚急。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再电刘郁芬告急求援。这次马仲英二次包围河州，除攻城外，对守城士兵进行政治宣传，瓦解军心。城上是西北军官兵，城外是回民官兵，在夜间不打仗休息的时候，两军士兵互相问答，你是什么队伍，我是什么队伍等，西北军士兵问回军士兵，你们的官长叫什么名字，回军士兵回答，旅长马步芬（马步芬是西宁镇守使马麒的儿子）。有的士兵说，我们是副师长马廷贤的队伍（马廷贤是凉州镇守使马廷勳的兄弟）。回军士兵对城上士兵说，你们都是甘肃人，我们一定要把西北军打出潼关去，你们跟着走吗，你们不想家吗，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甘肃，你们放心吗，你们赶快到我们这边来干吧！城上士兵听了这些话竟有痛哭的。以后禁止守城士兵与回军士兵讲话。回军士兵大骂西北军死了，为什么不答理我们。马仲英宣传攻势没有得逞，暴露了马麒、马廷勳的真面目。

刘郁芬接得河州二次被围电报，即电报冯玉祥告急，请派大部队入甘增援。并电令天水驻军佟麟阁师即日驰赴河州解围。当佟麟阁师在河州东南十余里要与马部激战时，城内听得炮声，经详细侦察，确系佟师与马部战斗，遂令七十四、七十五两旅，分路出击，马部佟、戴两师前后夹攻，纷纷溃退。河州解围，佟师进城。马仲英即于当晚又将河州合围。马部官兵在城四郊大喊大叫，大声狂呼，一夜不息，夜夜如此，一连十余日，既不攻城，又不撤退。城防部队察明马部动态，确有挖地道，埋炸药，轰炸城墙之企图，即在城内布置防备。马部虽把河州城垣炸塌三丈余长，因城内布置严密，马部几次猛烈冲锋均被城防部队击退。马仲英轰城计划又遭失败，把全部回军撤退到离城二里的北塬上，日夜扰乱。经城防部队，屡次出击，马仲英率领全部远窜凉州。刘郁芬为确保兰、河交通，便利运输和队伍休整，遂于河州北塬、莲花城（小寨子）等地建立据点，令二十五师师长部及炮兵连及七十六旅开驻莲花城，抽派一营进驻北塬。二十五师长戴靖

宇因伤赴兰休养，以副师长李松昆代理师长，参谋长叶宝珊因病去职，刘郁芬升我为二十五师上校参谋长。不久，凉州被围，刘郁芬令佟麟阁师和七十四旅由河州开赴凉州救援。刘郁芬把河州镇守使赵席聘调回兰州，派陈毓辉为河州镇守使，以二十五师七十五旅担任河州城防。

#### 四

刘郁芬在马仲英二次包围河州战役中，得知围攻河州的马部有马麒的儿子马步芳的队伍，又有马廷勳兄弟马廷贤的队伍，对马麒，马廷勳的用心完全清楚。他断定：马廷勳现虽坐镇凉州，凉州城防空空如也，是进攻凉州的好机会，但河州尚未解围，无兵抽调，又恐坐失时机。遂决定派王志远率领武装官兵百余人，便衣官兵三百余人，前往凉州招募新兵。刘郁芬在王志远出发后，面授机宜，令其相机行动。王志远到凉州后，暗中把便衣队分住各处，亲率武装官兵，在城内开始招兵，暗中调查凉州现有兵力，仅有马廷勳部几百名官兵驻守。王志远就天天散布谣言：兰州派来多少多少便衣队，要进攻凉州。马廷勳得悉这个消息，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王志远即于某日晚上，令便衣队在城内各处放枪扰乱，自己率领武装官兵向镇守使署直冲。马廷勳在仓卒之间措手不及，率领随从出城逃窜。凉州克复。刘郁芬以韩凤章为凉州城防司令，王志远回兰州。马廷勳事后得悉受骗情形，非常痛恨。不久马仲英在河州一再失利。马廷勳即召回马廷贤以及马仲英、马步芳等部，合力反攻凉州。刘郁芬接得韩凤章告急电报时，河州已经解围，马仲英已远窜（事实马仲英已去凉州）。即令佟麟阁师和李仲斌旅由河州开往凉州救援。佟、李两部当在行军途中，凉州已被马部攻陷。佟、李两部赶到凉州，经过三日激战，马部逃窜，收复凉州。凉州损失很重，城中居民受到很大灾难。是役旅长李仲斌阵亡。刘郁芬在凉州战役后，深悔在河州

解围战役中，由于顾虑兵力关系，采取了稳扎猛打的策略，仅把马部击退，未予马部痛击痛追，消灭马部主要力量，致使马部得以窜扰凉州，使凉州受到严重损失，是军事上的失算。

## 五

西宁镇守使马麒看到马廷勳已把凉州失去，马仲英等部在河州、凉州一再失利，一无进展，内心顾虑重重。刘郁芬对马仲英并无任何表示。长此拖延不决，非但军用浩大，形势对自己日趋不利。遂决心派其弟马麟于1928年七八月间来到兰州，召见刘郁芬，声言为顾全地方，以弭战祸，愿出面与马仲英调停。刘郁芬当时以兵连祸结，终非妥然，自顾目前兵力，要把回军全部消灭势有所不可，为缓和甘局，允派总部参谋长俞嘉培（无锡人）会同马麟去河州，就近与马仲英和谈。俞嘉培途经莲花城二十五师师部时，要我同去协助，到河州后，即决定以河州南门外的“八方”为和谈地点。八方是州南门外的一条大街，完全是回民地区，马仲英的公馆就在大街中间路西，建筑非常华丽，大门上有3个大金字“将军府”。俞嘉培和我住在将军府里，马麟是另外住的，七十五旅旅长彭振山派两个营进驻八方。经过十余天不见正式会议，终是马麟去与马仲英联系，马仲英没有来过，也没有派代表来。觉得和谈非常沉闷，问俞嘉培与马仲英联系的情况如何，何日能开会。俞嘉培说，联系得差不多，就要开会。但双方条件始终没有说过，我心里不以为然，同时我见到街上的回民，近来的行动与往日不同，我走到南街头外散步，突然有人向我连放两枪。我回将军府又向俞嘉培建议，和谈不见头绪，八方附近并无马部，竟有人向我放枪，这是不好的征兆，我们驻八方的队伍没有做工事，不很妥当，我们应即刻撤回城中，在城中举行和谈。俞嘉培说，和谈正在联系，说好在八方开会，忽然回到城中去是不好的，我有把握，你不要多顾虑。我又说以谨慎为

妙，不可大意。俞嘉培说：“山人自有道理。你放心。”我听了俞嘉培的话，疑惑不决。次日黎明忽然枪声四起，非常激烈，不到半个钟头，驻八方南头街口的三个连完全被马部解决，孙营长率领二十余人逃进将军府。同时，驻在八方北头吊桥旁边的三营十连只逃出十余人。俞嘉培决定令驻在将军府的第二营营长陈玉清火速布置，极力抵抗，坚守待援。在马部包围下，激战至午后4时左右，不见援兵，将军府四外民房已起火。营长陈玉清率队猛冲，中弹阵亡。将近黄昏，全营官兵猛烈冲锋，前仆后继，冲到南门口吊桥边，经胡同内绕到护城河旁（水深及腰），遂过河入城。八方通夜大火，火光烧天。是役总部参谋长俞嘉培左臂受枪伤，全身受刀矛伤十余处，营长陈玉清阵亡，孙营长受伤，连、排长死伤过半，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收容逃回官兵二百余人，损失惨重。

这次战役受挫的原因：（一）俞嘉培骄傲自大，麻痹大意。（二）我的决心亦不大，对撤回城中的意见不能坚持力争。（三）和谈地点应定在城内，不应定在八方。（四）由于和谈，部队官兵放松警戒，疏忽防范，仓卒受制，措手不及。（五）城内部队长官不察情况，不明地形，对救援兵力、方法、路线不加考虑，没有计划。旅长赵某在城上看察八方情况时，中弹阵亡。城中派一个营出援，盲目行动，营长率队一出南门，冲上吊桥，中弹阵亡，死伤士兵七人，返回城中再不救援，坐观成败。由于这些原因，使部队受到惨重损失。

刘郁芬将八方战役前因后果，电报冯玉祥。冯玉祥阅电后，对他的左右说：俞嘉培这小子办事无能，受人蒙蔽，挫我锐气，深为痛恨，应即严办。因俞嘉培当时受伤甚重，又因冯玉祥的高级幕僚都是俞嘉培军校同学，一再向冯婉言解救，俞嘉培得免于追究。总部参谋长一职即以兰州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张鹤舫调任，我回二十五师师部。

## 六

刘郁芬驻甘部队总共约二万余人，兰州、平凉、天水、河州、凉州等地，必须有重兵驻守，其余在交通要道的重要县城，亦须派兵防守，防地辽阔，无事则防守有余，有事则攻守不足。经过河州、凉州等处的几次较大战役，官兵伤亡四千余人。马仲英自八方战役后，退驻离河州几十里的大河家、双城等处，四出扰乱，扩大到陇东、陇南、凉州等处。刘郁芬接各县报告，马部窜扰日必数起，此堵彼窜，兵力疲劳，应付为难。刘郁芬为巩固甘局，再电冯玉祥迅派大队入甘增授。冯玉祥接电，即派孙连仲部和吉鸿昌师星夜赶赴甘肃。刘郁芬随即部署兵力，调整防务，令佟麟阁师回天水原防，令陈毓辉部回平凉原防，以伤愈师长戴靖宇任河州卫戍司令（河州镇守使名义取消）。我在河州约两个月，写了七个战例，并绘图解说，送给刘郁芬参考。刘郁芬调我到总部担任上校作战科长。

1928年年前孙连仲部和吉鸿昌师开抵兰州。因马部在凉州一带窜扰甚急，孙连仲未得休息，即连夜率部前往进击，把马部击溃后，又回兰州。不久，刘郁芬接河州戴靖宇报告，马仲英大部兵力集结在河州附近的大河家、双城一带，有窜扰河州之样，刘郁芬即会同孙连仲到河州部署兵力，分路出击。刘郁芬率领吉鸿昌师和彭振山旅，进攻双城马部。孙连仲率领全部进击大河家马部。刘、孙两部分别到达双城、大河家时，马仲英闻风远窜（据传马仲英远窜新疆）。冯玉祥派马鸿宾回甘进行和谈。此时马鸿宾也到双城与刘郁芬会面，但马仲英已经远窜，以及和谈无从着手。刘郁芬将马部逃窜，以及和谈情形，电报冯玉祥。冯玉祥即任命孙连仲为青海省主席，率部进驻西宁。西宁镇守使马麟为青海省建设厅长。又任命吉鸿昌为宁夏主席，率部进驻宁夏。各地虽有小股马部窜扰，刘、孙两部配合堵击，逐渐平靖，甘、



青、宁三省防务，稳定下来，各部队转入休整状态。刘郁芬派我点验各县驻军的同时，原甘州镇守使马玉清经刘郁芬劝降后，编为旅长，驻防宁河县。我点验马玉清旅，人事世袭制，虽枪齐全，弹药甚少，二千余人，训练甚差。刘郁芬以后发给马玉清旅一些弹药和军需用品。

## 七

冯玉祥自五原誓师后，会师中原，屡奏战功，蒋介石甚为借重。1927年宁汉分裂时，蒋、冯徐州会议，冯表示拥蒋合作，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走进蒋介石集团。蒋、冯又进一步拜把，表示更为亲密。由于互相利用的结合，经不起考验。冯玉祥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时，逐渐地对蒋不满，由不满发展到分裂。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方面：（一）争夺河北省和平、津地盘。在会师中原战役中，河北省和平、津两地是冯玉祥部鹿钟麟、韩复榘两部攻下的，冯玉祥当然觊觎河北省的平、津地盘。1928年5月间，蒋、阎在石家庄会议，阎在蒋面前极力攻击冯玉祥的短处，蒋介石也怕冯玉祥有了河北省和平、津地盘，发展壮大起来难以控制，就决定把河北省和平、津两地交给阎锡山统治，蒋介石曾把这个情形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冯表面同意，内心不满。（二）1929年1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时，冯玉祥、阎锡山双方都提出编遣计划。冯的计划，蒋、冯并重，阎次之，其他方面更次之。阎的计划，首重蒋，则阎、冯次之，其他方面更次之。蒋介石就采取了阎锡山的计划。再加上阎锡山在各处攻击冯玉祥的为人。使冯玉祥陷于孤立难堪，冯玉祥感到更为痛心和不满。（三）陕、甘、青、宁等省连年天灾人祸，地瘠民贫，西北军的部队从驻防察哈尔、绥远到现在，没有发过军饷，官兵穷困万分，要求蒋介石接济军饷，没有得到要领，使冯玉祥气愤不平。从此，冯玉祥决心倒蒋，遂称病请假。

蒋介石、孔祥熙先后到冯处看病，亲加慰问，并不能挽回冯玉祥的决心。1929年2月间，冯玉祥请准病假，离开南京，先后在百泉村、华山等处养病。蒋介石派邵力子等到冯玉祥处，亲请回京，冯始终推病休养，没有结果。冯玉祥在南京活动时期，有关全军的重要问题，都密电各高级将领知照，并指示一切机宜。冯玉祥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编遣会议前后，为了保持实力，曾密令刘郁芬扩大部队番号，招募兵员，充实实力。刘郁芬遵照冯的指示，把一师二旅，一旅三团，一团三营的编制，把旅改成师，师属三旅；把团改为旅，旅属三营。取消了团的一级单位，又派员到各县招兵买马，充实实力。这样就增加了师的单位，取消了团的编制，充实了营的实力，作为编遣时的后步，并可壮大声势，以示军威。冯玉祥在南京要求蒋介石接济军饷不得要领时，曾密电刘郁芬，说明西北军现在的处境，蒋介石不接济军饷，西北军官兵穷苦情形，比较蒋军官兵待遇优厚，有天渊之别。希望各级将领体念时艰，坚持苦撑，耐劳耐苦，以待时机。刘郁芬每与官兵讲话，我们西北军官兵是穷骨头出身，不怕苦，不怕穷，过惯穷日子的，我们愈穷愈有精神。蒋介石不接济我们的军饷，我们干得更更有劲，让他们看看我们有没有骨头，我们多少年没有发过饷，也是欢欢喜喜过来了。希望大家本着过去的苦干精神，勇往直前，我们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刘郁芬每逢过了一两月或两三月，以及逢年过节，发给一次名为“奉令借款”。旅长以上军官，每人三四十元。营长以下军官，每人一二十元，士兵每人三元五元等，来维持军队。但士兵衬衣衬裤以及鞋袜，均按季发给。

1929年5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到了最后破裂的时候，冯玉祥命令驻在鲁、豫两省部队向西撤退。原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洛阳声言：陕、甘连年灾荒，民不聊生，队伍入关没有吃的，打了多少年仗，官兵疲劳已极，仗是不好再打了，我不往西撤，不去吃苦了，即率领二十师基本部队东开倒戈。并云

石友三和我一起动作，已接受蒋的任命。冯玉祥在华山得悉韩、石叛变，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对蒋介石益加痛恨。刘郁芬接冯玉祥密电，韩复榘、石友三被蒋介石利诱，在豫叛变。过去我对韩、石过于信任，致生意外事变，殊为痛心。这次事变，韩是主谋，石是附和，望弟对各级将校详细说明，韩、石之去与本军大局无关。刘郁芬把冯电转给各师长外，并在每次与各级军官讲话时，痛骂韩、石忘恩负义，破坏团体，是全军的败类。蒋介石利用一时，决不会有好的结局。

冯玉祥养病华山，由于韩、石之变，倒蒋之心更切。后经李书城等的劝说，决心赴晋与阎锡山联合，共同倒蒋。阎锡山候冯玉祥随同李书城到晋后，即将冯玉祥软禁于建安村。一面威胁着西北军将领，一面向蒋介石讨好，以为左右之计。

刘郁芬接陕西省主席宋哲元电告，冯玉祥（原称总司令）此次赴晋，准备联阎倒蒋，不料随同李书城到晋后，仅与阎锡山见过一面，即被阎软禁于建安村，失去自由，事关全军安危。望兄与甘、青、宁各将领，研究办法，指示方针。刘郁芬阅电后，深觉冯的这次赴晋殊欠考虑，遭此不测，极为棘手。这个意外消息，刘万分焦虑，深感痛心，对西北军前途感到悲观。就电告孙连仲、田镇南、吉鸿昌、佟麟阁、戴靖宇、陈毓辉等到兰商谈。在商谈中，刘郁芬把宋电请人看过后，要大家研究如何营救冯的出险，以及如何面对韩、石叛变。事关全军安危，希望大家多出主意。孙连仲说：先生（指冯玉祥）个性大意，对阎锡山这个老奸刁猾的人没有戒心，受阎欺骗失去自由，深感阎的这种毒辣手法万分可恶。事已如此，只有派人去晋与阎锡山交涉，设法营救。要求阎把先生送回，保持两军友谊。对韩、石叛变来说，韩复榘、石友三都是十六混成旅的学兵，先生把他们从学兵提拔到今天的地位，竟丧心病狂地投蒋，绝对不会有好结局。韩、石叛变，虽与本军大局并无关系，亦不能一点没有影响，应该对前方将士多加鼓励。吉鸿昌、陈毓辉说：阎老西这个东西最为险恶。

我们如果营救不成，就与阎老西拼到底，总司令一天不回来，决不罢休。田镇南、戴靖宇说：我们营救总司令不可操之过急，应当软硬兼施，婉词进行，慎重处之，只要我们团体存在，不生变故，阎锡山决不敢加害总司令。佟麟阁说：阎老西虽老奸刁滑，他是吃硬不吃软的人，到我们真要和他拼的时候，阎会见风转舵的，一定能把总司令好好地送回来。大家在商谈中，一致痛骂韩、石忘恩负义，决无好结局。刘郁芬最后说：我们主要营救总司令出险，应当以婉词向阎交涉，说明双方利害关系，扣留冯总司令于阎并无好处，也瓦解不了西北军的团体，只有加深双方的仇恨，最后兵戎相见。使阎明白西北军的将领绝对拥护冯总司令，决不会就此罢休。目下前方将领，在鹿钟麟、宋哲元统率指挥下，不致发生意外变故，为防患于未然，必须多加鼓励，团结兵心为是。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电报宋哲元，请派人员赴晋向阎交涉，说明双方利害关系；以免引起兵戎相见，把冯总司令送回陕西，保持以往友谊等语。并请对前方将领多加鼓励，团结军心，以防别生事故。

1929年9月间，宋哲元电请刘郁芬赴陕，面商重要事宜。刘郁芬到西安后，始悉阎锡山与宋哲元联系，在冯玉祥的同意下，决定晋军与西北军联合倒蒋。宋对刘说，前方各将领为求总司令的安全，实行冯、阎倒蒋，大家并无异议。刘郁芬提出：冯、阎倒蒋，兹事体大，应当要求冯总司令回陕，现在大家已经同意，也表示同意。刘郁芬返甘。宋哲元于1929年10月10日，部署各部，进攻蒋军。但阎锡山并未指挥晋军出动。使宋的行动遭到失败。各将领深恨阎不讲信义，但亦无可奈何。

被软禁于建安村的冯玉祥情急智生，派人暗中把鹿钟麟召到建安村，面授机宜后，鹿即潜回防地，就与韩复榘、石友三暗中联络，共同倒阎，已得韩、石的同意。鹿对蒋介石方面则用虚与委蛇的办法进行联络。阎锡山得到这个消息顿为惊慌，再把冯玉祥软禁下去已无作用，有与西北军发生意外的可能。阎即到建安

村见冯，诚恳地向冯道歉，表示决心与冯共同倒蒋，随时商订办法，预定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阎任总司令，冯任副总司令，划分作战地区，以冯部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以阎部徐永昌为前敌副总司令。有关西北军作战用费，由阎尽力接济，各事计划妥当后，阎锡山即送冯玉祥回陕。

冯玉祥于1930年3月10日回到潼关。冯玉祥回到潼关后，即电告各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甘、青、宁驻军由于防务关系，仅召刘郁芬参加。甘肃省主席由孙连仲代理，青海省主席由孙连仲部田镇南代理。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张维玺、庞炳勋、赵登禹、刘汝明、郑大章、张印湘、梁冠英、任应岐、王修身、孙殿英、田金凯、冯治安、焦文典、刘春荣、葛运隆等。大家看到冯玉祥安然返防，都感到喜出望外，不胜愉快。开会时，冯玉祥讲出蒋介石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压迫西北军种种事实后，即提出联阎倒蒋的主张，组织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阎任总司令，冯自己任副总司令，即日兴师讨蒋。又说四集团军李宗仁在南方发动讨蒋，与我们协作；其他杂牌部队都表示响应。我们这次的行动很有把握。又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消灭蒋军为期不远。言词之中非常乐观。大家听到冯的主张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想不到要与仇人合作，一致心理是：西北军受过阎的打，受过阎的骗，受过阎的暗中攻击，阎夺过西北军的地盘，不讲信义，软禁总司令等奇耻大辱，与阎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大家对冯的威严素具害怕心理，平日都不敢说话，对这重大问题谁敢多言？冯的高级将领鹿钟麟，在冯未回潼关以前已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络，共同倒阎，事已成熟，现在听到冯的主张非常坚决，鹿虽心中不快，但也不敢提出反对的意见，仅说西北军多年苦战，必须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刘郁芬也只说我军大战以后元气未复，应当休整，待机而动。其余各级将领中，有师长葛运隆一人，提出联阎倒蒋利益小，联蒋倒阎利益大的建议。冯玉祥根本听不进去。会议结果，冯玉祥并未

注意各级将领的心理，更未考虑到后方根据地，只问前者，不加后顾，有孤注一掷的决心，无可挽回。会后即开始成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部署各路兵力分向平津、陇海两线开进。以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指挥。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率领所部开赴前方。以刘郁芬为陕、甘、青、宁四省后方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驻西安指挥。冯玉祥在4月间电令刘郁芬转令孙连仲率领甘、青、宁三省全部驻军即日东开郑州附近。刘郁芬阅电后即对左右说，甘、青、宁三省，在过去四年间，经过多次变乱，用尽心血，得有今日局面，地方平靖，大局稳定，虽地瘠民贫，如能休养生息，还是练兵、开发的好地方，取之不易，一旦放弃，甘、青、宁三省经此又将转入混乱状态，地方糜烂将不堪设想。陕西全省，现有兵力南部有王志远一旅，西安仅有手枪团一个，包庭宾一旅，陈毓辉师的一旅，兵力非常单薄，防区辽阔，处处空虚，万一发生事故，何以应付。对冯玉祥的破釜沉舟的办法非常担心。但也不敢向冯陈说利害，收回成命。仍转令孙连仲速即率领甘、青、宁三省全部驻军开赴郑州附近。刘接孙连仲复电，甘、青、宁三省是我军后方根据地，应留一支有力部队驻守兰州，巩固后方。刘郁芬接阅孙连仲复电，又对左右说，孙连仲的见解极是，随即加上自己的意见：甘、青、宁三省虽地处边陲，究为我军后方根据地，一旦空防，地方糜烂，关系重要，可否留驻一部兵力，驻守兰州以固后方。转电冯玉祥请示。刘郁芬接冯玉祥复电，此次讨蒋，全力以赴，胜则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随即速令孙连仲率领甘、青、宁三省全部驻军星夜开拔，赶赴前方。刘郁芬接阅冯电后，一再叹息，甘肃完了。并即转令孙连仲火速开拔，并令孙连仲把雷中田旅留守兰州，相机补充兵员，以厚实力，维持兰州城防（雷中田旅，是一个没有编成的部队，只有几百人）。孙连仲接刘郁芬电令，将兰州城防交给雷中田后，即率各部开赴前方。于5月间陆续到达郑州附近待命。

刘郁芬在西安，自5月开始到7月底止，每日接到鹿钟麟通报前方战况，非常顺利，节节进展。孙连仲和吉鸿昌两部加入战斗，屡获胜利。但孙连仲来电，极称所部兵力万分疲劳。自8月以后，刘郁芬接鹿钟麟战报，战况逐渐转入不利，每况愈下。自张学良通电入关，阎锡山见机即私自撤退。冯玉祥不知底细，尚欲与蒋作最后决战，挽回战局。迨冯玉祥得悉阎军已私自撤退，再想命令自己部队西撤，时机已失，已来不及了。这时庞炳勋、孙殿英等部首先不听指挥。继则刘郁芬接鹿钟麟密电，吉鸿昌、梁冠英等部先后投蒋。张维玺、冯治安等部被围。由郑州退守洛阳附近的宋哲元、葛运隆等部，因葛运隆投蒋，宋哲元被迫退守潼关。刘郁芬又接鹿钟麟电告，冯玉祥在前方看到战局已无转机，遂去山西晋城。刘郁芬接到鹿钟麟雪片似的通报，前方战况万分混乱，知道大势已去。经多方考虑，即电请鹿回陕主持大局，共商善后，收集残部，巩固陕局。鹿钟麟复刘郁芬电：有一兵一卒，决不甘休，要与蒋介石打到底。经过五六次电报往返，各持己见，没有结果。以后鹿钟麟离开郑州，再无电报。我在这时，对前后方的情形做一番考虑，当即向刘郁芬说：战局已无挽回希望，应即与退守潼关宋哲元联络，尽力增援，固守潼关。一面电蒋，虚与委蛇，以作缓兵之计。一面电请冯总司令回陕主持大局，收拾残部，以为后步，万一不成，退守甘肃，以转时机。陕南王志远旅令其速开西安，以厚实力（刘郁芬对冯失去信心，不赞成冯玉祥回陕）。刘郁芬未加可否。总部参谋长张鹤舫说我多事。

宋哲元退守潼关后，对潼关防务，自顾无力固守，暗自由朝邑渡河，退往山西运城。蒋介石电令杨虎城，进攻潼关。杨复蒋电，潼关天险，不可力攻，只能智取。适逢宋部撤退，杨虎城垂手进据潼关。某日黎明，我到长波各线电台打无线电话，与潼关联络，潼关电台台长对我说，宋哲元已于昨夜离开潼关，由朝邑过河退往山西运城。我们的电台已归杨虎城指挥。我将潼关宋部

撤退情形报告刘郁芬后，刘郁芬当时目瞪口呆，状极紧张，立刻和我一同到电台，自己和潼关电台台长说话。回来后，立即召陈毓辉、卮庭宾、张鹤舫以及省府重要人员等开紧急会议，刘郁芬把潼关情形说明后，即提出撤退，听候改编。大家意见，由主席决定办理。刘即决定，先电蒋听候改编，如果不成，即行撤退。由于过去与蒋无联络，叫不通蒋的电台，听候改编电报，始终发不出去。潼关失守的第三天，据报杨虎城部已离西安不远。刘郁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分别规定留守部队与撤退部队。令陈毓辉率领该部一个旅，留守西安，维持地方。刘郁芬本人率领手枪团、卮庭宾旅，于本日午后5时向三原撤退。省府人员由民政厅长邓长辉负责率领，随同撤退。第一天退驻三原城内，西安来说，蒋介石有电报，要刘郁芬在西安待命，听候改编。刘郁芬将信将疑，没有表示。第二天向大荔县方向撤退，第三天刘郁芬和手枪团退到大荔县孙家时，即被杨虎城部孙蔚如师包围于孙家庄内，此时与卮庭宾旅失去联系。经几度协商，队伍改编不缴枪，刘郁芬由杨虎城负责，派队护送过河到山西。刘郁芬在陕甘青宁的情形至此结束。

刘郁芬到山西后，没有停留，没有到晋城看冯玉祥，一直到天津。不久，蒋介石派人持函到津，请刘郁芬到南京面谈。刘即赴京与蒋面晤，蒋即任命刘郁芬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议。约两三月，蒋介石因孙连仲部进驻江西，蒋拟以刘郁芬为江西省绥靖督办，指挥孙连仲部。因孙不同意未实现。刘对左右说，世情可怕，孙连仲尚且如此，他人更不必提，极为气愤，即离京去平。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时，刘郁芬任高等顾问。抗战时期，刘郁芬到武昌见蒋，没有见到，转南京，汪精卫任刘郁芬为河南省绥靖督办驻开封。伪军张岚峰不听指挥，汪精卫调任刘郁芬为参谋总长，因病回平休养，不久逝世。



# 刘震东生平

刘 林 刘淑华

我们的父亲刘震东于1938年2月22日在保卫山东莒县城战斗中牺牲。1988年10月，我们从民政局领到烈士证明。做为烈士的后代，我们感到光荣和欢欣鼓舞！

刘震东字曦洲。1893年生于山东沂水县，祖籍世代务农，家境清贫。我的祖父刘义精于木工手艺。父亲幼年聪明好学，祖父母节衣缩食送他人私塾。他手不释卷，学习成绩优秀，博得师长和乡亲的赞誉。后随祖父学做木工。他不仅善绘画雕刻，还练得好书法。时逢民初，战乱频仍，生活难以维持，乃只身闯关东。他先在沈阳街头卖艺，后投入东北军任上士文书。由于他敦厚质朴，办事干练可靠且战斗勇敢机警，深受上级赏识。他从排长、连长、营、团，旅长直升到中将师长。其间还被送到东北陆军速成学堂学习。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违约率军入关，南下山东、江苏等省，把势力伸展到上海，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镇压了“五卅”运动。这时，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3日在河北滦县车站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争。父亲在郭的部下任师长，他参加了战前会议和反张的战争。这次反奉战争虽然失败，但给了张作霖以沉重打击。郭失败后，张学良顾全大局，父亲免遭株连。1927年初晋奉交战中，父亲积战功升任副军长。6月奉军整编取消副军长名义，父亲被委为第十五师中将师长。1928年父亲被保送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

在陆大学习期间被选为学习代表。因他学识渊博，有儒将风度，学员赞誉他和另一位学员为“医卜星象高仁绂，上下古今刘震东”。1930年学习期满毕业，出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中将主任参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军又图谋华北，侵略热河。国难日深，父亲义愤填膺，毅然到热河招募义勇军抗御日军。他转战辽西、热河，并在战斗间隙开办教练班培训部队干部。嗣后，张学良将义勇军编为七个军团，任命父亲为第五军团总指挥，率兵二万余与日军展开开鲁一战。

热察塞外，隆冬季节，地冻天寒，士兵缺粮少食仍爬冰卧雪抗击日军。而国民政府却对大片国土沦丧不思积极抵抗，以收复失土，却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道”。对此，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刘震东等于1932年11月24日联名向国联发出决心抗日通电：“我各地义军数百万，无时不在与敌决斗，唯日人残暴非意想所及，义军所过之处多被其炮火摧毁，无辜民众遭屠戮者前后不下五万人，诚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劫，兹特郑重声明：东北民众对于暴日只有抵抗绝不屈服，除非杀尽我3000万人民，万不许其傀儡组织存在，亦不承认任何非法权益之要求，更不能抛弃主权，造成所谓共管局面。中国今日无一人忘东三省，且无一人敢许割让版图，纵不能以武力收复失地，而人民则确精诚团结树立坚决不移之意志，誓将日寇逐出境外，还我大好河山，不达目的绝不终止。中华民国义勇军十四将领率全体官兵同叩。”

12月17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父亲及各军团总指挥再次联名发出“请集全国力量共抗强倭”的电文：“我三省民众矢志复楚，义不帝秦，血拚肉战……虽弹尽粮绝，不减杀敌之志，翘首南中，大计不定徒恃国联……倘不极谋自救，则全国陆沉之祸迫在眉睫，诸公集会首都共策国是，……务望集中全国力量共抗强倭。东北健儿，但愿效死，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两封电报

表明诸义军将领誓死报国的决心。

1933年2月，日伪军10万人分三路向热河发起总攻，北路敌军三次进犯开鲁，均被父亲所部各军配合友军击退。自此敌机连日猛烈轰炸，致使部队及商民伤亡惨重。父亲头部中弹片受伤。战况十分激烈。平津沪报纸几乎无日不登载前线激战的消息。父亲闻知日军将从朝鲜调第三十九师团步骑炮联队万人总攻开鲁的消息，立即组织部队冒敌矢浴冰雪于除夕夜将彰武南新开河镜桥全部炸毁，以阻止敌人向热河增兵。还组织小股士兵不断袭扰日军驻地。他在2月21日向北平拍的电文中报告战况：“2月21日拟进军王志惠窝堡，该地日军三百人，民团四百余，装甲车十一辆，已到刘长明窝堡与第八军团接触，遂进占该堡后端，就此抵抗。敌向南坨子第八军团发炮数十，机枪猛扫，我军沉着应战，敌向南退击，我起而攻击，与敌伏遇，激战竟日，毙敌伪数十，民团四十余，伤者不计，我亦有伤亡。现正与敌对峙。”

2月23日，北路日军由通辽出发进攻开鲁，守军汤玉麟部骑第九旅崔兴武旅长叛变投敌，父亲所部腹背受敌，孤军不支，24日开鲁失守。父亲忍痛率部西撤乌丹（今内蒙翁牛特旗），亦电北平整军待命。继而又撤往察哈尔省。

1933年，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重返张家口，于5月26日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父亲此时毫不迟疑地于5月29日发出响应冯玉祥将军的抗日艳电：“现在平津危迫，察绥战急，与其订盟城下，甘屈辱以求和，何如坚决抵抗，求民族之出路！”冯玉祥将军即委任父亲为第二十三师师长。自此父亲又随冯将军转战于塞北察东抗日前线，不意抗日同盟军都在日、蒋的军事政治夹击下于1933年秋冬宣告解体。父亲于1934年初奉命转回北平军分会。

1935年10月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父亲追随张学良将军到西安任

司令部专员。

他到西安以后，眼见东北沦丧，华北即将不保，国难日深。而国民政府不图御侮救亡，却一意孤行“剿共”内战。东北军一一五师几乎被红军全歼。一一〇、一〇七、一〇九及一〇六师经不住红军的反击。在甘泉、劳山、榆林桥及直罗镇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面对现实，他思想触动很大，开始在黑暗中探寻光明。但他未握兵柄，只能在书法笔墨间寻求寄托。偶或为西安市一些团体和商店撰写“匾额”。据后来得知，他当时已结识了潘汉年并与之过从甚密（父亲与潘的合照等在“文革”中被毁），他在潘汉年的教育和影响下，阅读政治理论书刊并学习俄文，逐步接受了中共团结抗日救中国的主张，对内战更加反感。

父亲事奉祖父母甚孝，治家严格。他牢记祖母教导，不近烟酒和赌博。一天，他从战地归来，见家人正陪同客人玩麻将。他不顾客人在座，怒问：“为何违我家教？”一而捧起牌具送入火炉。事后，他安排秘书为内眷教读经史，提高她们的文化。她们都能看报写信了。抗日战争后期，孤儿寡妇流落陕南，生活日趋艰难，二婶能在乡村小学任教贴补家用，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

我们弟兄姊妹3人，恕忠（退休教师）是长兄，弟弟恕心1944年参加青年远征军牺牲在印度，叔华现在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任工程师。我们和父亲见面时间很少。他在百忙中仍不忘严格要求，训诫要从小勤奋努力，立志成才，长大要自食其力，报效国家。他常以自己历史教育我们，以“为人要有骨气，有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气质”教育子侄辈。讲日军对我国的侵略，教育我们爱国家。1937年北平事变，七月中旬，恕忠高中毕业即背着母亲投身抗日军旅（父亲在遗书中还称赞他投军甚好），父亲牺牲后，部队领导令其回家照顾母亲弟妹，而恕忠却因不能上阵杀敌而耿耿，认为是有违父教，不能为父报仇，为国尽力。

父亲治家从俭，生活朴素。在北平安家十数年从不购置房产。陆大毕业后即将汽车接送改乘包月车。他不在北平时即退

掉。祖父在家乡要购买田产，他反对并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家乡的田产是祖父将生活费积累逐年购置起来的。他在西安工作期间仍赁屋居住，但对亲戚朋友的资助却很慷慨，教育家人要厚以待人。乡亲们为谋职来求者络绎不绝，来则供给食宿，分别情况介绍工作。无工作能力者虽至亲不予介绍，最后资助路费劝回家乡务农。庭院虽小食客颇多，母亲偶有怨言即教育济困扶危大义。对一位老友接济其全家食用长达三四年之久。对教育事业慷慨解囊，如北平北方中学和西安竞存中学（学生皆东北军子弟）皆获其捐赠。在家乡，为培养村民子弟拨房屋庭院开办小学。

1936年11月祖父病故，父叔们奔丧回老家。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急电召他回西安。临行时，全村父老乡亲出村相送。父亲情绪激昂，双膝跪地向祖父坟墓叩头明志：“震东决心抵抗日寇侵略，以身保卫生养我的家乡父老，绝不辜负乡亲厚望。”想不到这就是他的誓言。他赶回西安即投入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父亲被委以行辕参议兼总务处长。他看到张将军被软禁，东北军被改编裁掉，团结抗日的希望破灭，情绪消沉，也不去行辕办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父亲义愤填膺立即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缨杀贼。没有回电，他接连三次致电何应钦，均无回音，他即挂冠亲赴南京坐等，约三月左右。时值日军疯狂轰炸南京，附近民房皆被炸毁，左右人员劝其避入防空洞或回西安。他愤怒地说：“军人不能带兵杀贼已感赧颜，何谈躲避偷生。”母亲到南京劝归，亦被劝送回陕。何应钦见其抗日之志不可夺，任命他为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游击司令，兵员、粮饷自筹自募。尽管条件如此苛刻，筹组游击队任务十分艰难，他却感到十分兴奋，认为有了抗日名义就能挥戈上阵，杀敌报国了，当即赶到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徐州，张榜招募抗日志士。一面派二弟震西（1940年牺牲在山东临沭县，1972年领到烈士证明）回老家变卖房产，筹

募粮饷。他在给祖母的家信中说：“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先国后家。为抗日虽倾家亦在所不惜。”一面电三弟震亚急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政工干部到游击队指导工作。其实，来自五十一军的王再天少校就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的共产党员。来自平津的爱国学生和教师如徐眉生、李向群、肖芳洲和杨士清等人，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游击队在奔向战场前，父亲给母亲的家信竟成为遗书：“丙辰儿（恕忠）有下落，已走入救国道路，甚好！长生儿（恕心）补习功课也很好。家中事甚为放心，我在外专心杀贼。万一不小心被日贼把我杀了也更好。在此时间只有牺牲一途，别没路可走……只等待将日本贼杀个干净，才能了却我的责任。”信是在他极端困难时期草书的，从内容和两个错别字可透视出父亲当时工作的困难和杀贼的决心。

他在兵源、武器和粮饷全无的条件下，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初步组成了两千余人的民众武装。这是游击队的基本力量。上兵主要来自胶东、鲁南和苏北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学生，他们缺乏实战经验。此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和当地青红帮、地主武装。大家以抗日保卫家乡为同一目标汇集到这支游击队中来了。游击队仿效八路军开展政治工作，组训队伍。在江苏新安镇（今新沂县）经过短期整训就向山东进发。在鲁东南破坏日军运输线，袭击小股敌人，炸毁日军仓库等，有力地配合了正规军的战斗。

1938年2月间，父亲率领游击队一个支队游击到浮来山以南林庄时，日军板垣师团以日野联队为主力继侵占诸城之后逼近莒县、沂水和日照一线。莒县是日军攻击临沂、会攻徐州的必经之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海军陆战队及民团从正面阻击敌人，游击队则在招贤镇一带袭击敌侧翼。正面战场相持三日，招贤镇战火浓烟滚滚。许县长率县大队撤离莒县城，居民也已逃避一空。父亲发现城内外无部队防守，主动向第三军团长庞炳勋请

战，庞即命父亲就近率队入城暂时防守。等待援军。此时方圆五六里、人口二三万的莒县城城门大开，街巷无人，宛若一座死城。父亲风趣地对大家说：“是乃空城一计也！”

莒县古城城墙比较坚固完整，却毫无防御守城准备。队伍于21日傍晚进城，察看地形时发现了县大队遗弃的枪支弹药。父亲立即用以武装游击队员，并构筑工事。此城无西门，他们堵塞了东、北二门。他一面在西部署防卫，一面鼓舞士气。四百余人的队伍抱定必死的决心，沉着镇定地守着莒县城。22日凌晨，四十军朱家麟旅长始带领二二九团跑步到达，许县长闻讯后也带领县大队转回，方知道路和桥梁是县大队撤退时为拒敌而破坏的，故而汽车无法通过，援军来迟。

二二九团和县大队进城后，游击队已完成任务，本应交防撤出，但见四十军远程赶到，官兵极其疲乏，朱旅长要求游击队继续承担守城任务，给部队以休息吃饭时间，然后接防。父亲不顾参谋长等人的反对，慨然应允并和朱旅长、许县长研究成立了城防指挥部，自任总指挥，朱任副总指挥。父亲坚定地宣布：“要与莒县城共存亡”。他巡视各哨彻夜未眠。拂晓时分，城北传来马达声，也能看到敌人的汽车车灯。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殊不知这时防守莒县的战士们正严阵以待。当敌人临近城郊时，游击队员缺乏作战经验，便向敌投掷手榴弹。四十军听到北门打响，快步投入阵地，紧急布防，此时敌已将莒城包围。父亲命令官兵严密监视敌情，在敌人未进入有效射程时严禁开枪。5时半左右，敌人试探着向北门靠近准备爬城，守卫队员开枪射击。日军枪炮齐鸣，发起攻击。我战士沉着应战。激烈中，城外南高地为敌攻占，父亲指挥部队奋力抵抗，与敌形成对峙。日军多次以重炮、机枪掩护爬城，均被守军击退。为了歼灭城南高地之敌，父亲令两营士兵组成敢死队冲出南门，分东西两路包抄敌侧后，9时许，敢死队发起突袭，挥刀持枪冲入敌阵，南高地之敌狼狈溃逃。北门外之敌据险负隅顽抗，后来敌主力增援北门，

对城北一线发动重点进攻。二十九团团长邵思三、营长刘振声负伤，连长刘同盛阵亡，城北告急。父亲闻报不顾部下劝阻，毅然登上城墙，奔赴北门指挥作战。敌我相持一个多小时，终因守军火力薄弱，城西北角被日军攻破，日军十数人携轻机轮登上城墙，集中火力向守军扫射。父亲不顾危险在北城墙上飞奔督战，指挥堵击。就在城西北角被守军夺回之际，敌人的迫击炮弹正落在他身边，弹片由他右太阳穴射入，穿透左耳，脑浆流出，父亲以身殉国。士兵闻此噩耗，无不悲痛，更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也更激发了抗敌决心。

莒县城失守后，《新华日报》发了战讯又作了长篇报道，题名《莒县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不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同年12月，国民政府在重庆为抗日阵亡的刘震东、范筑先等21名烈士召开追悼会。中共领导送了花圈和挽联。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也送了挽联。父亲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各地，闻者莫不痛惜。国民政府为嘉奖父亲，命名莒县为震东县（1954年改为莒县）。



##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忆略

王佐良\*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是1950年11月30日，在四川广元县，由我和五百多名教友发起的。这个以自治、自传、自养为中心内容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倡议一发表，首先得到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的支持和拥护，也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鼓励。

我出生在四川绵阳县柏林王家湾一个贫农家里，祖辈都信仰天主教。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我和广大农民一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童年时期我进入了天主教会办的备修院，继而转入小修院，最后在神哲学毕业。共读了15年，受尽了折磨和考验。在修院，法国传教士不准中国修生读中文、学科学知识，只准死读硬背拉丁文。法国传教士可以任意辱骂或动手打人，说中国人“穷”、“笨”、“没有出息”。中国修生稍有不合他们意的，就有被开除出院的可能。

1948年，我从神哲学毕业后，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属的成都教区领受了神父的职务，被放在四川最北的边远山区广元县大院子、小寺山两处圣堂担任神父职务。同时被置于三个法国传教士的监护之下。那时，外国传教士住的是大城市，在离成都比较近的圣堂任职，教友人数少，好玩；而中国神父都置放

---

\* 作者时任天主教成都教区广元县大院子、小寺山圣堂神父。

于较小而且比较边远的地方，吃住都不如法国传教士。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当神父是靠他们给予的“恩赐”、“施舍”、解决饭碗问题。

天主教传入四川是明朝末年的事，到 1949 年共计三百余年。从 1696 年开始，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了四川的传教权。此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和教案赔款，在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各地大量购买土地，兴建圣堂，对教会内施行家长制统治。教会内一切经济和人事大权都操纵在外国人的手里。中国神职人员只能作他们的附庸。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二世，宣布在中国实行“圣统制”，假意要中国人自己管理教会，但事实怎样呢？全国共 143 个主教区，但中国人管理教区的仅仅 20 多个而已。其余教区仍由不同国籍的外国传教士所把持着。这与未宣布“圣统制”以前的天主教管理体制有什么区别呢？在主教人选问题上，成都教区的法国传教士仅仅 24 人，而中国神职人员 54 人，他们声称要实行民主选举，按照圣教法典，其结果占人数多的中国神职人员选举失败了，而占人数少的法国传教士胜利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圣统制”和“圣教法典”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我在旧中国生活了 30 个春秋，眼见许许多多不平等的事情。外国传教士在我们的国土上，借传教为名，任意挥霍中国人民的钱财，勾结官府欺压老百姓。广大中国教徒在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受奴役，经济上受剥削。我作为一个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感到十分痛心。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 12 月广元县解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励着我。我们信仰天主教的中国神职人员也站起来了。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决心听政府的号召，遵守政策法规，这是符合天主教教义教规的，符合耶稣圣训的。

1950年，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中国基督教吴耀宗先生发起了支持抗美援朝的倡议。我受他的启发，心情激动，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毅然同广元县五百多教友一起发表反帝爱国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实行“三自”方针，反对外国势力对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友的奴役和控制。10月30日，我们广元天主教反帝爱国宣言发表了！中共广元县委统战部、剑阁地委统战部和以后的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先后在《川北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祝贺。1951年1月4日以后，《川北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刊登了广元岳池各地天主教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消息。紧接着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召集川北地区的宗教界人士开了座谈会。当时任川北区行署主任兼书记的胡耀邦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高度赞扬广元天主教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他说：“天主教倡议的‘三自’革新，在全国打响了第一炮，要高举这面旗帜，让这块金字招牌闪闪发光。”

1951年元月，《人民日报》以“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了社论。接着有绥远、重庆、南昌、武汉响应了这一运动。毫无疑问，各地天主教人士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的。

1951年1月21日，在中央文教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宗教界提出的‘三自’革新运动，是应该提出的，人民政府应加以支持和赞助，这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爱自己的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徒在内。”

我们的宣言发表后，黎培理（梵蒂冈驻国民党公使）和彭迈传（成都教区主教，法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狂叫什么“绝罚”，“停止神权”，“开除教籍”。用尽各种手段对我施加压力，企图要我放弃“三自”反帝爱国运动的正义主张。但我们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1956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见了我们出席筹备会的全体成员，并同我们一起照像留念。1957

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了。在会议期间，朱德委员长亲自接见了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亲切的鼓励，谆谆的教导，深深地印入我的脑际，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党和领导的赞扬，使我深受教育，增强了反帝爱国的信心。我为祖国，为人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可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鼓舞。从1954年起，我被选为历届的省人民代表，1983年4月又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们四川省将开办天主教神哲学院，培训教会传教事业的接班人，我将尽我的力量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作出新贡献。

(1983年)

# 解放前天主教在阆中概况

阆中县政协

公元 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侵略军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增开通商口岸、进驻兵舰、赔偿军费等条款外，还规定：“法国人人中国内地传教，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1860 年法国强迫清政府在北京订立的关于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再次肯定了天津条约的有效性，更承认“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田地建造自便”。从此，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接踵来我国，深入内地，从事传教活动。

1878 年，成都平安桥主教区派法人张神甫来阆中，在学道街购置地产，建修教堂一座。以此为据点，向四乡及苍溪、南部等县发展天主教徒。1884 年，法国侵略军并吞越南，又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军队在冯子材、刘永福的领导下，奋起抵抗，在广西边境大破法军，举国为之振奋。但清王朝却下令停战，委派洋务大臣李鸿章到天津与法使和谈，于 1885 年又缔结了屈辱的“中法新约”。消息传出，国人议论纷纷，尤其是各界有识之士，忧国家之危殆，悲民族之零落，尽管在清王朝重重压力之下，仍然采取了规模不等、形式不同的反抗活动。阆中爱国人士自发集会，在“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中法新约”的口号声中到教堂示威。法传教士见众怒难犯，悄悄躲藏在密室中。群众义愤已极，捣毁了教堂内一切设施。迨地方当局派官弁前往镇压时，群众已经疏散。法教会以太上皇身份指斥保宁府玩忽职守，纵人“行凶”，限期圆满解决此案。保宁府官员诚惶诚恐，一面

严查肇事者，一面向教会认罪道歉，愿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保证尔后不再发生类此事情。几经交涉，法教会才“恩准”了结此案。张神甫以保宁府赔偿的巨款作经费，积极开展活动，拟议中认定状元街陈状元旧第宽敞，扩建教堂甚为理想，即遣中人前去洽商。陈氏后裔畏惧乡里指摘，不敢贸然应允。中人为了从中牟利，竭力撮合，以买主为“大三堂”（大三者“天主”二字的省笔）名义，与陈氏订约，遂购得陈第。后鸠工备材，破土兴工，越二年教堂落成，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旧教堂；经堂可容300人作弥撒，是阆、苍、南三县教会活动中心。教堂内还附设男女学校各一所，供教徒子女就读。民国时期在校学生达200人，多系男生，大多数为城郊及附城乡区的教徒子女。教会还为远道学生备有午餐，学膳费全免。所学课程为圣经圣诗。教师是圣经水平较高的男教徒和贞女。学生七岁入学，八年学完最基本的课程，教会认为可以深造的学生，要学18年，直至在成都神学院毕业。毕业后再跟随主教或神甫学三年，才有资格充当神甫。如安岳县人黄晓西，被送入成都神学院深造，未及二年，值沪案（五卅惨案）发生，全国掀起反洋浪潮，神学院停课，黄亦辍学。

教会在教堂内除兴办学校外，还设有孤儿院、养老院。所收养的孤儿，一部分是失去父母的流浪儿和家境赤贫、子女众多、父母无力抚养的幼儿；一部分是弃婴和肢体残废儿童。孤儿大多是女孩。孤儿的日常事务，根据其年龄和身体状况而定，或做手工劳动，或专学圣经圣诗。长大成人后，教会在教徒中为之物色配偶。非教徒求婚，须以入教为先决条件。孤儿有十余人。养老院收养的老人，以嫠、寡、孤、独为对象，不分教内教外，通常收养着三五人。

天主教在城内先后修建教堂二座，收教徒200余人。又在思依区河楼王家坝建修教堂一座，势力所及，如文成、双龙、玉华、河溪、思依等区入教者约200余人。参加教会经教徒介绍即

可。如果正规入教，必须领洗，领洗人洗前先要学会“公教教义”，熟读或念会“宗教信要经”。领洗时神甫一面用水在其额头上作十字形笔画冲洗，一面念：“我洗尔，因父及子及神圣之名。”成人和小儿入教仪式相同，小孩出生八天后就得领洗。付洗后，神甫在经堂补礼，搽领洗圣油。至此，才算正式入教。

神职人员把圣洗、坚振、圣体、告解、终傅、神品、婚姻等七个秘迹（也称七件圣事）奉为专职，无论施行哪件秘迹，都要详细记载，交班时交待清楚。圣洗秘迹如上所述。所谓坚振秘迹，是坚定教徒信念的礼仪，主教对教徒不定期施行教育和鼓励，要求教徒坚持信念，振作精神，战胜邪恶。并为之搽坚振圣油。此项圣事，主教在必要时可委托神甫代为施行；圣体秘迹是主礼者把面饼和葡萄酒在弥撒中祝圣；告解秘迹是一种赎罪仪式，也就是“忏悔”。教徒在行动上或思想上有悖于教规，要在神职人员面前直言不讳地忏悔，请求上帝赦罪，忏悔后才能得到圣体——面饼。饼薄如纸，约拇指大。神职人员把饼直接送入忏悔者口中，他人不得手触面饼，以免亵渎圣体。据说忏悔者领了圣体，就吸收了耶稣的血和肉，与耶稣相结合，就能得到天主的宠光；终傅秘迹是主礼者为垂危教徒施行的礼仪。由神甫在病人四肢五官上抹终傅圣油（认为四肢五官是犯罪的工具），念经文，要求病人忏悔，帮助他灵魂得救；神品秘迹是修道生升为神职人员的礼仪。教徒在升神甫前，要按神品递升，共分七品，一、二、三、四级为小品，五、六、七级为大品；一品守门（开闭堂门，击钟等）；二品诵经（在堂中念经书）；三品驱魔；四品侍从（在弥撒及行圣事时递圣水、燃蜡）；五品发贞节愿，祭献时辅助神甫；六品辅助神甫行祭；七品即递升成了神甫。递升神甫前还要举行剪发礼，即在修道生头上去发五小撮，以示绝俗，行剪发礼后便入了“神职界”。神甫的职责是管理所属教徒宗教生活方面的事情，进行传教活动和举行弥撒及除坚振、神品以外的“圣事”；婚姻秘迹是指教徒的婚礼必须在教堂内举行，由神甫主持礼仪，结婚人

向神甫保证自己的子女要当虔诚的教徒。

宗教礼仪，除经常举行的小瞻礼外，还有四大瞻礼，即耶稣复活、圣神降临、圣母升天、耶稣圣诞。每逢节日，教徒扶老携幼齐集教堂作弥撒。据说耶稣遇难前夕，用面饼祝圣后分给众门徒说：“这是我的肉身，你们拿去吃了记着我。”又拿出葡萄酒降福后分给众门徒说“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面饼与葡萄酒因而象征圣体。后世，教徒按经文教义把饼与酒当作祝圣祭品。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的仪态和道德情操极为重视，力求把他们塑造成外表正直无私、道德高尚、行为圣洁的偶像，供人膜拜。1922年法人姚神甫来阆作本堂，因喜好养狗打猎，被成都教区侦知，即派主教罗书雅莅阆，调查属实，认为姚的行为亵渎了经堂，为教规所不容，立即调离。并重新祝圣经堂（念经、洒圣水），后调安岳县天林场中国人神甫汪文著来阆主持教务。

1886年法人张神甫利用保宁府赔偿的巨款，除扩建教堂外，还先后在城郊附近的萨家坝、棋盘湾（后属玉华乡）、袁家坝、田家嘴（后属七里乡）、麻石嘴（后属双龙区）等处购置田地三百余亩出租。已由不平等条约的“内地传教”发展成“内地拓殖”。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皆视而不见，并“厚待保护”，一任教会得寸进尺，开拓殖民事业。凡租佃者，菜园地交押金、租金；田地缴粮食，一年两季庄稼，定地定租，各得其半。规定两季都用小麦交租，秋季不产小麦，只得用玉米掉换，每斗小麦掉玉米1斗8升，使租佃者实际收入不过十分之四。教会为显示优厚，还在应得的“五成”内提出些许作奖励。但灾年荒月仍要如数缴纳，租佃人东拉西借凑足数额缴纳后，向管家（中国人）诉说衷曲，请求救济，经详报神甫，又格外“开恩”予以“施舍”；菜园地租金则不能短少。租佃人必须入教，入教后的言论行动被纳入教规范范围内，不能违犯，否则要受到制裁。1928年教徒刘茂木纳妾续宗被神甫得知后，立即将刘的住房（教会房产）查封，全家被扫地出门。教徒傅国璋的女儿嫁给了



教外人，被神甫奚天佑获悉，立即收回租种的菜园地。所交押金，民国初年为十千文（当时约合硬洋 55 元，可买米 5000 斤），1943 年退押，折算为法币 5000 元（当时仅可买小麦 500 斤），傅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在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农民，饱受敲骨吸髓的盘剥，已是日不聊生。法教会在“拓殖”事业中，用中国人的骨头熬油，从中取出些许作为“施舍”性酬劳，这在贫困已极的中国农民眼里，竟是如此“宽厚”！尽管对天主教认识甚少或毫无认识，迫于生计，只好权且入教。教会不但凭借经济上的有利条件诱人入教，在政治上的权势也惹得一部分人（不包括真诚信仰者）眼红，情愿输纳依附。神甫，旧中国官府称之为“司铎”，意即主持教化者。他们在半封建的中国土地上“见官大一级”的特权人物，名片一张，官府视为圣旨，惟恐办之不力。1920 年，苍溪县五台子地主李步学自愿捐输庄园四处，约有田地五十亩，李因而得到青睐，成了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1923 年，思依区白茨窝黑分陵，据说是王家坟地，后被当地乡约、地主任大户强占，官司打到县城，长时间得不到公断。有人把王家介绍给法入姚神甫，姚略问情由，即以名片通知官府，飭令迅即裁断，官府很快把坟陵断给了王家。王家感恩戴德，率全家人了教。影响所及，天主教会这尊偶像因而又增添了几分感人的色彩。

自 1886 年至 1949 年六十余年间，阆中天主教会先后有法国神甫 3 人、中国神甫 3 人主持教务，都是一脉相承，遵照成都主教区意旨办事，不敢有丝毫变动。他们办学校，办养老院、孤儿院，用启蒙扫盲、恤老抚幼的“义举”粉饰着不平等条约的奴化政策；用“优惠佃农”，悲天悯人的姿态遮掩着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这一切都是发人深思的。

# 建国前河套区天主教史略

段德荣

## 天主教的传入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分割中国领土，控制通商口岸、强行设置租界、协定关税、在中国驻军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活动等特权。

1864 年，比利时、荷兰两国插足内蒙古地区，派遣了以比利时南怀仁为首的传教士进入我区，大搞侵略性的传教活动。在绥远、察哈尔、热河成立了“圣母圣心会”。首先在崇礼县西湾子设立教堂，接着到岱海滩（属内蒙古凉城县）进行传教活动，最后发展到巴盟地区。当时他们把蒙古传教区划分为东蒙古教区，主教堂设在热河的松树嘴子；中蒙古教区，主教堂设在崇礼县西湾子；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堂设在三盛公（今巴盟磴口县）。

1865 年，南怀仁亲自从绥远到察北崇礼县建立了西湾子第一教区（即中蒙教区）。1875 年南怀仁指派比利时传教士德玉明来三盛公建立第二教区（即西蒙教区）。主教堂设在三盛公，由德玉明任主教。以绥西为据点，向陕、甘、宁一带发展。为时不久，南怀仁又到热河的松树嘴子建立了第三教区（即东蒙教区）。此后他们又陆续在东堂、天兴全、圣母堂、粮台、兴盛扬、富太魁、旧地、哈拉图、王亮滩、渡口、补隆淖、黄羊木头、乌兰淖、三道桥、陕坝、蛮会、大发公、大营子等处建立起大大小小

十几座教堂。这样，天主教在河套的传教范围日益扩大。

1900年6月，义和团从河北、山西传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在三盛公等地散发“神拳单”、设立“神坛”，教练神拳。当时三盛公就有一百多人在练神拳，他们号召群众起来反洋教，并与洋教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同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和比利时荷兰等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扩展势力范围。

### 三盛公教堂

比利时的德玉明、桂法贞来到磴口东堂扎根后，于1878年建起三盛公教堂，将河套的天主教会划归宁夏教区。从此三盛公教堂成了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北的大本营。它管辖着绥远西部的萨拉齐、托克托、五原等县和宁夏、陕北榆林等县，以及阿拉善旗、西公旗、伊克昭 and 乌兰察布盟等4个蒙古地区。在三盛公主教堂的管辖范围内，共有教徒约四万余人。同时教会还备有武器，自身掌握着武装力量，享有政治及司法特权，俨然成为中国境内西北角的天主教独立王国。

德玉明神父在三盛公期间，和王公贵族封建势力勾结到一起，一面进行传教活动，一面搜集地方情报。亲自主持施工，建起了三盛公第一所教堂（西堂）后，又在三盛公相对称的东边修盖了第二座教堂（东堂），后来又三盛公的西北方也盖起了一座教堂，叫“圣母堂”。这样三盛公便成了绥西地区和陕、甘、宁一带传教活动的中心。上述教堂所需木料、石头、砖瓦、洋灰等是从宁夏运来的。教堂门窗上的玻璃全是外国进口的。为兴建教堂，整整备料两年。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始告落成。因为三盛公是主教堂所在地，所以建筑宏伟壮观，布置也绚丽多

彩。堂内备有花样锦绣的祭衣，新颖夺目的地毯，纸像塑像应有尽有，真是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在德玉明主教任期内，曾有一个当地商人因发生人命事故，需款急切，出卖土地房产，天主教乘机以700元现洋收购了他的全部家当，充作教会资产。

1888年德玉明神父去世，比利时人闵玉清神父接任了三盛公主教。在他的执掌下，教会取得极大发展。闵玉清的传教手段，是先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具体办法是用放地招引来利诱农民入教。并明确规定了谁要种地，必先入教。不入教者，不给拨地。教堂还想方设法劝自耕农入教，必要时还施加压力，促其信教。其目的是想把三盛公建成一个专一的教堂区。1892—1893年间，晋北与陕北因连年荒旱，遭了很大年馑，河西县外一带更加严重，以至灾民络绎不绝地逃到后套求生。各堂口的洋教士借机把这些灾民收留回去，吸收为天主教徒，变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使用灾民苦工大盖教堂。1893年到1896年期间，三盛公教堂完全是依靠县外逃来之灾民盖成的。洋教士为了大量占据土地，曾于1894年以小恩小惠软硬兼施的手段，向阿拉善旗租到了三盛公周围的南粮台、金沙庙和傅家湾等处的农田，同时在南粮台等地设立了教堂。教会深知有些穷苦人为了种地活命才入了天主教。对天主并无诚挚的信念。于是特意从岱海（属内蒙凉城县）把虔诚的信徒迁来十几户，作为教徒中的骨干，发展教务的基础。这些人是郝、武、沈、常、阮、胡、张、段等姓。他们来了之后，教会即分拨在三盛公、旧地、金沙庙、天兴全以及蛮会等堂口落户定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中国农历的庚子年，义和团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各地杀洋人、剿教堂、殴打教徒的事件层出不穷。而河套区的外国传教士在蒙古上层的保护下，被送至今外蒙，风声过去后，又重返三盛公教堂，各司其事。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同清政府外交大臣李鸿章

举行谈判，要求中国赔偿五万两白银，并要求河套区承担一万两白银的所谓“庚子赔款”。当时王爷府拿不出这笔巨款，只好用土地估价赔偿。从此天主教在三盛公、补隆淖、渡口、大发公等堂口获得了庚子赔款地，更加具有发展教徒的条件。他们以土地为诱饵，把神木、府谷等处逃来的大量农民吸收入教，让他们开荒种地，维持生计。同时利用这些承租教堂地的佃户修挖了三盛公渠、渡口渠，并倡导和指使他们大量植树造林，绿化荒原。

1926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将大发公教堂的赔款地收回。1935年石阳休主教又将三盛公、渡口等赔款地退归王爷府，办理为承包租种地后，教堂仍分给了教徒耕种，打下的粮食按三七分成，即天主堂分三成，佃农分七成。解放前夕，王爷府又把天主堂的包租地也收回去了。

三盛公教堂本是西南蒙古区教堂，自1900年以后，将主教堂迁到萨拉齐二十四顷地，但仍保留三盛公主教堂的原称。民国17年（1928年）成立绥远省之后，主教堂迁至归化城（即今之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定名为绥远教区，将西南蒙古教区这一名称取消了。同时把河套区和宁夏、三边等地，划建为新主教区，命名宁夏教区，主教堂座又设在了三盛公，指派荷兰人费达德任主教。

## 修道院简介

1887年三盛公创设了备修院，招收15岁以上的备修生十几名。次年正式成立了修道院，院长是比利时人，姓氏不详，后由鲍海蓉继任。修道院是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进入修道院后，修道生之书具、衣食等，都由教会供给。并规定修道期间修道生一般不准回家探亲，如家人前来探望，必须经院长批准才能接见。修道生务须每月向院长或指导神父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和行为表现以及进修收获等。

小修道院学制六年，以学中文和拉丁文为主，辅之以三字经、明贤集、四书五经等。三年之后，增学法文课，后改订为英文课。修道生六年届满，其程度相当于高中生。在小修道院毕业后，还要去热河松树嘴子天主教大修道院攻读神学、哲学之类的有关课程。自从大同成立了修道院，内蒙古地区的修道生一律到大同攻读神学、哲学及数、理、化教程。我从大修道院毕业后，回到本教区经座堂主教府主教以礼仪祝圣，才晋升铎品。

自1888年三盛公设立小修道院招收修道生以来，经过逐级学习而晋升为神父的计有第一批的段永奎、张怀又；第二批的康景东，郝羔斯玛；第三批姓名记不起来；第四批的有傅亭维等人。1904年主教府迁至二十四顷地，三盛公小修道院亦随之临时迁往莎拉齐县巴拉盖。三盛公修道院改为公学。

1905年，二十四顷地修道院建成，始将莎拉齐县巴拉盖小修道院迁到该地。当时教区主教是闵玉清。后来在河套各教堂担任神父及神职人员的基本上都是从修道院培养出来的中国人。

1923年重新划分教区时，三盛公划归宁夏教区，但为主教府的总堂，主教仍是荷兰人费达德。随之三盛公又成立小修道院，首任院长罗明坚，后由比利时人狄维泽、樊静安相继接任，最后一任院长是中国籍司铎刘静山。由三盛公小修道院招收进去的修士，毕业后晋升为神父的计有：第一批的宋志、刘宁民、陈宽炯；第二批的樊永逸、董荫南；第三批的段万科、李枝荣、谢九教、徐声远、刘厚基、马元牧（蒙族）、常建春、段文治；第四批的王甫田、马明德、冯进礼、万计选、冯进毅；第五批的郭正基、刘静山、武慕安、徐声波、侯永希；第六批的石生玉（蒙族）、马仲牧（蒙族）、樊静恒；第七批的李文书、张静远等人。

## 修筑围堡

天主教为防御大小股匪和哥老会的袭击，以自卫护教为名，

修筑围堡，设立军事据点。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即建起简陋的三盛公教堂围墙，自庚子赠款以后，又修筑了较大的围堡，高二丈，宽五尺，有东西大门，城门设有岗哨。1905年乌兰淖兴建大教堂时修筑了城垣。1915年修建起蛮会堂围堡。1931年荷兰籍神父邓德超在渡口堂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围堡。1929年在比利时籍戴神父执掌下，修建起补隆淖围堡。同年修建了黄羊堂围堡。1933年陕坝天主教堂修建了小城堡一座。1940年傅作义长官部迁到陕坝后，由省政府统筹施工，扩建为较大城垣，并筑有城门三道。1937年贝清明神父在三道桥教堂修建起一座较大规模的围堡。其他小型简易的围墙还多不一一记述。

民国以来，内蒙古地区的教堂屡遭土匪绑架勒索，所以天主堂不但修建围堡，而且备有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围堡，是陕坝、蛮会、渡口三处。尤其陕坝的围堡，经扩建后，有南、东、西三道城门，放有岗哨。渡口城门也有岗哨。由于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都带有枪支，如手枪、猎枪，甚至还有土炮。三盛公、渡口、补隆淖等教堂，都有相当数量的枪弹，不过大都是老式的枪械，计有老毛式、大揭盖，最好的是自来套筒。后来各教堂购置了枪支，加强自卫能力。当时三盛公教堂就曾有枪百余支。临河各教堂还建立了民团组织，三盛公、渡口、陕坝、蛮会等大堂口武装较突出。后来各教堂的枪支都消失殆尽。如大发公、蛮会、陕坝堂的枪支被杨猴小子土匪给取走了。三道桥教堂枪支于1940年被日伪军带走了。乌兰淖堂的枪械被国民兵没收了。三盛公、渡口、补隆淖等地的教堂枪支，被马鸿逵没收过一部分，其余解放后上交人民政府了。

## 掠夺土地

天主教堂掠夺土地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勾结蒙古上层统治阶级以廉价购置或包租土地。据说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二年之

际，闵玉清伙同费、文两神父，把三盛公官府的王爷和杭锦旗官员们邀请到一起，大摆宴席，美酒大肉款待了几天，达成了包租杭锦旗土地的契约：东至达拉旗，西至王爷地，北至乌拉特，南至童达公，允许教会在这—广阔的领域内开垦。结果是把陕坝、胜家营子、黄羊木头、渡口、上下蛮会、南台子等地，都拱手送给了天主堂。二是以借贷方式逼占土地。如陕坝堂神父邓德超，于1920年蓄意借给杨米仓800两白银，让他接挖杨家河渠，渠挖成后，杨家因一时无力还清这笔债，致将三道桥附近的一部分土地让给了教会。东至沙沟渠，南至双炮台，西至三淖儿，北至胡柜城，都划归教堂垦殖。又如三盛公一带土地，原为地商沈十万所有，因和教会发生纠纷后，洋人打胜了官司，即把沈家的土地，从天兴全至补隆淖沈家河两岸皆划归教堂。再如准格地原系张二奎和其叔父包租杭锦旗的一部分土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教会将张二奎等赶走，全部强占了他们的土地。三是庚子赔款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绥远道把黄土拉亥河（即黄济渠）达拉特旗1400顷土地抵作庚子赔款划给教堂管辖。与此同时三盛公教堂也提出了赔款要求，阿拉善旗认定承担赔款数为五万两白银，可是阿旗王爷当时只能交银二万两，尚有三万两白银，因其无力付出，于是将三盛公一带约五万亩土地抵顶。

## 举办教会学校

1880年三盛公教会设立了男童学校，除读经言外，还念三字经、千字文、明贤集、四书五经等。教师除个别神职人员兼任外，大都是清人的老学究。自民国初年以后，应用的课本，改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算术、历史、地理、体育等。其时补隆淖教堂还设置了成人夜校。

1913年各教堂都成立了初等学校，除五原、临河的县城里没有教会学校外，其他三盛公、陕坝、蛮会、渡口，都是完全人



学，学制是六年，课程同三盛公一样，以国家规定之教学科目为基础，各教堂学校还另设宗教课，并都唱教会歌曲。天主教兴办学校，是为了传播经言，灌输教义，以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精神鸦片来麻醉人们的心灵，其结果，导致人们消极、悲观、厌世。但天主教办的学，客观上对当地普及教育也起到一些作用。当时教堂神父和修女的身边，都备有一些常用药品，他们有时对教徒和当地居民，进行免费治疗，以示慈善，求得人们的好感。

(刘培荣整理，1986年)

# 北京道士火烧白云观安世霖、 白全一亲历记

许英华\*

1946年，北京36名道士为了维护道教清规，焚烧了白云观自称“住持”的安世霖和都管白全一，是道教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曾轰动了北京九城和全国宗教界。我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那时我在西便门关帝庙出家，道号是许信鹤。事后投案自首，被国民党法院不分是非判处了无期徒刑，受尽了折磨，直到北平解放，我和我的道友们才重见天日。

## 关于白云观的历史及传说

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偏西，建筑壮丽幽雅，为全国道教的第一丛林。解放后，又经政府把全部建筑整修一新，现为全国道教协会会址。

据道教传说，此观始建于唐朝以前，原名太极宫，宋朝时改为天长观。金时，吕祖嫡传弟子邱处机（道号长春）苦修于陕西泷州龙门洞多年，颇悟道机，创道教北宗龙门法派，授十八弟子，为龙门法派之祖，后世尊为邱祖。

后邱祖应金帝召聘，携诸弟子来燕京，住于太极宫。时太极宫倾圮已久，邱祖下力重建，因工程浩大，20年始竣工，初具

---

\* 作者时为北京西便门关帝庙道士。

现在规模，于是易名长春宫，大概即是取了印祖的道号为名。

邱祖羽化后，就把他升登仙班的葆光堂改建为邱祖殿。

到清朝康熙年间，又改名为白云观。据说康熙帝曾游白云观，御赐金钵，命方丈王常月开坛传戒，盛况空前。

邱祖之后，观中方丈，代有传人。至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明彬共有近八百年的历史。

### 安世霖与白全一把持白云观经过

安世霖字泽普，河北省房山县人，16岁时出家，是该县黑龙观的“念经道士”。后来在北京白云观挂单，遂长住在此。

安世霖为人聪明伶俐，办事有权术，善于巴结应付，因而颇得老方丈陈明彬的青睐。常交他办一些事，时间久了，就把安世霖升为白云观监院之职。

陈明彬年衰多病，不大问事，安世霖就借机把白云观的重要事情都把持在手中。陈方丈羽化后，乘无人主持之际，安世霖因利乘便勾结观中都管白全一（河北新城县人），自动代理白云观的住持（道教各庙观当家的一般均称为住持，开坛传戒后才称方丈）。

白云观在全国道教中是一个十方丛林，按道教习惯的规定，白云观的住持为三年一任，任期满后，须招集十方丛林的诸山道友另行议选，即便属连任，也必须履行公推手续。至于新住持，它的产生也必须郑重推选，才属合法。被选为住持者，必须是为正派，严守清规，在道教中有信誉的全真道士。安世霖自知如果按程序来，他是没有条件当选的，因此以种种借口推延和阻滞正式住持的选举，借着和都管白全一的紧密勾结和外边交接的显要的援助，竟长期以监院代理住持，时间长了，就自称为住持了。

## 安世霖和白全一的罪行

安世霖自从勾结白全一自称住持把持白云观之后，不严守道教太上清规，奸盗淫邪，无所不为。他为了取得外援，压服道众对他的不满和反对，拜认北洋派老官僚、大汉奸江朝宗为义父，倚靠江朝宗的封建社会关系，用请客送礼拜把子等手段交结显贵，走动衙门，逐渐融入社会上的上层人物中间，并借此达到了巩固他在白云观中地位的目的。

在安世霖把持白云观的十多年中，先后盗卖天坛四块玉附近的庙产地 20 余亩、天津煤厂附近不少庙产（准数不清）、崇文门外小市口庙产房屋 30 余间（均系过去施主施与永作香火之资的）、下院玉清观庙前菜园地若干亩。白云观在北京附近各县共有庙产地 300 余顷，也被他盗卖不少。

京郊枣林树原是道教坟地，内有土坟头 3800 多个，砖坟头 1800 多个。后安世霖勾结日伪，以征用为名，把坟完全起去。所发的起坟费悉数为安世霖、白全一所私吞。

除盗卖观外庙产之外，安世霖还陆续盗卖白云观内保存了数百年的法物、文物和古玩字画。据当时观内道友统计，观内珍藏的海内孤本道经《道教藏辑要》被卖与日本人，玉刻太上老君像一座，玉皇殿内元朝金丝幡八桶被卖与美国人，甲子殿存的历代名人字画，周代古琴和其他古玩画像等也被他暗中踢腾出去了。据说这些东西多是通过琉璃厂古玩商用赝品顶替真品卖出去的。

白云观有施主多年来施舍放生的长生猪、长生羊、长生马等牲畜甚多，都被安世霖陆续盗卖了。

白云观和下院玉清观原拥有由观设立的平民学校两所，目的是为了便利贫民子弟有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已历有年。安世霖当家后，即以“节约开支”为名，停办了这两所平民学校，并把玉清观平民学校所有房屋租出谋利。出租的经租人就是他的姘妇康

太太。

安世霖的生活淫靡奢侈，他经常与达官贵人酒令征逐，生活之阔绰不逊于高官显贵。有时还把姘妇从白云观后花园暗道经夹壁墙引入其住室度夜。他有五个长期姘妇，一个是新街口的康太太，一个是西单开古玩铺的赵老板的女儿赵二姑娘，一个叫赵小叶，一个是他的表姊妹，住在右安门，还有个姘妇住在西直门。安世霖搞女人最怕让人知道，虽然特别秘密，但时间久了，还是被传出来。

安世霖的各种盗卖侵吞行为都是与都管白全一合伙进行的。白全一的生活也非常腐化，他有一个姘妇叫李三太太，不但姘奸，而且把方丈坟原有的看坟道人撤去，把房屋让与李三太太全家居住。

安世霖和白全一由于种种违犯清规的行为，自然为一般道友所不齿。他们便生法虐待、打击和加害道众。他们的罪行可谓擢发难数。多年来，白云观有十几个道人被他俩停供饮食，先后病饿致死。如老人堂双目失明的何老道被他俩逐出观外，凄饿而死；下院玉虚观道人王永震、王蓬日，因被断伙食供应而饿死。威胁吓走领衔控告他俩的道人刘永续、范明证，后又通过其法律顾问交于日本宪兵。

安世霖也自知罪恶累累，为道众所不容。怕道众对他有不利行为，就借口改善观内风水为词，在他的住屋大兴土木，暗中挖地道、做夹壁墙，以便随时可以逃遁。与此同时，安、白二人还聘用李永芳、赵唯一二人（他俩都是宝坻县人，精通法律）为常年法律顾问，专门办理安世霖的诉讼案件。安、白还跟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关系暧昧，其中一个叫王信之。这几个人都被安排在观内西客堂院，每日酒肉招待，大烟白面供应，把个清净道观弄得乌烟瘴气。

在日本占领时期，安世霖还以重金聘任日本律师引地寅治作他的法律顾问，并利用引地寅治勾结日伪政权。我们曾把引地寅

治给安世霖的顾问证书拍照下来，留作证据。

## 对安世霖的道规惩罚和法律诉讼均告失败

安、白二人的行为，激起了北京各宫观道众之极端不满和坚决反对。

1940年，白云观道人朱宗玉为首，聚集各宫道众100余人，按道教太上清规，强迫安世霖落发还俗，把他逐出观外。不料安世霖手眼通天，他利用一切关系贿赂北平市社会局，倒把朱宗玉等20多个道士强逐出白云观，复行回白云观做了住持。

众道友对社会局不讲公道、袒护安世霖的处置结果均感不满。1941年，先后由白云观道人刘永续和玉清观道人范明证为首，联络各宫道士向华北政务委员会控告安世霖，请求把他逐出白云观，另选合法住持。安世霖得悉刘、范等联名控告他的消息后，即向他义父江朝宗哭求庇护。江朝宗是华北政务委员会要员，前次安世霖被强迫落发返俗时，就是他极力周旋，社会局才武装保护安世霖回观的。这次自然还得由他出面袒护。结果，华北政务委员会把这个案件推到内务总署查办。

内务总署受了江朝宗的嘱托，同时接受了安世霖的贿赂，遂敷衍塞责，仅认为安世霖有涉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嫌疑，又把此案推到北平地方法院办理。虽然他们层层推诿，极力欲将此事化小了事，但安世霖的不法行为和狼藉声名早已是北京地区社会上人所共知的。内务总署为了摆脱他们袒护安世霖的嫌疑，在把这件公事转给北平地方法院的同时，又训令中国道教会在法院还没讯办期间，由道教会先派一位全真道士去白云观代理安世霖的住持职务。道教会会长是后门火神庙的住持田子久，他在官面上的势力敌不过安世霖，人又胆小，平素对控告安世霖采取旁观态度，因此接到内务总署叫他派人去暂行代理安世霖的职务，他真为难了。合计再三，最终选派了才由外省云游到北京的道人门

至三去代理安世霖。

门至三去接住持之日，内务总署和道教会都派人莅会，但作为地方官署的北平市政府和直接管辖寺庙宫观的社会局却没有派人来协助，因而安世霖拒绝交卸。原来，北平市府的秘书长吴承湜是江朝宗的女婿，与安世霖臭味相投，他从中作祟，致使门至三接不了住持一职，进不了白云观。

安世霖因田子久派门至三接替他的住持，便怀恨田子久，不久田子久就死了。据传说，田子久死前半月，安世霖邀田到前门外都一处小酌，当时只他两人对饮。安世霖在田酒杯中暗下慢性毒药云云。田子久死后，门至三知难而退，又到外面云游去了。住持交接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案件转到北平地方法院后，在没有传讯原被告双方的情况下，法院做了判决。在给内务总署的复函中，法院说：“查该案关于民事部分，前住持安世霖果有私擅处分白云观之不动产及法物情事，其处分行为依‘监督寺庙条例’第八条之规定，自不生效。至法律上之补救办法，似应以白云观为原告，新任住持（按指门至三）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而以安世霖及不动产或法物之买受人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安世霖与买受人就某某不动产或法物所为移转所有权之处分行为不生效力，并请求令买受人将该不动产或法物返还原告管业。关于侵占部分，如果属实，只可由新住持以白云观名义为原告而由该住持为其法言代理人于刑事案件起诉，以后言词辩论终结以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侵吞后之款项。”云云。这个荒唐无理的判决，显然是安世霖及其律师多方活动的结果。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各宫观的道友又由朝阳门内马神庙道士张教全和琉璃厂吕祖祠道士陈至忠先后领头，控告安世霖、白全一的种种罪行。被迫害过的道友还以蒙难同志会名义分向各机关、法院和第十一战区长官部、行辕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呈文控告安、白二人。南京国民党政府曾令北

平市长熊斌查办解决，熊斌也派过人查明了安、白的罪行，表示要办。但不久，又没有了下文。

## 火焚安世霖、白全一

我对保护道教的关怀和对安世霖、白全一的疾恶如仇情绪，并不减于其他道友。但是多年来对安白的各控案中，我没有签名参加过。其原因是一向认为以我们这些无钱无势的穷道人，和势大钱多的安世霖打官司，是永远也打不过他的。那时我很年轻，勇气也大，暗想只有用直接行动来解决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我从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不久，我认识了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吴同志，我虽是道士，但却一向喜欢研究无线电和电工技术，吴同志经熟人介绍让我替他修理收发报机。以后熟了，我就把想法告诉给他，他很赞成，说：“你们如果真要解决安世霖，只有用革命手段。”这加强了我对我想法的信心。有一次我就对师兄杜信灵说了我的意见。他不答可否，只嘱我不要乱说。

大约在火焚安、白的前两三个星期，我遇见了白云观的道士山西同乡马至善，我们谈起了安、白的事，他说：“打官司是打不过他的（指安世霖），不如直截了当地把他弄死。”我很有同感，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回庙后，又把此事告诉了师兄杜信灵。他仍持缄默态度。此时，北平各宫观的道友们还在不懈地和安世霖打官司。其中不少道友接受了多年来屡打屡败的教训，总想找个好的方法。琉璃厂吕祖祠李道士说他有个朋友与国民党某机关的重要人熟识。有些道友想走这条路子，要求李赶紧接头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对方答应暂时扣押安世霖，白云观立即选举新任住持以取代之，但必须要100条黄货为酬劳。大家听了都默不作声。最后，我师兄提议，如果大家真心卫道，就按教规办事。接着，他把我和马至善早已打定的主意告诉了诸道友。他们都很支持。



意见一致后，他们一同来到西便门关帝庙，当时我正在庙中，又找来马至善。大家一致主张按太上清规第一条“凡奸盗邪淫败坏太上之法经，坏列祠之宗风者，架火焚身”之规定火焚道教败类安世霖、白全一。又认为事不宜迟，晚做不如早做，即决定当夜执行。还决定大家自愿承担任务，并准备了两大瓶掺汽油的煤油。吃了晚饭之后，分批向白云观出发。我和马至善一道，出彰仪门，走到白云观东门外预先约好的地方，等聚齐进观。陈金明为我们开了观门，这时大约是夜间9点多钟，因为时间尚早，恐安、白二人未睡，大家先藏在大伙房中。大约到了夜里11点钟，我们开始动手。

我进了安世霖住屋里间寝室，他已在床上睡着，我上前一手揽着他的脖子，一手抓住他的腿，就把他提了起来。他大声问：“干什么？”我说：“你违犯太上清规，今天处置你！”他问：“咱俩有仇么？”我说：“没私仇，有公愤！”他看事情不妙，想挣脱我手，但他没我劲大，就被我提出了里间。出屋门时，他一只脚勾在门框上挣扎，陈至忠上前把他的脚拨开，就把他提出了院子到了预定的邱祖殿后大树底下。这时马至善也把白全一从东屋里拉了出来，也到了大树下。田恒一立刻从安世霖、白全一头上把煤油泼下并点着火，立时烈焰就在他俩身上焚烧起来。烧的时候，他俩还挣扎着想逃走，我们又把他俩拉了回来放在一块焚烧，不久被烧死。

这时我师兄杜信灵也把宣布安世霖、白全一罪状的榜示贴在邱祖殿后的殿墙上，榜示上宣布了安世霖、白全一的罪状10条，原文已记不起了。其大意是：“自称住持安世霖和白全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实道教之败类，经道众合议，遵照太上清规第一条之规定，执行火焚处死。”下面分列了二人的罪状。

我们按照太上清规，焚烧了安世霖、白全一之后，即集合了尚未到场的本观道士，宣布了安世霖、白全一罪状及执行太上清规以保卫道教的意义。到场者共有36名，一律签名盖指印表示

赞成。

## 自首、受审、辩论和判刑

众道友签名之后，我和马至善对大家表示，这个事情是我俩主谋的，也是我俩执行干的，主要的责任应由我俩负责。我们要投案自首。杜信灵向西便门的警察第一段打电话说明情况。警察第一段闻讯后，就派巡官和几个警察来到带走了我、马至善、杜信灵、李至慧、陈至慧、张教会六人。到了分局，我们把预备好的投案自首书文交上，分局长问了问大概经过，之后又派人把其余的道友都带来了，只有田恒一一人不知去向。

我们在郊区第四分局被拘留了两天两夜。分局问了口供，11月14日分局把我们解送给司法部街地方法院看守所。派自行车队警和侦缉人员押送，步行人广安门，经大街至菜市口转乘公共汽车至法院。因为人犯是一大队老道，沿街观者如堵。到了法院后，孙检察官开始讯问，后来把大家关在不到两间的一个房子里。

我们烧死安、白二人自首投案的事，轰动了北平，大家议论纷纷。安、白二人臭名远扬，把他俩烧死，大家引为快事。社会上多数人都同情我们，给我们送来衣食。有一位见义勇为的律师凌昌炎自动来看看守所，愿意作我们的义务辩护律师，还有外国新闻记者来访问我们和照相，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语。并预备替我们在外国宣传。

被拘押后，法院还开过几次侦察庭，详细讯问每个人在整个事件中的经过。

地方法院把案情侦察完毕之后，在12月初，正式公开开庭审判。审判长是刑一庭庭长唐秉钧，他还是逐个分别审讯。在审讯我的时候，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一再强调安、白二人的恶劣行径激起了同道的公愤，我们这是在除魔卫道，是正义的善

举。

唐秉钧又追问我参加预谋的同伴，我只承认自己是主谋。唐秉钧没有在我这儿得到一线信息。这次审讯，整整搞了一天时间。在个别审讯完毕后，凌昌炎律师当庭替我们作了精彩的辩护，他说：“本案正如欧洲为整理耶稣教而组织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一样，应该认为是宗教革命的流血事件，而不应该看作是一件普通杀人案件。宗教革命是个社会问题，是超出法律范围以外的事。被告道众供词证明，他们和安世霖、白全一都没有个人间的私仇私恨，都是基于对安、白奸盗邪淫有损道教的公愤。故能敌忾同仇，众心一志，益证明不是一件普通杀人案件。太上清规是道教数千年的传统家法，其立意为维护道教尊严与防止其道众风纪之败坏，政府既无明令禁止或取消道教的清规，自是承认该清规有存在之必要与有效。被告道众为维护道教，执行清规以惩治其教内违纪清规者，应该认为合法。且从安、白死者而论，生前犯有种种大罪恶行，屡经道众警戒和控告，不但不改，而且变本加厉，此乃这一流血事件之造因。道众站在道教立场，见法律诉讼无效，不忍其宗教之被安、白永远破坏，才激起公愤义愤、群众一心，执行太上清规之家法以解决之，按之安、白罪行与道众卫道苦心，这正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故本案应追问安、白破坏道教违犯该教清规的罪行应该不应该处置，不应该仅就现阶段道众举行宗教革命所造成的流血事件孤立地看作是一个普通杀人案件。再退一步从法律观点上讲，被告道众执行道教清规处置安、白后，从容投案，一齐自首，主动领受国法裁判，他们的这种殉道牺牲精神和尊重国法的行为，亦应邀法院对他们在法律上特别从宽论处。”

12月24日，国民党北平地方法院对我宣判。唐秉钧在宣读判决书时颠倒黑白地说：“白云观道士与同观下院关帝庙道士许信鹤、杜信灵对于该观住持安世霖、执事白全一处理观内事务及日常行为多属唇齿相依，而怀恨安世霖、白全一之心日积，继探

悉观内道士不满安世霖、白全一，遂萌杀机……”判处我、马至善、杜信灵各无期徒刑，其余人等也都有相应的处置规定。

## 不服上诉

判决后，北平地方法院先把我们送第一监狱执行，因第一监狱紧张，过了几天又把我们改送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我们不服这个无理判决，虽然身陷囹圄，但仍依照法律程序，提出上诉。凌昌炎律师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办理一切上诉手续，并将上诉状呈送河北高等法院。接着，又补呈了上诉理由书。上诉理由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举出本案所以发生的实在原因。第二部分辩驳北平地方法院原判之法律观点的多处错误。第三部分根据事实和法律条文提出原判对各个被告量刑太重。由于我们据理力争，河北高等法院只得根据我们上诉理由的分辩，作了改判，我们三人由无期徒刑改为服刑10年，其余人也都减了刑。

## 监牢中的磨难

入狱后，狱官就叫狱卒给我们每人带上八斤重的铁镣，这使我们步履维艰。

我们每间牢房的炕只能睡三个人，但在押的人实在太多，就挤了七个人。牢房后墙有一个小窗子，外挡铁栏和铁纱，前墙只有一个寸半直径的小圆洞可以向外看。炕下就是一个便桶（大小便都在这里边），虽然每天倒一次，仍然臭气难闻，尤其在夏天，更令人窒息。

监里的伙食更是粗劣已极，每天两顿饭，每顿每人只给两个小的窝头，菜是白水煮白菜帮，根本吃不饱，挨饿仿佛是犯人唯一的自由似的。有钱的犯人通过行贿可以从外边弄到好吃的食

品，这在我们是不可望及的。有时我们各庙附近的街邻们给送点吃的，但到不了我们手中，都被看守们掠夺了。

监里有各种各样的苦工，如织布、做鞋、种菜等，其中只有磨面是最苦的。磨是普通石磨，只是用犯人代替畜力，四个人推一盘磨，脚上带着重镣迈不开步，而且还要四个人的步调一致，走不好就摔倒了，磨也停了，走慢磨也会不转，一推就是一天，还要限出多少面。脚脖子包不好，就要被镣磨破。

这种非人的生活使我们的健康情况日渐变坏。小病自然没人管，病重时才准到监狱医务所去看。但监狱医务所只是徒具形式，根本治不了病。如果犯人的病一到危险的时候，监狱看守们便把这个重病人移到隔离单间去，让他等死。我们一块共是 19 个人，2 年之内就死了 8 个，剩下的每个人也都处在死亡的边缘。

在北平解放之前，监狱当局叫我们找保，说刑期满者可以释放，当时袁明义等 2 人刑已满期，刑期未滿者可以保外。我们都设法找了保，但总不见释放我们，因为我们无钱行贿。

直到解放了北平，我们才真正地获得自由。

（陈子坚整理，1965 年）

# 我所知道的虚云和尚

觉 澄\*

虚云和尚（下文简称虚云）与我聚面有四次，相处时间不算短，故略知道他的生平。他生活在佛教界有一百多年，对禅宗造诣很深，重视百丈怀海禅师。一生喜学《百丈清规》（这书有10卷，是组织僧团的制度）。他生活在旧中国，善于结交国民党一班资本官僚，而对共产党干部的思想感情则很淡薄。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民国19年（1930年）冬，虚云从云南昆明来上海，住在英租界资本家竺兰芳公馆。竺氏夫妇都皈依虚云，对虚云特别虔敬。我慕虚云深入禅宗，偕深悟法师（湖南人，道偕老法师的法子）往访虚云。虚云说他这次是应福州鼓山涌泉寺两序和林森、杨树庄、方声涛等官僚之请，辞掉昆明云楼的住持，往鼓山当住持的。并请我和深悟同去鼓山，做个同参道友。说罢，即向我二人顶礼，因此，我俩就离别了上海，跟虚云飘舟达福州。

## 在鼓山时期

虚云初到鼓山办佛学院和整理寺规及经板。

这年冬，虚云到了鼓山后，中国海军部长兼福建省长杨树庄的母亲参拜虚云为师，厅长陈培昆的母亲也皈依虚云为弟子。

---

\* 作者时任福州涌泉寺佛学院教师。

杨、陈等都是虚云的大护法，常来鼓山帮忙。1931年春，虚云即着手创办鼓山涌泉寺佛学院，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为院长，我、深悟和另外三人（一是湖南人，二是云南人）为佛学院教师。深悟任律学，我任经论，其他三人，一任文学，一任算学，一任监学。当时教学方法兼有新旧式。学员们每日均参加早晚课诵，跟大众斋堂集体吃饭，每日早、午、晚三支禅香。上午下午人课堂听讲课。学员们的活动均有教师领导。当时学生多数是寺内青年僧和小沙弥，有少数从福州各寺来的，约有三十多人，都是男性。涌泉寺佛学院办了八个多月，云南来的青年教师因事回昆明去了。过了半个月，湖南来的文学教师也回湖南去了。再过一个月，深悟法师又因病回宁波。这几个教师，多数是因待遇不够维持他的生活而离开的。当时佛学院仅我一人撑持。到了11月中旬，南京狮子岭派来一个代表善学师，专程促我急速返岭调解常住急事。催促20天，虚云仍不肯放我走。我无可奈何，只好写下一首诗，置在房内书案上，和善学不动声色下了山，直奔马尾候洋船。不多时，虚云率同当家、知客追至马尾，他借居士家请斋饯送，并嘱早日归来。我返狮岭后，因众师挽留，只好致书虚云，请其另聘高贤，没有再回去。因此，虚云另聘上海沉香阁应慈老法师讲华严悬谈，五个月后，便返回上海去了。继请慈舟法师续办佛学院。慈老办了几年，颇有成绩。

涌泉寺经常住有六七百僧众，除了六十多个耕田僧和木匠、石匠、泥水、裁缝、杂工外，其余都是清修僧，老的八九十岁，少的十五六岁，生活多种多样：首座一百多位，知客八九十位，当家十多位，都是用钱向常住买的，各有私人寮房，他们的普佛钱、斋衬钱，比普通人多几倍。衣食住自由，生活享受，不受常住规制，不做早晚课诵，不到斋堂吃饭，不进禅堂坐香，出入不向客堂请假，欢喜酬应经忏佛事。力田僧劳动生产，按劳力取工资，领饭在田寮吃。住茅篷僧，或住白云洞，或凤池或其他茅篷。每月来库房取米油盐等。住禅堂比丘，经常大殿早晚课诵、

禅堂坐香、斋堂过堂。经楼僧和各寮香灯师，或过斋堂吃饭，或取领回寮。各种工人取饭在工寮。官客或普通客，送饭在官客厅或普通客寮。外来云水僧，去斋堂集体吃饭。寺内生活方式的复杂，在各方丛林是很少见的，是很不合规格的。虚云对此很不乐意，他先把用钱买的首座、当家、知客，一概取消，仅留一个80多岁的老首座，加留五个在客堂办公的知客及两个当家，其他制衣也改了不少。因此，两序大众颇有不满虚云者，但口里不敢说。

虚云见许多经板堆积经坊败架上，灰尘充满，深为叹惜。其中最宝贵的是北宋苏东坡在金山写的楞伽经拓本（真迹保存金山江天寺、鼓山得其拓本），其他明代各经繁本，重复不少。虚云特命张寿波（法名观本，广东中山人，光绪十七年举人，喜欢革命维新。留学日本，为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多年，舍家产为澳门功德林）整理经板，三年告竣，著有《鼓山经藏目录记》，约有一千多部经板，仗之保全下来。鼓山晚代祖师传记，中国藏经中少有记载，而日本大正续藏及有记录，观本一一增补起来，斯乃鼓山保存古迹文物之一盛事。观本著述丰富，他有《香光阁集》稿本20卷，存在中山大学洗玉清处未刊。虚云在鼓山时，与李济深将军常有往来。李当时已率部在闽主张抗日反蒋。蒋介石常派飞机到闽轰炸，虚云常导李到岩洞中避空袭，李也常至其方丈内晤谈。

## 在云南时期

虚云在和我相处期间，曾对我说起他在云南鸡足山的情况。他离开终南山，参礼四川峨眉山普贤道场之后，经康边入西藏，原意要参学西藏喇嘛。因西藏喇嘛僧不严戒律，才折回云南鸡足山，参拜迦叶道场。初到鸡足山时，山上没有十方丛林，都是本省子孙寺院，外省僧来，不得驻足，因此闷闷下山，走了900里



路到昆明的禅友处挂搭，蜚居禅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禅友介绍，大理提督张松林请虚云在三塔寺讲法华经。经毕，受戒者数千人。提督欲留虚云住持城内一寺，可以经常说法利人。虚云说：“我早有心愿在鸡足山结诚，以山上子孙不话，未能实现，请提督等代觅一片地，让我开单接待各省僧众，以便逐渐‘改化’本地子孙僧及重兴迦叶尊者清静道场。”提督通知宾川县知事觅得钵孟峰迎祥寺，唯其破败荒凉。厥后各省僧侣来山朝拜迦叶者，俱来迎祥寺栖息，共同担石填土，伐木种菜。但僧众日增，粥饭困难，虚云因此曾亲往腾冲募化。城中官绅士应皈依者千余人。募款回山，改建迎祥寺，立僧规，坐禅讲经。是年来山求戒者七百余人。从此，迎祥寺逐渐扩大，鸡足山子孙僧也渐改化。

后来，虚云又去鸡足山扩建祝圣寺，年年传戒。大理府和宾川县以及各地官僚皈依信仰者更多。虚云因此也与本地子孙僧的关系更恶化，曾被子孙僧买通尼姑出头，控诉虚云和尼姑私通多次，缠讼很久。官司打到末后一次庭讯，因某师长出庭为虚云辩护，才把这件事压下去。

### （一）虚云仗唐继尧官势，毁坟兴云楼

1920年春，云南省总督唐继尧特派专使诣鸡足山祝圣寺，邀请虚云重兴昆明西山云楼寺。虚云抵昆明时，唐特设斋筵为虚云洗尘，王九龄、张松仙等资本家和官僚陪席。席间，虚云以云楼寺前建满坟墓（约有一千家），又有西洋人垂涎云楼好风景，已订契约买云楼全寺，改建西人俱乐部（这个契约，后由唐督取消了），那些坟地过去原是云楼寺基，因寺院荒废，久已成为丛葬之所，目前云楼面积仅够一个小寺院，要想建设大丛林，必须先把寺前坟墓尽量消灭成平地，才好施设工程。唐答：这样做，牵涉面很广，俟考虑后再答复。并亲率省城官绅士庶多人，送虚云先行进入云楼寺住持。

虚云初到云楼，周围荒芜破败，他召集数十劳动僧和青年工

人在一起，种植的种植，建筑的建筑。虚云亲身领队，购材料，烧砖瓦，垦土担石，填地伐木。又和数个侍者日日手握日记簿，在坟墓处登记死者姓名，写了几天。另在寺旁建一座普同塔陀，准备把死者骨灰保存塔内，又把死者姓名写在牌位上。这些工作完竣后，竟不待唐继尧答应，便径自动手。发掘期间，虚云挖掘坟墓，每日早起，亲自领队（比丘僧和工友）数十人，人各手执锄头，齐到坟墓处，掘出死尸，即刻火化了，骨灰贮在瓦罐内，罐外列死者姓名，收藏于普同塔内。仅几天工夫，就把一千左右坟墓掘完了。掘完了坟墓之后，约经十多天，有些墓主子孙知道了，齐来云楼，向虚云责问。虚云自恃是唐继尧请来的，叫坟主们自去问总督。坟主无奈，只好大骂而去。

之后，墓主的子孙竟结队成群向督府省府控诉虚云大逆不道，请速据法惩办。连虚云的皈依弟子也参加到控诉队伍中。而督府省府均置不理。不久以后，云楼便成为云南全省最宏壮的首刹。事后，虚云自得地说，当时如果不先行动手，等候唐督想一想再说，则兴云楼就会付诸空谈。因唐督必询部下，部下对掘人山坟，又必反对（因不少山坟是属于地方士绅的），在此情况下，唐势必缓办。虚云形知掘坟焚尸不合国法，竟敢不俟一省长吏同意而行，其骄恃蛮横，可以想见。

虚云兴云楼寺，掘出古碑一块，载有云楼田产极多，遂将此碑送给唐督检阅。唐出示由云楼照原有低价回赎，群众更加怨愤。但由于有唐的撑腰，也奈何虚云不得。

## （二）虚云为宾川县各事解难

宣统末年，辛亥革命初兴时期，宾川县群众、会党起而反抗者特别多，县知事张某，湖南长沙人，喜功好杀，杀了群众甚多，地方士绅和无辜老百姓也有被杀者，甚至鸡足山本地子孙也被杀了数十个。群众恨入骨髓，参加反抗的人就更蜂起泉涌，曾围攻县署，要活捉张某斩首示众，以雪仇恨。张某结集县内武力，坚守抵抗，因无电话电报，外援断绝，自知必定死于民众手

中。虚云这时在鸡足山听到消息，惊恐知县被杀，即刻下山，告诉民众，要见知县。民众不理虚云，大喊进攻县署。俄而民众对虚云说：“你们出家人，也被张某杀了几十个，他也是你们的仇敌，请你入县署，将他诱出来，我们把他杀了。”虚云找到一个民众领袖，恐吓他说：“杀张某不难，但政府对围城杀官，也是罪在不赦。我们做事要有三思，万一官兵到来，他要根究起来，你我是吃不消的。”民众不了解政府的政策，不能揭穿虚云对革命政权的诬蔑，误信为真。虚云接着又诳他们：“大理距此不远，仅二日程，前布政使王某衔命至彼，你们往诉张某罪恶，张必死于国法，你们也无罪。”领袖和民众遂陷入虚云圈套。虚云人见张知事，张佩枪将出迎，作垂死反扑，并托虚云于其死后代将遗骸葬鸡足山。虚云安慰张某，不必出此言，并谓此间有绅士张静轩者，深得人心，请来一谈，事可解决。静轩入署见张后，诣大理晤王某，带兵来解了张某之围。张离宾川后，云南已独立，蔡锷任滇省都督，张子为外交司长，是蔡锷同学。事后，张某致书向虚云道谢曰：“公非独救我命，且造福宾川多矣。不然，杀父之仇，吾子能不报乎。”虚云对封建皇朝官吏的维护，就是这样不遗余力。

### （三）虚云被迫赴京控诉

蔡锷任云南都督时，虚云正在云南当全省佛教会长。当时云南省长认为虚云是有钱和尚，请虚云到省府谈话，要虚云发动全省僧尼捐献，帮助解决经济困难。虚云则推说僧尼既不力田，又不经营工商，全仗化缘吃饭，拒绝了省长的要求。省长定要虚云捐献，虚云站起身来，拍案对省长大声说：“我一定不能捐。”说罢，走出省府大门。次日，虚云拜访蔡锷都督，诉省长无理强迫。蔡锷对虚云说：“昨晚省长来我处，说你拍案骂他，要想和你较量。我告诉他，虚云是个疯和尚，不必理他，说过就罢了。他听到我说的话，不作声，但心中是不高兴的，以后和他客气些才好呢！”

后来事件愈搞愈大，以省长掌握全省政权，暗中唆使各地警察局和派出所，到处扰乱寺庵僧尼，以致僧尼昼夜不宁，或被污辱，或迫使捐款，或故意罚金，或无事生事。僧尼叫苦不堪，纷往佛教会投诉。虚云指示各寺庵僧尼，大胆和他们对抗，并表示万一发生意外事件，他自当挺身而出。有一天，几个警察到一尼庵，故意逼索捣乱，年小尼姑均吓怕，独有一个老尼不怕，彼此对骂起来，警察竟把老尼拘捕，庵内小尼告急。虚云即刻把警察非法拘捕老尼事件在昆明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中大加宣传。次日，宗教界和少数民族调查警察非法拘捕老尼，事属确实，报纸纷纷揭露省长纵容警察扰乱人民的罪恶。省长自知理亏，即囑所属快放老尼回庵。但老尼不肯回庵，且对看守者说：“老尼无面目回去见人，情愿死在狱中。”看守者再三慰劝，老尼又说：“省长某要老尼回去，除非把他坐的轿子披起大红缎，挂起大红花，叫四个轿夫恭恭敬敬抬送，否则，老尼死也不回庵。”省长慑于舆论指责，不得已把自己坐的轿子披红缎挂红球送老尼回庵。

自此以后，省长对虚云益加恼怒，到处加强破坏，僧尼天天告急诉苦，搞得虚云没法对付。不得已，虚云到上海全国佛教总会求援。全国佛教总会会长认为滇省政权操在省长手里，佛教会无力与之对抗。虚云莫奈何，跑到北京法源寺拜访道阶老法师，请求帮助。道阶与当时的内阁总理熊希龄极好，遂带了虚云去拜谒熊希龄。虚云向熊哭诉求救。熊只是劝慰虚云安心回滇，除口头允予设法调解外，没有确实表示。虚云回到云南时，原省长已调任贵州，新省长已接任，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 （四）虚云在鸡足山与李根源的关系

辛亥革命初期，李根源在云南，深恶滇省僧尼不守清规，认为对国家有害无益。有见僧尼不是呵骂便是杀害，故一班僧尼听到李将军来，莫不魂惊魄散。据说从昆明到鸡足山，一路被其残杀者不在少数。且反映虚云为怪物。李说虚云一介野衲穷僧，竟在云南骗得民心，其中必有怪事，乃飭令捕杀之。一日，李率队

伍来鸡足山，毁金顶铜像，全山僧众逃者甚多。祝圣寺僧众百余人，都欲逃避，并劝虚云一齐出奔。虚云不从，单身直诣军营请见。守者认识虚云，恐被杀戮，拒不为通，且劝速逃，否则必死。虚云不听，强入大殿前，见李将军雄踞佛殿正中，威势吓人。傍有一位官员陪坐，虚云识得是前四川布政司赵藩，赵素识虚云，起而劳之。李根源厉声问虚云“佛教有什么用？”虚说：“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为善去恶为本旨，佛教教人治心，心正则万物宁。”李又问：“佛殿当中塑的像，虚耗钱财，有什么用？”虚云答：“这是以相表法，令人起敬畏之心，改恶从善。如中外各种铜像，令人起敬信之忱，功政不可思议。”并说：“在海不弃鱼虾，佛性无所不容，僧秉佛化，非全废物。”大概是虚云这番用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打动了李根源的心，李和虚云竟作起长谈来，面色亦逐渐欢喜。谈话以后，李即把队伍移驻祝圣寺，且偕虚云同堂食饭，僧众、队伍一齐素食。以后，李对僧尼即不再呵斥欺凌，过去伤捕虚云之念，也变为归敬虚云之心。李在鸡足山前后不过数日，先后判若两人，下山前还召集全山僧众，公请虚云做鸡足山总住持，然后率部离去。

#### （五）虚云和解滇、藏关系

辛亥革命之后，西藏王公活佛，恃其处境险远，不肯归顺。中央命滇省出兵二师声讨西藏，以殷叔桓为总司令，总部驻大理府，前锋已达宾川县（鸡足山属宾川县境）。虚云听到消息，便下山拜访前锋队长，偕队长到大理见总司令，献议说，西藏人民向来信奉佛法，何不遣一明佛理者往说之，彼若归顺，胜于劳师远征。殷以为然，请虚云为宣慰法师。虚云表示，以汉人前往宣慰，恐无成绩，丽川有喇嘛东保，德高望重，藏人敬信，曾授四宝法王之位，建议请东保前去宣慰。殷即派虚云和陪员拜谒东保。保始以衰老辞。虚云对保说：“赵尔丰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寒心，公宁惜三寸舌，而牺牲数十万人生命财产？”保起立谢道：“我去我去。”保率同另一个老僧陪行人藏，果要约而还。因此，西藏归顺，滇省罢兵。在虚云的

一生活中，这件事是对国家最有裨益的事。

## 在广东南华寺时期

### (一) 李汉魂请虚云兴南华

1918年，李根源督办韶州军务时，略修南华大佛殿，致书邀请虚云来主持南华道场，虚云函辞。1927年，虚云和王九龄路过香港，粤省主席陈铭枢派专使迎抵德垣，请主持南华，虚云以已应福建杨树庄请主鼓山，力却之。1933年李汉魂主任粤省西北区绥靖委员，初抵穗时，拜访粤之名流士绅陈樾等（陈系李之老师），李询行政方针，陈逊谢曰，军事行政，各处或同或异惟西北区境，有南华寺，极宜兴复耳。李然之。即席发起列名100人，每人捐助100元，以为嚆矣。当时李在酒筵发起复兴南华，筹成11400元，作为重兴南华基金。

次年，李汉魂商诸港粤官僚士绅陈樾等，以南华是僧家丛林，佛教禅宗发源地，应请国内道德高僧主持，才有重兴期望。都说福建鼓山虚云，最好请来主持祖庭。他兴的丛林不止一处，咸指他是个高僧。李汉魂欣然命笔写成公函，派吴种石秘书等数人持书达鼓山。吴秘书到了鼓山客堂，知客叩询吴等来意，吴告以港粤同人邀请虚云主持南华之意。知客对吴说话冷如寒冰，绝无丝毫兴趣。吴睹这种态度，心殊郁闷，接着说，我要见虚云，知客把李之公函携上丈室给虚云看，虚云抱病未愈，把来书打开一看，原是绥靖公署公函，要求虚云赴韶关重兴南华六祖道场。阅毕，觉得心胸愉快，病态顿消，即命知客召集众师数百人，集中法堂，撞钟击鼓，齐赴客堂欢迎贵宾。

这件事发生之前数月，粤僧敬禅等曾要求虚云重兴南华，虚云置之不理。这会儿见吴持李汉魂公函来，虚云却欣然从命，从接信之日即不上殿，不过堂，不说法，把鼓山内外一切事悉交监院和两序首领办理。三天后，便兴冲冲地随吴一道来广东。

虚云从福州鼓山抵广州，驻六榕寺，各界官僚上绅和男女居士参拜者，异常拥护。次日，广州各界请虚云说法于民众教育馆大礼堂，听法者人山人海。第三日，吴秘书和香翰屏等官僚居士，乘专车陪虚云到马坝南华寺，驻锡南华精舍（时在1934年八月初三日，六祖诞辰）。这座精舍是李汉魂捐款新建的。李汉魂在南华寺周围荒地种植许多南华李，李汉魂别号李南华，他所以那样致力于重兴南华寺，实在是想借“南华”二字互相抬衬，提高自己的声望。吴秘书和诸官僚等引导虚云巡视寺境（这时李汉魂因病，不能奉陪），虚云以后便对他们提出条件说：“你们要我主持南华，至少要住一两百人。目前僧众太少，住的房屋也不够。假使要我来南华，至少需要20万元。经济我是不管的，我仅主持佛法。各位若肯答应我的话，我就来南华，若不肯答应我的话，我就不来南华。”吴秘书等对虚云提出的条件，初时都不敢开口，深恐20万元不易筹措，嗣恐虚云不肯来，勉强答应了，虚云才肯决心来主持南华道场。虚云在南华住了十多天，收了归戒弟子约有一二千人。

## （二）回鼓山重建回龙阁

虚云离开广州时，暂收从鼓山来报告失火的比丘明观等数人留守南华驻省办事处，代理虚云接洽各种事宜。虚云到鼓山后，首领和两序众师向他报告回龙阁火灾情况，恳求虚云不要离开鼓山，认为鼓山是虚云出家披剃祖庭，不可抛弃。且重建回龙阁事体很大，非10万巨款不能完成，需要虚云来主办。虚云表示，对于回龙阁重建已有计划，他完全负责到底。但在回龙阁工程完竣之后，他仍要离开鼓山到南华视事，并要求鼓山涌泉寺的首领和两序众师早日选出新住持，接管涌泉常住。

虚云回鼓山后，专心搞回龙阁，招工购料，夜以继日，事必躬亲，工不敢怠。经济不敷，则致书华侨和国内官僚富商，不出捐册，一书为凭。不到一年，便完成了回龙阁新厦的建筑工程。阁成之后，即把鼓山内外一切事务交代清楚，率侍者数人离开鼓

山，经香港达广州。

### （三）虚云返广州和在南华讲经侍戒

1935年孟秋，虚云从鼓山回广州，驻足穗市佛教居士林（即是南华驻省办事处），初暂设文德南路，因地点小，不够容纳人众。此处是在市区西关清平路，原是丝业工会，也是借用的，地点大，能容数百人。这时各界市民见虚云回粤，请求他在居士林讲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以语音不同，请观本法师翻译。我这时也在居士林旁听。当时听众异常拥护，求受三归五戒者约有数千人。经完竣后，士绅和居士等用专车送虚云赴南华视事。

虚云回南华后，筹备传授千佛大戒，为期49日。这个千佛大戒，广东省多年没有做过，规模严肃，必须具足三师（得戒师、羯摩师、教授师）七证（七位尊证阿阇黎）和八位引礼师（戒弟子人数多时，也可增加引礼人数）及其他数十位引赞、辅助等僧众，才得成就侍戒僧团（当时我在羯摩观本为教授）。受戒弟子，分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优婆塞、优婆姨，是各七众弟子。男女分开界限，住宿也要隔开，男有男领导管理，女有女领导管理。

传授戒法，必须分作三坛。第一坛，传授沙弥戒；第二坛，传授比丘戒；第三坛，传授菩萨戒。三个坛内传授仪式各有不同，戒弟子要昼夜勤恳学习，尊敬律制。到了戒期完毕时，得戒和尚给每个新戒弟子戒牒一张，戒牒写明新戒姓名及法名和戒师（三师七证）法名，载明年月日，在某处稟委戒法。戒弟子持此戒牒跑到各省丛林，均可食宿，认为是正式僧尼。这和唐宋时代的度牒相似。南华戒期内，还做水陆大斋七日，以期阴阳两利。讲经49日，每天下午约二小时，令诸戒弟子明辨律仪，遵守佛制以期自他两利。这次受戒弟子数百人，广州、香港、澳门等处达官贵人参观者，比比皆然也。

### （四）兴南华道场

虚云生平喜欢建筑工程，到南华理事之后，昼夜计划建筑和



雕塑，虽在开戒忙碌期中，还是不断地督工兴建。他在南华做了十多年的住持，建筑了大小殿堂、房舍等三百间左右，可称广东全省首屈一指的大丛林。他还装塑了佛菩萨形象七百多尊，或泥塑、或木刻、或五金、或漆纱。南华同住的僧众，经常一两百人（内有尼众二三十人）。虚云每年开千佛大戒一次，每次约有戒弟子数十人或数百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韶关时间，仍开大戒一次。他说，有了僧尼才可传续佛之慧命。人说虚云生平有正式戒弟子一万多人，三皈五戒等弟子约有十万多人，洵非虚语。

虚云在南华兴建梵刹，扩充地界，依仗官势夺回贫农田地，收回“无尽庵”房舍，赶走二十多户贫农，使无家可归，这是很可痛心的。据说他的剃徒智空当家，荷枪向佃房收租，殊非僧家品德。足见他兴的梵刹数百间，塑的佛像数百尊，用了十多年工程，剥削了许多金钱，费尽心血，来帮助当日官僚资本家，满足他们的私欲。

#### （五）在重庆做祈祷法会

1942年冬季，蒋介石派专机飞往南华，迎请虚云赴重庆主持祈祷世界息灾和平法会，至次年元月飞回南华。这次法会非常隆重，蒋介石斋筵款洽虚云，林森等大官僚陪座。其他达官贵人、买办资本家，和各界人上来受三皈五戒者五千多人，可谓盛极一时。唯林森曾在福州鼓山和虚云情感独厚，虚云在重庆出人行动，林森经常奉陪。这次息灾法会，凡在重庆官员都来捧场。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却抽调僧侣为兵。虚云即去为他们装门面，又致书国民党当局反对征调僧侣入伍。

### 在乳源云门时期

#### （一）兴建云门寺

1943年冬，虚云以南华工程告竣，辞了南华住持职，交法子复仁继任。虚云以乳源县云门寺是五代文偃禅师（佛教史称为

禅宗中五家宗派的云门宗)道场，经久失修，风雨飘零，摧残不堪，文偃禅师肉身荒烟败墟中，视之深可叹息，便应李济深、李汉魂和当地士绅的迎请去云门寺当住持。当时该寺仅有明空一僧，苦守寒岩。虚云初到云门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处来了僧众数十人，斩荆棘，伐木担土，购买材料，招工建筑。先后建设僧房、大厨房、大斋堂、大山门、天王殿、大雄殿、禅堂、客堂、祖师殿、观音堂、藏经楼、说戒堂、功德堂、法堂、钟楼、鼓楼、伽蓝殿、库房、仓房、普同塔等共有一百多间。塑佛菩萨像八十多尊，请来《大藏经》各一部。虚云在南华和云门近二十年兴建的工程，财力上除得到李汉魂大力帮助外，他还经常赴广州、香港、以及国内各处募款，并致书南洋华侨募化，故香港、广州、澳门及南洋华侨皈依虚云的官僚富商不在少数。

### (二) 在广州六榕寺大兴水陆道场

1946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粤省官绅士庶联名公请虚云莅穗主持水陆法会，坛设六榕寺，由广东省佛教会掌管，布置备极庄严，悬灯结彩，颇称华美。每日早、中、晚三时，大众齐集功德坛，回向追荐抗日战争牺牲将士和罹难同胞、各姓亡灵。水陆法会七日，每日从早到晚，市民和各界随喜瞻礼者，多者八九千人，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皈依虚云为师者也有一两万人。胡毅生画绯桃图，纪之以诗，遍征官僚、文士、富商题咏叹美奇异，编成《绯桃应瑞记》。

### (三) 在香港等处主持息灾法会

1947年8月间，香港工商佛教界举办万善缘会及和平祈祷息灾法会。这是东华医院主办的。他们虔诚邀请虚云主持法会。虚云率领南华寺58位僧祇先驻锡崇兰中学，随后移驻南华体育场。这里规模雄伟，布置华丽，异常美观。虚云主法中央大佛殿之内坛。除与虚云同来僧侣外，还有潮州经师24人，本港各寺参加的僧伽也有数十人。内坛分设三通间，左右偏间，悬挂醒世壁画，正间陈列佛像、神像等。坛外高挂黄布长幡，上写

“修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道场”几个大字。这次合集功德，专为超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华民烈魄、胥骨在东华义庄者、海陆空失事遇难者、英德侨民罹难者、历年东华医院病死者，以及附荐登记各姓先灵等。

当时参加附荐法会者异常拥挤，每日约有十万人左右，盛况空前。开始日，华民政务司临场剪彩，圆满日，港督偕辅政司、华民司等官员莅场酬酢。港督盛赞虚云年老健康，实属万善缘法会之荣幸。据说，虚云佛事虽忙，以港民渴望礼敬者络绎不绝，便每日定早晚两时巡行道场一匝，以便接见港之善男信女。所经行两旁之善信，皆肃立虔恭，目注虚云而不瞬，虚云口说三皈依摄受之。凡诸善信欲入门内瞻礼虚云者，每人预缴入场券二元，排队站在道场四周路之两旁，等到一瞻虚云风采后，出门而去。万善缘会圆满之后，虚云和众师转赴东莲觉苑。

继之，跑马地东莲觉苑法莲觉和佛教联会，恳请虚云在东莲觉苑主持祈祷世界和平大悲息灾法会三永日，信仰参加法会者也十分拥护。这次和万善缘会有所不同，一切广结善缘，随人乐助即皈依者也复如是。所有收款项，悉归云门寺用于修建。做了这个法会后，又应邀到澳门三日，中山石岐三日。两处各做同样法会，皈依礼敬虚云者也极一时盛况。还有湖南长沙也有预约。以上港澳各地邀请虚云主持息灾法会之隆重，耗费资财之巨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 在江西云居山时期

1957年夏；我路绕南昌，便道访虚云于江西云居山真如茅篷（虚云居的茅草屋），三宿而行。看见新建大佛殿、天王殿、大禅堂、库房大楼、大斋堂、大厨房、客堂、仓房、米房、磨房、牛房、客房、伽蓝殿、祖堂、钟楼、鼓楼、砖瓦窑、石灰窑、柴房、大小厕所等，约有一百多间，宛然高山上现出一座大

从林，与此前荒凉境界，大不相同。这里住有一百多僧众，成立“真如农场”，开辟稻田菜园数百亩，养活一两百衲僧，僧众都是早晚修持，白天劳动生产，俨然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僧众中，有种田和种菜的，也有做木工和泥水的，还有打石砍树的，也有做建筑、铁匠的。此外，还有烧砖瓦和石灰的，及编竹器和做木桶的等等。他们用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养活自己，节约了许多开支。

虚云于1952年5月劳动节前夕，离别了乳源云门寺。道经韶关大鉴寺，参加曲江民众劳动节大巡行，群众见者皆大欢喜。次日，虚云和侍者数人驱车北上，拜访首都首长，我等极力劝他常驻北京，多见多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言论和首都新鲜空气。虚云到京后，曾会晤李济深副委员长等多人，并呈请中央政府，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李副委员长等乐为协助。是年冬，以北京气候比南方寒冷，南移上海，驻锡玉佛寺。应佛教同人和各界人士邀请，在上海玉佛寺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法会，为期49日。法会非常隆重，参拜皈依者约有一两万人。法会完成后，参观苏州虎丘山，姑苏市民皈依者四千多人。虚云离开姑苏后，仍回首都，于1953年农历四月八日在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虚云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因他年老），圆瑛为会长。

佛协会成立后，佛教界请示中央，公请虚云为北京西山碧云寺住持，俾安心栖养。但虚云不肯接受，说北京寒冷，煤烟太重，因住惯山林，不惯城市楼息，一定要离开首都，回岭南南华和云门。他先经武汉三佛寺，寺主大鑫和尚和武汉市陈铭枢部长等再三劝他不要重入岭南，仍回北京碧云寺为最合宜，他仍不听。当时李济深副委员长特派一位秘书陪他到上海、苏州、武汉等处游，劝他仍回北京安居；我在1952—1953年先后四次致书劝他安心驻足北京，但他固执己见，还是走上了云居山顶，以目视云汉为乐。

虚云和尚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在宗教

界有较高声誉。国家每月给他发数百元生活费，对他的照顾十分周到。

(1965年)

# 能海法师集传

仁 祥\*

## 师父的家庭概况

上师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1886年腊月二十二日降生于四川绵竹县汉旺场。父名常一，母张氏，生姊弟二人。父先务农，后移居县城业摊贩，维持生活。不数年，父先亡，母亦相继去世，姊弟相依为命。姊长婚嫁，学光随姊到戚农家，得翁许就近入塾。师十四五岁时，见姊家生活困难，于是自谋生活，经人介绍，入成都市东大街恒升通匹头业商号做童工学徒。值号东清馆教子，东见师聪慧，亲如己子，乘隙教诸子书及史学，从此师始觉读书之可贵，学习勤奋，如饥似渴。于此同时师又阅读书报刊物，思想大有提高。当时清政失绪，外患辱国，民生凋敝，有志之士纷纷投入革命军。师年届弱冠，志气奋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决志从戎，遂考入陆军速成班。两年毕业，成绩优异，被派任张蓬山镇守使部任侦探大队长。将近一年，提任营长。师以勤奋著称，旋同乔义夫调赴云南，开办讲武堂，任教官。学生中有后来任总司令的朱德、川中将领杨森等。讲武堂结束后，师返成都，初任营长，继升团长兼任川北清乡司令。未数月，盗匪悉平，民得安宁。正值袁世凯方窃国柄，欲独揽军权，凡属军务职员，非已素旧，辄调入将军府而羁縻之。师以故而入府，日无所事，仅按时

---

\* 作者系能海法师之弟子。

领食饷而已。师以澄清之志弗遂，日涉佛经以自娱，旋思改学园艺，从事实业以富民。1915年，师东渡日本考查政教实业时，注意到日本佛教之普遍流行，对国之深刻影响。尹年后，师返北京，恰逢张克诚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哲学和佛经，便不辞道远前往听讲。师曾自述，听张先生讲佛经，相距20余里，每日往返二次。因闻法心切，便不觉道远也。此间，师细读深研了张先生著的《佛教的成唯识论》、《法相宗弥勒学提要》等书，渐渐萌发了出家的念头。于是，师返成都先商于姊，姊认为，龚家必须有子继承后才可行。于是师先娶庄氏，不久逝世，仅留一女，不能承祧，续弦张氏，无出。续娶其姊，因尚无出，勉从姊意，只好从缓出家，然仍暗中积极筹划。师先说服两妇皈依三宝，长名能新，次名能服。姊不久也皈依佛。接着，师出售成都附近郊田四余亩，庄房一院，共得3800元，除酌留家人生活费外，悉数作少城公园内创建佛经流通处之用。自置家具、花木、盆景之类，亦悉送流通处。师常请著名法师和居士在此说法讲经。有时自己也讲经。当时保留泡家巷全院，由姊及两妇分住。自己住文殊院，以便听讲。师常告家人，每闻钟声，辄动出家之念。待妇孕，出家之念愈炽。及生子树成，仅40天后即相约听经结识之程芝轩，同拜正在成都讲经之佛源老法师（涪陵天宝寺住持）为师。程得赐法名能观，师名能海。程系日本留学生，曾任成都女师、华西大学教务长、四川教育厅督学。龚、程均为知名人士，闻所相契，联袂出家，时众异之。（时当1924年，师年39岁）此时师将女儿送友人陈金山，改住宅为尼庵。不久能新别寻庙宇，去广汉县。能服偕树成过活。姊和能服不数年去世。树成年22岁时，曾至近慈寺暂住，不堪庙规严肃，遁去不知所踪。其女和能新犹存。

### 上师出家后之主要大事年表

1924年4月8日，师至新都宝光寺求戒，佛源法师任羯磨。

同受戒的有永光、果瑶、果玉、果蓉、傅品师等。

是年秋，师约同受戒六人拟东渡日本求法。道经重庆，见报载：去日本学密之大勇法师已返国。即赴西藏求法。至打箭炉，从降巴格格学，持翻译问答。

1928年7月27日，师偕永严、永轮、永光等从打箭炉出发进藏，阻于兵旅，有劝侨装苦力持长予绕道前进者，一试无效。乃沿丛林小道昼伏夜行，但必经德格，驻有藏兵，心恒悬悬，遇一壮夫，愿为导路，绕至昌都，行经多日，皆人迹不至处，壮夫偕永光购粮竟负其行囊逸去。闻昌都尚遥，只好耐心边问边走。跋涉日久，肤色都变，藏人不复叫甲米（汉人）目之，故得畅行无阻，直至拉萨。时已1929年夏矣。

1929—1934年进藏以后，礼康萨仁波切为根本上师，学文殊法，依止上师，随行不离，并为师远道背水，事师恭谨逾恒，连续七年全部学成，同时博涉其他宗派的主要著作，搜集藏文、蒙文资料，准备带回内地参用。

1935年，师取道印度回内地。<sup>①</sup>

1936—1937年师一至上海，便在班禅额尔德尼办事处讲经，四众弟子云集，每讲听众恒数千人。师多处设坛，广作佛事，盛况极为稀有。通常师先讲经，显、密都说，深入浅出，听众莫不欢喜。接着，师赴五台山译经。此时译出了《五字真言》、《菩提道次第》、《定道资粮》、《比丘戒集颂》、《大威德十三尊仪轨》、《现证庄严论七十义》。

七七事变后，师率弟子入川开办学道场，得李晓峰等资助成行，同部分弟子至汉口，住佛教正信会，应武昌三佛阁大鑫和尚之请，办法会，讲仁王护国经。讲经结束之后，师又为方广寺比丘尼讲戒。是年9月，师到重庆筹办法会，同时又讲经，又应接

---

<sup>①</sup> 《名僧录》所收隆莲《能海法师事迹简介》论述谓：“1933年师（指能海法师）自拉萨取道印度回国。”



居士、官方代表以及皈依弟子，备极忙碌。然而上师精神不稍懈，讲经结束之后，即转成都，先住文殊院，后接收近慈寺。师躬率徒众重建近慈寺，使之成为一个蔚然壮观的金刚道场。

1940年师传戒期间，得康萨大师电召，即筹备茶叶、哈达等供物赴西藏，并特购印藏文著作纸张六大箱，准备刊印宗喀巴大师三父子集，可见上师对藏密法的珍视。同行普超师等11人至打箭炉后，有死亡者，只余七人进藏。中途阻兵，函电往返联系，日后，始获解决，10月5日抵拉萨，分住各寺。

1941年师徒参与拉萨大昭寺朝拜法会，后赶回成都，住近慈寺。传戒后到绵竹县汉旺场云悟寺安居，讲生起次第。

1943年译出《大威德生图次第秘伽陀》、《三尊胜赞供养饮食观行仪轨》、《水陆供施食仪轨》、《清净法身天香供养法》。是年，近慈寺沙弥堂建成。

1945年为在彭县建塔，开始劝捐烧砖。其计划深远，工程宏大。师分派专人负责，持续进行，直到1949年解放时，始停。模型塔已完成，只是没有上顶，甚是可惜。讲“佛塔功德经”。近慈寺新修的译经院落成。当时住成都美国新闻处长持罗斯福总统亲笔函云：“中国四川成都外南近慈寺能海大法师，敬请驾临我国，宏扬佛法，以济国人道德贫乏。”

1946年峨眉山著名砖殿被焚，嘱弟子普超师修复。师亲到金顶礼普圣菩萨，并为修复后，作开光装藏的准备。5月，经房印出“新蕴足论”及附讲“阿毗达摩意义”等。

1947年印出玄藏译“乐师琉璃光如本来愿功德经”。4月重校“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5月讲圆成次第。

1948年亲率四众念诵。继续加紧烧砖，为彭县模型塔铸成金顶。又在龙兴寺院内铺如法塔基，因次年解放，迄今塔顶未上。现为彭县未完整之文物。

1949年4月，美国学人罗加思来，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弟子、马悦然教授之介绍，到近慈寺听经，并皈依上师，留住约三

月。同时有比利时二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来近慈寺听讲。师夏季在峨山慈圣庵安居，率众念经。

1950年，师接待解放军入藏代表，并派隆果师随行人藏，协助翻译等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贡献。7月，师北上赴京，先住北海菩提学会，旋移住西黄寺。该寺例办麻尼法会，已停三年，师建议续办起来，并捐助300元。

1951年10月，师以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52年12月，师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讲经结束后，带部分弟子到五台山清凉桥，接管破庙。仅有二石洞可以住人，仿近慈寺规模和办法、僧俗和力培修、准备传戒的因缘条件，就寺安居。

1954年仍在清凉桥安居。5月初参加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8月4日，被四川省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9月初出席会议后参加国庆典礼。

1955年到京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和平会议。

1956年6月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8月21日，师同赵朴初接待日本佛教徒。9月初，在首都机场迎接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在广济寺和雍和宫举行欢迎仪式，并开法会讲经。

1957年2月赴京参加佛教代表大会，结束后赴太原出席山西省政协会议。

1958年7月中旬，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代表。

1959年3月初，班禅喇嘛到京，同在广济寺和雍和宫举行法会并讲经。4月，出席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

1960年3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

1962年2月初赴北京参加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尚未结束，师乘飞机回成都视老喇嘛疾，在近慈住三周。举行传法仪式，将

近慈寺交永光法师住持。随后出席四川省政协。后随四川代表等同到北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上师住茅篷内，连续学习三个月，并参加劳动。上师临事从容，逆来顺受，依戒行不改常态，无丝毫不愉之感形于辞色。

1967年元旦师圆寂。

## 法师对佛法和祖国之贡献

### 戒行精严，重振僧纲

法师鉴于宗喀巴大师中与西藏佛法之最大成就，乃是恢复戒学与建立修行次第。目击当时中国内地佛法混乱，认为要使内地佛法兴盛，借鉴大师成就实为必要。故从西藏学密归来，即大力提倡戒学。师主张戒定慧三学，均应修习，然应以戒学为基础，以戒生定，定生慧。故要求出家人担负如来家务，必须戒行无亏，以此重振僧纲。师应请说法时，大抵先讲戒，后讲经，发挥戒德淋漓尽致，如释《金刚经》中之“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即依戒住，心戒防心，降伏其心，应生如律心。他释“戒”字为持戈防卫之兵；依戒防心，久习成熟，始能止恶修善。师不但口头讲述，而且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他常自谓“某大戒不敢犯，细戒不能言能持，独此信戒之心，可质诸鬼神而无愧”。又自书座右铭：“厚福受享，道德堕落。名誉光荣，我慢加等。养生优厚，病难更多，枉道求合，般若无缘。”他一生主持僧团，悉以戒律为准，以身作则，人无闻言。圆寂之时，右侧而卧，一如平生，戒德可谓至矣。

### 显密兼通，成就无上。

法师首从张克诚先生研究佛经，放为法器，继从佛源老法师处学习显教经典，得其临济正宗第44代嫡传法统，深通教理，初步宏扬。然师尚认为不足，又立志探求密教之奥秘。当时汉藏

交通异常困难，师不辞千辛万苦两次入藏，尽得宗喀巴大师教下第 28 代康萨之师相传之完整密法。同时本着虚心求真的精神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博涉其他宗派之主要经教，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独特的佛教风格。

### 首倡阿含大乘学记

《阿含经》举世目之为小乘教，《大藏经》、《如频伽》等，均列入小乘部。近世佛法学人多尚大乘，不复措意于阿含经。以是阿含经的法师，亦极罕见。师晚年始重视阿含，尊之为佛口亲宣、百劫千生难逢之教。特就平时所习三学之义，昔年思师口教之言，而作学记。学记内容参证颇多，不少创见，发前人所未发，妙谛精湛，密义深邃。

### 主张护庙护林

上师一贯主张寺庙僧团组织除其本分宗教活动而外，还应参加生产，实现生活自给。要守护寺庙建筑，整治维修园林，保存有关历史古迹、文物。既入僧团，即应少欲知足，节约生活，不应雇吃庙产，寄生于劳动人民。师曾亲率徒众开辟金刚道场于成都南门外近慈寺，寺内殿堂建筑、可观园林、果木花草收益不少，全凭自力经营，不烦政府帮助，不主动向外募化，厉行节约、勉力维持常住资用。从解放前后近慈寺僧团的表现来看，这一主张是贯彻了的。当时有提开发峨眉、五台之议，师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一经开发，山林顿毁、庙宇全非，无可观者。无论如何应保持人间一片干净土，以供世人享受。他的主张与现在护林专家、环境保护学者主张维持生态平衡，防止空气污染、水土流失以造福人类之论点无二致。同时主张将护林护庙、培植风景、保护文物的工作交僧负责是可行的，因僧众不慕荣利，有精神之慰安，无室家之累，能一心维护，于国家省事多矣。

### 一生为国不辞百忙

上师少年立志从戎以报国，继思改习园林以富民，中年以从事宗教之研究，挽救人心整 50 年。讲经说法，奔走教化，席不

暇暖。国难当头，大做息灾法会，大讲仁王护国经。解放之初，对西藏和平解放多所建白，并派隆果法师随军入藏担任翻译，之后参加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印度首都亚洲和平会议等，出任全国佛协副会长，不顾年老力衰，不惮长途跨涉，尽力完成任务，乃至参加基层领导的各项学习、劳动改造，莫不认真。遇事顺应自然，圆满其度生之愿，成就菩提心之大行。

# 我对太虚大师生平的回忆

雪 嵩\*

太虚大师（1889—1947年）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省桐乡县人（原崇德县）。他五岁丧父，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笃信佛教，对他影响很大。他九岁时，随外祖母朝拜安徽九华山，十三岁时又随外祖母朝拜浙江普陀山；十六岁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出家。同年冬季，到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

清朝末年，大师阅读了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和严复的译作，受革命思潮影响，毅然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

1909年，太虚随寄禅参加江苏僧教育会，从杨仁山居士学《楞严经》。1911年，赴广州讲学，任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与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其中有邹鲁等。曾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

1912年，大师在南京设立中国佛教协进会，该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由寄禅任会长。不久，寄禅在北京逝世，大师在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口号，撰文鼓吹佛教革新运动。1913年，任中华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发表了《宇宙真理》、《致私篇》等论文。1914年，在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治学，钻研天台、华严、法相、三论、禅、律、净、密等大乘八宗，旁及东西古今学说。在阅读《大般

---

\* 作者时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

若经》时颇有所悟。

1917年，太虚大师赴日本考察明治维新以来佛教的情况。回国后与陈元白、章太炎、张謇、王一亭等居士在上海成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1919年改为《海潮音》月刊）。1922年，在武昌黎元洪故居创办武昌佛学院，有日本僧侣来留学。

1924年，大师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德国、美国、芬兰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学家都赶来参加。他在会上宣传大乘佛教的利他教义，以阐明他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1925年，他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

1928年，大师得到蔡元培、戴季陶、李子宽等人的赞助，在南京成立中国佛学会。秋天，去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在英国，曾与著名哲学家罗素会谈。在法国，应法国学者的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回国后，写成《寰游记》。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大师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931年，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并任院长。1932年，任奉化雪窦寺住持。

自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起，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大师多次函电日本佛教界，本着佛陀“大悲兼利”的精神，联合日本人民，向日本政府抗议，呼吁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大师到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讲学，号召佛教徒参加抗敌救国运动，并组织僧伽救护队，分赴各战区服务。1939年秋，他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1943年，同于斌（天主教）、冯玉祥（基督教）、白崇禧（回教）等筹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并任常务委员。1946年，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大师到南京时体质很虚弱，说话声音很小，几乎

听不清楚。因而喜静怕动，深居简出，曾说“色壳子<sup>①</sup>坏了，要回炉了”。先在毗卢寺住了几天，嫌烦，后住普照寺，不久就应宁波、杭州、上海佛教界的邀请，离开南京了。在南京期间，找他的多为受贪官污吏迫害的僧侣。大师对他们的困难一筹莫展，只是说：“雪嵩法师懂法律，找他用法律解决。”（我当时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然而，在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哪有什么法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中国佛教会建立党团组织，大师不同意，对我说：“佛教会不要有党派色彩，不要建立党团组织。”大师兼任中印（度）学会理事，理事长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一次，教育部召开中印学会理事会，大师懒得去，派我代表他出席。还有一次，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开会，大师也派我去。大师还任命我为《太虚大师全集》的编辑委员。很惭愧，我没有尽到编辑委员的责任，全集出了10本，只收入部分学术论著，至于讲稿、书信、诗词、游记等均未收入。我说：“全集”二字不恰当，应改为“选集”，但已出版，无法更正。

爱国爱教是太虚大师的长处，但他也有短处，对国家十年内战，谁是谁非，真相不明。但我相信，大师如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一定能够弄清是非，同情革命，拥护革命。遗憾的是他于1947年患脑溢血，逝世于上海玉佛寺，只活了59岁，未能目睹新中国的诞生就与世长辞了。

---

<sup>①</sup> 色壳子：佛家语，指身体。



## 杨仁山居士的生平及其事业

游于默 李 安

居士名文会，号仁山（公元1837—1911年），安徽石埭（现改名广阳镇，属太平县）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11月16日。他的父亲名摘藻，号朴庵，他38岁那年，居士的母亲孙氏已怀了胎，便戏对准备再次赶考的朴庵说：“今年你如考中举人，我就生个男孩祝贺你。”那年，朴庵中了举，孙氏也果然生了居士，因此取名“文会”，家乡一时传为美谈。次年，朴庵又考上进士，官刑部主事，就带着全家北上，在北京住了七年。

居士幼年嬉戏时就从容安详，有条不紊，异于常儿。九岁回到南方，10岁进塾读书。他很聪明，14岁就能作文。但不喜举子业，而喜读《唐诗》、《宋词》，和朋友们结社赋诗为乐。稍长大了，更好读书，举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说，都博览而韞之于心。还练习骑马击剑，意气豪迈，只是对于佛家典籍，从未有过接触。

咸丰二年（1852年），居士16岁，和同里苏氏结婚。那时太平天国革命军起来，从南向北推进，清兵节节败退，居士家乡时受溃兵的窜扰。于是，居士一家，从他父亲以下，老少几十人流转避难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一带，首尾10年，几次遇到危险，都因居士部署得好，没有遭受损失。居士在流离转徙中间，也带着书篋，收集爱好的书籍，随时取出来阅读，好学不倦。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军放弃安徽，居士带一家人

迂回安庆。第二年秋天，他的父亲去世，家境渐有些艰窘。那时和他的父亲同年考取进士的曾国藩正当两江总督，驻在安徽省会安庆，曾邀居士担任谷米局职事。

同治三年（1864年），居士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重返安庆。因感染时疫，病了好久，从此就慢慢有了接近佛法的倾向。早先有一不知名的老尼姑送给居士一本《金刚般若经》，读了不大懂，就搁置一边。后来在安庆书店里得到一本《大乘起信论》，也没有仔细看。到了病后，拿起别的书，都不称意，而读《大乘起信论》却放不下手，接连读了五遍，渐渐领会到它的内容。从此就常常注意寻找佛家经典。一天偶然在书店里看到《楞严经》，就几阅读，竟忘记了时间，直到天晚，书店老板催促他回去，才醒悟过来，匆匆离店。以后就抛开过去的一切学问，一心学佛。凡亲戚朋友到外省各地去的，就托他们访求佛经；平时碰见行脚僧人，就问他们从哪里来，那里有没有佛教经典。

同治四年（1865年），居士来南京，才得到几种经书。第二年就移家到南京居住，主持南京公房的营造工程。一位同事真定人王梅叔对佛学曾有研究，两人很谈得来。后又和邵阴魏刚至、阳湖赵惠甫、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居士们往来，互相讲求佛法。

居士尝对人说，佛曾预言：佛教末法时期有7000年，如果在末法初期经典未能流通昌明，恐很难维持这么久长的年代。（佛家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分为三期：佛灭后500年为正法时期，佛虽去世，法仪未改；再千年为像法时期，佛去世久，道法讹替；以后为末法时期，转复微末，终归消灭。）就有志要在末法时期弘扬佛法。但是当时官刻的《龙藏》，平时买不到，个人也无财力置备这么卷帙浩繁的藏经。明代民间刻印的《嘉兴藏》，则因几经兵火，版已毁坏。要学佛也无书可读。于是发愿要继承《嘉兴藏》的遗规，刻方册的书本佛典来推广流通，便利学佛的人们研读。他就自己拟订章程，邀约志同道合的十余人，

分头进行劝募刻资。趁他在南京任职的机会，筹设金陵刻经处。同治五年（1866年），刻成了第一部佛经《净土四经》，即以此作为筹备创办的开端。到七年（1868年）才正式宣告成立“金陵刻经处”。

当时，居士白天经管营建工程，夜里研究佛学，编校刻稿，往往到深夜不得休息。他渐渐觉得一身兼任职务，实在妨碍学佛刻经。到癸酉十二年（1873年）就辞掉职事，专门从事读经刻经。他在校刊经本以外，还参考《造像量度经》和“净土宗”各经所谈的庄严境界，默坐观想，定出布局章法，并特请山阴画家张益和张国瑞、丹徒刻工潘文法合作，描绘刻成“释迦佛坐像”、“灵山法会图”、“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园图”、“慈悲观音像”等图像。图内有组合数十人物在一起，行列繁密几无间隙的，绘画雕刻极其精致，庄严华妙，别开生面。更注意搜求古代名画家所画佛、菩萨诸像，精刻印造流通。这些图像，不但引起国内佛教界的重视，而且为各国爱好从事木刻艺术的人士所称赞、欣赏、观摩，叹为稀有。

同治十三年（1874年），居上游历江苏、浙江的名胜古迹，瞻礼宁波育王寺的佛骨舍利，朝访普陀山的梵音洞，主要都是为了的多方访求佛典。听说太湖洞庭西山有古寺，藏有旧刻经版，就只身去搜求，以无所得，扫兴而回。他时常因为远道访求，旅费短绌，备历艰辛，可见他对于刻经事业的专心和殷切。

那时，居士的家庭经济艰窘，因此又出任江宁筹防局职事，在下关经管筑造炮台三座，炮房 11 所的工料事务。到这时，只经过几年的努力，所刻经版已渐渐增多，就在南京北极阁选定地点，筹集经费，建筑房屋，作为贮藏经版的地方。并请了僧人来住持。后发觉有人存心侵占，怕引起争端，于是就把经版移存自己家中，另请朋友来协助管理。光绪元年（1875年），他去汉口经理盐务局工程，虽然身不在南京，校刻经典仍照常进行。次年（1876年），曹镜初居士约他去湖南，商量筹设长沙刻经处的事，

顺便游览南岳，攀登祝融峰顶。

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出使欧洲，居士参与使馆工作，随同去英、法两国，还到过意大利和比利时。他到处留心考察西洋的政治、文教、工商企业情况，还仔细研究天文、地理、测绘等科学。归国时带回大量仪器。后自制天地球仪和舆图尺，并撰著《天地球图说》，用“璧月山房”的名义发行，供当时各学堂采用，传播这方面的科技知识。

居士在英国伦敦期间，同时还研究梵文佛典，想阐扬佛教于太西各国。他于日本学人米松谦澄寓所，认识当时在牛津大学专攻梵文的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博士，互相探究佛学诸问题，往返四十余次。南条博士赠给居士以梵文本《大云轮请雨经》，两人结成学术上的友谊，开辟了此后长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国际渠道。居士在国外时寄回家书，每次都问起刻经处情况，指点筹划刻款，务使刻事不停。任期满后回国，仍躬自负责筹划刻经业务。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居士又应刘瑞棻之聘，再度去英国，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工业制造等各方面实况，他更注意探究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关键，以期择优仿效，力图自强。满了三年之后，本来可以继续供职，但是他决心辞职回国，不受保奖擢用。那时居士已53岁，曾对人说：“欧洲各国的政治、教育、工商业务，设有一种它的专门学问。我国仿效西法，不从专门学问切实下手，只在表面上学点皮毛，是不会见有成效的。何况上上下下都互相欺蒙，人人自私自利，要希望国家富强起来，做得到吗？”从此他厌弃官场不务实际的活动。那时当权者曾国藩知道居士善工程，曾密保他，李鸿章也曾函聘他出来任事，他都辞谢不就，益专志自己创办的刻经事业。特从日本购置弘教书院出版的缩刷小字《大藏经》一部，闭户钻研，孜孜不倦，便不再和当时政界人士来往了。

光绪十六年（1890年）夏，居士到北京瞻礼旃檀佛像，仍到处访求中国失传的古本佛典章疏。后来刻经处刻行的如《华严

略策》、《华严三昧章》等籍，有的就是日本南条博士代为从朝鲜访求得来的。后他的内弟苏少坡随使东渡日本，他又托致书给南条博士，请广事搜求。以后由南条文雄、赤松连城、岛田蕃根等日本道友从日本访得日本旧刻藏经另本二百多种。其中有许多种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灭佛运动中失传、宋明以来千余年未曾重见的重要典籍。为隋嘉祥法师撰的《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唐窥基法师撰的《成唯识论述记》等，都是中国已遗失几百年或千余年，因而在国内遂成绝学的重要撰述，得到重刻流通，使三论宗、慈恩宗的义学得以复明于世，对于历史学术文化上的贡献至为巨大。居士在二百多种典籍中，先择要刻印流通，刻资不够，就割爱出售从英法等国带回的各种仪器给湖南时务学堂等处，以充实他们的科教用具。并用“壁月山房”名义出售自己制造的地球和舆图尺（闻现在南京大学还保存有他所制的地球仪一具），对于当时的科学教育，起了提倡和推进作用。那时，日本藏经书院计划汇辑前后发现而未曾入藏的经典以及注释章疏和后出诸籍，编成《续藏经》。居士也为他们多方访求，先后供应典籍也达数百种，以备他们选辑编入。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起了互相协助补充的作用，这是在学术上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赞助。

光绪二十年（1894年），居士在上海曾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合作，把《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向欧洲方面传播，因为李提摩太的译文夹杂穿凿私见，许多地方失了原意，居士认为很不恰当。以后再有西人请居士同译《楞严经》，他就严词拒绝了。1895年，居士在上海会晤斯里兰卡佛教学者达摩波罗，对他发起创立大菩提会以复兴印度佛教的弘愿极力赞助。于是着手先在国内开办僧学堂，手订章程，并撰订《佛教初学课本》、编辑《佛教中学课本》等，作为兴学传教的准备。这不仅对印度和斯里兰卡，也对东南亚信仰佛教各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起了先行的推进作用。

居士和上海《时务报》创办人汪康年、梁启超、夏曾佑，湖南时务学堂创办人陈三立、谭嗣同及南京水师学堂的一些开明人士来往都很密切。又和刘惠卿、茅子贞等组织测量会，极力赞助新学和普及科技知识的事业。当时，沈曾植（子培）、夏曾佑（穗卿）、章炳麟（太炎）等知名人士，也常来南京亲近居士，问学请益。

在亲近从游诸人之中，最突出的有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壮烈牺牲的谭嗣同。戊戌变法运动代表当时士大夫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革命进步意义的。谭嗣同就是其中的在思想界起解放作用的杰出活动家，是抨击封建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最激烈的战士。他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而发展为反满，由反满而同情太平天国革命，进而憧憬于法国大革命。尤其在参与变法运动中，始终坚持勇猛无畏的实践，终于从容殉难，不但是一位忠于自己理想的人，而且有些地方已超越当时改良主义的范畴，相当接近于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光绪二十二年，谭到南京候补知府，即从居士听受佛学，深有启发，感发大愿，常以入地狱度众生自勉。他所撰的代表作《仁学》就是于这期间在南京写成的（据杨氏家属传说，即在刻经处的深柳堂内写成的，并说深柳堂旧有红木桌椅一套即谭所献赠）。谭在这部著作里，大声疾呼要冲决一切罗网，充满要求个性解放、和传统思想作斗争的精神。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慧星。他初好王船山（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窥今文经学，也盛言大同；后从杨仁山居士听受佛法，其学又一变。自说其所撰《仁学》就是“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可见在思想上受居士讲佛学启发之深。又居士门人孙少侯、余同伯都参加同盟会活动。后孙少侯被捕，居士就让他家属隐藏在刻经处。还有僧人亚堃，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清政府要逮捕他，居士也帮他隐藏在刻经处，待形势缓和，让他化装为俗人离开南

京。可见居士对清末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革命，在思想上起过共鸣，并在行动上热心维护赞助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居士自建住宅于南京延龄巷。那年夏天，他的母亲孙氏去世。丧服期满后，居士便对他的三个儿子（自新、自超、福严）说：“我自从26岁得闻正法，就想出家学佛，因为有老母在，不能如愿（佛制，出家应得父母许可）。现在老母寿终，我已年迈体衰，不能受制出家律仪了。我家人口日繁，你们正在壮年，应该分家，各谋生计，我所置房产，全部捐给金陵刻经处，作为十方公产，永为刻印经典佛像、藏版流通的处所。希望以后再勿以杂事来累我。”从此更专志于会释经疏，昌明教法，从未空过一天的时间。并表示：“我在世有一分时间，就应当对佛法尽一分力量。”这种为法忘身，以道自任的精神，更引起学人们的敬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居士就金陵刻经处设立佛教学堂，名曰“祇洹精舍”。他自己担任佛学主讲，聘李晓暎教国文，苏文瑛（曼殊）教梵文和英文，期望学者能兼通中西语文，将来往印度重兴佛教。这是以前赞助斯里兰卡佛教学者达摩波罗发心复兴印度佛教计划的初步实现。

居士特别强调：“刻经事业必须设立居士道场，早晚研读，朱墨点治，引发兴致，然后始能使刻事继续增长，不至于日久歇废。”早年和居士共同发起刻经处诸人中，有的中途离开，缺乏贯彻到底的精神。和金陵刻经处同时创立的扬州砖桥法藏寺江北刻经处，也曾刻了不少经典，后来主持人亡故，刻事也就停顿下来。因此主张金陵刻经处永为居士道场，以期法事得以持久发展。宣统二年（1910年），居士复就金陵刻经处创立佛学研究会，他被推为会长，每周讲学一次，每月集会议事一次，讲习不息。即树立居士道场规模，作为维持刻经事业使垂久远的典型。

居士过去赞助日本藏经书院编印《续藏经》，出版后一、二集卷数达万余卷，居士看了，认为辑收诸籍太芜杂，应该区别为

必刊、可刊、不刊三种而重加审订。于是进一步选择必刻经籍，编为《大藏辑要书目》，准备陆续校刻出来，还想撰《大藏》和《续藏》的提要，便于学人掌握要领，了解全貌。

宣统三年（1911年）秋，居士患小恙，自知殆将不起。回顾平生刻经全力以赴的艰苦历程，想到《大藏辑要》还没有完功，内心深感忧虑。经过仔细考虑部署，指定欧阳渐（竟无）、陈镜清（稚庵）、陈义（宜甫）三居士分任编校、流通、交际三部门的事，得各人同意接受，然后怡然释念，归心净域。居士先预嘱佛学研究会同人于8月17日召集临时会议，商量维护刻经处的计划并改选研究会会长。当天上午，还和同人谈论会务和刻经步骤。听说又觅得古本经典几种，为之欣喜。到午后，佛学研究会同人都到碑亭巷蒯寿枢（若木）居士家开会。杨居士即嘱家人给他洗脚并修剪指甲。到了申时，他说：“这时候刻经处事情该当商议妥善了。”又问此刻几点钟，说：“刻经大事落实，我可以放心去了。”说后小解，忽发寒噤，就向西端坐瞑目而逝，本年75岁。逝后七年即民国7年（1918年），刻经处同人为他在刻经处内建塔完工，安置遗体于塔下，这是遵照了居士生前所说“经版在哪里，灵柩就在哪里”的嘱咐。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流通四十多年，刻印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造佛像十余万张。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一卷、《无量寿佛经愿生倡略释》一卷、《坛经略释》二纸、《论孟发隐》二卷、《阴符、冲虚、道德、南华四经发隐》四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阐教篇》一卷，都收入《杨仁山居士全书》，后由刻经处汇刻为《杨仁山居士遗著》发行。另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单行。

综观居士一生刻经弘法事业，其精神所系，最突出者凡五：

一、佛家典籍浩繁，汉文译传的佛典约六千卷。我国历代古德撰述宏富，卷帙更超过此数。宋、元、明、清各代都由政府来编刻。本世纪初，上海频伽精舍校刊的《大藏经》凡1916部、



8116卷，后日本辑印的《续藏经》凡1659部、7148卷，可以想见其大概。居士独于末法苍茫、宗风衰歇之会，发愿创设金陵刻经处，以刊布方册单行本藏经自任。并为雕造描刻佛菩萨像，致力于摹绘木刻图像艺术之继承与求精，华妙庄严，别开生面，精诚磅礴，毕生不倦，诚为甚难稀有。现在金陵刻经处所保存的大量经版和精刻画片，蔚为我国佛教文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内文、史、哲学术界的注意，亦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佛教国家人民所共同珍惜和重视。

二、居士于整理刊布大藏经过程中，特别注意于广事搜求我国历代散佚失传的古德撰述于海外，并择其重要善本辑校刊布。如校刊《成唯识论述记》，圭臬不遗，而契门绝学之研讨有路。校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疏，然后中观之学有籍，而三论宗义学复明。辑刊《贤首法汇》、《华严疏钞》，而华严宗义重兴。承先启后，使有志精研佛家教理者有资以深造的途径，同时也影响佛教界以外的人士对佛家典籍的注意，引起希望了解的要求。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业，亦从此唤起久长的历史回忆而加强友好和团结。

三、居士对于佛法认真探究，有感大藏经卷帙浩繁；辑收历代撰述芜杂不纯，特致力于甄综抉择，审订《大藏辑要》，以期学者集中精力，掌握法要，实为对佛家思想学说作系统整理究明的先导。先曾刊《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标举五位以笼罩一切法门。然晚年与门人桂伯华书，则提倡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颛预笼统，走入外道而不自觉。逝世前校刊《瑜伽师地论》前半部51卷，而将后半部交欧阳竟无（渐）接洽校刊完竣。临寂遗嘱，一切法事悉以付托于欧阳竟无居士，可以见居士刻经弘法最后的心愿。其后，果由欧阳竟无居士继承光大，从金陵刻经处的研究部发展成立支那内学院。不但法相、唯识之学得以重光，且进而阐扬般若学、涅槃学，对佛家学说作全面的探究，使正法得到空前的昌朗。

四、佛法从后汉传入中国，至李唐而极盛，亦至唐贞元以后渐衰。到了清代已极衰微；高僧不多。独在居士中，清初有王夫之好治法相，长于名理。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佛。彭绍升曾与当时学者戴东原（震）往返辨难，其后龚定庵（自珍）受佛学于彭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就是彭绍升），和他同时的魏默深（源），后都受菩萨戒，皆以居士身激扬佛法。居士创设金陵刻经处，最初校刊的经典就是魏默深所辑校的《无量寿经会译》。居士一生，行持主弥陀，研散宗贤首，盖有所承受。居士并以金陵刻经处为据点，力倡“居士道场”之建立。尝说，刻经事业须设居士道场，朝夕丹铅，感发兴趣，经后有继以渐而长。并设立佛学研究会，日事讲论不息。又开办祇洹精舍，吸收学僧，作育人材，以赴印度弘教为的。以白衣创立居士道场，肩荷弘法讲学大任，实为前世所未有。

五、居士所创道场规模宏广，门下多材。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弘密乘，谭嗣同善华严，而法相、唯识之学则有欧阳竟无、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等。至于各界从游人士，以及间接受影响的知名人士则有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周树人、许炳堃等。居士中年远游英、法、比、意等国，交游甚广。在英伦与日本佛教真宗学者南条文雄交往最密，对于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做了很大的贡献。前于居士的龚自珍、魏源，并为当时的今文经学家所推奖，影响所及，当时的今文经学家多兼治佛学。谭嗣同从居士游一年，本其所得撰《仁学》，以冲决一切网罗自命，并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使之更适应社会人生之用。其中驳杂幼稚之论固多，而其解脱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戛戛独造，在有清一代中殊未见其比。梁启超比之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慧星。居士刻经弘法讲学的影响遂隐然汇成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对于当时文化界思想的解放和历史前进潮流的憧憬，都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启蒙、激荡的作用。佛法从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历代学者的吸收融辑，在

文化、思想、学艺等各方面都曾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但像居士的刻经弘法讲学所起的影响，形成为当时思想界之一股起解放启蒙作用的伏流，则是过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1979年5月12日)

# 忆格达活佛

邓珠拉姆 来作中 于在滨 阿都泽呷\*

—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也。1902年生于甘孜县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7岁时，作为甘孜白利喇嘛寺活佛，移居甘孜白利喇嘛寺，17岁去西藏拉萨学经，八年后获格西（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籍考取的学位名号）学位。是一个格鲁巴（黄教）教派虔诚的信徒。由于他幼年时曾在农民群众中生活过一个时期，因而他生活俭朴，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思想感情，常将寺庙所得布施拿出来周济穷人，他又懂藏医，经常为附近贫苦农牧民看病施药，他还编写了大量本民族的锅庄歌词，其中一部分至今尚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传播藏族人民的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剥削、歧视藏族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的法西斯行径无比愤慨，他所主持的白利喇嘛寺经常收容有二三十个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孤儿和

---

\* 邓珠拉姆：民主爱国人士，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政大藏文副教授，“国大”代表，现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常委。

来作中：中共党员，曾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州政协党组成员。

于在滨：中共党员，曾任四川省康定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阿都泽呷：民主爱国人士，甘孜县阿都土司继承人，曾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

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出走的贫苦农牧民，因而藏族人民都非常爱戴他，称他是“真正‘普渡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 二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藏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造谣诬蔑，通告群众不准卖粮食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这时格达活佛派人探听了红军的动向，听了红军的宣传，在红军到达甘孜后亲眼看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扰害百姓的实际行动。红军的政策、纪律使格达活佛深为叹服，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因而决心靠近红军，并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群众广为宣传，说服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要各自安居其业。在他的宣传影响和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消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这时，格达活佛又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响应红军号召，反对国民党官僚军阀和反动土司头人的压迫剥削，组织藏族人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格达活佛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积极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筹建工作。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成立大会在甘孜召开，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格达活佛在会上被选为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也讲了话，他号召藏民团结起来，搞好生产，支援红军，制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他又派遣自己寺内的喇嘛到各处向群众宣传红军和博巴政府的政策，张贴宣传告示，召回村民回乡生产，动员群众筹备粮食支援红军。仅白利寺就支援红军青稞三万多斤，豌豆四千多斤。对此，红军专门派员

责干部向格达活佛表示了深切谢意。

在和红军的密切接触中，格达活佛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纲领、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进而受到了更为深刻的鼓舞和教育。

他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红军和中央军反复进行了对比，认识到：国民党的官吏和军队，一到藏区就是压迫剥削、歧视打击藏族人民，他们的苛捐杂税和乌拉差役多如牛毛，压得藏族人民喘不过气来；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则是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平买平卖，不住寺庙，不住民房，不派乌拉差役，不打人，不骂人，还把藏族人民当作红军的朋友。对比之下，更加坚定了他永远相信共产党，愿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红军决定北上抗日离开甘孜前夕，格达活佛更加积极为红军筹备粮食、帐篷、皮火筒等物，亲自到附近一些寺庙去商量如何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的问题。当红军离开甘孜时，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前往和格达活佛告别，朱德总司令对他说，我们要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要很好地团结起来，把博巴政府办好。只要团结得好，就能够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红军至多10年、15年是一定要转来的。朱德总司令的这番话使格达活佛深受鼓舞。

红军走后，格达活佛时常怀念共产党和红军，他把红军保护寺庙的布告和文件秘密隐藏起来，并时刻为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而进行祈祷，还继续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坚定地相信和鼓励群众，红军总有重回甘孜的一天，藏族人民也总有翻身解放的一天。

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甘孜喇嘛寺反动喇嘛生龙多吉一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公开杀害了甘孜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四十多人，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格达活佛对此极为震惊，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甘孜寺进行劝阻，同时把没有受到伤害的红军重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寺院居

住，并把轻伤病员作了转移。一些重伤病员经过格达活佛一个多月的精心调理治疗，绝大部分人的伤病得到了恢复和好转，先后由格达活佛亲自派人安全送出藏区的红军伤病员达二百多名。

格达活佛不仅积极保护红军伤病员，而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屈服。当国民党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动员他和红军割断联系参加国民党时，遭到了格达活佛的严词拒绝。后来格达活佛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纠缠和迫害，带着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到西藏拉萨避难。

在拉萨期间，格达活佛对红军仍十分怀念，他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念经祝福，为红军祈祷平安。并经常打听红军的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在拉萨住了10年。

### 三

1949年，甘肃、青海两省相继解放，消息传来，格达活佛极为高兴。当即派出代表，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从青海绕道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红军走后藏民遭受的灾难，并代表甘孜地区人民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敬，希望早日解放康藏。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活佛在甘孜亲自主持召开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他的代表得到苗逢澍政委要他进一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准备迎接解放军，并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的指示时，格达活佛积极向当地人民进行了宣传，为大军进藏准备了很多粮食。解放军到达甘孜时，格达活佛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当年留下的红军以及当地人民群众，亲自跑到十里以外的地方，热烈欢迎当年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到达后，格达活佛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等职。当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要在北京召开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发来电报，邀请格达活佛去北京开会，这时他是多么想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啊！可是当他看到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一直阻挠西藏当局派代表去北京进行和平谈判时，心里十分气愤。他想，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在伟大祖国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各族人民同样尽了自己的一份光荣的职责。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同样也侵入了西藏地方，他们还进行了各种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西藏各族人民，则和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不断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致使西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少数顽固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离间，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就会使西藏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陷于被奴役的痛苦深渊。他想到这里，决心不辞辛劳，亲自前往拉萨向西藏政府晓以大义，陈说利害，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贡献。他向政府和亲友们说，我是十分希望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还没有解决，我必须先到西藏去，向有关人士讲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服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等到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此，地方党委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以及他的亲友，对他去拉萨可能会遇到危险，都表示关心和担心，但是他说，我相信西藏地方政府会深明大义的，为了祖国的统一团结，为了西藏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50年7月4日，他谢绝了各方面的劝阻，毅然离开甘孜，前往昌都。临离开甘孜前夕，受到甘孜及白利寺地方僧众以盛大舞会表示的欢送之情，还在沿途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8月5日在广大僧众的护送下，格达活佛安全到达昌都。



## 四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不怕旅途劳累，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政府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昌都地方政府中个别反动分子、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等人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对此，格达活佛泰然置之，并决心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进行谈判。但因当时昌都电台仍然为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所控制，福特即利用格达活佛去电报局发报的时机，假献殷勤，在茶里放了毒药，向格达活佛下了毒手。格达活佛遇害时年仅 48 岁，毒害格达活佛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时被俘获，受到了应有的惩治。

格达活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藏族地区，广大藏族人民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西康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布讣告，肯定了格达活佛是藏族人民中最优秀杰出的人物之一，深受广大藏族人民所爱戴，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的死，是为了祖国统一和广大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死的，是死得其所，虽死犹荣。同时他是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西藏反动分子残害而死的，这就使广大藏族同胞更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个别坚持反动立场分子的罪恶嘴脸，进而更加坚定了藏汉民族亲密团结、誓把帝国主义势力驱出西藏的信心和决心。毛主席还把亲笔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 100 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格达活佛所主持的白利喇嘛寺，访问团又亲自到了格达活佛的家乡——甘孜县白利乡德西底村，对他的亲属进行了亲切的慰问。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奉命向西藏进军，并分数路渡过了金沙

江。金沙江以东地区的藏族人民，为了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实现祖国的团结、统一，继承了格达活佛的遗愿，积极支援大军解放西藏，自动组织了1.2万多头的牦牛运输队，使昌都很快得到解放。这时，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终于派出代表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同中央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本文经格达生前的密友、甘孜县前白利土司、甘孜州政协常委白利哈呷，格达的管家、随员、格达尸体的处理和安葬者勒勒和甘孜州政协常委、白玉县白玉寺活佛达瓦提供和订正事实，特此说明。

## 艺涯南北七十年

徐志良

徐志良，京剧表演艺术家。六岁到上海学艺，十几岁在江浙一带演出即名声鹊起，享有“小武生”的美称。50年代初应邀参加文化部戏改局所属京剧研究院。先后在中国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北方昆曲剧院演戏、教学、导戏。既擅长演箭衣短打武生戏，又擅长演长靠披挂大武生戏，融合南北武生表演艺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1年10月26日在京去世，一生奉献给了京剧事业。

此文曾得到原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老院长、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老戏剧家马少波先生，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刘东升先生、北方昆曲剧院办公室米云芬主任的支持，北方昆曲剧院著名剧作家时弢先生审阅指正，在此深表谢意与敬意。

我是南方人，1921年8月19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一个风景秀丽的水乡。从6岁开始与京剧结缘，29岁以前在江南演戏，1950年来到北京。蓦然回首，心潮涌动，思绪万千，桩桩件件往事似乎仍在眼前。我愿将自从小学艺、驰骋舞台，到授艺教徒的一生经历从头细细讲来。

## 杭嘉湖一带的京戏班

自从徽班进京，京戏越来越兴盛。清末民初时，江南一带不但各大、小城市戏园、神庙戏台众多，戏班如云，日日箫鼓，夜夜笙歌；就是在广大乡村，京戏班也比比皆是，“高台戏”、“庙台戏”此起彼伏，常演不辍。仅江浙两省，水陆码头就不下几十个戏班。当时的老百姓非常爱看京戏，各戏班辗转演出，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在浙江省境内，尤以省会杭州市、嘉兴府、湖州城的三角地带的京戏班远近闻名。

杭、嘉、湖一带的京戏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堂名班”，班主财力雄厚，还很有名气。他们常从大城市邀主要演员，组的戏班阵容强大，“四梁四柱”整齐，还常邀请名角入班。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京戏演员也将“杭、嘉、湖”作为既能多挣钱、又能多演戏的地方，前来搭班，往来不断。另一种叫“一冲头班”。班主财力小，只能邀齐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组成人数较少的小班。有钱的班主自己备有全份戏箱，力量弱的班主则租箱，单有“箱信儿”随班演出。

因为戏班众多，一年之中又是从年初演到年底，所以搭班的演员流动性很大。当地的规矩是，演员每半年与各班主定一次合同，先讲好多少“包银”，演出当中算下“戏价”，陆续“支账”。“年齐月满”演至合同到期后，双方如合作得好，则续合同；双方不合，演员则换班演戏。两厢情愿，互不勉强。戏班内所邀的普通演员。一般是当地的人，他既以搭班演戏为生，但在不搭班时，也做买卖或干其他营生维持生活。

杭、嘉、湖一带为水域多的地段，戏班主要住在船上。在嘉兴一带有许多船主，戏班向他们赁船后，每条船都配有船夫。戏班所用的船有大有小，名目不同。

“堂名班”往往一租就是十几条船，在河里行走时，气魄很

大。开路的是“箱船”，从船头到船尾有一间半房长，一丈半宽。船头宽阔，上面放着戏班的“把子匣”，匣外写着班名，匣内放着舞台上所用的刀枪剑戟等，另有其他道具箱、衣箱、桌椅，还放着头排演员的“私房行头”。第二条船则为班主住的稍小点的“帐船”。然后是头排演员单住的“商船”，再往后是一般演员及其他人分别住的“乌舢船”。

称为“一冲头班”的戏班一般租有两三条船，开道的也是“箱船”，班主也住“帐船”，班里人则按名分住在一条或两三条“乌舢船”上。头排演员住“头舱”，次要演员住“中舱”，一般演员、乐队等人住“房舱”即“统舱”。

早年间的京戏班中是没有女演员的，直到后来才逐渐形成男女同班，在水乡演戏也有带家眷的了。但却保留着重男轻女的规矩，即女人不能上“箱船”，认为不吉利，一旦沾上了脚，被人看见，就要烧香受罚。

所邀演员来搭班后，随班演出在船上生活，条件很差。饮食方面，戏班只管主食，吃大锅饭，但不管菜吃。带有家眷的人自己做菜，单身人就买摇小船送过来的熟菜吃。常年住在船上，卫生条件不好。每条船都是在船头洗米，船尾倒马桶，看似分上下，但对在这条船的下游的另一条船来说，就成了上边倒马桶，下边洗米了，因此每条船上的“头尾”之分，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船上的人也只有“眼不见为净”了。这样的生活环境使肠胃容易闹病，所以从老一辈人那儿就留下一个每年春天吃“三官素”的风俗，就是要有三天吃素，三天中的头一天更是要不吃“烟火食”，也就是吃生素食。这样，平时吃进许多不净食物，用这三天清理一下肠胃，调整一下身体。

戏班与各乡镇约定演出事宜，是由地方上出钱的“主头人”派地方上叫“牌下”的办事的人，与戏班里专管安排演出叫“做班”的人接洽，定出下一年中来当地演出的日子、场次、戏目等事宜。“主头人”熟知哪出戏有哪些特点，演员应有何功夫，非

常懂戏。“牌下”与“做班”接洽中都要一一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做到，达不成协议，就另约别班了。地方上需要演戏的日子很多，除固定的年节之外，还有大量的演出是各个乡、镇按本地地方定的“还愿戏”名为“愿戏”。由于还愿名目不同，各乡、镇演戏的日子也各不相同。戏班为了生计，一年之中也不能“放空”，因此，几乎天天有演出，从初一到年末，应接不暇。

在乡里、镇上演出不是每演一场卖一场戏票，而是年初或年末由“主头人”派人挨家挨户去收钱或收米，到演戏时，镇上或乡里人可以随便去看。或蜂拥而至，或寥寥无几，对戏目的评论，对演戏人的好恶反映再自然真实不过了。

戏班到镇上演出，大都是演“庙台戏”。一进庙门，正殿前的大院子里有土台的可以在上边演，没有的临时搭台演。开锣演戏后，殿内香烟袅袅，殿外人群摩肩接踵，热闹非常。看戏人笑称：“上供人吃，演戏给菩萨看。”

戏班到乡里演出时，就在乡里或乡外空地上搭“高台”演，晚上演时则点着汽灯。戏如果演得精彩，散戏之后，看戏人常高兴地从家里搬来酒、肉、农产品等等，名曰“赏众”或“众赏”；演得如果不好，“主头人”发话，下次另邀别班。

戏班在每一个地方一般演三五天，一天平均演两三场戏。在水乡，一个码头与另一个码头的距离，当地人管几里路叫“几九”路。戏班换地方时，路远之处，在当晚演出后，拆卸台，上船夜渡，一觉醒来，已是下一个码头。

## 第一次学艺

我的家乡硖石镇虽然只是个镇，但当时却比海宁县城的人多。因为交通便利，又通火车，所以从上海到杭州的快车，在硖石镇都有一站。由此镇上店铺多、集市也多，是个比较富的地方，素有“小上海”之称。我的父亲叫徐贵松，是杭嘉湖一带的

老演员。他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盛县。因为家中生活贫苦，14岁离家出外谋生，后来到杭嘉湖一带学艺，吃尽苦头，练就武功，主要行当为武老生，当地人称“白胡子老生”。他还能演许多其他行当的角色，后来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为人耿直、古板，一生从未求过人，只是凭自己本事吃饭。为了家中生活，他60多岁还在登台演戏，直到1939年病故。

我童年时，硖石镇上只有我们一家以演京戏为生的人家。我自懂事起，就非常喜欢看京戏，每当庙里演“愿戏”时，我便悄悄溜进去看。四五岁时，我已会溜“虎跳”了，腰腿灵活，胆子特别大，敢从高桌上往下蹦。六岁时，父亲决定送我离家去学艺。托他的老弟兄、我的义父将我带到上海拜师。母亲虽然舍不得让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可是因为生活艰难，只能含泪同意。我被带到上海，拜在上海“天蟾舞台”戏班里的花脸演员陈永奎门下，他早在当年麒麟童演《封神榜》时期就小有名气了。

上海那时并无科班，收徒一般为“家门徒弟”，拜师要先写“关书”，也就是合同，上面写明拜师几年，学艺期间演戏挣钱均为师父所有，打死勿论、投河溺井不负责任等等。“关书”写好，按了手印，我就留下住在师傅家中，开始了艰苦的学艺生活。在师傅家中，从早到晚，除了练功还得干活，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就有住在别的师傅家中的徒弟来叫我一起到“天蟾舞台”，与许多别的小徒弟一起，等专门请来的抄功老师给我们一起练功。我早上从没吃过早饭，每天空着肚子一直练功到中午12点。也没有鞋，光着脚在地板上和水泥地上练。因为人小身体又弱，练功达不到要求常常挨打，身上没有一天没“吃过”“藤条面”，练功老师用藤条抽打得我们胳膊、腿上全是一条条红印。中午回到陈老师家，只有残羹剩饭，能吃饱肚子已是好的了。吃完饭就要立刻干活。虽然我才六岁多，但每天必须倒八个老式铜痰桶，每个痰桶都快与我一般高了。倒完之后，还要挨着个刷上桐油，直到擦亮为止。接着又要擦地板、

楼梯、楼道。活都干完后，下午继续练功，压腿、撕腿。将两条腿面向墙撕开，两边用红木椅一夹、耗着。过了几个时辰，等老师让起来时，腿已麻木，站起来后再踢腿。剩下一点时间，还要陪老师的儿子玩。这样的学艺日子过了两年多。一天，陈老师的儿子与别的小孩打架，往回跑爬楼梯时，一揪花盆，结果盆落下把别的小孩砸了，他竟将此事赖到我的身上。陈老师不分青红皂白，信以为真，借故把我送回家了。

## 第二次学艺

此时，母亲在家开着一个小杂货铺，挣点钱贴补家用。她见我在外边吃了那么多苦，非常心疼，于是每天早上给我10个铜板，让我到街上买点包子、喝碗馄饨。父亲却对我被送回家很是生气，他不让我在家呆着，领着我跟随他去搭班演戏。我们在杭嘉湖一带的京戏班中从一个码头演到另一个码头。除了在船上生活外，有时晚上演完戏离船很远，就睡在镇上的庙里，或睡在小城市戏园子的“间房”（放杂物的房子）。大人们演戏时，我留下看房子。在随班演出中，由于卫生条件差，我身上长了疥疮，又没钱治病，只能用盐搓脓包。两三年里，我跟着父亲在戏班中生活，有时父亲还将我托给在其他班里的师叔们，跟着他们“跑码头”，等于过着流浪的生活。

1933年，在上海永安公司办的“小京班”里“打武戏”，比我大八岁多的哥哥写信回家，说帮我找到一个师傅，名叫傅永利，他与哥哥同在“小京班”中，是一位唱花脸行当的老演员，也是班中的“武行”头，教戏很好。父亲见信后，就又托人将我带去上海，我再次离家，离开了母亲。

来到上海，哥哥带我去傅老师家，也是写了“关书”拜师，写明学艺7年，之后再随师傅多演1年，一共8年，到我21岁时正式满师。这时我已长成少年，比小时懂事多了，想到在家



随戏班演出时，父亲对我的严厉，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练功学艺，争一口气。从此，每天一早，我与其他几个师兄弟一起练功，跟师傅学艺，天天还练“走边”、“起霸”、“趟马”，学《挑滑车》等基本功戏。开始时，师傅把我归行学武花脸，打下串。由于我格外努力，进步很快，四个月後，就能上台演戏了。

我在边学边演中，有时也随师傅临时搭别的班演戏，又能边看边学，增长了见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曾有一次随师傅搭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的班，坐船北上大连演出，在他所演的《闹天宫》中我演一个小猴，在《拿谢虎》戏中我演谢虎之子，无论是舞台上，还是在侧幕，都使我有直接观摩、学习的机会，受到很大启发，不但对盖先生非常敬佩，也更激发了我努力学艺的决心。

1935年，永安公司“小京班”换了经理，师傅也从班里下来了，他的其他几个徒弟各奔前程、自谋生路去了。师傅是个忠厚的人，只是好喝酒。我想既然写了“关书”，就应不论师傅处境多不好，也要按写定了的去做，就没有走，留下来继续学艺。我在学艺中，还随师傅常在上海郊区的小戏园里参加演出。后来有人邀师傅参加一个戏班同去苏北演戏，于是我跟着师傅、师娘，随那个戏班坐船走运河，去了苏北。

## 辗转苏北演出

我们随戏班到的第一站是淮阴县的清江浦，这个地方算是个市了，在那儿演出很好。第二站到了淮安，演出也很好。演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所搭的班又要换地方了，师傅看此地虽小，当地人却非常爱看戏，而本地只有淮剧，京戏班去的不多，竞争少，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演出，遂决定留下，单赁一个住处。我们师徒与其他零散演员凑在一起演出，时有演员来来去去。

在这里演出，见到各地方的演员更多了，也知道了不但江、

浙两地京戏演出受欢迎，就连安徽、江西，甚至进到江西山里，老百姓都喜欢看京戏，而且也都熟悉剧目，对演员的唱念、武功表演好坏的评论全都在行。

当时所演剧目分本戏与折子戏两种。武戏的本戏有：“三国戏”、“水浒戏”、“东周列国戏”、“彭公案戏”、“三侠五义戏”、“太平天国戏”、“莲花湖英雄戏”等。折子戏就是这些本戏中精彩的一折。那时，武戏演出非常受欢迎，舞台上开打要求“真刀真枪”，打时还得光膀子，我的腹部就曾因光膀开打刺伤过。每当戏演到开打时，根据班里武戏演员多少安排上场人数，人多，上八对，人少，上四对，但不能再少了。每一对对打都各有特点，观众看戏时对其中的套数都能说得上来，打得好连声喝彩，打得不好倒好不断。由此，每天演戏台上台下都是一片火爆、热烈的气氛。演员的练功、排戏也异常辛苦，付出全部精力，好在舞台上一争高低。

我在跟师傅学艺之中，每天又连续演出，看到许多好演员身怀绝技，就做一个有心人，“偷学”了好多出戏。由于南方武戏中除了要求功夫好之外，还有很多戏同时也注重唱、念及表演，于是我又常跟班里的师叔学习唱功、念法，虽然自己从未上过学，但我就在老师的口传心授中努力学，认真背诵唱词和念白，我也非常喜欢唱念，学完之后认真揣摩如何能唱得有韵味、动听。

由于我的刻苦努力，越学越多，演戏进步也越快，虽然年龄还不大，渐渐被别人称赞，观众都叫我“小武生”。师傅喜在心里，能指着我演戏了，武生“短打戏”、“箭衣戏”、“靠把戏”能演不少；所演的角色也有武松、燕青、林冲、史文恭、花蝴蝶、黄天霸、赵云、高冲等。

就在我初露锋芒之时，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烧到江南，日军铁蹄踏进江浙两省。此时，老百姓没有心思看戏，我们的京戏班也演不下去了。无奈，师傅、师娘带着我离开了苏北，另谋生路。

## 沦陷时在南京谋生

师傅、师娘领着我离开了苏北，一路上兵慌马乱。想着南京是大城市，邀演员的机会多，活路也多，于是我们三人来到南京。进了市区一看，国民党军队到处抓夫，狼狈溃退，市面混乱。我与师傅只好到南京周围的小码头搭班演戏，挣很少的钱，勉强维持生活，天天不但又苦又累，还担惊受怕。为了躲避飞机轰炸，我们三人住在南京乡下。当时天气炎热，白天、晚上都有蚊子叮咬，我得了“脱力伤寒”病，一点力气也没有。眼看病得越来越厉害，急坏了师傅、师娘，可是没钱到医院去治。听人家说，栗子县有一位专治伤寒病的大夫，就请人抬着我往栗子县走。正在焦急万分时，途中幸遇一位毕姓老妇，她在当地有些名气，因她看过我演戏，见状说：“这不是小武生吗？”遂发恻隐之心，让师傅见到那位治伤寒的大夫提她的名字，就会用心为我治病。她还让我们看完病后到她家养病，她的义举令我们感激不尽。这样，我转危为安，师傅、师娘也松了一口气。待病好后，我们谢了人家，又回到南京郊外，躲进“国际红十字会”办的难民营中。开始还发一点吃的，后来日本兵占领南京后，他们竟闯进难民营寻找花姑娘，人们都东躲西藏，难民营也岌岌可危，这样的日子足有一两个月。

南京大屠杀时，我们正在南京，看见日本兵穷凶极恶地杀中国人，街上到处都是老百姓的尸体。难民营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吃的东西发得太少，我与师傅只得悄悄进城寻找食物。一天，在街上看见地上倒着一匹死马，就想割下一条马腿带回去，谁知忽然几个日本兵走过来，端着刺刀边走边吼，我与师傅赶快往回跑，险被刺刀扎上。一路之上，我们还看见有的人碰到日本兵迎面走来，急忙避到路旁防空洞中，没来得及躲进去的，刺刀已扎进身子，倒在了血泊中。那时南京的汉奸还特别多，我们每天都是提

心吊胆过日子。

过了一些日子，市面平静一些了，有的戏园又开始演戏，师傅听说南京“中央大舞台”在邀演员，我们遂去搭班。有一天，我与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同行在剧院门口踢皮球，球踢落在泥坑中，泥溅到路上一个日本人身上。他过来就抓住我摔跤，我未被摔倒，他嚷着要抓我到司令部去，我甩脱他躲了起来。

以后，陆续有上海等地的演员来南京搭班演戏。如艺名叫“小白牡丹”的马崇光，是演花旦的著名演员，他还能演著名演员杨月楼曾演过的挂小武生（一人演两个行当）的《樊梨花》。他演此戏时，由张德禄演程咬金，李慧芳演薛丁山，我演薛应龙。那时还未有正式戏曲导演，每排一出戏，都是由“排戏先生”给排，他会很多戏，手里有好多剧本，资料也多，能排许多“本戏”。

### 重回上海演戏

1939年春，我与师傅、师娘、哥哥一起回到上海，搭了“好莱坞”赌台子所办的京戏班。那里还有话剧班，演出不卖票，让来赌钱的人可以白看戏。我在班中仍演武生戏，师傅还给我应了武小生戏，如《虹霓关》、《穆柯寨》。我的演出受到了欢迎，“小武生”的绰号也在上海叫响了，演技也日益成熟起来，师傅、父亲、哥哥都非常高兴。

正在此时，出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哥哥竟得了“失魂伤寒”，突然病故。

父亲因哥哥的死受了刺激，不久就病倒了。半年之后，父亲也与世长辞。

1940年，“好莱坞”赌台关门，当时的“头牌”花旦董明燕要去南京，邀我为她所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及头本、二本《虹霓关》和《大英杰烈》等戏配演。我们同去一个多月后，我又回到上海，在浦东剧场演了一个多月以我为主的折子小武戏。然

后我又再到南京、芜湖和对江的玉溪口，在各小码头演戏，那一带是未沦陷的游击区。随后又在安徽、江苏各地演出。1941年又去时已改名叫当途、那时叫太平府码头的小镇子，与“小白牡丹”同台，我仍是主演武生折子戏。

## 出 师 以 后

这一年，合同到期我满师，滁州来人邀师傅、师娘搭班，我拜别了师傅和师娘，开始了独立谋生的生活。

母亲因家里开的小店铺无力支撑下去，只好带着小妹来南京找我。我因刚满师，自己没有演戏行头，也无能力养活她们，就与母亲、妹妹一起回到秧石镇老家，家中已是一贫如洗。

我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原想跟亲友借点钱置办些行头，但都落了空。无奈只身回到上海，找到第一个老师陈永奎先生，请他帮忙。他将我介绍给他的“家门徒弟”、唱麒派老生的陈鹤峰，正巧别人邀他去南京演戏，他让我一道同去。我随陈鹤峰在南京秦淮河边夫子庙旁的“南京大戏院”搭班演戏，为他配演。

六个月合同期满，回上海。一位朋友介绍我去“更新舞台”。在这儿搭班的“武行”全是新潮派，他们不服“五虎将”管。在上海，“五虎将”是武戏头头，凡戏班有关武戏用人等事宜均要经过他们。更新舞台搭班的“武行”，人称“二十一股挡”，却独立行事，不受约束，竟打倒了“五虎将”，在上海戏班中也很有名气。

我在这个班里与他们相处得不错，平时参加戏中武打演群戏。有一次一位武生演员因应了一个堂会演出，恰与戏院演出时间冲突，临时让我替演，我答应了。演出后反映很好，被在更新舞台搭班的著名武生赵松樵先生看中，他表示愿意教我戏，并让我为他配戏。赵先生比我年龄大，长一辈，我称他叔叔。他演《狮子楼》时饰武松，我演西门庆，演后他觉得很好，对我很满意，也

就更格外想培养我，于是我就经常去他家学戏。更新舞台的前台老板董照斌也看中了我，想加意培养我。这段时间可说是我学艺出师以来较为顺利的演艺生活。

一段时间后，我感到每天演戏虽然高兴，但身处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尽看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觉得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正好此时，家乡杭嘉湖一带的京戏班也都知道我满师以后虽然年轻，但在外面已有些名气，就有邀我回家乡演戏的意思。妹妹已出嫁，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她也托人捎信给我。我想在哪儿都一样演戏，何况是回家乡演呢，遂放弃了在上海的优越机会，下决心回家乡了。

### 一下杭嘉湖演戏

1943年2月，我回到硖石镇老家，见到母亲，分外高兴。我在靠着嘉兴的振铎镇应邀搭了朱三宝的“一冲头班”。他的班名叫“新乐大舞台”，母亲也随我一起入班，住在戏班船上，帮我做饭，照顾我生活。

朱三宝的“一冲头班”，班底少，用的船也少。我住在“乌舢船”的中舱，是武戏主要演员的住处。进班后的头一天，演的是《柴桑关》，这出戏在南方叫《周瑜归天》，我饰演周瑜。因为年轻、冲、武能翻能打，身段功架规范，文能唱、嗓子好，一炮打红，以后一天连演一两场戏，三五天一换码头。

第二个码头去的南浔镇。这是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大镇，人口多，常有戏班南来北往，是一个戏难唱的地方。我在那儿连演几天的武戏都很受欢迎。第三个码头又去了双林大镇，那儿有句话“游过三十六码头，难过双林唐桥头”，也说明在那里戏是难唱的，但我的演出同样受到欢迎。随着所去的码头越多，戏也演得越多，粗粗算来，所演过的折子武戏有六七十出之多了。

尽管演武戏是自己的特长，但对戏中的唱念也绝不马虎，还

要精雕细刻唱出好来。如在《淮都关》又名《收子都》中，一段摇板，一段流水，这一慢一快唱段，我都格外注重抑扬顿挫，耍腔细致，根据剧情唱出不同风格，因此每次唱完都得到喝彩。

在表演方面我也格外下功夫，注意表演的细腻，尤其注重眼神的运用，以神传情，表现人物。如在《独木关》中饰演薛仁贵，戏中薛是在病态中出场，我除了运用形体动作表现外，还反复揣摩，运用眼神技巧，练出特殊的眼神，将病中薛仁贵的神态表演出来，得到很好效果。那一阶段我倾注了全力演戏，受到了家乡观众的欢迎，自己的技艺也越来越提高。

在我所演的诸多武生折子戏中，有多出体现南派武生戏特点的剧目，尽展武生功夫，注重演唱、表演，常在戏中有边耍枪花边唱来表达人物心情的段落，或是打一通唱一段，对演员要求文武兼备，难度较大。这些戏几十年来在我脑海中，始终记忆犹新。

## 几出南派武生戏

1. 《驱车战将》：这是一出战国戏，内容是说齐国与鲁国结成联盟，派兵攻打宋国。双方交战时，鲁兵假扮“虎、豹”，将宋兵吓退。宋国大将南宫长万一身武艺，力大无比，非常骄傲，他不把齐国放在眼里，奋勇作战。鲁庄王在暗中射箭，把他擒住，劝其写降书后放回。长万回国后受宋王羞辱，宋王又在与他下棋时借他输棋讥讽他是“屡败囚徒”。长万气极，将宋王砍了，太子跑到鲁国搬兵。长万是孝子，在逃走时，推车带着年迈母亲离宋，鲁兵后面追赶。此戏情节感人。长万边推车边向母亲唱叙战事。戏中“出征”一场导板第一句是“气吐虹霓马咆哮”，紧接唱流水蹀板，唱腔好听动人，唱词表达他的孝意。在追兵到来之时，他边推车边挡将，再接唱，最后将车推到山后，其母下场，后边追兵齐发箭，母被射死。台上一桌表示山，此时长万扔手中枪的刹那，一跃上桌，同时接枪，再与鲁兵奋勇作战。这出戏扮相也

很别致，南宫长万头带狮子盔，身穿乌绒靠。这是改良靠，一色的乌绒，不绣花，上缀大铜泡，钉出花样，胸前有护心镜。脸是俊扮，带五缕长须，这是南派扮相，从真实胡须出发设计的。此戏技巧很多，是一出非常好的戏。

2. 《广泰庄》：这是一出明朝戏，也叫《三请徐达》。戏的内容是描写朱元璋在登基之初，准备攻打采石矶，无人挂帅。军师刘伯温出主意去请已退隐在广泰庄的徐达（号国显）。徐达不肯出，于是定计先用“乌鸦兵”搅乱广泰庄，再让徐达的表弟常玉春请来徐母，晓明大义。徐母自缚城楼之上，常玉春等人引徐达对打前来救母，趁机烧了广泰庄。徐达见母被缚悲痛欲绝，最后方知是计，归顺挂帅。此戏连唱带舞，边打边耍枪花，打败一将唱一段，然后再打。至城楼前，徐达、徐母、朱元璋、刘伯温、常玉春的“五音连弹”演唱更是好听流畅，徐达的唱词很感人：“徐国显来至在疆场之上，战疆场用目来观望，好一似万把刀剑刺我的胸膛。我只说广泰庄烈火之中娘把命丧，哪有个人死又还阳，除非是大梦一场，怎不叫儿痛断肝肠。”在此戏中，常玉春与徐达对打，并边打边引他至城下这一段表演充满诙谐的气氛。徐达怒气冲天，常玉春以假作真，还用激烈语言激怒徐达，边打边唱，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这出戏。

3. 《一箭仇》：是水浒戏。此戏牌子曲很多，而且非常好听，戏中对打把子都非常好。史文恭与燕青打“棍破枪”，史文恭与武松打“小平”把子，史文恭与卢俊义打“枪架子”，史文恭与武松打“拳架子”，又叫“叉拳”。戏中还有对打双方边打边琢磨战术，然后再打，趣味横生，很吸引观众，这是与别的武戏不同比较别致的地方。

在杭嘉湖常演的文武并重的武生戏之外，还有些戏是按梆子剧目的演法，念白全为押韵，念得很快，边念边做，全戏在紧张、脆、快、干净利落的念白及表演中演完。如《血溅狮子楼》，武松念：“为兄杀了西门庆，武二发配恩州城，二公带路往前进。一个



个使钢刀截杀武松，正行来用目睜，再叫二位听分明”，最后唱一句“再飞云（哪呀）杀解公”，之后接念“假扮解公要进城，黄沙迷了我的眼，大路神仙难认清，桥下有水把眼进”，接着走技巧翻筋斗，再接念“混进城去杀蒋忠”。待上了鸳鸯楼，音乐奏过门，接唱“武二郎上楼来杀人无数”、“杀丫环和院公”。当听到送酒的上来，武松堵着门，边杀边念“乱鼓咚咚，一个来了一个死”，杀死之后接念“满门家眷我杀死”。全戏在顺口的念唱中，配合动作、表演，穿插技巧，再加上火爆的锣鼓经配合，一气呵成演完此折情节紧张的戏，看起来非常带劲。

## 同台演戏结良缘

我在朱老板的“一冲头班”演戏半年合同期满，又有王福田老板约我去搭他的班。

这时，班里来了从上海来搭班的两师姐妹，师姐叫陈美娟，与我同岁。她也是苦出身，是上海“共舞台”的著名演员“女叫天”的家门徒弟。她学艺出师后，因条件好、艺术精，师傅非常关心她。但因当时在“共舞台”演出的前辈多，名演员多，她的实践机会少，师傅认为应让她多闯闯，就让她母亲带着她和师妹同下杭嘉湖搭班演戏。陈美娟与师妹在王老板班里挂头排。她们母女三人住头舱，我与母亲住中舱。在每天的生活、演戏中，我们相互关心，渐渐有了感情，我们的两位母亲也很投缘，都对对方的儿女很中意，于是定下了这门亲事。

我本与王老板定的合同到阴历6月，此时是4月底，可是我为王老板安排的戏不妥与他发生争执，就离班回家。与母亲商议婚事后，5月回王老板戏班接了陈家母女来到硖石，1944年阴历5月11日结婚成家。过了些时候，为了生活，我独自一人去苏州的“开明大舞台”搭班，与麒派老生陈小木同台演戏，他是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辈的演员。我在苏州一直演到年底。后来，

妻子回到上海，我的长子出生，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给儿子起名叫徐尚宾，意为高尚的宾客。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妻子娘家亲戚的一间小阁楼上。

以后，母亲托人写信说杭嘉湖的朱三宝老板听说我娶妻生子，此时又未搭班，遂邀我们夫妻同去搭他的班演戏。为了生活，我与妻子将儿子留在上海，来到朱老板的班上。

### 艰难的演戏岁月

1945年，正值日本即将投降之时，未走的日本人慌得可以，也更加猖狂，社会秩序很乱，人心不稳。二下杭嘉湖戏班后，朱老板让我们夫妻以演艺入股，共同分担戏班营业的好坏。为了能演的红火和多演些日子，我还在上海邀了一拨儿人同去。如唱小花脸的孟鸿茂与他妻子王惠云，孟是著名演员孟小冬的弟弟，外号叫孟老七。他嗓子好，表演也好，如在《彭公案》的戏中他饰演欧阳德，戏中噱头多，几句唱下来，准能“奔”下好。我们来到杭嘉湖一带本以为可以稳定的演出一段时间，谁知由于政局的混乱，老百姓生活不安定，没有心情看戏。这样不景气，只演了一个多星期，就演不下去了，只好把请来的这拨儿人送回上海，我与妻子回到硖石老家。这时传来日本真的要投降的消息，许多汉奸摇身一变，打出“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发国难财，到处明抢暗夺。我一看乡下很乱，赶快将我们的行头、行李运回上海，让妻子随后也赶回上海。

等到“八一五”日本正式投降后，我与妻子又应邀到杭州的“大世界”（现在叫“东坡剧场”）搭班演戏。我们赶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去开锣，谁知只演了一个多月也演不下去了。当时物价飞涨，币值不稳，日本时期发的“储备券”已作废了，社会秩序非常乱。我和妻子又去了杭州湖墅参加那里国民党的一个剧团演戏，时间不长，那个京剧团就解散了。

1946年，我租了这个京剧团的行头，从杭州邀了一些人，我算一个带头人，去杭嘉湖一带演戏。那时正是春天，不想赶上梅雨天，连着下雨，等了好几天也不见晴，无法演戏，只能散班。为了义气，我想当初是在杭州邀的人，虽然演不成戏，未挣到钱，散班也要把人送回杭州。我与妻子将仅有的一只镯子、一个戒指卖掉，每人还发了一笔花红钱作为生活费。虽然自己所剩无几，生活也处于艰苦状态之中，但我认为这是我应负的责任，做事要有始有终，要讲信义，这也是我做人的原则，这样过后想起此事心也是安的。我租了一条船将邀的人送回了杭州。

当我把人送走后，将租来的戏箱如数还到那个京剧团留守处时，讲了演不成戏暂还不了租钱，请他们再借些钱，等我回上海挣钱后，一并还上。但这个国民党留守处的人不但不答应，还将我们自己的戏箱也扣了。我个性很强，并不怕他们，即与他们发生争执。我说你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箱子，如有值钱的东西尽可拿走，但不能动我们的行头。有一个姓史的科长，他在我面前耍了两面派，要使我走投无路。幸好后来与一个姓严的军需官说通了，才又借了18万法币，把戏箱拿走，讲明回上海借钱还他们。这样，回到上海，我与妻子赶快搭班演戏，挣下钱，他们后来派人来取，我们如数还了这笔钱。

## “大上海”的菊坛事

我们重回上海，找到妻子的师傅“女叫天”，搭了她的班，在“共舞台”演戏。此时共舞台的老板叫周剑星，是张善琨的徒弟。

当时，共舞台常演连台本戏，剧目由排戏先生一本本的排。在共舞台演戏的头排演员是麒派老生赵如泉，他还常演《济公传》和《彭公案》的戏。那个时期，小杨月楼、武汉的郭玉琨都在共舞台唱戏。郭玉琨的“出手”功夫很好，有“出手大王”美称。小王桂卿的“出手”功夫也好，他们俩人都是著名武生，他们的

“出手”功夫在上海属一流的，直到现在武戏中常用的“宝剑出鞘”功夫技巧就是郭玉琨创造的，后辈人纷纷效法。郭、王二人在艺术上谁也不服谁，暗中叫劲。比如新排一出戏，其中设计开打套数，都互不通气，各自在家研究。当时有说词，如果我设计的开打比你强，在安排戏前后次序上，我即能在你后边，胜你一筹。因此事先让对方知道了要打什么，就会设计出比你还精彩的武打，把你的开打“刨了”。小王桂卿叫王强华，与我很投缘，小我四五岁，晚上一块演戏，白天一起练功，切磋技艺。

我在每天的连台本戏中只应开打，由于天天演，我与妻子记唱、念很快，没多少天全本唱词就都会了，一旦演员病了，生行缺人就是我上，旦行缺人就是妻子上。有一次，麒派老生钱麒童先生病了，《宏碧缘》中的花振芳无人演，我马上顶上，演出效果很好。我平时在班中与“五虎将”的武行兄弟相处得也不错，这样，我和妻子在共舞台演出直到1948年夏天。

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剧界演艺日益繁荣，戏院、剧场非常多。过去叫“上海第一台”现在叫“大舞台”的戏院，既演京戏老戏，又演本戏。“黄金大戏院”固定演“京潮派”戏。“共舞台”多演本戏。另外还有许多公司所属的剧场如“大新”、“永安”、“先施”、“新安”、“福安”等。娱乐场有“大世界”、“小世界”、“新世界”等等。

那时上海相当盛行演本戏，除周日有日场外，每天是晚上6点开戏，一直演到夜里12点散戏。如果上座好，就一直演下去；如果观众少了，就开始排下一本戏。晚上散戏，演员吃完夜宵后，夜里两点开始排戏到天明。

本戏内容有新编历史剧、神话剧，如《观音得道》、《惊天动地》、《开天辟地》、《金鞭记》、《狸猫换太子》等。

论起在上海的名角儿，那是南方人、北方人都有。早年间，京戏传到江南，并无科班培养学生，许多成名演员是老先生培养的家门徒弟；另有很多是在北方“坐科”，以后落到南方的好角

儿，尤以北平到上海来的居多；再就是一些北平的名角儿，经常北来南往，数年之中，绵延不断，为繁荣南方京剧艺术起了很大作用。

在“四大徽班”进京时期，与京剧前辈程长庚同辈、著名红净李洪春先生的老师、外号称“老三麻子”的王鸿寿，就是以演“老爷戏”闻名演艺上海的好角儿。

武生演员有名享上海的高雪樵、张德禄等。花旦名角儿有芙蓉草、黄桂秋等。当时的上海“四大名旦”是小杨月楼、刘小行、黄桂秋、徐碧云，徐碧云先生是著名琴师徐兰沅之弟。

近代的名演员中，有在北京坐科、搭班后名扬上海的周信芳先生，有我的老师赵松樵先生，有与我同过台，也是名扬上海的赵如泉先生，他也是“老爷戏”《彭公案》、《济公传》演得好的名角儿。

在上海的名角儿里，享誉南北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的艺术，尤要一提。盖先生是河北省人，后到上海。早在1934年我随师学艺时，曾同搭盖先生班去大连演戏，即对他非常崇拜。

盖先生的艺术特点可以归结为稳、准、狠、新。他所演的戏中，不但处处体现出深厚功底，还特别注重不同人物的不同形象的塑造，使他所演的众多武生角色个个生动逼真。如他演的武松，不是只按一般武生演法只讲“边式”，而是特别有“心里劲”。出场动作设计细致、讲究，一出场走一顺边的“挫步”，亮相时不是一般“握拳”，而是“栽锤”握法，然后另一手提棍，再梗脖，立刻英武过人、勇猛耿直的武松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他在演戏中还格外注重细节，如在《打店》中，演武松脱靴时，是面向台里，只让观众看背后到戏，脱完再转过身，时时处处给观众舞台美的感受。在他演燕青时，又设计与人物个性相符的动作造型，在“握拳”上也下功夫，将掌心向上，从细微处一变化，给观众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他所演的人物都有区别，显示出迥然各异的特性。

盖先生在《闹天宫》中，设计了很多新颖、别致又风趣的表

演形式，处处表现着艺高功深。如在四大天王出场时，手拿各种不同道具，打伞、抱琵琶、拿圈等，他所演的孙悟空与四大天王相对见面，在对打中分别夺过对方的“武器”表演一番技巧，展示不同的功夫。最有意思的是他夺过琵琶后，在台上真的弹了一曲“夜深沉”，博得台下观众喝彩声。我看他演此戏时，他已是五十多岁了。

盖先生演的《霸王别姬》更表现了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首先是扮相独特，他饰演楚霸王勾紫膛脸，带“脸子”，形成大脑门、挂“鼻子”，这个扮相与南派《斩颜良》一戏中颜良“挂脸”扮相有相似之处。楚霸王穿改良靠，带塔盔，兜络腮胡子，挎剑插鞭，带弓箭。在《九离山》一场中，楚霸王与汉将对打，将身上所带兵器一样样拿下与之比武，显露功夫，戏中的24个兵士也是手拿各种不同兵器，各有不同表演，走出各种不同图案的队形，非常新颖。

盖先生不墨守成规，极富创新精神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京剧武生艺术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可谓独树一帜，光彩夺目。

## 再下杭嘉湖演戏

在上海“共舞台”演出两年多以后，我们感到总在“本戏班”演出没有多大出息，只能解决谋生问题，谈不到个人艺术的发展，遂不想再呆下去了。

这时，杭嘉湖的王福田老板又来上海邀我再搭他的班演武戏的主戏，我就离家随他走了。当时正是热天，老板并不管演员吃不吃得消，只以赚钱为主。每天我要演“四块”，也就是四出武戏，下午、晚上各演两出。头一出短打武戏，后一出靠把戏，如前边演《四杰村》，后边演《驱车战将》。演出非常累，吃得不好，天热又不能好好休息。没有蚊帐，蚊子像大轰炸一样，成群结队、铺天盖地来叮人，闷热的天气中，只能拿被罩着脸睡。这样十几

天后，我就病倒了，鼻子不停出血，一连3小时不止血，躺着也不行，只好找个偏方用什么东西烧成灰堵住。后来实在支持不住，跟王老板请假回上海，鼻子又流血5个小时，流得脸发白，没有血色了。其实我得的是伤寒病，仍是“脱力伤寒”。

这时上海有一位名医叫张龙子，又叫张龙棒，医术高明，专治此病。凡是得了伤寒，到他手里就能治好。家里人刚送我看了病，王福田老板竟追到上海来。他说，戏班的演出早已定好日子，买戏看的东家听说我病了不相信，要他把人抬来，放在台口让台下的人看了，才有交待。这时我连路都不能走，他找人把我搭到“杭嘉湖”，在一个码头的台口搭了行军床，让我躺在上边，看戏的人看我是真病了，才没话说。这样，又把我送回上海养病。

回到上海后，我鼻子又连续出血八小时，再请那位张大夫看病，才稍稍好一些。我因每天只能吃些汤水，人瘦如骷髅，熬到8月，慢慢能下地走动了。我一人悄悄出去吃了一客生煎包子，又买了一斤香脆饼、两个柿子，吃了个痛快。回家后马上感觉不对，拉了三次稀，人站不住，倒在地上。家里人说我是胡吃了东西，我还不承认。病情发作也不敢去找张大夫，因他有规定，认为伤寒病人治病期间胡乱吃东西肠会穿孔，所以只准喝些汤水，如若违反就不给看了。后来还是妻子去求了她师傅，请她的私人医生用西医来治，打针吃药才把我救活。

## 上海解放前后

我的伤寒病好了以后，虽然还被承认是在“共舞台”搭班，可因为体力不行，实际上什么武戏都演不了，只能以养身体为主。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好了一点儿后，就上台演些一般角色，仍是不能来重活儿。

这时上海社会很混乱，物价一天三涨，人心惶惶。我家已有三个孩子，除了老大尚宾，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月伶，一个叫月俐。

侄女在家帮着带孩子。家中人口多，经济负担重。我不顾身体衰弱，除了在“共舞台”演出，还去大兴公司的“大京班”赶包。我还介绍在北平“荣椿社”做过科的王永泰一起去。他到南方落脚，在我家包饭，我们还曾合演过《三岔口》。

上海解放前夕，社会更加混乱，演出越来越不景气，戏院、剧场都停演了，我们一家的生活又没了着落。我的师傅傅永利老师家中生活也极为困难，我就将自己家中仅有的一点米送去，解燃眉之急。我自己去做点小买卖，到十六铺批发点白薯、木柴，回家之后，将木柴劈开成小块，当成生炉子用的引火柴去卖。因不会做买卖，等弄回来自己加工后再卖时，物价又涨了，没有赚只有赔。这时每天只能以配给买的“户口米”充饥。这种米与北方吃的“杂合面”同一个意思，不过是“杂合米”，米中虫子、沙子都有。为了生存，也只能煮熟硬咽下肚子里。每天还要躲避大街上国民党抓壮丁，抓上了拿不出钱就要送走。

就在上海解放的那天，清早一醒，到大街上一看，解放军已进城，全睡在大街上的马路上，对市民秋毫无犯，一点没有干扰。这使得上海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亲眼看到解放军的纪律严明，见到解放军有如见到亲人一般。接着就是游行庆祝解放，我们全家都参加了欢迎解放军，我高兴地在游行队伍中挥舞大旗。

“共舞台”恢复了演出。看戏的观众多了，上座率一高，就采取了分账按收入比例拿钱，除了工资基数，还能分到茶堂卖茶和卖戏单赚的钱。这样，每天再加上戏票的分红钱，就够生活了，全家人欢天喜地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

## 参加戏曲讲习班

新中国建立以后，戏曲界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改革运动。1949年10月2日成立了“中华戏曲改革委员会”，11月1日改称“文化部戏曲改进局”，领导具有历史意义



的戏曲改革工作。其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了几届讲习班，向戏曲界的人士讲述戏曲事业的重要与改革的意义。戏改局的领导也到讲习班亲临讲课。

我参加了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讲习班，除京剧界许多人士之外，还有越剧著名演员傅全香、范瑞娟等也来参加。

在讲习班上，我初次见到了戏改局总支书记兼秘书长马少波先生。他当时年仅31岁，风华正茂，既是首长，又是教师。课堂之上，他侃侃而谈，讲国家对戏曲事业的重视，展示了戏曲事业的美好前景，讲“推陈出新”的重要性，激发了在座的每一个戏曲演员要为这个事业去奋斗的信心。

通过40天的学习，参加的人都深受教育，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学习班结束之时，还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册。

上海的戏曲舞台有了新面貌，摒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共舞台”除经常上演传统戏外，还排了新的本戏《人民英雄传》，是讲朱元璋的故事，演了两本以后，又换了《水泊梁山》，在头本《智取生辰纲》中我饰演阮小五。

这时我的演出地位提高了许多，促使我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对过去所演过的戏开始整理，尝试着如何去旧出新，考虑如何演得更好。

上海戏曲界成立了工会组织，发起号召买公债，我们都踊跃参加，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还上街跳腰鼓舞宣传，热火朝天。

1950年后，演出收入有了保障，生活越来越好。我当了工会消防小组长，又参加了篮球、足球、乒乓球队，白天打球、学习，晚上演出，精神非常振奋。

## 初到北京

新中国建立后，戏曲改革运动逐渐掀起高潮，京剧界的许多

剧团都有了变化。关于中国京剧院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刘英华先生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成立及其衍变纪实》一文中谈到：“1949年10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成立，原华北平剧院部分人员进入北京……并在京吸收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许多名演员参加，重新组成隶属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京剧研究院’。”“京剧研究院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形势下成立的新的演出实验机构，纯粹是以从事京剧改革的实验示范为主要任务的新的艺术表演团体，它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

1950年夏，中央组织了文艺界赴西北慰问团，由沈钧儒先生带团。实验京剧团中著名演员张云溪、张春华等人都参加了。他们走后，剧团武戏力量薄弱，武戏演出也受影响，为了补充力量，领导派郑亦秋先生到上海来邀演员。郑先生既认识不少上海演员，又认识“共舞台”的刘文魁经理，邀人比较方便。同时又通过上海文化局出面，到“共舞台”、“大舞台”、“中国大戏院”的京戏班中邀演员，讲明自愿报名参加，自己开价定工资，合同先定3个月，这期间允许乙方辞甲方，甲方不能辞乙方，合同期满后，愿意留在北京的人可继续工作，不愿留下的保证送回上海。

我听到邀演员的条件这样优厚，又有机会去北京，就非常愿意去，遂报了名。在自定工资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只报137元，比在“共舞台”演戏时略高一点。

我们一行17人来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戏改局局长田汉和其他领导请我们吃饭。他说，京剧改革也是革命，咱们一起搞革命。我们住在东城区南河沿内南湾子胡同四号，一条幽静的长街上。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很新鲜。

参加排练、演出以后，我的心情非常舒畅。这里的工作作风与过去所在的旧戏班有天壤之别，剧团中民主气氛浓厚，无明星制，只要你有本领就能得到发挥的机会，令人感到非常温暖。

3个月的时间匆匆过去了，除李影德与我愿意留下，同来的上海同乡大多因水土不服、思家心切等等原因，都要回去了。我想当初既然同来，为了义气，此时也要先一同回去。我向团里领导表示，安置好家里，一定回来。

回到上海后，上海京剧院已成立，周信芳为院长。京剧院的同行让我同去参观院址，并动员我也参加。我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表示自己既然已答应了留在北京，不可言而无信。上海同行纷纷请我吃饭，依依惜别，我独自一人重返北京。

### 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

1950年，我从上海来到北京正式加入了实验京剧团，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生活。那年我29岁。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

1951年7月，我所在的实验京剧团加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成为实验工作第一团，以后分为两个团，不久又成立了第三团。

这时，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文艺界先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慰问团赴朝，随后又组织二千多人的第二批慰问团。戏曲界去的人很多，各个剧种的演员都有，如评剧院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魏荣元、喜彩莲都去了。京剧团内也掀起报名高潮，我感到保家卫国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报名，得到了批准。

我们奉命过了鸭绿江，来到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以后，住进了山洞。京剧团分为总团一团，与评剧团同住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很深，有一房高，宽约5米，里边虽然安了电灯，但并不亮，洞口还罩了苫布，洞内氧气也不足。吃饭是到洞外做饭的地方去吃，一响警报，立刻放下饭碗，赶快往山洞跑，有时一天吃饭要跑好几次。几天下来，大家逐渐习惯，习以为常，动作也都非常迅速。供水也很困难，志愿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从山下担水上山。

我们住在山的中腰，演出是在山的上边，要走三四里地。上边有个较大的山洞可以演出，但因洞内高度不够演出需要，就须格外小心，但总难免出些问题，我们都是轻伤不下火线。我在演《四杰村》、《白水滩》时，有翻有打，很不适应。有次演《四杰村》，翻筋斗脚磕在桌子上，马上肿了，我忍着痛仍坚持演完，之后又立刻下山去给在山下的志愿军、人民军演出。

在高射炮阵地上，许多战士一天到晚监视着雷达，守着阵地不能离开，我们就去阵地演出。因为是空地，不能化妆，只能清唱。我除了翻筋斗还要耍剑给战士们表演。志愿军、人民军战士勇敢战斗，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令我们深受感动，我们也没有怯懦，尽管随时会有危险，但仍照唱照演不误。

当时的朝鲜战场上，虽然战争是严酷的，但志愿军一面英勇作战，一面照常开展娱乐活动以鼓舞士气。“志司”还经常安排跳舞晚会，我们京剧团的人大多不会跳交际舞，领导就让总政歌舞团团员必须把京剧团的人带活跃起来，于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就随歌舞团团员按乐曲节奏跳起舞来，欢快的情绪冲淡了战争环境中的紧张气氛。有一天下起倾盆大雨，总政歌舞团的同志将自己的雨衣脱下，全都给京剧团的同志披上，他们却在雨中纹丝不动，使我们非常感动，决心向他们学，更加抖擞精神为战士们演出。

在朝鲜慰问演出 40 天后，圆满完成了任务，光荣地回到祖国。在丹东总结后，又到天津进行总结评比。二千多人的慰问团中，评出六名赴朝慰问团模范文工团员，全是京剧团的人，有周瑛鹏、何金海、王玉让、糜金群、左云溪和我。我们六人被总团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届慰问团特等模范”，每人奖给一本纪念册，册中有金日成、彭德怀的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叶盛兰、杜近芳与我在朝鲜慰问演出的事迹，给了我很大荣誉。

## 令人敬重的马少波院长

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从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至建立了中国京剧院后的这 10 年间，是我艺术上得到更多的深造的 10 年，是我有机会将所学、所演的剧目中南北京剧艺术特点得以比较、借鉴、交融，从而使自己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的 10 年。

中国京剧院是受到党和国家重视的国家级剧院，将众多好演员组织在一起，去除旧戏班的陈规陋习，长期相互配合、交流，排练出一台台好戏，保持着团结合作的正气之风、干事业的奋斗之风、真诚相待的友爱之风。这些是与马少波院长的领导分不开。

马少波院长主持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工作后，对京剧院的建设倾注大量心血，辛勤耕耘，尊重艺术，爱惜人才。

当时京剧院实行了一整套严格、细致、合理的管理制度。为了提高演员的技艺水平、艺术修养、文化素质，院里举办了“艺术专训班”、“文武集训班”、“文化扫盲班”等一系列的训练班。在剧院内，老艺术家得到尊重，还实行名家带徒制，废除封建行帮，鼓励、支持勤奋向上的学习风气。对著名演员、艺术家更是按其风格分团，使他们能尽显艺术才华。对从外地来到北京的演员，为其创造演戏发展的机会，尤其鼓励青年演员不但要勤奋好学，还要有超越前人的信心和决心。

他常说：“我认为不管是‘初出茅庐’还是‘炉火纯青’，对这些人都要很好地爱护、扶持，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力量，调动艺术创造积极性。”

在剧院中，各项工作实行严格管理，细致安排，落到实处。马院长让演出处在办公室内将全剧院人员的名字都写在人名牌上，挂在墙上，上面记着每个演员的名字、所学行当，每隔几天，他就去看一次每一个演员正在排什么戏、演什么戏、学什么

戏，全都记在心中。他为每一个青年演员提高艺术水平安排计划，谁来任教，全都具体落实检验，创作室的人员正在写什么戏，什么时候排，也都一一落实。那时京剧院中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浪费一个人才。

在京剧院中还实行着极严格的彩排把关制度，不论是新排剧目还是加工整理剧目或是学习继承剧目，都要彩排，经过全院审查通过才能演出。每次彩排，马院长都仔细观看，既肯定成绩，又提出善意的意见，令人心悦诚服。在剧院的浓郁艺术氛围中，演员之间都能坦诚相见，相互尊重。

为了提高演员文化水平，使许多在旧社会没有机会学文化的演员得到学习机会，京剧院安排文化课，请文学组、编导组的同志担任教师，从拼音字母的ㄣ、女、冂、匚开始教，直至会念懂剧本。

马院长在领导剧院工作的同时，既创作剧本，还亲自登台讲授戏曲理论。马院长讲课中深入浅出，所举实例从大到小，从细微处点出程式表演一定要与剧情、与人物的真实感情结合，表演才能真实可信，使观众折服。记得他所举的《三岔口》一戏为例的情景。后来他在《戏曲艺术论集》中“联想”一节里写道：“《三岔口》也仅凭演员的表演，表现出对面不见掌的漆黑。假如观众没有这些生活经验，就无从联想，那么一切都将落空；如果有，大胆运用，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使观众也成为创造者，和演员们一起探索生活和艺术的幽静，发挥艺术的魅力。”

马院长在上课中讲到：当戏中人任堂会来到客店前“叫门”时，有“举手”动作，这一细微的“举手”到底是“拍门”还是“叫门”，动作一定要明确。如是“拍门”，似乎不合理，一般开店，店门是打开的，如是“举手”示意“叫门”则比较合乎情理。任堂会三叫“大哥该出来了”，此时应侧身站立，不应背对观众，使观众能看到人物心理活动变化。当刘利华“翻进”，站在任堂会面前，任的一瞬间反应应是很稳的，有定力的表现，而

不能用“惊”来反应，这虽是一刹那的表演，却体现着对人物的把握，不能忽视。戏中“摸黑”表演，台上灯光有几万烛之亮，而二人表演对面相遇却要像什么也没看见，这完全要靠对所演的环境有“真实”的感受，都要通过眼神功夫、表演技巧表现出来，使观众也有“黑夜”的感觉，才能感到这段戏的生动有趣，欣赏到演员的武功技巧。

那时，马院长还常请院外作者写剧本，请著名导演来排戏，请名演员来合作演戏，京剧院呈现着兴盛繁荣的局面。

### 向李洪春先生学艺

我在京剧院中曾有幸得到向京剧前辈李洪春先生学习的机会，得到他的亲授，受益极深。

当时李先生已六十多岁了，他对我很关心，主动地教了我很多东西，使我在技艺方面更上一层楼。李先生还亲授了我《反西凉》这出连打带唱、表演很讲究的功夫戏。

每天一早，在京剧院头一进院中设一张桌子，我沏好茶、买好早点，静候李先生。他在上课说戏之前总是先聊带说，从唱念做打到戏情戏理旁征博引，点悟启发，使我茅塞顿开。

李先生说戏上课时，身段动作的一招一式严格、讲究，唱腔念白逐字逐句要求，绝不马虎，精雕细刻直至达到要求。对于尖、团字的念法，也都有讲究，即使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戏中，或就是同一出戏中，都要根据要求来决定念法。举例说，如“三国戏”中，在一段念白中念：刘玄德与张翼德同是“德”字，念刘玄德的德字就不上口，念张翼德的德字就上口，这是根据人物身份的不同就有不同念法。

在讲到戏情与念白内容的统一时，他举了《古城会》中传下来关羽唱词有“吹得透骨寒”句，而马童的念白却有“天气炎热”之词，二人念唱出不同季节。看似很小的地方，但李先生却

是认真对待，他让马童改念“路途劳顿”斟字酌句中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严谨作风。

李先生在讲到 he 拿手的红生戏中关羽的表演时，说为什么舞台上的关公总是“眯”着眼，因为他是丹凤眼，一睁眼就表示要杀人了，通过眼睛的睁、闭、收、放来表现关公的威武气魄。在使用兵器上，一般长靠武生拿刀是单手，演关公却要双肩垂、双手拿青龙大刀，展示关公的大将风范，不同寻常的身份。

李先生传授我《反西凉》戏，我学马超一角。在全戏学成彩排时，不但全院各团包括团长和编导科、文学组的人都来了，院外著名演员厉慧良先生也来观看，那种当面审查的气氛对于无火候的演员真能被看“化”了，这一关是不好过的。当时因这出戏学得实在，自己在技巧、功夫上都有把握，又有老师把关，彩排时胸有成竹，稳得住，顺利演完，得到一致肯定。这出戏解放后在北京还无人演过，后来公演时我也获得观众好评。

## 在中国京剧院演戏

我在京剧团到京剧院的十年中，演出过的传统折子戏有：

《汤怀自尽》，这是一出南派武生靠把戏，也是我到京剧团时最早演的戏。

此戏难度较大，需要走很多技巧，当时北京还无人演。戏中打三四套把子，同台演员与我合作非常好，打得不是“八不挨”，而是严丝合缝，因此每套打完都能得到满堂彩。戏中还有边唱边耍枪花的表演，每演至此也都获得满堂彩。这出戏演出后，观众反映很好。1953年我们在北京市青年团组织的慰问建筑工人的数场演出中，更是得到欢迎。当时同去的著名演员王玉让跟我开玩笑地说，你这出戏演出场场有好，成了固定的了。

《周瑜归天》，这也是一出南派武生靠把戏，在北京也算我开头演的。



此戏武功重，难度也很大。其中有上马之后，一条腿抬起要始终不落，然后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马鞭，唱一段“二六”，唱完之后走“鹞子翻身”、“下叉”，起来之后仍是单腿独立“干碾”转十几个圈，由慢变快。这是一出要功夫的戏，没有好的腿功是演不了这出戏的。我演这出戏也受到观众欢迎，演出中也常是喝彩声不断。

《花蝴蝶》，这是一出南派短打武生戏，北京演的人也不多，戏中“趟马”中技巧很多。

《武松打虎》，这出戏当时在京剧院李少春、张云溪都演过，我平时看他们演出，学习他们的长处，再加上原来在南方所学综合起来排出。这出戏昆曲唱腔是曾为梅兰芳先生吹笛的霍先生亲自吹笛、迟先生说腔。演出后，也获好评。

《白水滩》，也是一出短打武生戏，后是我经常上演的剧目。

《反西凉》，是向李洪春先生学习的剧目，由李先生亲授。

我在京剧团至京剧院工作的十年间，曾与多位艺术家同台合作，受益很多，亲见他们在舞台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高超技艺与艺术魅力。在与他们的合作中，不但艺术上得到很大收获，在平时的排练及演出中，许多点点滴滴的事情体现出他们的人品与艺德也都让我深受感动、感触很深。

## 我与多位艺术家的合作

如与叶盛兰先生的合作：

素有“小生之王”之称的叶盛兰先生，确是文武昆乱不挡、难得的小生人才。他艺高但人不骄。在他与著名演员杜近芳合演全部《吕布与貂蝉》时，前边带《三战吕布》就是《虎牢关》，由我演前边的吕布，他从《人头会》杀张温演起。前边的“三战”中，过去一般的演法是吕布与刘、关、张同时打即可，我演时，加进了自己的创造，开打时分别打，最后再与三人对打，增

加很多把子。与张飞打是枪对枪，与关羽对打是刀对枪，与刘备对打是双铜对枪，最后用枪与三种兵器对打，这样越打越激烈，演出效果很好，叶盛兰先生也很赞赏，没有艺术家的架子，与我合作很好。

在《锤震金蝉子》一戏中，叶先生饰演岳云，我演关胜后代关琳。在演此戏之前，我在前边先演《武松打虎》一戏，演出中我走的技巧与表演奔下好来，观众喝彩不断。后边与叶先生同戏合作仍旧很好，他一点没有主演不愿次主演前边有“好”的狭隘想法，而是很大度，不愧名演员风范。

当天桥剧场落成开幕时，叶先生与杜近芳联合演戏庆祝，我在前边演《白水滩》，参加了这场有纪念意义的演出。

与李少春先生的合作：

在艺术上我是“识真不识假”，对于著名武生演员李少春先生，我认为他是武生行当中真正的好人才。虽然他年龄上与我相仿，但在艺术上我很崇拜他。他平时不爱多说话，但对人很好。

《武松打虎》一戏是他与著名武生张云溪先生所演的拿手戏，我吸收了他们俩人的长处，又结合在南方所学，融合到自己排练的戏中。我彩排后，请李少春先生提意见。他肯定了我具备演此戏所应有的条件，并诚恳地说，你既让我提意见，我就不客气地提几点。在武松喝酒时，每一杯喝下去都应有不同层次的表现，第一杯喝下去如何反映，第二杯喝下去又是怎样。酒既不能喝得烂醉如泥，又不能喝完无动于衷，缺乏真实感不行，醉了就别打虎了，但又不能无醉态。演这出戏他的理解很深，他将自己的体会一一告诉我，很令我感动。

《龙凤呈祥·回荆州》一场戏中我饰演赵云，我请他给说“跑车”那段戏。我们是在京剧院一进大门有个“二舞台”上说的戏。他让我先走一遍后说：要注意“三叉花”的“编辫子”，拐弯时“靠旗”如何变化非常重要，“靠旗”要像“顺风旗”一样变得顺才行。在走“挫步”时，“靠旗”要“压得住”，观众就看

你这一点。

在我们还未分团时，我曾陪李少春先生演过《取南郡》，他演周瑜，我演赵云。同台开打效果很好，他夸我手里不错，说我把子打得好、劲头好、基本功深。

他的文武老生戏也非常好，在全部《将相和》中，他饰演蔺相如，也都有精彩的演唱和表演。我在戏中演李牧，此角色叶盛章先生曾演。我在戏中与白起的“对剑”每次演出都受到观众欢迎。

通过与李少春先生的合作，我感受到他的确是受到高人传授的好演员，艺术上不保守，以诚待人。

与李和曾先生的合作：

在《三打祝家庄》中，李和曾先生饰演宋江，李元瑞先生饰演石秀，我演广成，是老生“活儿”。其中“求和”一场戏有相互对唱，李和曾先生唱得调门很高，我紧接其后唱“流水”。二人对唱要求唱得活，不是“死唱戏”，也不是“唱死戏”，要求相互配合默契，表演要入木三分。

在《江汉渔歌》中，李和曾先生与高玉倩主演，我饰演刘芳。此戏著名演员李宗义先生与云燕铭合演，张春华饰演副将刘芳，他的武打像闪电一样快，功夫非常好。我演此戏时与他打的把子有所区别，是根据自己的条件设计的，打三套“剑枪”，效果很好，多年以后，萧盛萱先生请我教他小儿子这套“剑枪”。在这出戏中，我唱的两段“快板”都是紧接李和曾先生的唱连下来的，他与李宗义先生均是高调门，如无好嗓子，是接不下他们的唱的。

与茹元俊先生的合作：

在《一箭仇》中，著名演员茹元俊先生饰演史文恭，要求我演武松，合作得非常好。戏中开打配合默契，其中用了一套“小平”把子，我用单刀，对打时锣经很快，打得很带劲，打到最后，一刀两刀，我鹞子翻身，一个硬抢背起来亮相。每演至此，台下一定有“好”。后边我们还打一套“叉拳”，每次打完也是台

下叫“好”连声。这套“叉拳”还是我在南方所学，盖叫天先生与儿子张义鹏打得就是这套拳。

在《三侠五义》中，茹元俊饰演展昭，李元瑞饰演白玉堂，谷春章饰演蒋平，我演花冲。这出戏人位齐，相互配合也很好。戏中我也有高难技巧表演。当花冲逃到鸳鸯桥时要“跳水”，蒋平站在桌上代表“桥”，我要从他两腿中“窜”过去，这个技巧叫“认针”，必须二人配合很协调，时间差掌握好才能完成，那时在京剧院内还无人能走此技巧。

在茹元俊所演《林冲夜奔》中，我演徐宁。在对打时，他要求我将在《江汉渔歌》中那套“剑枪”教他用上。

与白登云先生合作：

在京剧院中，著名鼓师白登云先生也是令我尊敬的前辈。人家是什么戏都见过的老先生，但仍然谦虚，尊重艺术，提携后辈。每逢他从院中走过时，我都垂手站立，深鞠一躬。平时一般演员的戏他都不打，但有一次我要演《周瑜归天》时，他主动对我说：“嘿，爷们，今儿我捧你一出。”我连忙说不敢当，但心里却非常高兴。说戏时一遍就成。在说“导板”上场打“急急风”、走“掉毛”、“抢背”，然后一口血吐出，打“阴锣”。这个地方白先生说改一改吧，将“阴锣”改为打“战场”。演出之后，白先生又对我说：“志良，我那儿打得不合适，你那段表演还是打‘阴锣’合适，咱们下次改了。”白先生一点不摆名鼓师架子，一切从戏的内容需要出发，真是大家风范。

我还曾与李盛藻与言慧珠有过合作机会，是因著名演员杜近芳出国演出，京剧院特邀著名演员言慧珠来北京与著名演员李盛藻先生合演《龙凤呈祥》，我饰演赵云。这出戏中赵云是不好演的，不但需有功夫，还很讲究唱，杨派武生唱的调门很好。我能在这出戏中担任此角色，与他们合作，也是幸事。

## 在梅兰芳京剧团

1960年，北京市要成立梅、尚、程、荀四大流派京剧团，为充实力量，要从中国京剧院调一部分人去。那时我已在三团工作，领导决定将三团中70%的人调去梅剧团，其中也有我。

在动员大会上，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讲了话。我十分尊敬梅先生，经常听别人讲他为人如何厚道、如何好。他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平时并不常去。动员会上，通过他的讲话，深感他的为人谦虚、和气，并且非常幽默。

他说，我作为中国京剧院院长，在这里代表中国京剧院向大家致以欢送，我又作为梅剧团团长向大家表示欢迎。咱们戏班有句话，是“上场门”也通到“下场门”，“这边”也通到“那边”，“那边”也通到“这边”，所以，从京剧院到京剧团是一样的。梅先生说这番话时，还带着“身段”比划着手式，台下的人连着喝了几个满堂彩。

我们到了梅剧团后，与梅先生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梅剧团的副团长是著名花脸演员刘连荣先生，他与梅先生在舞台上是老搭档了，经常合作演出《霸王别姬》。梅先生去世前一年，我们随他到济南演出，我有幸在《霸王别姬》戏中饰演钟离昧，在舞台上听到他念的台词，那真比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声音都润，我听得都入了迷。每当我前边演完，定要在侧幕将戏看完。我对他的表演有了直接的感受，真不愧为京剧艺术大师。

梅先生演《奇双会》时，其中《写状》一折，他在戏中将李桂枝与赵宠新婚燕尔却又念念不忘要替父报仇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了。当演到后边，他在念到“三日后听审”的同时，做用手指轻弹赵宠帽冠的动作，又不禁流露出娇羞之态。梅先生虽已是60多岁了，但却演得维妙维肖。在《三拉》一场中，他在姜妙

香先生配合下演得非常精彩。

我们随梅先生在济南共演了20多天，每次演《奇双会》之前，我演《汤怀自尽》。初定戏目时，团内有人反对安排这出戏，说《奇双会》是吹腔，《汤》剧又是海派，联在一台演不合适。不过领导认为从内容看，此戏是岳飞手下大将汤怀的故事，完全可以演。意见不同之时，梅先生说，现在我们还分什么京、海之派别，只要内容好，观众喜欢就可以演。通过实践，如不合适下次再换别的戏。梅先生对待问题并不以艺术大师的身份压制其他意见，而且非常尊重别的艺人，还在很重的演出之前作调查研究。

正式演出前，梅先生很早就到后台，准备在上场门亲自看戏。他看见我，打招呼说：“志良，你吃饭了吗？”我说：“吃了。”其实演武戏之前是不可能正常吃饭的，这一问一答，是他表示对我的关心和安定我的情绪，我则深深理解他的关怀与支持。梅先生将这出戏整个看了。戏中技巧很多，枪花也要得很多，我一下没掉，还得了五六个好。对这出在北京没有演过的戏，梅先生以非常尊重的态度对待，使我深受感动。

当梅剧团要到一个小县张店演出时，梅先生为了接近群众，环境艰苦他也去。他坐小车先到招待所，团里人坐大车后到。大家一起去住处看他，他正在抽烟，见大家来了，连忙站起，将烟背到身后，退到桌旁把烟掐灭，客气地回答大家的问候，说：“我不累，哪有同志们累，同志们也要好好休息。”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对别人的谦恭有礼，平和待人。

我们回到北京后，本来很快就要去新疆演出，但梅先生病了，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梅先生去世，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在首都剧场举行，许多领导、各界代表、文艺界人士，以及外国使节都参加了。当时不但首都剧场附近，就连王府井一带都交通堵塞、人山人海。我们一直将梅先生的灵柩送到西山的“晓华山”墓地，还为坟茔填土，作最后的告别。

说来也很感慨，我在北京赶上参加三位艺术家的葬礼。一位是梅先生，一位是京剧名家王瑶卿先生，也是葬在西山，还有四大名旦之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他的追悼会是在厂桥的嘉兴寺举办的，由郭沫若先生致悼词，陈毅、贺龙等领导都去了，我们也都是送至墓地，为坟填土，也算有缘执弟子礼。

以后我曾随梅剧团、青年京剧团联合组织去南方演出。梅剧团有著名演员梅葆玖、梅葆玥、李宗义、李慧芳、叶盛章等人。青年京剧团有著名演员赵荣琛、李元春等人。头一站是常州，之后镇江、上海、杭州、南京一路演下去。到了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头天开场是赵荣琛先生的《锁麟囊》，我在前边演《两将军》。第二天是梅葆玖的《穆桂英挂帅》。这当中，海盐一个京剧团要我去他们那里当主演，并许以优厚待遇，我因种种原因未去，后随团回到北京。不久文艺界整改，四大流派剧团取消，合并为一个团了。

## 整改后到北方昆曲剧院

1963年下半年，四大流派京剧团合并后，只留下一部分人，为保存力量，其他人都调到北方昆曲剧院。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我虽提出对昆曲很不熟悉，但也服从了分配来到“北昆”。那年我42岁，自己抱定宗旨“顺其自然”。到北昆后，我组织一起来的同志彩排汇报剧目，我彩排的是《武松打虎》，还帮助其他同志排戏，如樊桂舫的《探庄》，贺永祥的《山门》，奚延玲的《秋江》等。这时，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表示了自己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排戏时热心作幕后英雄，无论排传统戏、现代戏我都有求必应，名义上我什么都没有，也从不计较。昆曲艺术家白玉珍老师让他的儿子著名武生白士林跟我学，说：“士林，徐老师会的很多，你要好好学。”士林后来演《三挡》一戏由我给排，毫无保留地给他说

戏。1964年随二队去山西、内蒙古演出时，我演《文成公主》中的可汗，每天还给学员韩相吉、孙启成等上把子、身段课。院领导安排我作行政组长。演出之余，我就帮演员换服装，装卸行李，自己会那么多武戏在舞台上无法演出时，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回到北京后，排现代戏《小红军》，李愚先生导演，我为武打设计。我还负责排学习剧目《一颗红心》。在北昆我与艺术家、老师们相处融洽，合作很好。除了与白玉珍老师经常切磋技艺，还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马祥麟老师关系也很好，在他的剧目排练时，我经常真诚地提出建议，马老师愉快地采纳了。

1965年过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被调到文化局组织的工作队，下到密云县堂子大队搞“四清”运动。事先讲明不能亮明身份，在10个多月中，不但党、政、妇全管，还要查账，每天吃派饭。1966年“文革”开始，奉令调回。我走时，乡亲们恋恋不舍，男女老幼好几十人相送。回到市里，先到党校学习，后到北京京剧团参加运动，也曾受到冲击。1969年1月，我妻子病故，令我悲痛万分。她本是很有才华的演员，为了我、孩子和家庭，放弃了在上海的演出生活，来到北京，照顾我与抚育子女。失去妻子后，我一人支撑家里，体会到“中年丧妻大不幸也”。

1970年1月10日，我被“解放”，下放到“五七干校”。在与大家一起劳动之余，我仍坚持练功，每天压腿。有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精神，我说将来会有用的。在干校，原北昆学员韩相吉与我同在一组，他主动找我学戏，我就教他练基本功。休假回北京时，我们常一起去天坛公园练功，教他“身上”，给他讲“手眼身法步”。后来调回北京，我们仍天天去天坛公园练功、说戏。

我调回北京后被分配在“中国科学电影制片厂”卖饭票。我以前未算过账，但在工作中，不论钱、粮、面、油票一样未错过，对此常常“自鸣得意”。我心中也常为自己的前途苦闷，曾



去看望当年中国京剧院马少波院长，他非常理解我和同情我，说演员如不演戏了，应到戏校教课，那是演员应去的地方。一句话说到我心里，他是那么了解我的心情，但当时他也爱莫能助。

1976年地震那天，我从睡梦中惊醒，惊慌之余，想到“科影”许多正在工作的人不能回家，要吃饭，我一定得去工作。天还未亮，我将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尚强一人留在家中，急忙赶到“科影”厂。

以后文艺归口，我调回北京京剧团，与石宏图一起担任了《三打祝家庄》的武打设计，是按在中国京剧院时演出此剧的路子排的，当年此戏又是按延安平剧院的路子排的。后来，我在北京京剧团担任了艺术委员会委员、武打设计。还曾在阎桂祥与李保排的《教刀》中担任导演、武打设计。

1978年秋，百废俱兴，北方昆曲剧院也恢复了。虽然京剧团挽留我，但我怕自己不去会影响其他人，为了顾全大局，我再次服从分配，毅然回到北方昆曲剧院。

## 传 艺 教 学

在北方昆曲剧院，我担任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并参加了剧院业务排练工作。我为白士林排了区别北昆《林冲夜奔》“一场干”的演法，而是按京戏路子共分五场、上徐宁的《林冲夜奔》一戏。又导演了韩相吉主演的《哪吒闹海》。我与韩的师生关系很好，从干校回北京后，我们教与学的关系始终未断。还是在京剧团时，他在基本功汇报中，走的那排“旋子”深得好评，对此我深感欣慰，后来那排“旋子”在好几出戏中都用上了。我们情同父子，他来学戏，我留他吃饭，以后他成家生女，连他小女儿上托儿所我都管送，过问关心他的衣食住行。后来他调到北京京剧院之后，与著名演员孙毓敏合排《翠屏山》，还请我去排戏。以前我还教他老生戏《南阳关》和一些武生戏，武教功夫，文教

唱念，对他倾注了心血。

1981年我60岁时，曾提出退休，李达院长找我谈话，他说你还能为人民多服务几年，何必那么早退。我又继续工作下去。

著名演员关肃霜曾来北京，并与北昆合演《金山寺》。多年未见，她亲热地叫我阿叔。解放前她到上海在“共舞台”演出三年，当时还是小姑娘，饰演《宏碧缘》中的花碧莲，她的扮相我还记忆犹新。

在北昆排练《牡丹亭》时，我又见到了马少波院长，他对我很关心，说：“你也是名演员，应录几出戏留下来。”我很受感动，更促使自己尽力将艺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除了完成剧院的工作任务，我还到别的单位和去外地教学，传播艺术。

1982年，我应好友徐元珊先生之邀到北京戏校教戏。他是系主任，请我为青年教师说《四杰村》一戏和教把子课。以后戏校领导想调我过去，但北昆未同意，教课七个月我分文未取，又回到剧院继续工作。

1984年，经中国戏校张志祥先生介绍，我去河南南阳地区越调剧团，与张合排改编为越调的《斟玉川》。在同去南阳的李兆芳教的《扈家庄》中，我排了王英的戏。戏中饰演货郎的演员要有上三张桌“偷盗”的技巧功夫，戏中“走边”身段中也加了技巧来丰富表演，练起来都很不容易。南阳越调剧团居住条件艰苦，吃的一般，又是热天排戏，很是辛苦，我却毫不在意，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 去福建戏校教课

我回北京不到一周的时间，福建省京剧学校请我去教《战冀州》一戏。8月31日动身，坐飞机到福州时正赶上满天大雾，不能降落，又飞到南昌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到福州，我的二儿子尚朋去接我，带去的一只烤鸭因天气热坏了。我的三儿子叫

尚强。1958年，福建戏剧学校来北京招生，当时许多京剧世家子弟都去了，如袁世海先生之子袁小海，王玉让先生之子王小让等，我因自己的朋友李盛斌先生在那儿当校长，会有个照应，就送两儿子去了福州，那年尚宾十三岁，尚朋八岁半。

我到了福州住在军区招待所，待遇很好。那次请了七八位老师，其中有原在北昆的老生演员王庆达先生。在这里，还遇到了几十年未见面的把兄弟、鼓师段贺亭先生，我与他在四人一间的房中同住，每晚二人喝酒叙旧。

我教了四个学生，一个是李盛斌先生的孙子。李盛斌先生是富连成出科，他在福州既是戏校校长，又是业务上的权威。福建京剧团来北京演出的《真假美猴王》曾轰动一时，这出戏即是他的儿子李幼斌导演的，他们一家在福州的京剧事业发展上作了很大贡献。

我教的另一个学生是在《真假美猴王》中饰演猪八戒的演员的儿子。还有两个学生则不是“门里”出身，但也都聪敏勤奋。为了使他们能学好《战冀州》这出戏，我每天一早还去指点他们练功，传授练功要领。告诉他们，翻“前扑”时要“上去一个蛋，下来一条线”，以及走“挫步”的要领等等。为他们抄功的是同从北京去的中国戏校刘玉卿老师。同时，我还为学校所排武旦戏《盗草》说“把子”，当初我在中国京剧院时，杜近芳、李慧芳演此折戏都是我配演鹿童。在福州，每逢周日，家长们都热情地请我去吃饭，以表谢意。我在福州呆了五个月，既教学生，又与儿子相聚，还与老朋友共叙友情，也是不亦乐乎！戏学成之后，彩排演出，深得好评。

我回到北京，正赶上剧院准备招收学员，领导安排我参加此项工作。我担任了第一课堂主要考试官，以考学生身段为主。第二课堂主要考试官是马祥麟老师，以考学生唱、念、表为主。以后生源不足，我又去远郊区县招生，在密云见到了搞四清时培养的大队长，非常亲热。学员班开课后，我作为教员，主要教武生

戏。

1987年，我退休后仍反聘继续教学。我主教了《雁荡山》一戏，说武打、舞蹈身段。教授学员宋军《界牌关》一戏，曾在比赛中得了青年调演一等奖。我还教授了《一箭仇》一戏，既教演员，又为乐队说声腔、曲牌记谱，很是辛苦，可惜后因故未能教完。

我为剧院培养的这批学生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 北地交挚友

初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但随着岁月的增长，在日久的相处中，与许多北方同行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梅剧团我相识了著名武生徐元珊先生。他是著名琴师徐兰沅先生之子。徐兰沅先生夫人与杨小楼先生夫人是姐妹，他们二人是“一担挑”。徐元珊先生与著名武生谭元寿是师兄弟，都是梨园界的名演员。

我到梅剧团时，他正因病未上班，休长假，但关系仍在团里，编制正好与我同在一组。我经常帮他领薪金并送到他家中，由此常来常往。我们俩人经常边喝边聊，非常投缘，成为莫逆之交。有时见徐兰沅先生，他很亲切，曾送我一副对联，写的是毛主席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破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其中喻意为：你参加革命早，留在北京非常好。落款：称我为志良贤契。据元珊说，此称呼父子研究了半年。我将此对联珍藏。

“文革”初期，徐兰沅先生被冲击时，我曾去他家中看望。后来我受冲击，大字报满墙，被管制不能回家，徐元珊先生悄悄到我家看望，见到我妻子、女儿说，工资怎么样？如断了上我家去。我后来听说此事，心中十分感动。

我在与徐元珊先生成为知心朋友时，曾将自己身世跟他谈

过，他很理解、同情，我们的友情超过一般的朋友，在“风暴”面前经得起考验。我与他相交二十多年，他在1995年故去，当时我未在北京，回来后赶去他家，在他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响头，与他告别。岁月如梭，故人远去，但心中时常思念，以后还经常与他夫人通电话问候。

我的另一位至交好友是著名武生王金璐先生。我们相识很早。1942年，我在上海“更新舞台”与他同班演戏，并有幸认识了他的老师、前辈丁永利先生。丁先生教授杨派武生，他那次是与王一起到上海，为他说戏，专门培养他的得意门生。丁先生对我也很好，曾对我说：“志良，我看你不错，走吧，跟我上北京吧。”当时演《八大锤》时，王金璐饰演陆文龙，我演岳云。我听了丁先生的话，虽然很高兴，可是想自己在北京无亲无故，不敢去。丁先生看出我的担心，他说：“爷们，我让你去还能饿着你。”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各个剧团都能安插人，后悔已没用了，失去了早到北京学艺的机会，很遗憾。

我在解放后到北京又见到王金璐先生，与他同为李洪春先生的学生，经常在李先生家相遇，过年过节、老师和师娘生日又在一起相聚，我与他也成了真正的好朋友。王金璐先生为人非常好，艺术造诣高。他在腰受伤后，凭着惊人的毅力恢复如初，又在舞台上再展风采，既演戏又育人，令我很钦佩。我们见面时，业务上切磋技艺，生活上相互关心，真挚相交。

我还与武戏演员，曾与徐元珊先生合作过，后在戏校当武功老师的翟成俊先生是好朋友。与他也是在梅剧团相识的，多年相互间真诚相待，也是酒友，志趣相投。

## 人生感受的不尽之言

在我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有了极深的体会。作为武生演员，更引为自豪。武

生行当难度较大，需要具有超常的毅力，付出数年汗水，勤学苦练，才能成为合格的演员。舞台上时时处处无不是功夫的展现。一出台“左手不离马面，右手不离胯骨，一招一式举手投足每一个姿势都一定有阴阳面”，塑造出威风英武的人物形象。然后在“闪、展、腾、挪、砍、剁、劈、削、跌、打、翻、扑”中表演“马战、步战、火战、水战、破阵战等等厮杀之战”，同时在唱念和表演中还要“沉于气、提于神、贯于顶”，神清气足展示出阳刚之美。在一出出的武戏中表演英雄豪杰、绿林好汉、武将忠臣、勇夫孝子，表现出他们的雄壮勇猛，潇洒英姿。

作为一名武生演员是很不容易的，我愿告诫后生，学业有成之后还要牢记“谦虚”二字。在我学艺的那个时代，老师们常说：“满师以后独创江湖只是开始。”对于现在毕业的学生来说，那就是刚走出第一步。青年演员一定不要认为自己有了一身功夫，本事高强就行了，要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不要单一的“艺高人胆大”。不谦虚随时会栽跟头的。我一生始终奉行谦虚谨慎的作风，认知“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使我在走南闯北中受益无穷。

我感到安慰的是，国家现在很重视优秀文化艺术的保留，音配像工作非常好，保护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学习、研究、欣赏资料。

作为我个人，现在家庭生活很幸福。我与妻子尹凌云女士1976年相识成家。她现在是文化部老干部局退休干部，她对我生活关心照顾很好。现在我的几个子女也都工作、生活很幸福。

现在我还在教着外地青年京剧演员，每天去龙潭湖公园一说起戏来仍是精神抖擞，连着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北昆如有需要，我仍会尽全力奉献自己的力量。在我心中还有一件憾事，早在退休之即，曾想回碓石镇老家，义务培养一批家乡子弟，为繁荣家乡京剧事业尽一份力量，可惜由于许多具体问题而未能成行。

我是一个做人单纯、知足长乐、快乐自安的人。一生中除了靠自己的实力谋生之外，其他时间就是以艺会友，我还经常与朋友、故交畅饮对斟，潇洒度日，怡然自乐。

我将所演过的大部分折子戏列举出来，作为总结和回顾：《驱车战将》、《伐子都》、《阳平关》、《大报仇》、《战马超》、《战冀州》、《长坂坡》、《连营寨》、《哭灵牌》、《斩颜良》、《斩华雄》、《战合肥》、《战宛城》、《战徐州》、《周瑜归天》、《收姜维》、《反西凉》、《走麦城》、《活捉吕蒙》、《界牌关》、《虹霓关》、《大破摩天岭》、《反西凉》、《凤凰岭》、《薛礼叹月》、《拿高登》、《穆柯寨》、《挑滑车》、《林冲夜奔》、《翠屏山》、《武松打虎》、《武松杀嫂》、《狮子楼》、《百凉楼》、《铁公鸡》、《恶虎村》、《薛家窝》、《洛马湖》、《洗浮山》、《溪皇庄》、《八叉庙》、《拿谢虎》、《莲花湖》、《恶虎沟》、《赵家楼》、《三岔口》、《花蝴蝶》、《嘉兴府》、《四杰村》、《两将军》、《金雁桥》、《广泰庄》、《汤怀自尽》、《三雅园》、《吴汉杀妻》。

正是：

叱咤风云在舞台，  
演尽男儿英雄态。  
人生飞逝回首望，  
粉墨春秋七十载。

（李梅整理）

